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三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三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www.mzdbl.cn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三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 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850x1168 1/32 印张12.25 插页2 字数230,000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200

统一书号：11094·72 定价：(平)0.94元

毛泽东博览 网站编辑
www.mzdbl.cn

副 主 编： 陈 志 凌 杨 世 兰

参加本卷审稿编委： 彭 明 方大铭 岳玉临

郑洪泉 李育安 刘富恒 房成祥 唐纯良

元邦建 何鹤志 范寅璋



彭 湃



苏 兆 征



徐 特 立



刘 志 丹



谢子长



许权中



毛 泽 覃

目 录

彭 湃	罗可群 邱锦荣	熊泽初 郭呈祥 (1)
苏兆征	榻倩红	卢 权 (66)
徐特立	蒋崇伟	邹秋龙 (101)
刘志丹	李振民	张守宪 (191)
谢子长	李振民	张守宪 梁星亮 (229)
许权中	张守宪	李艳玉 董建中 (259)
毛泽覃		刘仁荣 (283)

彭 湃

罗可群 熊泽初

邱锦荣 郭呈祥

彭湃，我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他是广东海丰县人。生于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农历九月十六日），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壮烈牺牲，当时年仅三十三岁。

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海丰位于我国南海之滨，北依崇山峻岭，南临汪洋大海，渔业和林业资源比较丰富。但是，海丰山多田少，土地瘦瘠，在封建剥削下，农业生产落后，农民过着贫困的生活。

鸦片战争后，海丰农民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生活更为痛苦。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打倒了溥清皇帝，海丰人民以为有希望了。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在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统治，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更加残酷。辛亥革命中，海丰出了一个陈炯明，他利用当地群众秘密结社“三合会”的势力，当了广东的都督、省长、陆军部长、总司令。陈炯明握到广东政权后，海丰突然增加了许多军阀、官僚、新兴地主

（指地主兼军阀），广大穷苦农民所受的压迫更加重了。“从前农民与地主发生争议，地主不过是禀官究办，现在新兴地主阶级用直接行动毫不客气的殴打、逮捕或监禁这些农民了，也可以直接迫勒抵租和强派军饷了。”^①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彭湃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彭湃祖籍在陆丰的吉康，从他的曾祖父彭魁起，搬迁到海丰县城郊的桥东社，开了一个小商店，号为“彭名合”。彭湃的祖父彭藩当家后，家业日益发达，购置了许多土地，除“彭名合”经营杂货外，又开设了一个兼营长生板的木材货栈，还有六十多间铺面出租，成了桥东社的首户。彭湃谈到他的家庭时说：“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②

彭湃乳名天泉，学名汉育，到日本留学时才改名为彭湃。在十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三^③。彭湃小时候，聪明伶俐，很逗人喜欢。六岁便进海城七圣宫读私塾，八岁转到林祖祠小学，十三岁进入海丰第一高等小学。小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优良。

在少年时期，生母周凤给彭湃影响很大。周凤原是海丰公平山区贫苦农家的女儿，当过婢女，十六岁嫁到彭家为庶母。她经常讲述穷苦农家的悲惨生活，使彭湃从小就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十岁那年，父亲彭新因病去世。在母亲的抚育

^{①②}彭湃：《海丰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见《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月版，下同。

^③彭湃的祖父把彭湃的兄弟和买来的长孙彭应培一起排列，应培算是老大，彭湃便是老四了。彭家的人习惯称彭湃为四哥，其妻蔡素屏为四嫂。

下，彭湃对农民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越来越强烈。彭母回忆说：“彭湃小时，每当听讲土霸劣绅、贪官污吏的故事，便大声痛骂，甚至在经过县里权贵门口时，也不喜欢。”^①彭湃十五、六岁的时候，祖父叫他去收租。到了佃户家里，他看到佃户们的穷苦生活，便空着手回家来了。祖父问他，租收到没有？他说，我家有吃有穿，佃户家没吃没穿，还要收他的租干什么？祖父听了大发脾气，把彭湃痛骂一顿。

一九一三年，彭湃高小毕业，考进海丰中学。彭湃在学校里，“好谈论时事和参加社会活动，是一个富有朝气的青年。”^②他爱和同学们到学校后面的方饭亭和表忠祠去，缅怀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英雄业绩，诵读他的爱国名篇《正气歌》^③。他爱读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报纸和杂志，拥护孙中山，常与不同意见的同学展开激烈的争论。一九一六年的“五七”国耻纪念时，彭湃和同学们一起，组织过反日爱国示威游行。

当时，海丰中学的进步学生组织起群进会，以互相激励，共同进步。彭湃是群进会的骨干之一。一九一六年秋冬，群进会组织了一场反对袁世凯爪牙林干材的斗争。

林干材是龙济光任广东都督时，派到海丰的驻军统领。他

①周凤：《湃的小史》，彭仕录存。

②陈其尤：《关于彭湃年轻时的一二琐事》（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访问纪录，未发表。

③“方饭亭”和“表忠祠”都在海丰县城北郊的五坡岭，是为纪念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而建造的。据1548年“方饭亭”的石碑《宋文文山公传略》记载：景炎三年十二月，文天祥“帅麾下走海丰，方饭五坡岭，元兵突至，众不及战，遂被执，解赴燕京，禁闭三年，作《正气歌》，元世祖不忍杀，诏劝之降，终不屈而就义。”方饭亭石碑拓片，原件存杨成志教授处。

专门“清剿”反袁的革命党人和三合会会员，屠杀了几百个农民。当地以陈月波、马剑郎为头子的豪绅地主，十分敬重这个凶恶残忍的刽子手，尊称为“统领公”，无耻地为他雕了一个石像，准备安放在“表忠祠”内，与文天祥配祀。群进会的成员对此非常愤慨，他们在海丰县城张贴标语，表示抗议。林干材、陈月波一伙扬言要武力对付，彭湃等人不怕恐吓，在竖像前一天的深夜，彭湃和同学陈复悄悄地来到表忠祠，乘看守的卫兵在大殿里边睡觉，迅速地把林干材石像的鼻子敲掉了。陈月波等人只好把没鼻子的怪像运往碣石，丢进大海。

反对林干材的斗争后，彭湃渴望离开海丰，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寻求真理，就拜托他家世交陈其尤向其祖父说情，允他到外地求学。由于“彭家虽富有但无势力，每逢题军需时常受官府迫勒”^①，彭湃的祖父怀着读书当官、彭家将来可免受欺侮的希望，同时也省得彭湃在家乡再惹祸端，便答应了彭湃的要求。

彭湃随陈其尤经香港到了广州，在广府中学读书一个多月。一九一七年初，东渡日本求学。他先在为中国留学生进行预备教育的成城学校补习，一九一八年五月三日毕业。一九一八年九月三十日，进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就读于专门部政治经济科（三年制）。

彭湃在日本的博物馆里看到从中国掠去的文物，在社会上看到有偏狭爱国狂的日本人竟然随意欺侮凌辱中国人的现象，便“以为生做中国人的唯一责任是救国，当头的急务是排日”^②。

①陈其尤：《关于彭湃年轻时的一二琐事》（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访问纪录，未发表。

②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载《晨光》第二卷第一号。

因此，在留学日本期间，他积极投入反日爱国运动。

一九一八年春夏间，日本与段琪瑞政府秘密谈判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国留日学生获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愤慨，彭湃和同学黄霖生、陆精治合影，他们在照片上写着：“民七年中国军事亡国协定被迫签订之日，特合摄此‘国丧纪念’照片，以示国仇之不忘。”^①

留日学生救国团的干部，在东京神田区“维新号”中国饭馆，以吃饭为名，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回国挽救国难的办法。突然，日本警察“持械明炬闯入室内，不问情由，将在座诸人乱打，刀斫足踢，掀桌倒台……”^②，接着，又将四十六名到会人员全部押到警署，进行辱骂、审讯。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将他们释放。中国留日学生满腔悲愤，痛切地感到，日本准许本国人结社集会自由，准许居住日本的欧美人结社集会自由，唯独不许中国学生结社集会，由于干涉而驱赶，而逮捕，而侮辱。三千留日学生忍无可忍，决定全体罢学回国，以示抗议。

彭湃回国后，由上海到广州，再回海丰，为反日救国事业东奔西忙。在广州，他和留日的广东同学发出《留日广东学生同乡会宣言书》，痛斥中日密约是“直举吾国领土奉送之”的亡国条约，说明“大祸临头，大义在目，威力甘言，不值一顾，此吾人所以不旬日而归国者千余，奔走呼号，愿舍学、舍身而谋废约救亡也。”^③回海丰后，彭湃发动青年学生，开展了“废约救亡”的宣传活动。

留日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而卖

①这张合影照片仍存彭潮处。

②王拱璧：《东游浑汗录》，上海图书馆藏。

③《留日广东学生同乡会宣言》（一九一八年），存广东省档案馆。

国媚日的北京政府的教育部，却强令归国学生“务于六月十日前到达日本，返回各校继续留学，其后仍不回校者，经调查核实，取消留学资格”^①。在反动政府的压力下，留日学生不得不忍辱负重，再行东渡。此后，彭湃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反日爱国活动，“完全是一位热烈的排日人物。东京警署内排日派的中国留学生‘黑表’上，遂有了彭湃的姓名。”^②甚至，连彭湃因鼻窦炎住院动手术期间，也有两个日本“刑事”（便衣警察）“陪同”。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帝国主义者强将德国在我山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东京，我留日学生无比愤慨，他们既仇恨得寸进尺的日本强盗，更痛恨那些奴颜媚日的卖国贼。四月三十日，报载驻日公使章宗祥将于次日回国。章宗祥参与签订中日密约，留日学生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得此消息后，彭湃等六十多个留学生，在章宗祥动身的那天，一清早就守候在东京车站，当章宗祥从地下楼梯上来乘车时，留学生一拥而上，高呼“打倒卖国贼！”并把写着“打倒卖国贼”的小旗子，掷到章宗祥坐的车厢里去。

五月七日，是中国的国耻纪念日，而日本政府却专门挑定“五月七日”来庆祝太子冠礼，以中国的“国耻”作为日本的“国荣”，留日学生非常气愤。五月六日，日本报纸报道了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他们决定在五七那一天召开纪念大会。但是，由于日警的预先警

①一九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日本东京《朝日新闻》，转引自实藤惠秀，《日中非友好的历史》。（日文），朝日新闻社一九七三年一月版。

②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见《晨光》第二卷第一号。

告，各处都不肯租借会场，想改在中国驻日使馆的俱乐部开会，又遭“事实上不过为日本外交部一附属机关”的中国使馆的无理拒绝。留日学生只好决定分成若干小队，分别向各国驻日使馆递送宣言书，然后到日比谷公园集中，再行解散。正当各小队向公园集合途中，又横遭镇压，日警“拔刀狂挥，马队亦纵横冲踏”^①，受伤者甚众，彭湃被打得“头部手足破皮流血”^②，被捕去三十五人。经过留学生的严正斗争，第二天释放了二十三人，六天后才又释放五人，其余七人竟被判处十天到半年徒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迫害，我留学生“呼吁政府既无持平之争，乞怜使馆每遭恶声之叱”^③，彭湃悲愤交加，转而寄希望于唤起民众，激励同胞。他回到住处，在长约一米，宽约半米的白绢上，啮指血书“毋忘国耻”四个大字。血书寄回海丰学生联合会，张挂在海丰中学的揭示板（即布告栏）上，大大地激发了海丰青年的爱国热情。“掀起了抵制日本劣货的轩然大波。海丰中学学生组织成队伍，在县城，特别到汕尾日货较多的商场搜查劣货，并把搜来的劣货全付之一炬，以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行为的愤恨。”^④

这一年的暑假，彭湃又回到海丰。当时，五四运动正波及全国各地。他把新文化运动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组织了“海丰白话剧团”，演出过《打倒帝国主义》、《朝鲜亡国恨》和反对封建迷信一类节目，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抨击。

暑假以后，彭湃回到日本继续求学。这时，正在日本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深深地吸引了他。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①②③王拱璧：《东游洋汗录》，上海图书馆藏。

④刘锦汉：《回忆彭湃同志的一些革命活动》（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六日），未发表。

下，原来已经比较活跃的日本思想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更广泛地传播开了，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团体也陆续出现。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以后，日本政府为了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颁布了新的大学法令，对思想舆论的控制有所放松，因此，在大学里研究社会主义的群众组织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杂志不断涌现。彭湃所在的早稻田大学，是著名的私立大学，有不少进步教师，素有关心政治的传统，对新思潮非常敏感。早在一九一七年底就有了工人学生协会的组织，后来又有了“人民联盟”，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八日，早大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学生组织了“建设者同盟”。

建设者同盟的成员多来自农村，与农民联系密切，熟悉农民的困苦，重视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他们希望通过学习和研究，找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措施，在大学期间就为毕业后的活动做好准备，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新社会。他们学习和讨论过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苏维埃研究等种种问题。他们重视实践，强调从事实际的农民运动。建设者同盟支持过佃农反对地主的斗争，要求减租，保证耕种权利。而且还对佃农纠纷进行过实际考察。

彭湃是个对新生事物敏感的人。“及至一九一九年以后，日本社会主义思想渐次普遍发达，彭湃思想又大受影响。”^①在这以前，彭湃曾一度笃信基督教，很欣赏基督教的博爱思想，“认为基督教也可以救国。”^②但是，在新思潮影响下，

①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见《晨光》第二卷第一号。

②彭泽：《对彭湃烈士的点滴回忆》，未刊稿，原件存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他认为基督教不能解决问题，“遂翻然一心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①，因此，在建设者同盟成立不久，他就参加了这个组织。建设者同盟重视农民运动，重视实践的特点，都直接为彭湃所接受。他在后来从事海丰农民运动时，还以极深厚的感情怀念着建设者同盟的战友^②。

当时的彭湃和建设者同盟的许多成员一样，对社会主义诸家学说都作为“鲜花”予以采纳。他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很感兴趣，从《互助：一个进化的要素》这篇著作中，接受了克氏的“互助论”思想。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很赞赏，俄国革命的胜利，更使他振奋。他和李春涛、杨嗣震等留日同学在一九二〇年组织了“赤心社”。“取名赤心二字，就是表示一心学习俄国”^③。他们出版不定期刊物《赤心》，不定期举行学习会，学习过《共产党宣言》、河上肇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等书刊，讨论过十月革命。他还直接到京都帝国大学去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讲课。

在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彭湃批判了偏狭的爱国思想，认为“狭义的爱国运动是不彻底的，因为我爱我的国，你爱你的国，这就造成互相侵略”，主张“要解放全人类”^④。因此，每

①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见《晨光》第二卷第一号。

②彭湃一九二三年六月五日给李春涛信中，怀念“建设者同盟”成员和田岩君时，说和田岩君是“日本建设者同盟的中坚，我们阶级斗争的战友，尤其是农民运动的闯将。闻他们到农村去，十几日没有睡眠，后来发生肠胃病，一命呜呼。唉！真悲惨！真痛恨！唉，我的眼泪要滴下来了。”

③李孝则：《彭湃同志在日本》（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④彭泽：《对彭湃烈士的点滴回忆》，未刊稿，存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逢“五一节”，他都参加日本劳动人民的纪念活动。他还“加入劳动者同情会，常助劳动者推挽重载上坂。”^①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彭湃和赤心社的成员又参加了日人堺利彦韩人权无为发起组织的可思母俱乐部（Cosmo-Club）。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社交组织”，“接近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②，参加这个组织的除日本、中国、朝鲜人以外，俄国（如爱罗先珂）、印度、南洋群岛及欧美诸国也都有人参加。他们多是一些左翼的文化人，有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如高津正道，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如大杉荣。他们不定期开会，讨论各种国际问题。彭湃参加可思母俱乐部的活动，被日本警探侦知，“嗣后，遂时有‘刑事’尾随彭湃。彭湃姓名，亦遂列入淀桥警署内社会主义者‘黑表’上，为八百注意人物中之一分子。自是以后，至一九二一年归国止，彭湃始终是日本警察眼中一个注意人物。”^③

一九二一年五月，因祖父、母病重，彭湃在早稻田大学参加毕业考试后，便提前归国，于五月二十三日，即他祖母去世的第二天，回到海丰。

丧事以后，彭湃一度到广州，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实践社会革命的理想，他回海丰后，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参加研究社的有七十多人，大多是青年学生，其中的郑志云、林苏、陈魁亚、李国珍等，后来都成了彭湃从事农民运动的助手。

社会主义研究社以座谈和专题讲演的方式进行学习。座谈

①③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见《晨光》第二卷第一号。

②田汉：《给曾文同志的复信》，存海丰红宫纪念馆。

过李大钊同志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专题讲演，主要由彭湃负责，他讲过《河上肇博士社会问题管见》、《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唯物史观》、《资本论入门》等问题，也介绍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①。

七月三十日，彭湃又组织起“劳动者同情会”。他在《劳动者同情会的缘起》中，抨击现存的教育制度“不是贫民阶级——劳动者、农夫、贫民的教育，而是贵族、官僚、资本家的教育”，“不是图平民福利的教育，乃是专教资本家官僚一班掠夺阶级的教育”。组织劳动者同情会的目的，就是“表同情于劳动者”，结束教育与贫民分离的现象。他提出：“凡我们能力所能及的，必欲与劳动者协力工作，互相扶助，交换知识，以促成教育与贫民相接近，庶社会的革新，有些希望！”这篇文章，是彭湃“反对现代教育制度的宣言”^②，反映了他革新社会的强烈愿望。

八月，彭湃写了一篇《告同胞》，发表在九月一日出版的《新海丰》创刊号上。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指出了私有财产制度所造成的种种社会罪恶，贫者耕不得食，织不得衣，造成屋宇而不得住；富者田园阡陌，高楼大厦，闲游无事而衣食住自足。因此，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破坏私有财产制度，实现社会主义。文章还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驳斥所谓“社会主义是提倡

①陈修：《彭湃同志在海丰创办社会主义研究社概况》（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未刊稿，存海丰红宫纪念馆。

②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见《晨光》第二卷第一号。

公妻”的瞎说。文章最后说：“有志者事竟成！我们既承认现社会之种种罪恶，种种缺陷，有不得不实行社会革命之决心，我们就应当赶快觉悟！……赶快将新社会现在我们的眼前！”但是，彭湃又认为，“我们今日的时代，即是世界有史以来未曾经验的一大破坏时代！”要实现社会革命，就“要破坏法律”、“破坏政府”、“破坏国家”，通过“互相研究！互相团结！互相联络！互相扶助而为之！”这表明了彭湃正处在从“深信无政府共产主义”到“对马氏发生信仰”^①的转变过程中。

不久，彭湃开始了从教育入手进行社会革命的实践。

当时海丰的教育被原劝学所长陈伯华搞得一塌糊涂。陈伯华结党营私，贪污腐化，劝学所的人员吃喝玩乐，不事教育。海丰的学生十分不满，群起反对，迫使陈伯华于八月九日借口“事繁不克兼顾本邑学务”而辞职^②。

八月十二日，海丰学联会“学生请愿彭湃为劝学所长”^③，陈伯华一伙仍想把持教育大权，便大造谣言，诬蔑彭湃提倡“共产”、“公妻”，进行攻击。

那时，担任广东省长的陈炯明，还没有背叛孙中山先生，“海丰要人钜公在广州者极多”。为了澄清是非，驳斥陈伯华一伙散布的流言蜚语，也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八月中旬，彭湃和学联代表郑志云、陈魁亚等来到广州。他给李春涛的信中说：“湃到广州二月，镇日里只向人解说社会主义是主张共产不是主张均产，是主张自由恋爱不是主张公妻。”^④陈炯明虽然

①彭湃：《给文亮的信》（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存广东省档案馆。

②③《陆安大事纪》，存汕头档案馆。

④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见《晨光》第二卷第一号。

不同意彭湃的主张，但又觉得彭湃是个人材，想拉来为己所用，便指示海丰县长翁桂清，聘请彭湃担任劝学所长。

一九二一年十月一日彭湃就任劝学所长后，进行了许多改革：对劝学所的人事进行整顿，清除顽固守旧的老朽，吸收进步青年，如陈魁亚等；聘请思想进步的留日同学杨嗣震、李春涛和北大毕业生黎越廷等担任中小学校的校长和教员；革新教学内容；发展乡村教育；举办女子学校；提倡体育运动等。

彭湃画了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像挂在办公室里，又在住房里贴了一副对联：“漫天撒下自由种，伫看将来爆发时”，抒发自己的革命抱负。他兼任美术课，画攻打冬宫的图画和马克思、列宁的像，培养学生的革命思想。

一九二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彭湃组织县城各校学生举行纪念游行。因为一号至三号下雨，遂延至四号举行，学生们高擎写着“赤化”二字的红旗，高呼“劳工神圣”的口号，唱着彭湃编写的《劳动节歌》，浩浩荡荡，穿街而过。这是海丰历史上第一次纪念五一节的游行，它使海丰的豪绅地主十分震惊，他们以为是将实行“共产共妻”了。这班豪绅地主早就对提倡社会革命的彭湃十分不满，“赤化”游行后，他们立即在《陆安日刊》上攻击彭湃“籍教育以宣传主义之谬妄”^①，又向陈炯明告状，说彭湃搞“赤化”，要实行“共产”“公妻”。五月九日，彭湃便被撤去了教育局长的职务，“县中所有思想较新的校长教员们也纷纷的下台了。”^②

彭湃想从教育入手进行社会革命的尝试失败了。但是彭湃

①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见《晨光》第二卷第一号。

②彭湃：《海丰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

并没有灰心。撤了教育局长的职务，“自谓如释重负”。^①此后他逐渐认识到发动工农的重要，在《海丰农民运动》中说，五一游行“参加的绝无一个工人和农民”，“实在幼稚到了不得”。^②

五月十四日，彭湃和李春涛等办起了自己刻写油印的小册子《赤心周刊》，与《陆安日刊》展开论战。第四期发表了彭湃写的《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这篇文章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没有完全摆脱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影响，但它已透露出彭湃从事农民运动的决心。他说：“若是受了教育，全无觉悟，专为官僚军阀作走狗，那就太不忠实了！”他设想自己“真把家财拿出来运动社会革命”^③。接着，彭湃在《赤心周刊》又发表了《告农民的话》。他母亲知道后说：“倘如此做法岂不是要破家荡产吗？”彭湃却认为“这篇文章若是农民看了，心里必非常欢喜，”他“自信农民一定可以团结起来”，于是，“放弃与陆安日刊无谓的笔战，而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④，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

“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

彭湃开始从事农民运动时，单枪匹马，遇到很多困难。初到农村，农民们有的以为他是来讨帐的士绅，有的以为他是来收税的官吏，应酬几句，便躲开了。尽管彭湃诚心诚意，不辞劳苦，一再宣传，但“农民被人欺骗的多，总以为湃的话是谎

①③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见《晨光》第二卷第一号。

②④彭湃：《海丰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

的。”^①豪绅地主则乘机造谣中伤，说彭湃被撤去教育局长的职务，忧郁在胸，得了神经病。彭湃到农村去的行动，也得不到家里的支持。因为“他家里特地花了一笔钱送他出洋留学，及他回来，不特不去做官挣钱，反而说要拿家财去运动什么社会革命，那他家里可就不答应了。”^②他自己说：“除了三兄和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刻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③彭湃一清早去农村活动，晚上回来，只能弄点残羹剩饭来填饱肚子。在给李春涛的信中，彭湃说：重重困难“几乎把要到民间去的念头打消。幸而湃的决心是十二分坚决的，遂把这个形单影只的我，送到农村去作单独的奋斗。”^④

彭湃一心要和农民交朋友，而农民却不愿和他接近。这是什么原因呢？他细心思索，终于认识到：自己穿戴特殊，农民不敢接近，自己讲话太文雅，农民听不懂。于是，他摘下白通帽，戴上尖顶竹笠，脱下鞋子，光着脚板，带着农民爱用的旱烟筒，到农民中去，用通俗的语言和农民交谈。他选择了一个好地点——海丰城东郊龙山的天后庙前作为宣传阵地。这里是交通要道，许多农民进出县城，都从这里经过；庙前一棵傍溪生长的大榕树，郁郁葱葱，树底下，正是行人歇脚的好地方。在农民路过休息时，他主动和农民攀谈，有时还发表演讲。方法改变之后，马上收到了效果。彭湃说：“是日与我谈话的有四五人，听我演说的有十余人之多，其成绩为最好。”^⑤后来，彭湃的办法就更多了。他有时先表演魔术，有时用留声机播放

①③⑤：《海丰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

②④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见《晨光》第二卷第一号。

唱片，有时教牧童唱民歌，吸引来许多农民，再进行宣传演说。他还到青年们爱去的拳术馆练武术，结识农村青年。

彭湃的宣传，越来越深入。他用“耕田亏本”的道理，揭示农民痛苦的根源。他对农民说：“地主便是欠你们的大账者，他年年闲逸无做工，你们耕田耕到死，结果将租谷给他收去，他们一坵田多者不过值百元，你们耕了千百年，试计算一下，你们给他收了好多谷呢？我们想起来，实在是不平，所以来和你们磋商，怎样和地主拿回这笔账！”^①怎样才能“拿回这笔账”呢？他说：“农民如有了团体，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就可以实行减租，那时地主一定是敌不过我们，只有束手待毙。”^②彭湃的这些话，使农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青年农民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和李思贤等成了彭湃最早的知心农友。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旧历六月初六日）的晚上，他们五个人来到彭湃的住处——得趣书室，和彭湃谈起农民的运动，越谈越融洽，接着他们进一步商量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动农民。李老四说：“喂！我们几个先立一个农会，将来有人加入，那就不用说。如无人加入，我们也不要散，好不好？”彭湃高兴地说：“那好极了。”^③于是，就在当天晚上，组成了一个六人秘密农会。这是后来赤山约农会的萌芽。它的成立，开始了海丰农民运动的第一步。彭湃对此极为兴奋，他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成功快到了！”

六人农会的成立，大大加强了彭湃开展农运的信心。他热情地帮助张妈安、林沛学会演讲，张妈安和林沛则带领彭湃到农村宣传。彭湃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锄草翻地，车水挑粪，

①②③彭湃：《海丰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

晚上又挑着留声机，走田间小路，深入乡村。“六个人的团结与奋斗”，^①成绩颇佳，听众由原来的几个人、十几个人迅速增加到六、七十人，以至二百余人。彭湃等人的赤心还感动了一个名叫吕楚雄的医生，他也和彭湃等一起奋斗，他们一同下乡，边行医，边宣传，“食尽了四乡的茶饭，差不多日日是早出夜归。”^②很受农民欢迎。

彭湃越深入农民，他的地主家庭对他就越不满。他的大哥竟因此向他提出分家。分家以后，彭湃把分给自己的田契，亲自送给佃户，佃户们不敢要，彭湃便把他们召集到得趣书室门前，将田契当众烧毁。他对佃户们说：“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从此，他和妻子蔡素屏过着俭朴的农民生活。在蔡素屏的支持下，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农民运动。

在两个多月的串连发动过程中，彭湃耐心细致地动员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农会。有的农民虽也赞成农会，但要等别人都参加了，自己才肯参加。面对这种情况，彭湃并不埋怨农民落后，而是反复耐心教育。他说：若是个个都等别人先加入，那在千年后还是没有农民成立农会。“我们入农会，比方过河一样，这面河岸是痛苦的，对岸是幸福的，可是个个都怕被水淹死，都不愿先过，我委他，他委我，互相推委，结果没有一人敢过。我们加入农会，即是联合的过河，手握手的进行，如一个跌下河去，就手握手的接起来，所以农会是互相扶助，亲如兄弟的机关。”^③经过耐心引导，加入农会的人逐渐加多。农会

①③彭湃：《海丰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

②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见《晨光》第二卷第一号。

组织发展后，显示出团结的力量。云路乡一个农会会员的小媳妇上厕所溺死，娘家的人来打人命官司，会员们便集合起来和对方讲理，使对方不敢闹事，并宣传农会是贫人的会，大家团结一起，亲如兄弟，互相帮助的道理。农会针对农民互相夺耕及地主加租易佃等情况，便及时定出条例，妥善解决农民之间的争端，团结农民和地主斗争。农会还向城市的土霸作斗争，取消了勒索农民的码头捐。农民从实际受益中体会到农会的好处，参加农会的人不断增加，到一九二二年农历九月时，会员已扩展到五百余人。这时，乡村的政治权力实际上已由绅士土豪之手移至农会，农会在农民中的影响和威望大大提高了。

十月二十五日（农历九月初六日），召开了赤山约农会成立大会。彭湃为赤山约农会草拟了组织章程，规定凡入会者，经本人申请，交纳会费，经谈话后发给会员证。会员证上面印着“不劳动，不得食，宜同心，宜协力”，教育农民团结起来，为反对剥削而斗争。

从彭湃开始去农村到成立赤山约农会的实际斗争中，农民逐渐认识了彭湃，彭湃也更深刻地认识了农民。赤山约农会成立不久，彭湃在给李春涛的信中说：“他们（农民）实在不乏聪明的人。他们对于农会的组织，都具有热烈的情感。他们现已渐有了阶级的觉悟。他们现已渐能巩固自阶级的营垒。他们还能向别约宣传，教导别约快起。”^①彭湃坚决表示：“湃也不愿和现在最有生机的农会及亲切可爱的农民离开了！”^②

^{①②}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见《晨光》第二卷第一号。

赤山约农会的建立，对于长期饱受压迫剥削的海丰农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又是一个实际的榜样。农会努力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特别是创办农民医药房，优待会员治病，更受农民欢迎。农会威望日高，农民入会日众，很快形成了加入农会的热潮。“由赤山约而平岗约、银镇约、青湖约、河口约、西河约、公平约、旧墟约……十余约，都成立了约农会，把县城东西南北都包围起来了。”^①面对迅速发展的形势，彭湃计划到旧历年尾，“可以组织总农会于县城，可以向田主挑战。中国农民的阶级斗争，将现出于南部海丰一隅！”^②

一九二三年元旦，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会员达二万户，人口约十万人，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成立大会上选举彭湃为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总农会设有文牍、农业、宣传、仲裁、财政、交际、庶务、教育、卫生等九个部，下辖海丰各约农会。总农会制定了黑赤两色分四角联合的会旗，象征原来被统治阶级分裂为红旗邦和黑旗邦的农民团结起来。彭湃为海丰总农会起草了《临时简章》，提出农会的纲领是：“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③，并详细规定了农会的各项活动。海丰农会“所取的政策：（一）对付田主；（二）对付官厅。即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④海丰总农会还向全国发出报告总农会成立和关于时局的两个宣言。庄严宣告：“我们农民，是世界生产的主要阶级。”可是，“几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无日不在无智饥饿压

^①彭湃：《海丰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

^{②③④}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见《晨光》第二卷第一号。

迫的难关恶战苦斗以维残命！”“所以，我们一旦觉悟，集合全县农民，组织农会，协力团结，反抗社会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争回我们生存的权利。”^①这个县级农会的建立，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推向了有纲领、有领导的新阶段。

海丰总农会在《农会利益》传单中，对农会的作用阐述得十分详尽：一、防止田主升租；二、防止勒索；三、防止内部竞争；四、凶年呈请减租；五、调和争端；六、救济疾病；七、救济死亡；八、救济孤老；九、救济罹灾；十、防止盗贼；十一、禁止烟赌；十二、奖励求学；十三、改良农业；十四、增进农民知识；十五、共同生产；十六、便利金融；十七、抵抗战乱。农会并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首先，把番茨市移到农会附近，把管理市场的权力从土豪劣绅手中夺取过来，将该市的收入拨为农民医药房的经费，免费为会员诊病。举办学校，学生免费读书，“自是与教育绝缘的农村儿童，有五百余人得入学校读书了。”^②农会还发动农民广种山松，作为全县农民的公有财产。

海丰总农会还很注意斗争策略。当时的海丰县长翁桂清，既不赞成农会，也不敢解散或禁止农会，农会能比较自由发展。因此，农会政策虽有“对付官厅”这一条，但不把翁桂清作为斗争目标。在提斗争口号时，又分为内外两种。“对内（农民）的口号：一、减租；二、取消‘三下盖’^③；三、取消‘伙

①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见《晨光》第二卷第一号。

②彭湃：《海丰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

③农民交租时，地主用自制的租斗盖（系极坚重的木，长约一尺七寸，大约一寸半径）盖三下，以多收租谷，农民称之为三下盖。

头鸡’、‘伙头鸭’，取消‘伙头钱米’^①；四、不给陋规与警察。对外的口号：一、改良农业；二、增加农业知识；三、作慈善事业。”^②而且提出“对于实行减租一层，预备五年的训练之后实行，目前不能做到。”^③

农会的这些政策和策略，避免了官厅的干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农会出现了“极盛之状况。”^④为了进一步扩大农会的影响，一九二三年旧历新年时，举行了全县农民同乐会。到会的会员达六千多人，非会员三千多，共约一万人。会场上锣鼓齐鸣，歌声四起，燃放舞狮，气氛非常热烈。大家高呼“农民万岁”，表现出农民组织起来后的巨大革命热情。“是日加入农会已发会证者二千余人……自后入会者亦日以百计，农会接洽新会友者有应接不暇之势。”^⑤

海丰总农会的成立和发展，大大地鼓舞了毗邻的陆丰农民。成立海丰总农会时，有十多名陆丰农民自动前来参加大会，并当场加入农会，领取了会员证。后来，他们又请彭湃去指导陆丰农运。在彭湃的关心和指导下，陆丰县从一九二三年初开始，经过深入宣传，培养骨干，发展核心力量，组织起农会，到六月份，入会农户达八千多。六月二十三日召开陆丰县农民代表大会，建立了县总农会，彭湃兼任该县总农会会长。

农会力量的壮大，引起了豪绅地主阶级的仇恨与恐慌。于是，他们纠合起来，妄图扑灭农会。一场地主与农民之间尖锐的阶级斗争终于爆发了。

一九二三年三月的一天，海丰恶霸地主朱墨，无理要佃户

①地主规定在收租时，农民必须削鸡杀鸭招待。“伙头鸡”“伙头鸭”“伙头钱米”都是农民除交租外的额外负担。

②③④⑤彭湃：《海丰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

余坤等六人加租，余等在农会的支持下，辞退了所耕的田地。朱墨以为依仗他们的势力，可以随便欺压农民，便向当地法庭诬告余坤等退田不足坵数，“佃灭主业”。法庭推事张泽浦慑于农会的力量，不敢袒护朱墨，据理判朱墨败诉。朱墨气急败坏，便串连地主豪绅，由陈月波领头，搞了一个专与农会作对的粮业维持会（农民称它为“斗盖会”）。粮业维持会的土豪劣绅们，向张泽浦施加压力，逼着张泽浦再次开庭，几乎未经讯问，便把余坤等六人收监，还上了镣铐。总农会得知这个消息，决定发动农会会员到法庭进行请愿斗争。

第二天上午十时，六千多农会会员已在海丰城东的龙舌埔集合好。彭湃鼓动大家说：农友无罪，被法庭枉押，法官违法。我们应认定这不是余坤等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整个农民阶级的事情。余坤等如果失败，就是我们十万农友的失败；余坤等如果胜利，也就是我们十万农友的胜利。在这生死关头，希望大家奋勇前往，湃生死都和大家在一起！听了彭湃的讲话，群情激愤。农会干部黄凤麟接着说：众农友不要怕。如果地主要与我们宣战，我们就宣布拆去田基，掘掉田界，使地主认不出自己的田地，让他们自相争吵打起来。大家听了，欢呼雀跃，情绪高涨。然后，大家挥舞小旗，列队出发，浩浩荡荡，冒雨前进。彭湃等二十名代表进了法庭，严词责问张泽浦，提出必须立即放人。张泽浦面对声势浩大的农民群众，只好开镣释放了余坤等六位农民。斗争取得胜利后，大家十分高兴，一路欢呼“打倒地主”、“农民万岁”的口号，簇拥着余坤等回到总农会。

彭湃在总农会又发表演说，分析胜利的原因。他问大家：“农民千百年来都受地主绅士官厅的冤枉和压迫，总不敢出

声，今天能够把六个被押的农友放出来，这是谁的力量呢？”有人说是彭湃，有人说是农会，有人说是耕田同志的力量。彭湃对大家说：“说是彭湃个人的力量乃是大错特错的，彭湃如果有力量，还要你们六、七千人去作甚么？我相信一个彭湃，任你有天大本事是放不出农友来的。……今天得到胜利的力量，是农会能指导六、七千人的耕田佬团结在一块地方，有一致的行动，……使官僚不得不怕，不得不放出农友来！”“大家应该自今日起，更加团结，加紧扩大我们的势力……”^①

反对拘押农民的大示威，矛头直指封建地主、军阀官僚的政权机关，并以农民的胜利和地主阶级的失败而告终。粮业维持会长陈月波不得不借故辞职，出走香港，维持会无形中解散了。这次斗争使农民更加认清了农会代表农民的利益，“由是要求入会者纷至沓来。”^②不仅海丰总农会的会员进一步发展，紫金、五华、惠阳、陆丰等县的农民加入农会者也逐日增多，这时，各县的农会入会户数约达二万六千八百户，会员约十三万四千人。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海丰总农会扩展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各县分设县联合会。不到两个月，又发展到潮州、普宁、惠来方面，遂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各县均设县农会。彭湃被推选为广东省农会执行委员长。执行委员有农民出身的杨其珊、蓝镜清、张妈安、万维新、黄正当、万清睐和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劳工、林苏、余创之、彭汉垣、马焕新等。广东省农会设在海丰，同时兼摄海丰县农会的职权。以海丰为中心的粤东农民运动出现了高潮。

^{①②}彭湃：《海丰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深夜时分，强台风突然袭击海丰。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狂风暴雨的吹打，“倒坏房屋无算，田禾完全失收”^①。据海丰总农会调查部报告：“各灾区损失最大者为各种农产品，损失约百分之九十，牛猪等家畜损失百分之四十有奇，房屋之倒塌者约百分之四十，毁烂者百分之二十，人命之损失者未有确实调查，总有五百人以至千人之数，实为海丰有史以来未曾有之大损失。”^②灾情发生后，农民纷纷到农会商求解决办法。彭湃原来打算应约去广州找陈独秀，商量有关农会的事情，看到灾情这样严重，便改变主意，留在海丰。他和农会干部一起研究救灾办法，立即组织救灾队，奔赴灾区。同时，召开农会执行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会议，决定“至多三成交租”，收获不及三成者照数减之，如全无收获者则免交。农民抱着“生为农会人，死为农会鬼”的决心，团结在农会周围，为实行减租决议而斗争。

剥削成性的豪绅地主，不顾农民的死活，仍然坚持要十足收租。反动县长王作新伙同保卫团局长林斗文，劣绅丘景云召集地主开会，把沉寂了几个月的“粮业维持会”又恢复起来，由林斗文兼任会长，对抗农民的减租斗争。旧历六月底，林斗文的侄子到北笏仔乡收学租，说什么“学租”是“官租”，毫厘都不能减。农民则坚持要按农会的决议减租，于是发生激烈冲突。王作新借题发挥，派武装“游击队”围捕农民，捕去三个老年农民入狱。而且还张贴布告，“不准自由减租，违则严拿究办”。

①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见《晨光》第二卷第一号。

②彭湃：《海丰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

当时的形势正如彭湃所分析的：“海丰全县分出极明显的两个阶级的营垒：一为地主阶级，一为农民阶级。在工人方面是甚与农民表同情，……土豪、烂崽、绅士、警察、法庭、行政衙门之官吏皆立在地主方面。”^①

为了加强对全县减租斗争的领导，经总农会执行委员会讨论，决定于农历七月四日召开全县农民大会。那天，县长王作新贴出布告谓“匪首彭湃希图造反，四乡人民勿为所愚而自招重祸”。并派出警察到大路口把守，不准农民参加大会。但是，愤怒的农民群众仍然象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向县城，二万余农民群众举行了使豪绅地主胆战心惊的声势浩大的集会。在这次减租的誓师大会上，彭湃等农会的领导人发表演说，当“说至农民痛苦，演说者与听众皆相感泣”^②。大会对被捕农民的问题，决定依据法律诉诸法庭，采用和平方法解决。

彭湃和农会干部对凶恶的地主阶级缺乏足够的警惕，没有料想到“愈平和愈受压迫”^③。反动县长王作新和粮业维持会的地主豪绅，勾结反动军官钟景棠，伙同县公署“游击队”长王益三，率军警三百余人，突然于八月十六日（农历七月初五日）凌晨包围农会，“被掳去职员及会员杨其珊、黄凤麟、洪庭惠、郑渭净等二十五人。会中所有文卷器具以及会金九百多元，用马二匹，皆被没收。同日，又封锁会所，解散农会，四贴布告，通缉会长彭湃、余创之、林苏等。十七日早（七月初六日）复查封农民医药房，缉拿医生吕楚雄。……旋又纵令各区警兵四出下乡逼租；并查缴农会会员证章，多方苛勒，百

①②彭湃：《海丰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

③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见《晨光》第二卷第一号。

般骚扰，农民生机全绝，惟有待死。”^①这就是震动全省的“七·五农潮”。

彭湃和其他脱险的农会干部集合在大嶂山边的小庵寺开会分析形势。他们认为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处境困难。为了稳住自己的地盘，他标榜“同情”农会，企图控制农运，还想拉拢彭湃作为自己的幕僚。因此，决定由彭湃、林苏、蓝陈润三人前往老隆找陈炯明，拟利用他对王作新施加压力，释放被捕农民。彭汉垣、李劳工等则继续留在海丰，组织农民武装，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到老隆后，彭湃以海丰农民代表的资格向陈炯明交涉，使陈不得不承认农会提出的“至多三成交纳”的口号是合理的，并给王作新发出电报：“凶年农民要求减租，事属正当”，“至于捕杨其珊等二十余人，查非聚众扰乱治安，应即省释。”然后，彭湃和蓝陈润又经五华到潮汕去，争取社会舆论对海丰农民的同情和支持。

在潮安，彭湃请李春涛起草了《海丰农民告同胞的宣言》^②寄发各地，揭露海丰地主豪绅压迫农民摧残农会的暴行。

九月，彭湃秘密回到海丰，得知王作新收到陈炯明电报后，并不释放被捕农友。他和彭汉垣、陈修、郑志云、李劳工商量，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不宜组织暴动，而应继续深入细致地暗中联络各乡农友。对陈炯明可以利用，但不能依赖，因为

①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见《晨光》第二卷第一号。

②据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文，题目应是《海丰全县农民泣告同胞书》。

陈暗中支持解散农会，希望他设法释放农民是不可能的。为了进一步争取外界援助，决定彭湃和李劳工到香港活动。

在香港，他们一方面做上层人士工作，如争取林晋亭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又到人力车工人（多数是海丰失业农民）中进行宣传和募捐，很快募得八十多元，立即寄回海丰，救济被捕的农友。他们还在香港发表文章，驳斥陈月波之流在《新闻报》上对海丰农运的污蔑和攻击。

一个多月后，彭湃和李劳工又经汕头到老隆，敦促陈炯明释放狱中农友，但陈炯明却一味敷衍，还想拉彭湃去惠州为他服务。至此，彭湃深刻地认识到：“要求陈炯明释放农友是笑话”，“根本方法”还是“发展农民运动”^①，把立足点放在扩大农会组织，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彭湃和林苏在汕头发起组织了包括海丰、陆丰、惠阳、紫金、普宁、惠来、澄海、潮安、潮阳、五华等十县的“惠潮梅农会”。彭湃亲自到澄海、潮安、潮阳各县进行联络。陈炯明对农会组织的迅速发展十分不满，但表面上却电告农会，表示非常“赞同”。彭湃他们就故意将来电登在报上，趋炎附势的官僚们以为陈炯明真的支持农会，纷纷给农会捐款。彭湃将所得五、六百元汇回海丰，支援受难农友。

陈炯明担心日益发展的农运必将危及他的地主阶级利益，于是，他函电交驰，频促彭湃到惠州去“共商革命大计”^②，以图利用彭湃，控制农民运动。但陈炯明没有料到，他的这一举动，反而为农会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十二月下旬，彭湃和李劳工回到海丰，在宣传惠潮梅农会发展规模和声势的同

^{①②}彭湃：《海丰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

时，又透露陈炯明“支持”农会并电请彭湃赴惠一事。弄得反动县长王作新一反常态，说：“彭湃我是十二分拜服的”，“我是他的母舅”等等，又是捧场又攀亲。海丰驻军头目钟景棠也派亲信来找彭湃，表示奉承。当时，王、钟之间因争夺一笔赃款而互相攻击，彭湃利用他们间的矛盾，对钟景棠晓以利害，使被捕农民终于全部获释。

农友们出狱后，农民要求恢复农会的心情更加迫切。彭湃和李劳工等农会干部紧张工作，准备重新奋起，恢复海丰农会。这时，刚好陈炯明因办丧事回海丰，彭湃等乘此机会，组织群众夹道“欢迎”，由刚出狱的杨其珊在致“欢迎词”中提出农民要立会的要求。群众的“欢迎”，使陈炯明得意洋洋，他一口应承：“工商学都有会，农民那可无会。”于是，恢复农会的工作便能公开进行了。

农会的恢复，急坏了海丰的豪绅地主，他们纷纷向陈炯明诉说。这时，彭湃想进一步摸清陈炯明的态度，也到了陈家。冤家对头，不意碰到一块了。一见面，王作新就攻击彭湃“做事太过激了”。彭湃理直气壮地驳斥：做事过激的只是你们！去年狂风暴雨，农民损失惨重，尽人皆知。农民的血本被风刮掉了，被水冲走了，我们帮助贫而受损失的农民减纳租谷，而你们却帮助毫无损失的地主去勒索受灾的农民，这到底是谁过激呢？而且农会还有至多三成交租的规定，对地主可说是温和极了！而你们又诬告农民造反，解散农会，还把二十多个农民监禁半年之久，这不是你们过激又过激了吗？接着，彭湃又当面揭露王作新敲诈勒索为非作歹的种种事实，王作新狼狈不堪，又不便发作，十分尴尬。海丰保卫团局长林卓存（即林斗文）摆出老师的资格，责问彭湃：“你是我的学生，为什么在

报上骂我？”彭湃反斥道：“违背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就是大逆不道！即父母也不理他三七二十一，何况师生情分！”驳得林卓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又是大绅士又是风水先生的陈展麟想打圆场，他说：“彭先生你是好人，办农会是好的，不过双方不可各走极端，应该和平解决。”彭湃义正词严，对这帮豪绅地主说：“你们天天剥削农民的膏血，把农民迫得要死，现在农民已觉悟起来了，你们再不得去欺侮他们，如再欺侮他们，只有你们上当！”一场激烈的论战，驳得豪绅地主们理屈词穷，陈炯明也无法为他们辩护。这伙人只好一个个都借故溜之大吉。陈炯明的两个护弁是农民出身，在场听了这场辩论，深受教育。他们看见座中只剩下彭湃时，便跑过来说：“彭先生，你真是骂得好！”并表示要加入农会^①。

论战以后，彭湃他们决定在农历二月十三日举行海丰总农会恢复典礼。

陈炯明已深感到彭湃不能为己所用，他的真面目便暴露出来了。他指使王作新贴出布告：“顷奉总司令面谕，尅日须将农会解散，如敢故违，定必严加究办”，准备实行武力镇压。

彭湃和农会干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经过认真讨论，一致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决定取消农会的公开组织，转入地下。彭湃、李劳工等则离开海丰，向外发展联络，准备新的斗争。

“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在从事海丰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彭湃更坚定了对马克思主

^①彭湃：《海丰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

义的信仰，也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一九二三年我党“三大”以后，对农民问题也日益重视起来，并由此加强了和彭湃的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彭湃于一九二三年底到一九二四年初这段期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①。

一九二四年四月，彭湃到了广州。当时，广州的革命形势很好。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逐渐高涨。为了培养农运干部，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我党倡议，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出，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议案。其名称先后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由中央农民部主管，委派当时担任农民部秘书的彭湃为第一届农讲所主任。

第一届农讲所于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开学。校址设在广州越秀南路53号的惠州会馆（现93号），学员共三十八人，都是我党团组织在各地选派来的先进分子，其中“以‘五四’运动奋斗的经验而觉悟到要‘入民间去’之分子为多，次则为农民已接受本党政纲而做农民运动于前者，次则工人曾参加工会组织

^①关于彭湃入党时间有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等多种说法，须进一步考证。我们的根据是，一、彭湃本人的书信。在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他给文亮的信还说“中国共产党我大不明白，恐怕是无当用吧”，说明他这时还未入党。二、一九三〇年八月三十日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刊登《彭湃杨殷两同志事略》，说彭湃在一九二四年入党；一九四五年中央组织部编印的《死难烈士英名录》，记载彭湃入党时间是在一九二三年前后。三、有一些老同志回忆，说彭湃入党时间是在一九二三年“七·五”农潮以后。

运动者，有女生二名”^①。

在培训农讲所学员过程中，彭湃亲自讲课。他分析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情况，揭露广大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教育学员为农民群众的翻身解放事业而斗争。他着重介绍海陆丰的农民运动，并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搞农民运动必须有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要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彭湃还聘请有关方面的著名人士来所授课，如请廖仲凯讲国民革命；阮啸仙讲国民革命中的工农政策；周其鉴讲广宁农民运动；罗绮园（后来叛变）讲有关农民运动问题；林苏讲农民运动的宣传问题；鲍罗庭讲国际问题。丰富的教学内容使学员们开阔了视野，学习了开展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

除组织正式授课外，彭湃还很注意所外活动，常利用假日带学生到郊区农村实习，进行社会调查，开展宣传，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等。此外，农讲所还有步行和马术训练。军事科目占全部课程的五分之一。

孙中山先生对农讲所十分重视，八月二十一日，他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亲自参加第一届学员的毕业典礼，发表了《耕者有其田》的重要演说，强调农民是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革命就没有基础。他指出，学员毕业以后，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是“农民运动所办的第一件事。”

经过严格培训的农讲所学员，成了农民运动的骨干。他们对推动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届正式毕业的三十三名学员中，有二十四名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农

^① 《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情况》，见一九二六年《中国农民》第二期。

民部特派员，到广东各地领导农民运动。学员黄学增担任广东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主任，主办了雷州宣传讲习所，培养了九十多名农运干部。他还在廉江、遂溪、海康等地发展党的组织，大力开展工农运动。在斗争实践中，黄学增迅速成长，与彭湃、阮啸仙、周其鉴等齐名，被称为广东农民运动的四大龙头（领袖）。学员陈伯忠担任广宁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农民自卫军军长，多次率领农军与反动地主武装战斗，保卫了农民利益，发展了农民运动。学员梁桂华在中山县开展农运，建立了上、下栅乡农民协会和九区农民协会。西江的韦启瑞，后成为广西农运负责人。鹤山的丘鉴志、陈式熹，顺德的李民智等也在工作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都是农民运动中的佼佼者。农讲所的开办为迅速培养农运干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是我党培养革命干部的一个创举。

第二、三、四届农讲所分别由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担任主任。这期间，彭湃忙于到广东各地去指导农运和参加东征。一九二五年四月彭湃又在海丰城郊的龙山准提阁开办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由他兼任所长。这些学员毕业后，奔赴饶平、潮安、普宁、惠来、五华、揭阳等县，促进了东江各县农民运动的发展。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四日，第五届农讲所开学，彭湃又担任农讲所主任。这一届共招生一百一十四人，学员来自湖南、广东、湖北、山东、广西、江西、安徽、福建等八省，其中湖南籍的学员最多，有四十三人。毛泽民、蔡协民等都是这一届农讲所的学员。他们毕业后为促进农民运动的中心从广东向湖南转移起了先导作用。

第六届农讲所，由毛泽东任所长。彭湃仍兼任教员，讲授

《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状况》。一九二六年，彭湃在汕头领导农运时，又在汕头开办了东江工农运动养成所。一九二七年春，毛泽东在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又被聘为教员。为培训农运干部，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九二四年四月，在农民部部务会议上，决定在广宁县等六个地区重点开展农民运动。会后，周其鉴带领三十多名广州油业工会工人前往广宁开辟农运。遵照中共广东区委指示，五月中旬彭湃也到了广宁。他和周其鉴一起，首先建立中共广宁支部，吸收农民运动积极分子高玉山、高树南、高金、詹庆等八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深入农村，向农民揭露地主剥削的罪恶，宣传佃农“耕田亏本”，说明农民只要团结起来，向地主阶级斗争，必将取得胜利。彭湃还介绍各地农民反抗地主豪绅的经验，提高农民争取胜利的信心。经过宣传发动，“不过十日光景，农民觉得理由也充分了，方法也实在了，团结果然觉得是必要了。”^①广宁农会会员由原来的四千余户猛增至七千余户，十月，正式成立了广宁农民协会，建立了县农民自卫军，同时决定在已成立农会的区乡首先实行四成减租。

地主豪绅为了破坏农会领导的减租运动，提出“武力反抗”的反动口号。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大地主江汉英、江淮英为头子的豪绅地主纠合组成业主维持会，筹经费，买枪枝，招民团，建立反动武装，相约“佩齐枪剑，虽打死不裁升合”^②，硬是不愿减租，要与农会较量到底。

在双方短兵相接的紧急时刻，彭湃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二次来到广宁。在农民群众大会上，他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

^{①②}周其鉴：《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月版。

员身份，表示坚决支持农民群众向反动豪绅地主进行斗争。会后，农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到县公署请愿，提出：一、解散业主维持会，二、缉拿祸首江汉英、江淮英；三、告示地主不得违抗农民公决减租成数，严禁地主持械纠匪强迫收租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右派县长蔡鹤朋不得不答应拿办江汉英等反动地主，承认请愿所提出的各项条件。接着，彭湃等又提出了区别对农会的不同态度而决定是否允其收租的原则，来分化瓦解地主阶级，以便集中力量，打击仇恨农会的反动大地主。

减租运动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广宁的大地主竟指挥反动武装，攻打农会，杀害农民，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为了使广宁农运能胜利开展，孙中山大元帅府把我党直接掌握的武装——铁甲车队派往广宁。十二月十一日，铁甲车队一到广宁，彭湃就在当晚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制订了攻打谭埗地主民团的计划。次日，农民自卫军在铁甲车队的支援下，一举攻占了谭埗大地主江淮英的老巢谭岭坑，夺取了首战胜利。

谭埗被攻下后，地主民团退守江家炮楼，负隅顽抗。江家炮楼是广宁著名的封建堡垒，有五层楼高，可容纳几百人，储有大量粮食武器，周围还挖了水壕，是一座易守难攻的水楼。反动地主武装集中在江家炮楼，准备对农会和农军实行反扑。

这时，粤军三师的两个连由师副官长詹学新率领来广宁驻防。江汉英立即大摆宴席“慰劳”，且每人每日发银两块，使詹学新等人为地主说话。斗争形势骤然逆转。在此紧急时刻，彭湃和铁甲车队长、共产党员徐成章，不顾个人安危，亲赴兵营拜访詹学新，力劝三师执行国民党关于扶助农工的政策。同时，发动群众慰劳三师官兵。十九日，县农会又在社岗田垌举行“农兵联欢大会”，彭湃在会上演说，号召农民与士兵团结

起来，号召士兵支持农民革命。通过一系列争取工作，三师官兵对农会的态度逐步有所转变，士兵对农会表示同情，军官保持中立，不再公开帮地主说话，也不敢公开阻碍农民运动。

十二月二十五日，根据孙中山大元帅府电令，彭湃等人组成广宁绥缉善后委员会，负责处理广宁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问题，委员会通过了《缉拿破坏农民运动的罪魁祸首江汉英、谭侣松等八人》、《收缴地主反动武装》两项议案。谭侣松是广宁县团保总局长，他不但不认罪，反而施展阴谋，邀请彭湃和铁甲队党代表廖乾五、队长徐成章等人到团保总局赴宴，彭湃等人则将计就计，依约赴宴。在席间乘机逮捕了谭侣松。同时，铁甲车队副队长周士第和教官赵自选带领铁甲车队直冲县民团驻地，迅速解决了民团武装，收缴枪枝四十多件。

奇袭民团，逮捕谭侣松，沉重地打击了豪绅地主的反动气焰。但他们仍不甘心失败，继续在各地破坏农会，残杀农民。为了彻底消灭反动地主武装，一九二五年一月，大元帅府又增派卫士队一百多人，来广宁协助铁甲车队作战。卫士队长卢振柳是国民党右派，他居然违背帅令，勾结地主，压迫农民。彭湃又亲返广州，报告卢振柳的罪行，大元帅府遂将卢调离，卫士队长由谢升继代理。经过我党的一系列统战工作，使卫士队站到农民一边。接着，由彭湃、廖乾五、谢升继三人组成了广宁绥缉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铁甲车队、卫士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军事行动。

二月一日，攻打江家炮楼的战斗打响了，彭湃亲临前线指挥。当决定用挖地道埋炸药的方法炸敌炮楼时，彭湃身先士卒，亲自参加挖地道，三天两晚不下火线。后因爆炸技术不够好，只将炮楼一边的墙震开了一道裂缝。于是又改为围困和火

攻。铁甲车队和农军将炮楼团团围住，农民群众纷纷出动担运柴草，冒着枪林弹雨送到阵地。炮楼里的反动地主在炸炮楼时已被吓得魂飞魄散，眼看炮楼四周堆积起来的柴草越来越多，更为恐慌，最后不得不派人前来谈判投降，表示愿意解除武装，赔偿农民损失，接受农会减租的规定。二月十三日，铁甲车队和农军胜利进入江家炮楼。翌日，另一封建堡垒黄家炮楼也跟着向我缴械投降。攻下这两家炮楼后，广宁各地反动地主相继承认减租要求，答应解除武装，赔偿损失。

广宁的减租运动经过复杂、激烈、艰苦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减租斗争的胜利，又进一步促进了广宁农民运动的发展。

一九二五年春，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取得了英帝国主义和段琪瑞政府的支持，乘孙中山先生北上之际，准备进攻广州。在中国共产党倡议和支持下，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在二月一日进行东征，攻打陈炯明。

彭湃在广宁减租斗争胜利后，立即赶回广州，奔赴东征前线。东征军的主力，是黄埔军校三千多名学生军。周恩来任黄埔军校前方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东征。彭湃尽力协助周恩来工作，派手车工人俱乐部的三十多位海丰籍工人为东征军带路，带信给海丰坚持秘密斗争的农会领导人杨其珊、郑志云等，通知他们发动农民，接应东征军。饱受军阀陈炯明摧残压榨的农民群众在农会的领导下，积极配合东征军的战斗，“或为党军内应，或作外援，如当冲锋队，充伏役，响导，侦探及截击逆军等等，无不踊跃去做。”^①在农民群众大力帮助下，英勇善战

^①彭湃：《革命政府如何对付东江问题》，载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十八日广州《民国日报》。

的东征军节节胜利，迅速前进。

二月二十七日，彭湃以中央农民部指导员名义随军抵达海丰。三月三日，海丰各界群众三万多人在林祖祠举行欢迎大会。彭湃和东征军领导人在大会上发表演说，热烈赞扬海丰农民运动，高度评价东江农民群众对东征军的支援，指出这是东征胜利的保证。彭湃在会上当即宣布恢复农会，提出农会“在县代表大会未召集前，由旧时职员组织临时县执行委员会，行使会务。”^①

彭湃回到家乡，得趣书室顿时又热闹起来，从四乡来看望彭湃的农民川流不息，有七、八千人之多。陆丰、惠阳、惠来等县农民也专程赶来，使彭湃应接不暇。他们向彭湃诉述受陈炯明和豪绅地主压迫的痛苦，磋商恢复农会的工作。农民的革命热情使彭湃充满信心，认为“东江农会运动的发展当已不成问题。”^②

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彭湃于四月一日在海丰县城桥东的平民织造厂楼上，组织了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党员有彭湃、郑志云、李劳工、林苏、吴振民、张威、林务农等，由彭湃任书记。同时，还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海丰特别支部，它以农工俱乐部的名义公开活动，成为党领导各项群众运动的得力助手。

在党的领导下，各区农民协会迅速恢复，三月，召开了有三百多人参加的海丰县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恢复了县农民协会。大会选举彭湃为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大会作出了五项决定：一、在十天内恢复各级农会并加强其组织；二、坚决实

^{①②}彭湃：《关于东江农民运动情况的报告》，转引自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向导》第一一二期。

行二五减租；三、设立农军总部，组织和训练农民自卫军；四、委任特派员到各区指导恢复农会的工作；五、清算反动派的罪恶，给以应得的惩罚。根据上述决定，党派李劳工、吴振民负责组织 and 训练农民武装，建立了一支二百多人组成的农民自卫军，派林道文、黄晓元、彭元璋、杨望等为县农会特派员，到各区指导工作。

同时，改组了海丰县政权，由彭汉垣出任海丰县长。新政权废除了乡里约正的旧制，取消陈炯明时代的苛政，实行禁鸦片、禁粮食出口、禁蓄婢，兴修马路，整顿警察，取消陋规，取消“伙头鸡”、“三下盖”。这些革命措施的实行，使海丰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海丰的影响下，陆丰的农会也相继恢复。但是，新任陆丰县长徐建行是个国民党右派。他竟然干涉农会事务，为地主豪绅撑腰，甚至追收陈炯明时期摊派的军饷，恢复苛捐杂税……。陆丰人民对徐建行的倒行逆施十分愤慨，派人向彭湃报告。彭湃即亲自率领了由海丰农讲所学员和农军组成的宣传队，步行前往陆丰质问徐建行。他们一路走一路宣传，陆丰人民深受鼓舞，也迅速发动起来。结果，彭湃尚未到达陆丰县城，徐建行就被吓跑了。彭湃到陆丰县后，立即与留守县公署的官员订立条约，规定：（一）即时组织粮食救济委员会；（二）筹出农民协会费用五千元，并将旧议会所有款项拨给农民协会为常款；（三）以后筹捐征饷，绝不能要无地农民负担；（四）对于各区反对农民运动之劣绅，一经查实，即应拿办；（五）取消各种陋规^①。接着，又召开县群众团体代表会议，正式通

^①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陆安日刊》。

过了《驱逐徐建行的决议》。

正当东征军与农运相结合的革命声威震撼东江之际，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竟乘机进兵广州，发动反革命叛乱，图谋颠覆广东革命政府，东征军不得不回师广州，讨伐杨、刘。

东征军回师平叛前，彭湃根据党的指示，召集各区乡农会干部会议，有计划地将农民武装和干部撤离城镇，分散在城郊和山区，作好机动战斗的部署。同时，还在海丰和东江其它地区组织了三千多农民，担任回师部队的运输工作。彭湃则随东征军回师广州，投入平定杨、刘之乱的斗争。

陈炯明趁东征军离开东江，卷土重来；豪绅地主乘机而起，反攻倒算，疯狂镇压农民运动。劣绅丘景云又当了海丰县长，钟景棠任清乡督办，他们放火烧了彭湃的家，捕捉彭湃的亲属。他们杀害了优秀共产党员、海丰农民运动领袖李劳工。还有不少农民群众，被他们特制的“斩首大刀”杀害。

陈炯明重新占领东江后，与盘踞在南路的军阀邓本殷相呼应，依仗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企图进攻广州。为了彻底消灭陈炯明的势力，国民革命军在十月上旬，又举行第二次东征。东江地区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战斗队、担架队、运输队、情报队，与东征军密切配合。东征军在农民群众的大力帮助下，进展神速，破惠州，占海丰，攻克兴宁、梅县，直下潮州、汕头，一个月工夫就彻底打垮了陈炯明在东江的势力，取得了第二次东征的胜利。国民政府委任周恩来担任东江行政委员，管辖惠、潮、梅二十五县。

彭湃在十月二十二日随东征军回到海丰后，即根据中共广东区委指示，迅速开展工作。他召开了海陆丰地区党的扩大会

议，将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改组为中共海陆丰地方委员会，仍由彭湃任书记。

十月二十五日，在林祖祠召开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彭湃在会上报告了工农群众配合东征军作战的情况。他说：“在革命的联合战线上、由于军事的胜利，政治方面，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密切配合下，亦呈现开朗的局面。现在正是农民们反压迫，反摧残，争取解放的时候，我们必须迅速地把各区、各乡农民协会恢复起来，同时要扩大农民协会的组织。”^①大会决定在十一月一日以前，恢复各级农会组织。农会接受了周恩来代表东征军的赠枪，进一步加强了农民武装。当时的海丰，呈现出一片革命景象。后来被人誉之为“小莫斯科”，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学员还前往考察。

在配合两次东征，发展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斗争中，彭湃深刻地认识到“当此镇压反革命之时，农民非有武装不成，而且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②在革命武装与农民运动的结合方面，彭湃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东征的胜利进军，促进了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恢复和发展，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又有力地支援了东征的胜利进军，这为革命武装与农民运动的结合，提供了成功的先例。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了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一年来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通过了《农民协会今后进行方针议决案》、《农民自卫与民团问题议决

①钟贻谋：《海陆丰农民运动》，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②彭湃：《关于东江农民运动情况的报告》，转引自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向导》第一一二期。

案》等，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彭湃（因参加东征，留在海丰，未出席）和阮啸仙、罗绮园三人被选为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彭湃从海丰回到广州后，工作十分繁忙。党内，他是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区委的农委负责人；在统一战线里，他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又出任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在农民协会他是省农协的领导人。一九二六年一月，又兼任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主任。他废寝忘餐，为促进广东农运的发展而忘我地工作。彭湃经常在省农民协会出版的《犁头周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注意从理论上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指导农运的深入开展。一九二六年一月，他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开始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上连载。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农民运动的专著。彭湃以自身的经历，详细、具体、生动地叙述了海丰农民运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提出和阐述了关于农民运动的必然性、重要性和规律性等重大理论问题。一九二六年九月，它被编进《农民问题丛刊》。毛泽东在丛刊的序言中指出：“这部书内关于广东的材料，占了八种，乃本书最精粹部分，他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许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过细看这一部分。他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和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①《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后来一再翻印，当时担任广东区党委领导的周恩来题写了书名，任党中央宣传部长的瞿秋白称赞它是革命者的必读书。

^①毛泽东：《〈农民问题丛刊〉序言》，见《农民运动》第八期。

彭湃常常深入广东各地具体指导农民运动的开展。一九二六年一月，普宁地主指使民团殴打入城农民，酿成“普宁惨案”。在彭湃的指导下，普宁农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胜利后，彭湃即以省农协代表身份前往慰问，普宁七千多农民和五百多农军到离城二十多里外去迎接自己的领袖，表现了农民群众对彭湃的衷心爱戴。彭湃在对群众演说中，把胜利归功于人民群众，强调这次斗争的胜利是全县人民团结一致和邻县以至全省农民支援的结果。同时提醒大家：目前的胜利仅是初步的胜利，地主阶级还在购买枪枝，准备与我们决一胜负，我们要叫地主减低租额，取消各种苛律，就要武装起来，进一步加强团结，进行不懈的斗争。

彭湃很重视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他多次出席省港罢工工人的会议，宣传工农联合战斗的重要意义。他说：“工人革命单独可以成功吗？农民运动单独又可以成功吗？这是决不可能的。……农民运动的成功，非联合工人不可。工人农民的地位已是没有分别，所做的工作，又是相同，故又非联合不可。”^①他明确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喊出了“工农联合万岁”的响亮口号。在强调工农联合的同时，彭湃还很注意争取社会各界对农民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他在参加一些革命团体的活动和出席纪念集会时，经常发表演说，宣传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重大意义，动员和争取各方面力量的支援，以利农运的胜利开展。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在林伯渠主持的省农民协会执

^①彭湃：《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八次大会上的报告》载一九二五年八月五日《工人之路》特号第四十二号。

委扩大会议上，彭湃作了《农民部工作经过的报告》。这次会议针对国民党右派分子在各地镇压和破坏农民运动的新情况，着重讨论了各地办事处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等问题。会议发表了宣言，提醒各级农会要警惕阶级敌人的阴谋，并决定召开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进一步确定全省农运的大政方针。彭湃和省农协负责人阮啸仙等一起积极筹备省二次农大的召开。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到十五日，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的正式代表二百一十四人，列席代表一百多人，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福建、浙江、江苏、河南、山东、贵州、山西等十一个省都派有代表。毛泽东率领第六届农讲所学员也参加了大会。

大会总结了农民斗争的经验，通过了关于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工农大联合等三十项决议案。决议案明确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便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在经济的观点上和群众的观点上，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占人口最大多数和占经济地位最重要的农民如果不起来，中国国民革命绝对不能有真正成功的希望。所以，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是占一个最主要的地位，农民运动问题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根本问题。”^①表述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大会选举了省二届农协的执行委员会，彭湃再次当选为常务委员。

二次省农大以后，农民协会的威望日益提高，各县农协的组织日益壮大。农会会员在召开二次省农代大会时是六十二

^① 《广东农民运动》，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月版。

万，大会后不到一个月增至六十四万，约占当时全国农会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广东的农运不仅成为广东革命政府的重要支柱，而且积极拥护北伐，支援北伐战争。在北伐之前，无论从发展速度、规模以及对革命斗争所起的重大作用看，广东农运都远在其他省份之上。广东农运取得的巨大成就，“已惊起全国的农民运动”^①，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工农运动的高涨和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极大恐慌。他们勾结起来，阴谋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篡夺革命领导权，以扭转历史的车轮。在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策划“整理党务案”后，各地的豪绅地主、土匪民团，明火执仗地进攻农军，摧残农会，“农村中流血惨事，几无地无之。”^②

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和豪绅地主的进攻，广东省农民协会执委会于八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对策。彭湃是大会的领导成员。毛泽东、瞿秋白等也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全省农民运动目前最低限度之总要求决议案》和编练农民自卫军等十五项决议案。会后，全体代表和广州郊区农民代表一千多人，在彭湃和阮啸仙等带领下示威游行，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请愿，要求惩办摧残农民运动的反动派。

一九二六年秋，花县民团勾结土匪，摧残农会，惨杀农民，酿成“花县惨案”。省农民协会派农民自卫军去援救，而蒋介石总司令部参议伍观淇，却以“花县民团与农团械斗，双

^{①②}《广东农民运动》，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月版。

方都有勾结土匪，内容异常复杂”^①为词，阻止和破坏对花县农会的援救。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农民部发起，组成一个有军、政、农协各方代表参加的调查委员会前往花县调查处理。彭湃作为省农协的代表，在调查委员会里，和国民党右派伍观淇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说：“对的，民团里面有土匪固然要惩戒，农民协会里有土匪更要加倍惩戒；何以呢？因为农民协会是国民党所领导，国民政府所扶助的，是不应该有土匪的。可是农民协会方面总找不出有何土匪的证据出来。”^②当面驳斥了伍观淇攻击农会也有土匪的胡说。彭湃在参加调查以后，写成《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详细记述了调查的过程，列举充分事实，说明真相，揭露了国民党右派支持民团和土匪向农民进攻的罪行。文章说，伍观淇“从前是民团长，是民团的先辈，现在仍做江村民团养成所的所长，平山的民团，他有许多学生在内。”^③使人们清楚地看出，国民党右派伍观淇之流正是民团的后台。文章深刻指出“广东的国民革命进展，已转入一个新的形势；广东革命的民众，不但只是晓得肃清广东内部的军阀就算数，并且已晓得非把农村中反革命军阀的根苗铲除不可。所以革命的斗争，由都市而转入于农村，现在正是农村中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不断的冲突最厉害的时期。在这个斗争的阵线中，农村的大多数农民、工人、小商人、觉悟的学生、国民党左派的分子及军人，团结在革命的一边。劣绅，土豪，恶地主，国民党右派，及贪官污吏，逆党匪棍，民团，站在反革命的一边。前者是大多数人，是被压迫者，后者是少数人，是压迫者。这两种势力的斗争，差不多广东九十四

^{①②③}彭湃：《花县团匪残杀农民的经过》（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载《犁头周报》一九二六年第十七、十八期合刊，下同。

县都有这种情形^①。在深刻分析农村阶级形势的基础上，彭湃认为，在反革命势力未被彻底消灭之前，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或明或暗，是不会停止的。只有真正革命分子站在革命的一边，去消灭一切反革命势力，尤其是国民政府更应肃清内部的贪官污吏，而站在革命一边，保障农民协会的组织，镇压农村的反革命势力，国民革命的前途，才有希望。

继“花县惨案”之后，国民党右派五华县长胡淳又勾结豪绅地主，诬蔑农会减租是“实行共产”的“会匪行为”。五华的逆党劣绅、土豪地主、贪官污吏、保卫团和土匪联合起来，疯狂屠杀农民，“断头碎尸，血肉横流”惨不忍睹。对此，彭湃以极大的革命义愤，连续在《犁头周报》和《农民运动》发表《敬惜字纸》和《为五华农友哭一声》两篇战斗的檄文，讨伐国民党右派残酷镇压农运的罪行。彭湃义正词严地指出：对胡淳这样的“反革命之官吏，应根据党纪国法，严加究办，至可应根据宣言（指广东革命政府对农民的第二次宣言）褫夺官职，永不叙用”^②。彭湃还深刻指出：“五华这次事变之重大，可以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广东目前国民革命的对象，对内方面，已经不是打倒军阀的势力，而是在如何消灭军阀势力之根源——农村中的逆党，劣绅，土豪，大地主，民团……等反革命势力。”^③这里表明，彭湃已明确认识到革命内部存在危机，革命的基础并不稳固。

①彭湃：《花县匪徒残杀农民的经过》（一九二六年十月八日）。

②彭湃：《“敬惜字纸”》，载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犁头周报》第十六期。

③彭湃：《为五华农友哭一声》，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日《犁头周报》第二十一期。

一九二六年十月，彭湃到汕头工作，除了担任省农会常委兼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主任外，还任中共汕头地委常委。他和地委的其它同志一起，认真贯彻省委指示，大力发展工农武装，与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何应钦的部队压迫虐待支援北伐的工农运输队，他们便组织群众到留守司令部示威，提出拥护北伐，反对北伐军中的右派分子压迫工农运输队，要求释放被捕的工农运输队员，保证不再虐待，照发工资，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工人运动领袖杨石魂到揭阳视察工人运动时，被无理绑架。彭湃立即亲赴揭阳，和国民党右派县长交涉，同时，组织工农群众示威游行，迫使反动派不得不释放杨石魂同志。

一九二七年三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全国革命重心由广州转移到武汉。由于工作需要，彭湃也离开了广东。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日，他出席了毛泽东在武昌召开的鄂湘赣粤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和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的联席会议，彭湃和方志敏等支持毛泽东提出的重新分配土地的主张。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彭湃和毛泽东、方志敏等十三人被选为执行委员，担负着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任。

从开辟海丰农运起，彭湃以全部精力投入农民运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行了理论的总结，在指导农民运动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被誉为“农民运动的大王”^①和“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②。

①方孔木：《毛主席赞扬彭湃同志》，见《革命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五期。

②中共中央：《告人民书》（一九二九年），转引自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南方日报》。

创建第一个红色政权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四月二十七日，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彭湃参加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是，由于陈独秀把持了党的领导权，五大未能解决问题。会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一步发展，继续妥协退让。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集团也公开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七月上旬，中共中央排除了陈独秀的错误领导，成立了临时政治局。改组后的党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以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委派周恩来担任组织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等为前敌委员会的委员。

前敌委员会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排除了张国焘阻挠起义的意见，决定在八月一日举行起义。

八月一日凌晨，由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的一部分，共约三万人，协同作战，经过几小时激烈战斗，歼敌一万多人，取得了胜利。

八月一日上午九时，在江西省政府西花厅召开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市及海外党部等代表的联席会议。彭湃作为广东代表出席。在会上产生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有国民党左派参加的革命政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表示继承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反对背叛革命的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动政府。革命委员会下设参谋团、秘书厅、财务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农工运动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党务委员会等机构。彭湃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同时还被任命为农工委员会委员。

八月二日下午，革命委员会委员在南昌市贡院侧举行就职典礼，到会群众有农工商学兵各界共数万人。彭湃和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一起宣誓就职，决心“为全国大多数民众利益奋斗到底，绝不妥协，以完成国民革命工作。”^①

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它对工农群众是极大的鼓舞，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是有力的反击。南京和武汉的敌人大为震惊，他们急忙调集兵力，包围南昌。为了避敌主力，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军分批撤离南昌，挥师南下，准备占领汕头，取得苏联援助，以东江为基地，统一广东，再图北伐。

起义军挥师南征。在艰难困苦时刻，彭湃仍然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他不顾自己的劳累，经常给战士唱《国际歌》、广东戏和讲故事，使部队在行军中增添了愉快的气氛。起义军进入福建后，他又在群众大会上讲演，宣传南昌起义的意义，号召军民团结起来，解放闽粤，解放全国。

九月中旬，起义军进入广东。九月二十三日，起义军攻占潮安。当时潮汕铁路不能通车，他便立即动员农民协会的会员连夜帮助工人修路。二十四日解放汕头后，他又配合周恩来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担任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他的老战友杨石

^①民国十六年八月三日江西《工商报》。

魂任副总指挥，领导和组织工农群众，安定社会秩序，从各方面支援起义部队。

这时，党中央的代表张太雷来到汕头，向南昌起义的干部传达党中央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的精神。在那次会议上，彭湃已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九月二十六日，贺龙、叶挺率领起义军主力向揭阳进发，彭湃和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部二十八人随行，负责建立地方政权和后勤等工作。这时，广东军阀集中重兵扑向潮汕地区，起义军赴汤坑与敌接战。彭湃组织工农群众给起义军运送弹药。我军初战获胜后，前进到揭阳县属的汾水村，在那里与前来增援的敌陈济棠部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彼此冲锋各十数次。当时，我方兵力约六千，敌总兵力近二万，三倍于我。我军勇猛战斗，未能击溃顽敌，决定夜袭，但因敌军已有准备而未成功。我军损失巨大，减员一半，且弹药将尽，无力再战，被迫后撤。在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浴血战斗中，彭湃亲临前线，直接参战。起义军撤离战场后，他又组织参战的农民自卫队员设法收容我军伤兵，转移武器，处理善后工作。

十月三日，起义军败退到普宁。在流沙镇的天后庙里，周恩来主持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并决定集中武装人员，进行整顿，撤退到海陆丰。（后来成立了以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对参加起义的领导干部也分别作了分散撤退的安排。流沙会议后，彭湃根据党的指示，从陆丰乘船去香港。十月十五日，彭湃在香港出席了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会议总结了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讨论了目前工作纲领，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建立革命政权等重大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彭湃在广东省委机关刊物《红旗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土地革命》的文章，宣传建立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指出：“无产阶级要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和资产阶级的掠夺与压迫，解除全中国大多数人的痛苦，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明确地提出了“一切土地归农民！一切武装归工农！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的口号。

在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下，海陆丰农民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曾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月先后举行武装起义，都失败了。十月三十日，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赶跑了国民党反动派，夺得了政权。起义胜利后，彭湃受中共广东省委的派遣，从香港回到海陆丰，担负起筹建工农兵苏维埃的重任。十一月十三日和十八日，陆丰和海丰先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的建立。

海丰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红宫召开。出席大会的有三百一十一名代表，其中农民占百分之六十一，工人占百分之二十九，兵士占百分之十。千百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奴隶，第一次成了主人，自己起来组织政府。大会历时四天。彭湃自始至终领导大会的进行。大会开幕和闭幕时，他都发表了演说，他还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阐述新生红色政权的性质、任务和施政方针。

彭湃在报告中向代表们强调土地革命的重要意义时说：“中国共产党看见了国民党的头目都已背叛革命，遂领导一般勇敢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国民党斗争，并知道国民党的军阀，所以能稳固是因为有一般地主、土豪劣绅、大资本家做它的墙脚，所以提出一个政纲‘实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所以打倒地主

及土豪劣绅资本家，也即可以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工农兵能够团结力量，军阀及一切的反革命派都能够消灭的。”^①彭湃指出了封建地主阶级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根基，分析了反封建与反帝任务的紧密联系，提高了代表们对土地革命重要性的认识。

彭湃还号召海陆丰的农民群众，要坚决镇压土豪劣绅的反抗，搜查契约、掘除田埂、没收地主的土地，即不仅要从政治上使地主阶级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而且还要从经济上根本废除封建剥削。彭湃提出分配土地的四标准：一、照人数多少；二、照人的力量（老幼强弱）；三、照家庭经济（有无别种收入）状况；四、照土地肥瘠。同时，还提出“不劳动不得田地”、“不革命不得田地”的口号^②。彭湃的这一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过，“不革命不得田地”的口号，对当时参加革命斗争的群众固然是极大的鼓舞，但不利于团结当时尚未参加革命斗争的劳动群众。“不劳动不得田地”这一口号，也不利于改造原来不从事劳动的人们。大会根据彭湃提出的意见，讨论通过了《没收土地案》。这个决议案为我国后来土地法的制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彭湃在闭幕时特别指出，这次起义成功和建立政权，是利用了敌人内部矛盾激化的有利时机，把反动派赶跑而取得的，还不是执行土地革命，广泛发动群众起来的结果，所以，这种政权很危险。只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发动群众，杀尽反动派，政权才能够稳固。

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决议案和八个提案

^{①②}见《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的特刊》，存海丰红宫纪念馆。

（即没收土地案、杀尽反动派案、改良工人生活案、抚恤遭难烈士及被祸工人家属案、取消苛捐杂税案、妇女问题案、禁止米谷出口案等），虽然“杀尽反动派”的口号，不利于分化瓦解敌人；“禁止米谷出口”，也有绝对化的倾向，但总的说，这些决议案反映了工农兵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代表了工农兵群众的利益。这次大会的意义，正如开幕通电所指出的：“这种举动是中国前古所未有，即在世界上除苏俄以外亦是第一次，这种壮举实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①

苏维埃政府建立后，立即着手分配土地。时值秋收，先实行分禾，贫困的农民群众得到了切实的物质利益，更加拥护苏维埃政府。到十一月中旬，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扩大到有五十万居民的区域。苏维埃政府公开招募志愿兵，编成工农革命军，购买武器，自制枪弹，加强武装力量。同时，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妇女运动，还组织儿童团、少先队，开敬老大会等等，海陆丰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九二七年底，紫金、惠阳、惠来、普宁、五华、龙川等县的代表约二百人，前来参观海陆丰政权的建设、人民武装和群众组织的情况，彭湃向代表们一一作了介绍，并说明工农群众只有坚决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才能得到解放。

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进行的，但它同时又受到这次会议后党内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的影响，提出了诸如建立集体农场，工厂归工人，没收大商店等过“左”的错误政策，特别是由于对反动派在海陆丰疯狂大屠杀所引起的仇恨，提出了“杀尽一切反动

^①见《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特刊》，存海丰红宫纪念馆。

派”的议案，导致了镇压反革命有过火行为和扩大化现象。但是，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人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的首次尝试。它为其后红色政权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一个红色政权永垂史册，彭湃创建苏维埃的功绩也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广州起义前夕，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彭湃率领海陆丰工农革命军，尽快向惠州方面移动，以便与广州相呼应，争取与广州联成一片。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爆发后，起义军迅速占领了广州大部分地区。当天上午，即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还在海陆丰的彭湃被选为人民土地委员。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反扑下，广州起义的军民经过三天浴血奋战，被迫撤离广州，起义最后还是失败了。

参加广州起义的第四军的教导团、警卫团主力和工人赤卫队的一部分，撤退到花县整编，共一千二百多人，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由叶镛担任师长，袁国平任党代表。红四师决定撤退到海陆丰。彭湃闻讯后，迅速组织海陆丰人民和革命武装前往接应，红四师和海丰赤卫队在紫金县龙窝会师。一九二八年元旦，红四师到达海丰县城，苏维埃政府在红场举行了有数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彭湃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谈到广州起义失败时，他把手一挥。坚定地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畏困难，失败了再干，跌倒了爬起来，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①

不久，红四师又和董朗率领的红二师会面了。这两支分别

^①徐向前：《奔向海陆丰》，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一），战士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

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英勇红军，在彭湃为书记的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紧密团结，互相配合，为保卫和发展苏维埃政权，转战海陆丰。他们在陆丰镇压了“白旗”会匪的叛乱，打击了反革命势力；在海丰消灭了反动军队蔡腾辉部一千多人，缴获迫击炮二门、步枪五百余支、子弹十余担，取得了“赤石战役”全胜。在肃清海陆丰境内的反动武装后，红军又向普宁发展，二月三日攻克了普宁的反动地主武装庄大泉的据点果陇，乘胜又攻下了和尚寮，拔除了这两个封建堡垒，遂使海陆丰与普宁、惠来的红区联成一片，并打通了向东与潮阳游击队的联系。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引起国民党军阀的极大恐惧。他们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稍为平息，便又纠集起来，派出两个军的兵力，配以中山、民主、广庚、飞鹰等军舰，分三路对海陆丰实行“围剿”。

中共东江特委发出了对目前东江严重时局的宣言，号召全东江工农群众及革命士兵，反抗一切军阀的进攻，提出誓死拥护海陆丰苏维埃、保卫海陆丰苏维埃的口号，并作出具体的部署：武装一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开展对敌宣传，坚决抵抗敌军进攻，捕杀随敌军回海陆丰进行反攻倒算的豪绅地主。红二师在海丰、红四师在陆丰、普宁和农民武装互相配合，迎击敌人。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抵抗，给前来进犯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但是，毕竟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在优势装备的敌人进攻下，我弹药不足，甚至不得不靠刺刀与敌人搏斗，许多红军战士壮烈牺牲。由于伤亡很大，被迫退入山区。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和三月一日，陆丰和海丰相继失陷。海陆丰苏维埃政权从建立到失败，坚持了四个月的斗争，史称“四

月政权”。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失败，主要原因是敌人的强大。从主观上来说，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及时退入山区有利地形，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但是彭湃和他的战友们当时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注意及时向粤东北的五华、兴宁一带山区发展，而是仍然在腹背易受敌攻击的海陆丰沿海地区打仗攻城。在战术上也没有集中兵力去打击敌人的弱点，而是与占优势的敌人硬打硬拼，因而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

国民党反动派攻占海陆丰后，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处处是白色恐怖。仅海丰一县，被杀害群众就达五千九百三十二人，被烧毁房屋七千二百四十六座，被抢耕牛二千九百九十四头^①。彭湃和红军战士在艰难困苦环境中，继续坚持斗争。他们吃野菜，住茅屋，盖稻草，在山区流动作战。人民群众常常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送粮食，送情报。

三月上旬，红四师和海陆丰的农民武装在彭湃带领下，转移到惠来、普宁、潮阳交界的大南山区周围活动。不久，董朗率领红二师的红军也到了惠来。在彭湃的领导下，红军攻占了交通枢纽葵潭镇，接着又在三月十二日和三月二十二日，两次攻占惠来县城，击毙了敌七十七团团团长向卓然，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第二次攻占惠城后，成立了惠来县苏维埃政府，没收地主豪绅土地分给农民，并用五天时间，全部拆除城墙，把砖头

^①南方根据地访问团：《海陆惠紫四县被反革命摧残调查表》，存海丰档案馆。

分给群众建房子，很受群众欢迎。但是，敌人很快就调集重兵发动了对潮、普、惠的进攻。由于红军不断与占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损失很大，战斗力削弱了。四月五日，彭湃率领红军退出惠来县城。东江特委机关、惠来县苏维埃政府撤至远离县城的大南山区的林彰乡。在普宁、潮阳的红军和潮阳的赤卫队也退回到大南山区的三坑、五福田、盐岭一带。敌人步步进逼，向大南山发起“围剿”。彭湃主持召开东江特委和红二、四师委联席会议，还是决定集中红二、四师，打回海陆丰去。四月八日，正当红二、四师和潮阳赤卫队共六百多人在盐岭待命时，遭敌袭击，被冲散后分别转移到海丰、陆丰。二、四师陆续集结后，根据广东省委关于加紧完成东江武装割据的指示，又与海丰县委商定“五三”反攻海丰县城。因敌强我弱，反攻失败，省委派来的赵自选也在战斗中牺牲。

在革命低潮时期，本应有计划地组织退却。但是，彭湃在五月五日潮、普、惠三县负责人联席会议上，仍制定三县暴动计划，并由彭湃等十五人组成了暴动委员会。由于战斗一再失败，战友接续牺牲，激起彭湃对敌人的无比仇恨，他提出组织敢死队打冲锋，由他任敢死队长，与敌人血战到底。同志们没有同意。后来省委也来信批评彭湃这是“拼命精神的表现。”

五月二十日，敌人突然袭击林彰乡，东特委和惠来县委的机关被冲散。接着，敌人集中“围剿”，红军处境十分困难。这时，彭湃被迫隐蔽在大南山区纵深的白马仔村，他回顾斗争所受到的挫折，认真总结失败的原因，并和东特委的同志一起制定了整顿三县党组织的计划。

在反革命势力的残酷进攻面前，不少红军战士也都产生了急躁情绪，他们要求豁出去与敌人拼命，为死难战友报仇。彭

湃根据自己从斗争实践中得来的痛苦教训，语重心长地对红军战士说：“同志，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坚强意志是很可贵的，我们也不惜有代价的牺牲。但是，我们不能让自己的水平仍然停留在猛打猛冲的阶段。”他又说：“我们要学会适应环境，保存革命力量。”“我们的党将不断成熟，革命的力量将不断发展，而敌人，它们是注定要被消灭的。”^①残酷的斗争把彭湃锻炼得更成熟了。

彭湃和红军战士在大南山区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坚持斗争。一次，彭湃在路上跌伤了脚，五福围的赤卫队员就背着他越过山沟，躲过了敌人的搜索。当敌人“围剿”步步加紧，斗争处于更残酷的时刻，彭湃白天隐藏在大南山的石洞里，晚上，他又出现在群众中，组织群众，积蓄力量，继续与敌人周旋。

一九二八年中秋节后的第二天，正在杨公坑活动的彭湃和郑志云等，突然遭敌人包围，担任东江特委秘书的郑志云不幸牺牲。彭湃在群众的掩护下脱险后，根据党的指示，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生死与共的乡亲父老，离开了和群众一起浴血奋战的大南山区，前往上海。

为革命英勇就义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

^①朱道南：《巧遇彭湃同志》，见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解放日报》。

民主革命，革命的形势是处于低潮。因此，党在大城市的任务，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积聚力量，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这次大会上，彭湃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二八年初冬，彭湃到了上海，住在大西路百禄里。当时的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严密控制的中心城市，反革命势力极为嚣张，充满白色恐怖。彭湃在党中央工作，担任中央农委书记兼任江苏省军委书记。

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彭湃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了题为《反帝运动的危机》一文，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一面投靠美帝国主义，一面又搞些反日运动的矛盾现象。彭湃强调：“我们要认定没有根本打倒帝国主义，没收其在华的财产，和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建设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甚么解决的条件都是空的，是骗人的，完全无一点保障的。”

彭湃贯彻“六大”精神，正确估计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的群众情绪，主张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深入发动群众，积累革命力量，反对盲目冒险的大干。他注意斗争策略，主张对富农既要联合又要斗争，认为专谈联合或打倒都是不对的。他强调武装领导非常重要，在农村要将武装领导转到贫农手中。

彭湃还很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经常深入到党的基层组织中去了解情况。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和十日，他去闸北区委开会时，了解到安排使用从莫斯科回国的留学生存在问题后，在十一日即写信给中央组织部，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他在《健强阶级主力向小资产阶级意识奋斗》一文中，论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他说，我党的斗争历史不长，党员成分

多属小资产阶级，因此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高党的质量。

彭湃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坚持参加党小组活动，常在党小组会上谈自己的思想。他经常自己教育自己并教育同志，要对党忠诚，努力工作，在阶级斗争的生死关头，就要为党的利益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彭湃到上海新闻路经远里参加江苏省委军委的会议。开会时间已到，担任军委秘书的白鑫还没有来。不一会，白鑫进来了，帝国主义工部局的巡捕也紧跟着进来，彭湃被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杨殷，中共江苏省委军委负责人颜昌颐和中央军委负责兵运工作的邢士贞等。

帝国主义者逮捕了彭湃等我党的领导人，如获至宝，他们妄图进一步破坏我党的组织。八月二十六日，即将彭湃等引渡给国民党反动派的上海市公安局，关押在公安局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的拘留所。上海公安局马上过堂审讯，由国民党反动分子方乃斌（曾任伪汕头市长）出场指认。这时，彭湃见敌人已经认出了自己，决定进行公开的斗争。他在敌人的公堂上慷慨陈词，“从未入党前在海陆丰做农民运动起直谈到海陆丰建立苏维埃的经过”。他把敌人的法庭当作痛斥反动派的讲坛，厉声对庭上的敌人说：“似你们这班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好多，你现在不必再问，将我枪毙好了”^①。

彭湃等被捕的当天晚上，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就立即主持

^①冠生，〈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见一九三〇年八月三十日《红旗日报》。

召开紧急会议，同中央特科（党的安全保卫组织）负责人一起研究营救办法，决定迅速摸清情况，千方百计进行营救。当得到国民党反动派将于八月二十八日清晨把彭湃等转解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情报后，决定截车武装劫救。周恩来下令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都出动，地点选在囚车必经的枫林桥。那天，党组织派人将枪装在小皮箱内，用机器脚踏车送到同孚路的特科机关，特科同志发现枪支上的润滑油还没有擦去，便马上去找煤油来擦枪，然后才上车出发。在车上放了一个三角架，架上摆着个箱子，假装是去拍电影外景。到预定地点等了很久，都没有看到敌人的囚车经过。原来，因擦枪耽误了时间，戒备森严的敌人已经把彭湃等押去龙华了。

龙华警备司令部是杀人的魔窟，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是在龙华被国民党杀害的！到了龙华后，彭湃和杨殷联名秘密给党中央写报告，汇报狱中斗争的情况，并提出了营救同志的设想。彭湃和杨殷的意见是：“（一）尽量设法做到五人通免死刑；（二）上条不能做到，则只好牺牲没有办法之安、揆二人^①，而设法脱免余无口供之三人；（三）运动丘哥谋逃脱；（四）调查现在炮兵营之张庸言（沈文峰知道），看有无变动及希望，因白亦知此人；（五）指导慕兰从中活动；（六）调查及注意王千臣方面之关系及实情。”^②这份在敌人牢房中写的报告，说明彭湃对凶残的国民党反动派不存在任何的幻想，并作好了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准备。在身陷囹圄的时候，彭湃惦记的是党的事业，别的同志的安全！但他不是消极的等待

^①安，即孟安，彭湃化名；揆，即孟揆，杨殷化名。

^②引自彭湃给党中央的两封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敌人下毒手，而是开展了积极的斗争。他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宣传，使“敌人士兵无不为之叹气捶胸，囚人亦为之感泣不已”^①。

八月三十日，敌人使用铁杆把彭湃两个膝盖压得血肉模糊，血流满地。严刑拷打不可能使坚强的战士屈服。彭湃受刑后被抬回牢房，难友们见他被折磨成那个样子，心里很难受，彭湃却以从容的表情来安慰大家。在牢房的壁上，他画了一条龙，对难友们说，“我要上天了。”一个同情革命的看守兵跑来，轻声告知：蒋介石亲自下令要立即杀害彭湃。消息传开，难友们悲痛欲绝。彭湃大无畏地对难友们说：这是意料中的事，你们要坚持斗争到底，让共产主义在中国开花结果！

身上的伤痛难忍，死亡的威胁就在眼前，此时此刻，每一秒的时间都万分宝贵。就在这种情况下，彭湃又和杨殷联名给党中央写下了最后一份秘密报告：

冠生暨家中老少：

我等此次被白害，已是无法挽救。张、梦、孟都公开承认，并尽力扩大宣传。他们底下的丘及同狱人，大表同情。尤其是丘等听我们话之后，竟大叹气而捶胸者。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

余人还坚持不认。

裴安^②

①晓云：《〈彭湃等被难前给党的报告〉前言》，原件存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②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冠生”，是当时在党中央担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彭湃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从大革命以来，在长期的斗争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上海期间，他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在这即将受害的时刻，彭湃向党、向自己最信任的战友，倾诉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英勇就义的决心。这份只有一百多字的最后报告，真是字字千钧重！“我们在此精神很好”，表现了共产党人在敌人屠刀面前的浩然正气，视死如归！“兄弟们不要因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凝聚着彭湃等对同志诚挚的关心与深厚的情谊。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国民党反动派把彭湃杀害了，同时被害的还有杨殷、颜昌颐、邢士贞。行刑是秘密的，地点就在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的旷地。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彭湃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彭湃、杨殷等牺牲的噩耗传来，同志们无比悲愤。党失去了几位优秀的领袖，人民失去了几位忠诚的战士！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以极度悲痛的心情，为党中央起草了题为《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告人民书，愤怒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彭湃等同志的罪行，沉痛哀悼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号召人民为完成烈士未竟的事业而继续努力奋斗，以实际行动回答反革命的屠杀。周恩来一边起草，一边流泪。他对机要处的同志说：文告要马上发出去，马上发出去！沉思了一会，又说：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消灭，一定要把叛徒白鑫干掉！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由关向应、陈赓等具体负责，制定了惩办叛徒的行动计划。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晚上十一

时许，正当白鑫因害怕我镇压，准备离开上海到南京去时，我特科人员在上海霞飞路和合坊四弄，成功地击毙了这个十恶不赦的叛徒。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情报处长范争波也受了重伤。这次为彭湃等报仇，为人民雪恨的行动，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一击，成了第二天上海报纸的头条新闻。

党中央非常关心彭湃烈士的亲属，把正流落在澳门的彭湃的母亲周凤接到上海中央机关，并妥善安置了彭湃烈士的遗孤，我党领导的互助救济会还号召革命同志为彭湃烈士的亲属捐款。

为了纪念彭湃等烈士，我党在革命根据地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彭杨军事学校，以彭湃等烈士的英雄事迹教育和鼓舞青年一代。

一九三〇年八月三十日，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提要”中，用醒目的大字写着：“今日是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被难的周年”，在第一版《纪念着血泪中我们的领袖》专栏里，发表了周恩来以“冠生”的笔名写的题为《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详细介绍了彭湃等烈士英勇牺牲的事迹，指出彭湃等是“积了无数次斗争与战绩，从广大的群众中涌现而锻炼出来的革命领袖”，他们虽然牺牲了，但他们的战绩是不可磨灭的，它“照耀在千万群众的心中，熔成伟大革命的推动之力，燃烧着每一个被压迫群众热情，一齐奔向革命的火原！”

五十多年来，人民无限怀念彭湃烈士，人民永远铭记彭湃的功绩。正如当年党中央在《告人民书》中指出的那样：“他曾经领导着海丰几万农民开始中国农民反抗地主剥削的革命斗争，他曾经指导着全广东几千万农民不断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

压榨，他曾亲自领导东江海陆丰广东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肃清一切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创立苏维埃政权。他并参加南昌暴动。他这样英勇的革命斗争的历史，早已深入广大劳苦群众的心中，而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谁不知广东有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这是历史的结论，这是最公正的评价。

附：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 《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编审稿）。
2.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十月版。
3. 钟贻谋：《海陆丰农民运动》，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4. 实藤惠秀：《日中非友好的历史》，（日文），朝日新闻社一九七三年版。
5. 彭明：《五四运动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6. 王拱璧：《东游汗录》，上海图书馆藏。
7.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晨光》第二卷第一号。

苏兆征

潘倩红 卢 权

苏兆征是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我国职工运动史上的杰出领袖。

一

一八八五年，苏兆征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淇澳岛（今属珠海市唐家公社淇澳大队）。他父亲苏赋，字厚荣，是一位刻苦勤劳、为人老实忠厚的贫苦农民，当过地主的雇工，后来租佃了本乡官僚地主苏雨田的几亩薄田瘦地耕种。这些田地分散偏僻，有的远在淇澳岛南端地名金星的地方，来回一趟，有好几里路。虽然父亲起早摸黑，终年辛勤劳动，但是高额的地租、繁重的苛捐杂税，又加上逢年过节要给地主豪绅送礼等等，几乎夺去了他的全部劳动果实，因此家境十分困难。母亲钟偶，为了帮补家用，除辛勤操持家务外，还要靠打草鞋换钱，到海边拾蚌壳回来卖给本村地富经营的蚌壳窑，有时还要替人家打短工，但是仍然无法维持一家生计。父母亲只好被迫借债度日，受高利贷的盘剥，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全家长年过着衣不蔽体，食难一饱的悲惨生活。苏兆征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因此当他稍懂事时，就要为家庭生计而操心，并且还要替

父母分担家庭的困难，参加做农活，上山砍柴、下海捕捉鱼虾以及替人放牛等劳动，养成了刻苦耐劳和俭朴的品性。

苏兆征的童年时代，帝国主义与我国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相勾结，对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人民大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淇澳岛是一个具有反帝斗争光荣传统的地方。鸦片战争前，英美鸦片贩子把淇澳、金星门一带当作鸦片市场，麇集了一批贩售鸦片的趸船，进行贩烟勾当，遭到了淇澳人民的激烈反对。一八三六年，美国侵略者派出十多艘武装帆船，企图武装侵占淇澳岛。淇澳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抗击美国侵略者，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最后美国侵略者以可耻的失败收场。苏兆征从小便反复听到这一反帝斗争经过的讲述，受到了要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的英勇反帝革命精神的教育，在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仇视和反抗帝国主义的种子。

贫困的家庭境遇，使苏兆征迟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后来在亲友的资助下，才勉强读了三年私塾。但他勤奋好学，在进步老师王步干的热心教导下，学习成绩优异，特别是珠算一门，很快就能娴熟地运用，成了苏兆征日后干好革命工作的一件有力武器^①。

一九〇三年，苏兆征十八岁了。因为在家乡无以为生，年轻的苏兆征只好离乡别井，跟随一些同乡跑到香港找工做。经人介绍，他到了一艘外国轮船上当“侍仔”（即杂役）。“侍仔”是船上最劳累下贱的工作，要侍候乘客和船上的高级职员，为他们倒水、端茶、送饭以及擦地板等等，从清晨直至深

^①苏兆征于香港海员大罢工时，曾任总务主任；省港大罢工时，曾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二七年在党中央工作时，负责中央财务小组工作，都因所管帐务一丝不苟，整整有条而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

夜，一连干十六、七小时的活，还不时受到责骂和侮辱。而“侍仔”每月所得工银仅有几元，还要受到包工头从中克扣勒索。当他稍为怠慢了船上的包工头时，便立即被开除上岸。后来，他又相继到渣甸公司的“乐生”号当“车枱”、到“塔夫”总统号当扫地仔等工作^①。海员不仅在经济上遭受非人的待遇和残酷的剥削，在政治上也受到种种难以忍受的歧视迫害。在同一艘轮船上，外籍海员的工资往往比中国海员高出数倍，各种待遇享受也有天渊之别。轮船经过一些外国港口时，当局竟然不准中国海员上岸，甚至还要施行侮辱人格的所谓验肛门、通喉咙的卫生检验。有时准许上岸了，却又规定不准随意进入高级酒店、戏院、理发馆等，甚至连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不准随便进入。这种辛酸悲惨的海员生涯，使苏兆征深深感到穷人到处都一样受煎熬，因而更加激起他对帝国主义和大资本家的憎恨，并且逐渐产生了反抗的要求。

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为推翻清朝统治者而经常奔走海外，进行革命活动。他在旅途中，常有机会和苏兆征等香港海员直接接触。因同是广东香山人，语言相通，互相之间的思想交往就显得融洽一些。苏兆征向孙中山介绍了海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各方面的情况，使孙中山从中看到了海员中间所蕴藏的革命力量。于是，孙中山热情地向海员们宣传革命主张，鼓励他们组织起来，支持他所从事的反清革命活动。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苏兆征于一九〇八年加入了孙中山所创建的革

^①据老海员方世林、谭其科、陈一清、崔炳南等回忆：在较大的轮船上，往往有一些外籍海员工作，并特为他们设一个餐厅，派一些中国海员服侍他们。这一工作叫做“车枱”，属船尾部。

命政党同盟会，积极参加了推翻清朝统治者的各种活动。他和其他海员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为革命党人传递消息，秘密运送武器及其他物资，为革命党人筹集活动经费；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遇到密探追捕时，便机智地掩护和帮助他们脱险。与此同时，苏兆征还积极地在海员中进行组织活动，先后参加了在孙中山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海员联谊社、海员公益社等组织，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

苏兆征在当海员期间，有时因失业回到家乡居住一段时间。他常常利用亲友邻居来闲谈的机会，向大家介绍海外的见闻和孙中山反清的情况，讲解当时革命潮流的一些道理。他与村里一些青年农民钟梅吕、蔡安宝、姚传杰、郭光荣以及他小时的老师王步干等人经常在村外的文昌宫聚谈，并组织了一个阅报社；后来又经常在青年农民钟广祥的家里活动（因他家在村边，地点较偏僻，不易引起地主豪绅注意），进一步组织了自治会。他通过这些组织，把村里的贫苦农民进一步团结起来，议论国内外大事，诉说反动政府和地主豪绅压榨劳苦人民的罪行。大家听了苏兆征的宣传解释，很受启发，十分欢喜亲近他。

苏兆征还在家乡积极从事宣传破除封建迷信和改革旧的风俗习惯，如主张剪辫，反对奉神拜鬼，反对封建婚姻，提倡文明结婚，不摆酒席，举行简单的仪式，等等，同时动员自己家人带头移风易俗。苏兆征不仅在本坊宣传，还常常跑到外坊^①去宣传演讲。他不辞劳苦，往往一去就是一整天，连饭也顾不得食。苏兆征与村里一些青年组织开山造林活动，在土名灯塔

^①淇澳村分为三坊，即东溪坊、中行坊、淇西坊。苏兆征是东溪坊人。

的地方，种下了一批松树。为了筹备开山造林的基金，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种植公司。苏兆征带头认了十股，父亲苏厚荣在他带动下，也加入了三股^①。日后树木长大了，将收入所得分给贫苦会员以帮补家庭开支。由于苏兆征为人忠厚正直，待人诚恳，见义勇为，村里群众也就更加信任和尊敬他，有事都喜欢找他商量解决，把他当作知心人。而群众的信赖，又不断激励着他进一步树立为劳苦群众谋福利而斗争的信念，于是进一步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鼓励他们展开各种改革活动。

苏兆征在家乡的活动，却使地主豪绅感到坐卧不安。他们对苏兆征十分仇恨，串通反动官府对他进行迫害。有一次，一批反动民团奉命前往苏家捉拿苏兆征。敌人来得突然，苏兆征来不及走避，被捕入狱，坐了一年多的牢，才释放出来。他的老师王步千后来也因此牵连被捕，最后病死狱中，遗下女儿王彩一人，由苏兆征抚养起来。但是，反动统治者的迫害，并不能令苏兆征畏缩，相反却进一步促使他走上反抗和革命的道路。在他离开家乡前，曾经怀着激动的心情，跑到座落在村外江树山脚的“义士墓”前，掷碎了一个青碗，郑重发誓说：我要继承先烈遗志，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②！

①据苏兆征家保存的记事本，现存淇澳大队。

②关于“义士墓”：该事件发生在苏兆征的少年时代（一说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后），淇澳岛一些地主豪绅企图霸占属于全村所有的公尝田，遭村里的农民群众激烈反对。地主豪绅于是收买了一批打手，将为首的青年农民姚祖发等五人殴打致死。但此事更加激起了全村的反抗。地主豪绅生怕事情越闹越大，不好收场，只好暂时收敛其霸占公尝田的行为，并被迫出钱修造坟墓埋葬死难农民，在墓前立了一个题有“义士墓”字样的墓碑。此事对苏兆征教育影响很大。他经常到墓前凭吊义士，表示要继承义士遗志，为穷苦人民谋利益的志向。

二

苏兆征与其他海员一样，由于经常跟随船只走遍世界各地，因此，时有机会目睹欧美各国工人为争取工人自己的切身利益，反抗资本家的压迫剥削，反抗政府的反动政策而前仆后继地举行罢工斗争等活动情况，从中受到鼓舞和影响。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很快便在中国海员中间传开了。初时，大家虽然对革命道理还懂得不多，还弄不清十月革命的详细情况及其伟大意义。但他们听说是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自己当家作主，都感到十分兴奋，认为这是天公地道的大好事情，从中受到巨大鼓舞，也憧憬着中国工人将来也能有这么一天。苏兆征也同样为十月革命胜利这一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所激励着。后来，他随船到过海参崴等地，进一步详细了解到十月革命胜利的经过情况，并且有机会博览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书籍和报纸，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因此眼界更加开拓了。他努力从中了解革命的真理，寻求战斗的武器，并且不断增强反抗斗争的意志。这个时候，苏兆征渐渐认识到革命的意义，“深信只有社会主义的革命，才能完成人类的彻底解放。”^①

一九二〇年，苏兆征正在一艘英国轮船上工作。有一天，船上的工头无理踢伤了一名中国海员。苏兆征义愤填膺，发动船上的中国海员起来斗争。他激动地对大家说：“工头经常随意殴

^① 《苏兆征纪念册》，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三〇年二月出版。

打凌辱我们的海员兄弟，我们若不团结起来反抗，以后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自己头上，难道我们就这样不管吗？”海员们听了，也都异常愤激，就在苏兆征的带领下，一拥而上，找船长交涉。船长见海员如此齐心一致行动，心里害怕，只好答应赔偿医药费，以求了结此事。但苏兆征认为这不仅是海员个人受辱的事情，而是涉及全船海员人身安全的大事，于是带领海员继续进行斗争。一方面，他与船上海员工人一起，联名写信给轮船公司，要求开除行凶打人的工头，并要他们答应今后不再有虐待中国海员的行为再次发生，否则中国海员一致罢工；另一方面，苏兆征还积极争取香港其他海员工人的支持，因而声势大振。船公司老板初时并不理会，后来发觉风潮越来越大，生怕发展下去，会严重损害自己的利益，终于被迫表示接受海员提出的各项正义要求。这是苏兆征第一次领导海员进行的反抗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

这次斗争的胜利，使海员工人受到很大鼓舞，在海员工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看到：要反对资本家的压榨欺凌，争得自身的正当权益，就必须敢于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因而相继奋起，进行了一系列反对虐待，反对克扣工资以至痛惩骄横跋扈的工头等斗争活动。同时，在斗争的实践中，海员们也越来越感到原先成立的海员慈善社、公益社等组织，虽然为海员办了不少福利事业，在加强海员的团结方面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它的组织较涣散，战斗力较差，远不能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因而迫切要求成立海员工人自己的真正的工会组织。苏兆征和林伟民等海员中的积极分子于是加紧进行筹建海员工会的活动。一九二一年三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成立了。这是中国海员工人第一个真正的工会组织，也是中国最早

的现代化产业工会组织之一。而苏兆征通过一系列斗争的锻炼，也渐渐“把他自己训练成为海员的领袖了”^①。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就全力开展工人运动，专门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国工人运动因而有了新的发展。在汹涌的世界革命潮流和国内工人运动新发展的大好形势鼓舞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根据香港海员工人的切身利益和迫切要求，于一九二一年九月间向各轮船公司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包工头剥削及工会有介绍海员就业的权利等要求；同时下决心准备以罢工手段来达到要求的实现。尽管海员工会先后三次提出要求，但始终得不到轮船公司老板的答复。饱受压迫和剥削的海员工人，再也抑制不住长期埋藏在心头的怒火，在苏兆征、林伟民等人的带领下，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大罢工。香港海员罢工不仅是一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同时也是一场反抗英帝国主义压迫的政治斗争，给予英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以沉重打击，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新起点。

苏兆征当时虽然不是海员工会的会长，但他和林伟民等人却是这次罢工的实际领导人。罢工开始，他被选为罢工总办事处（设在广州）总务部主任。罢工总办事处的一个重要事务、财务、罢工海员的生活安置等，都由他负责处理。苏兆征面对罢工斗争过程中的大量工作，总是任劳任怨废寝忘寝地完成。后来海员工会会长陈炳生因杀妻案被捕，全体海员大会于是推举苏兆征担任

^① 《苏兆征同志小传》，载《劳动》，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版。

代理会长职务，负责全面的领导工作。他还被大家推举为谈判代表，与香港当局和轮船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斗争。在这次罢工斗争中，苏兆征坚持原则，处处维护海员的根本利益，不为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高压政策所动摇，不为资本家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也不为困难所吓倒，紧密地依靠全体海员和团结全港工人，争取国内外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使罢工斗争坚持到胜利，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高度的斗争智慧。

罢工一开始，香港英国当局就采取高压手段，妄图把刚燃烧起来的罢工火焰扑灭。罢工爆发的当天晚上，香港当局派出华民政务司夏理德到海员工会企图压制罢工。夏理德带着威胁和欺骗的口吻对海员工人说：“本港政府是不允许此种罢工行动的，你们有条件可交本大人，替你们斟酌办理。你们罢工，不怕饿肚吗？”苏兆征当即理直气壮地质问夏理德：“我们提条件已经三次了，而且通知了政府，政府何以早不出来说话？现在我们已经罢工了。要复工，除非完全承认我们的条件。我们饿肚子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你们不必担心。”^①这番话充分表达了工人阶级的志气，说出了海员们的心声，因而博得了在场海员雷鸣般的掌声，弄得夏理德一时不知所措，只好灰溜溜地离开海员工会。

罢工的怒火越烧越旺，香港的航运几乎陷于停顿，加上罢工海员对香港实行了经济封锁，使香港的粮食和物资供应日益困难。一月底香港运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以后，罢工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加罢工人数从初时的数千人增至三万余人，香港的局面也就更为严重。香港当局悍然封闭了海员总工会，将会址搜

^①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

劫一空，并抢去海员总工会的招牌。但是，香港当局的高压政策阻挡不了罢工的继续进行。后来，香港当局变换手法，企图通过“调停”、“谈判”的手段来诱骗罢工海员就范，从而达到破坏罢工的目的。

在香港当局的授意下，中国轮船公司的资本家代表首先出面“调停”。被罢工工人推选为谈判代表的苏兆征^①等人，十分机智沉着地与他们周旋。中国轮船公司的资方代表装着通情达理的样子说：“我们同是中国人，你们罢工我们是同情的。是否中国轮船先行复工，将来外国轮船答应你们什么条件，我们一样照办。这种照顾到双方利益的办法，你们看好不好？”谈判代表中的个别人，竟一时被这种甜言蜜语所迷惑，准备答应。在此紧要时刻，苏兆征说服了自己的伙伴，同时一针见血地向对方指出说：“我们同是中国人，这话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在罢工一开始时，就请你们帮忙，谁知你们先前不理，对香港政府又默然无所表示，今日竟向我们要求这种特别办法。为罢工全部利益计，这是不可能的。我看你们应该发扬中国人的国光，一致逼迫香港政府接受海员条件，早早解决罢工才是。”^②当场戳穿了香港当局妄图利用中国轮船公司老板分化瓦解罢工的诡计。

接着，香港当局又指使中国绅商代表出面“调停”。苏兆征等四名代表到香港与他们进行谈判。根据全体海员大会的决定，必须以恢复海员总工会原状为先决条件，因此谈判就从这问题开始。绅商代表按照香港当局的旨意发言说：“恢复工会

^①苏兆征代理会长后，谈判代表职务改由林伟民负责。

^②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

是可以的，但工会名称要改，会址要迁移，办事人员要重新推举，工会招牌也不能送还给你们，因为这与政府威信有关。”

绅商代表还威胁地说：“你们罢工我们不反对，但是你们要顾念到现在香港快要粮尽食绝了，难道要把香港几十万同胞活活饿死吗？”

苏兆征义正词严地反驳道：“是的，香港居民将粮尽

毅然举行了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人数再跃增至十万人以上。在全港工人酝酿总同盟罢工的关键时刻，苏兆征还领导罢工工人挫败了香港当局诱骗部分工人组织所谓“全港工人调停海员罢工会”、以破坏总同盟罢工的阴谋。全港总同盟罢工的实现，更进一步致香港于死命。香港英帝国主义竟然使用血腥的镇压手段，在沙田地方枪杀从港回省途中的罢工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沙田惨案”。但是，英勇的香港工人万众一心，始终顽强地坚持战斗，终于迫使香港当局接受海员提出的条件。一向耀武扬威、肆意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英帝国主义者，第一次被迫在中国工人面前低头认输了！为时五十六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宣告胜利结束。

在这次影响深远的罢工斗争中，由于苏兆征表现立场坚定，勇敢机智，密切联系群众，能够发挥集体智慧和力量，群策群力，因此博得了广大海员的信赖与拥戴，在海员中的威信不断提高。而苏兆征自己通过斗争的实践和锻炼，也进一步成长起来，“成为全国海员的中心领导者。”^①

尤其重要的是，香港海员在罢工斗争过程中，始终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国内各地工人阶级从政治、经济各方面支援香港罢工海员。各地工人纷纷成立了香港海员后援会等组织，募捐了大量款项援助罢工工人。上海海员工人拒绝应招到香港作工。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之一李启汉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到香港慰问罢工海员，勉励海员要团结一

^① 《苏兆征同志小传》，载《劳动》，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版。

致，坚持斗争，夺取胜利。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也发表了《敬告罢工海员》的文告，对于海员罢工斗争给予及时支持与指导，明确表示“本党以海员同志们为开始阶级斗争的急先锋，定当竭其能力，为之后援”^①。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支持指导，也就帮助了罢工工人在斗争中掌握正确的斗争方向，鼓舞了罢工海员的斗志和争取胜利的信心。通过斗争的实践，苏兆征开始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感到中国共产党是为工人谋利益的党，劳苦人民的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因而对党产生了敬仰。后来他曾对别人说：“我当时（指香港海员罢工时）到处找共产党，总找不到手”^②。表达了他对党的向往的心情。

一九二四年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周恩来、陈延年等同志相继来到广东工作，大大加强了党对广东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广东区委派遣了一些党员到香港开展活动。苏兆征主动接近他们，积极支持配合他们的活动和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教育帮助，思想觉悟因而不断提高，更加迫切地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春，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发动下，于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苏兆征代表广东香港的工人团体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北京期间，有机会同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接触；党组织也派人对他进行谈话教育。不久，他就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③。从此，苏兆征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培育

①原件藏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馆。

②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

③据梁复然、郭瘦真、冯永垣等人回忆资料称，当时苏兆征的入党介绍人为李大钊。但也有一说法介绍人为邓中夏。

下，成为一个自觉的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三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力量，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九二五年五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举行。苏兆征对于召开这次大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会前，他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筹备，作了大量工作，动员教育广东方面的工会组织摒弃派系界限，同心同德地参加劳动大会。大会期间，他参加了邓中夏、李启汉、王荷波、孙云鹏、冯菊坡、刘尔嵩等人组成的中共党团委员会的工作。团结了全体代表，保证了会议按预期的目的胜利地进行。这次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统一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宣布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制定和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章程，选举出执行委员会。苏兆征的亲密战友林伟民被选为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苏兆征亦被选为执行委员。

第二次劳大闭幕后不久，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屠杀我国同胞的罪行，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于六月十九日举行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这次罢工斗争一直坚持到翌年十月止，共经历了一年零四个月之久。就其领导之坚强、组织之缜密、规模之巨大，持续时间之长久及其影响之深远等方面来说，不仅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添上光辉的一页，而且在国际职工运动史上也是少见的壮举。

在罢工酝酿和发动过程中，苏兆征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和表现出杰出的组织才能。当时香港有工会一百多个，但组织十

分复杂，除少数产业工会外，大部分是行会和手工业工会，操纵在资本家、封建把头 and 黄色工会工头的手中。而党在香港工人中的力量还较薄弱，仅有十余名党员和团员。香港广大工人虽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迫切要求，但要举行罢工困难却不少，阻力重重。党专门派遣了邓中夏、杨殷、杨匏安等人到香港，与苏兆征一道组织发动罢工。他们一方面深入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另一方面又耐心地争取说服一些工会的上层人物。由于苏兆征在工人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大家都对他的罢工号召表示拥护。“因兆征同志平常对于各工会领袖有一种吸引力，故终能使黄色工会与行会工会一致赞成这次最大的罢工”^①。罢工首先从香港海员、电车等工会开始。但当罢工临头时，海员总工会的会长谭华泽却又犹豫起来，不肯下罢工令。在苏兆征的带动下，广大海员工人于是逼着工会会长说：“下不下罢工命令？不下我们就自己干！”会长无奈，只得下了罢工令。这样，在海员工人的影响带动下，罢工便象烈火燎原一般，顿时燃遍了香港。

罢工爆发后，罢工工人纷纷返回广州，在广州组织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这次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又设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带领广大工人进行斗争的最高指挥机关。黄色工会的上层人物先是反对建立这些团结广大工人进行战斗的统一领导机构，后又千方百计地窃取这些机构的领导职位。广大罢工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挫败了他们的阴谋，一致推举苏兆征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同时推选他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当时苏兆征仍然留在香港，继续组织发动工人罢工，

^①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

没有在场，数天后回到广州，方才知悉^①。可见工人群众对苏兆征的信任和爱戴，以及他在工人群众中威望之高。

以苏兆征为首的罢工委员会，在罢工过程中真正发挥了战斗指挥部的作用。它属下设立了干事局、审计局、法制局、财政委员会、会审处、保管拍卖处等等，还有一支组织严密、战斗力强的数千人的罢工工人武装纠察队，由于广东政府尚不健全，为了及时惩治内奸工贼，罢工委员会又设有带政治性质的法庭、监狱；还办了报纸、公共饭堂、宿舍、医院、学校等等。各项工作都有专人管理，有条不紊地进行。正如邓中夏同志所说那样：“这个罢工委员会，按其实际，实不啻一个政府，它有绝对权力，可以处置一切与罢工相关之事，广东政府不得过问”^②。罢工委员会设在广州东园地方，故当时人们称它为“东园政府”。

在这次规模大、时间长的复杂罢工斗争中。苏兆征和邓中夏、李启汉等罢工领导人一道。十分注意及时分析情况，总结斗争经验，掌握和正确运用正确的斗争策略。苏兆征本人也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增长才智，进一步成熟起来。如罢工初期，由于形势复杂，曾经实行过普遍抵制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政策。苏兆征也曾著文主张这次罢工斗争应“持续的向一切帝国主义进攻”^③。后来随着斗争形势的不断变化，苏兆征与其他罢工领导人及时分析了当前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及时改变了这一作法，采取了“凡不是英国货、英国

① 《工人之路》，第二十九号，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②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③ 《工人之路》，第十三号，一九二五年七月六日。

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这一“单独对英”的中心斗争策略，从而拆散了帝国主义之间的联合阵线。争取了各阶层人物的同情与支持，进而解除了广东经济的困难，促进广东经济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香港英帝国主义，保证罢工斗争能长期地胜利坚持下去。

省港罢工不仅在经济上使英帝国主义遭受到空前的损失，使香港从一个以繁华著称的港口一下子变成了“死港”、“臭港”和“饿港”；同时在政治上也给予英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香港总督史塔士突然被撤去职务，便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对此，苏兆征特意著文进行深刻的分析说：“此次香港之大罢工，予英帝国主义以莫大的致命伤”，“英帝国主义者于此次大罢工之时，忽然撤换其总督，此为一种极不得已事情。帝国主义者于此风潮，捉襟见肘之态，已可见一斑。”他豪情满怀地策励“省港全体工友与广州各界同胞，仍当为密切之联合，坚持罢工，使帝国主义者无隙可乘，然后完全之胜利乃可期也”^①。

省港大罢工对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样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罢工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并依靠广大省港罢工工人的力量，国民政府实行了改组，宣布继续奉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军阀却对此万分仇视，并千方百计地图谋颠覆破坏。在此关键时刻，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人积极执行党的反帝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带领罢工工人，与广州人民一道举行各种活动，要求肃清内奸，表示

^①苏兆征：《香港总督撤任了！》，载《工人之路》第五十六号，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愿为政府后盾。苏兆征还发表题为《肃清内奸》的文章指出：

“我们要下决心，先行肃清内奸，然后罢工可保，帝国主义可打倒。”^①八月间，国民党左派、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廖仲恺，遭受帝国主义收买的反动分子所暗杀。以苏兆征为首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一再发表宣言，一方面对廖仲恺的不幸逝世表示悼念，另一方面一再敦促国民政府痛下决心，肃清奸细。苏兆征还亲自带领罢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等活动，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炮制的卑鄙罪行表示声讨，坚决要求给予敌人以痛击。在我党的一再催促和罢工工人的强烈要求与支持下，国民党左派才采取逮捕凶手、处置右派分子、解散反对国民政府的反动军队等措施，国民政府得以转危为安。随后，苏兆征不辞劳苦，亲自深入罢工工人之中发动与组织罢工工人参加运输队、宣传队、救护队等，支援国民革命军的东征南伐，以及后来的北伐战争，对统一广东、促进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省港罢工过程中，苏兆征不仅表现了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同时还充分表现了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大公无私、任劳任怨的高贵品德，以及发扬民主、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工人生活，与罢工工人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由于罢工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千头万绪，他身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担子十分重，日理万机，但是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夜以继日地坚持工作。经常因此废寝忘餐。他依期出席隔日召开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深入群众，虚心听取工人代表的意见，集中群众的智慧，与大家同心同德，并肩作战。他在大会上讲演或发表文章，总是亲自起草。他文化水平低，写起来遇到很大困难，

^① 《工人之路》，第四十四号，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

但他从不畏缩，经常虚心向邓中夏等同志学习，请他们帮助修改。他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这一工作十分重要，等于掌握住罢工的经济命脉。为了搞好这项工作，他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每天都亲自检查布置财务工作，千方百计筹措罢工经费，认真处理开支。他廉洁奉公，坚持原则，一丝不苟，并定期向罢工工人报告收支账目，接受工人代表的监督，因此，尽管敌人故意制造种种流言蜚语来中伤他，但广大罢工工人却始终信任他，把他视为完全可以信赖的知心人和当家人，正如邓中夏所给予的高度评价说：“在这样的庞大的组织中，百务丛错，真是一日万机。然而，兆征同志却处之裕如，以至于将近两年而不少懈，这可见兆征领导群众的艺术和解决问题的才能了。”①

罢工期间，苏兆征与邓中夏、刘少奇等一道，对加强罢工队伍的组织建设，促进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进行工会统一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广州、香港地区都各有工会一百多个，分别隶属于各个派系，不少并为资本家或其爪牙所把持。因此，进行工会统一运动，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无论从工会本身来说，或者就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及保障省港罢工的胜利来说”，“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②苏兆征等人深入工人群众，耐心做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并从基层做起。苏兆征首先带头从香港运输业工人中起核心作用的香港海员工会中进行内部组织的整顿巩固工作，在此基础上，再联合汽车、电车、邮

①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

②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香港工会统一问题意见书》，载《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一卷），工人出版社出版。

电、煤炭、内河、船主司机等十多个工会，成立了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苏兆征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与此同时，又在金属业工人中进行，成立了金属业工会。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最后成立了香港总工会，将香港广大工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炮台。苏兆征复被聘为香港总工会的顾问，罢工期间，苏兆征等人还十分重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将大批有觉悟的优秀的罢工工人吸收进党。罢工期间，共有数千名罢工工人积极分子入党，其中如邓发、刘达潮等人，便是苏兆征亲自介绍入党的。

一方面，广大工人对于自己的领袖苏兆征表示衷心的热爱和拥戴，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却把苏兆征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地对苏兆征进行打击陷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罢工初期，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工贼梁子光一伙企图操纵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捏造事实，诬蔑苏兆征接受奸商贿赂，企图将苏兆征撵下台。但是梁子光的所作所为却激起了罢工工人的极大愤慨，结果梁子光陷于孤立。罢工后期，帝国主义主使一小撮反动分子放火焚毁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所在地东园的建筑，并乘机大肆造谣，说火是苏兆征等罢工领导人自己放的，目的是借此贪污灭迹等等。事后，有少数罢工工人情绪因此受到影响。苏兆征高瞻远瞩地鼓励大家说：“东园的火只能烧毁我们的一些物资，但不能烧毁我们的斗志。饱经斗争经验的罢工工人是经得起考验的。”^①在苏兆征的带领下，罢工工人自己动手，迅速将罢工委员会办公地方重新搭起来。与此同时，还组织有关方面进行清查帐目，结果证明所有帐目分厘不

^①据省港罢工老工人刘达潮、梁国志的回忆资料。

差。这样一来，苏兆征等罢工委员会领导人威信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反而更高了。敌人的阴谋一再遭到可耻的失败。

罢工期间，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苏兆征在会上作报告。他总结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斗争的经验教训，指出海员工人必须打破帮口界限，进一步加强团结；并提出今后要在各轮船上建立工会的基层组织，使海员工会组织更加严密和巩固。会上，苏兆征被选为全国海员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召开。苏兆征与刘少奇、邓中夏等人一道领导着大会的进行。他还在会上作了关于省港罢工问题的报告。到会代表对于苏兆征在我国职工运动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给予高度的赞扬。因而一致选举他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成了全国工人所拥戴的领袖。

四

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国内革命势力已逐渐发展至全国范围。一九二六年底，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办公。不久，中华全国总工会亦从广州迁到武汉，全国革命的中心便从广州转移到武汉。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旬，国民党举行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规定国共两党共同指导工农运动，由共产党派出一些负责人参加国民政府及省政府工作。会后，国民政府增设了农政、劳工两个部，由共产党人担任部长。“中国共产党决定完全赞助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决定自己

的党员应加入国民政府”^①，并委派苏兆征和谭平山分别担任劳工部和农政部部长。苏兆征还参加武汉市政府，为武汉市政委员会委员。

三月底，苏兆征告别了在广东的战友，与参加中共“五大”的代表彭湃、陈延年等人一道（苏亦是“五大”代表），北上武汉工作。苏兆征一行沿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三月二十八日，当他们路经湖南长沙时，湖南省总工会、长沙市总工会以及其他群众团体代表数百人为他们举行了欢迎大会^②。他们抵达武汉时，又受到了武汉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刘少奇在一次五十万人的欢迎大会上代表大家致欢迎词时说：“苏兆征同志是一个海员工人，他有了很长久的革命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他指导了伟大的省港罢工，坚持了十余月之久，与帝国主义直接奋斗，并且指导全国工人运动，与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斗争”^③。《汉口民国日报》也特为此发表题为《革命的象征》的社论，说：“苏兆征同志代表全国二百八十万革命的产业工人站在我们的面前，告诉我们全国的工人阶级已经领导着，而且正在领导着，并且继续领导着中国的国民革命”，“革命的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的人们欢迎他，不革命、反革命的见了他，只有恐惧，只有发抖”^④。

其时，在北伐战争胜利的推动下，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工农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也因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载《向导》第二〇一期。

② 《湖南民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③ 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

④ 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

此加紧与国内反革命势力勾结，千方百计地力图颠覆破坏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集团相勾结，进一步对武汉实行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他们“不仅是把他们在武汉的银行关闭，不接受中央银行钞票，不与武汉做买卖，并且勾结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实行停止沪汉的汇兑，断绝长江的交通，串通武汉奸商破坏金融，停闭工厂商店。蒋介石组织土匪，勾结军队，造谣恐吓——闹得武汉社会鸡犬不宁，风声鹤唳，市面萧条，财政困难。”^①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拉拢下，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内部一些人物也蠢蠢欲动，进行反共活动，“发出许多训令宣言，专以限制工农运动”，“并放任反动派使能自由的准备进攻革命。”^②党内也有一部分人，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为代表，攻击工农运动“过火”、“糟得很”。

在革命处于紧急关头的时候抵达武汉的苏兆征，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之中。在他抵武汉第三天，即四月三日，汉口发生了日本水兵行凶枪杀我国民众的严重事件。事后，一些日商乘机闭厂歇业，造成大批工人失业以为威胁。苏兆征与刘少奇等当即带领武汉人民举行了一系列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暴行的活动。苏兆征还参加了武汉政府成立的“四三”惨案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由苏兆征、谭平山、陈公博三人组成），进行了各项具体工作。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在中国共产党的敦促下，武汉政府成立了战时经济委员

①太雷：《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载《向导》第一九七期。

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载《向导》第二〇一期。

会，苏兆征、汪精卫、谭延闿等五人参加该会工作，担任了委员职务。他与刘少奇、李立三等一道，坚定地领导武汉地区的工人群众勇敢地进行斗争。为了巩固革命，维护生产，武汉工人进行了一系列反经济封锁的斗争，对捣乱的资本家实行制裁，接管故意歇业的工厂企业，不准店东携款潜逃，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惩处破坏分子等等。为了更好地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力量，湖北省总工会于四月二十日举办了工人纠察队训练班。苏兆征赶往参加训练班的开学典礼，并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大家要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保卫总工会。他还强调指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军阀，扫除一切封建势力及宗法思想，革命才能成功，真正自由解放才能实现。”^①

但另一方面，在武汉地区的职工运动中，也同时出现了一些过火的现象。对此，苏兆征认为虽然“工人农民甫经解放，不免有初期的幼稚行为”，但也应该注意纠正，提出“此后各劳工团体或个人，如有违反中央迭次训令之幼稚行为”，“当依法彻究，决不徇袒。”^②

为应付当前危急的局势，总结过去的斗争经验，提出党的任务方针，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武汉举行。毛泽东、任弼时、瞿秋白、张太雷、彭湃与苏兆征等人都出席了会议。会上，苏兆征与其他代表一道，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开展工农武装斗争等正确意见。但由于大会处于陈独秀控制之下，因此不可能认真解决上述问题。大会继续选举了陈独秀为党的

①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②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七日。

总书记。苏兆征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九日，在形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于武汉举行。苏兆征和刘少奇、李立三等人主持和领导了大会的进行。为了筹备这次会议，苏兆征等人在会前做了大量工作。大会开幕前夕，苏兆征代表全国总工会特意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了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及这次大会所要解决的战斗任务。他着重强调“中国工人阶级的努力和发展，足以造成中国革命之长足发展。”^①广大工人群众十分关心这次大会，开幕那天，除正式代表外，凭证列席旁听的工人达二三千人，还有更多的人要求前往旁听，但会场已无法容纳。苏兆征在大会致开幕词时豪情满怀地说：“在反动派向我们进攻很厉害的时候，我们却在此开会，这是何等欣喜的一件事！”^②会议期间，苏兆征还代表全国海员总工会向大会做了关于海员过去奋斗的历史及在当前革命中的责任的报告；以国民政府劳工部长的身份作了关于劳工部工作情况的报告。他坚决地表示“劳工部要为工人谋利益，也即是为大多数民众谋利益，如果我们不为大多数民众谋利益，革命便得不到保障”^③。大会鲜明地指出：“工人阶级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反对一切反动势力，粉碎反革命大资产阶级一切扑灭革命、镇压工农运动的反动阴谋。”“中国工人阶级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坚持到底，同时亦必须坚决的反对背叛革命的大资产阶级及其

①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

②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③北京《晨报》，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

代理人蒋介石。”^①大会对在国民政府统辖的地区发生屠杀工农、摧残工农组织的反动罪行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要求国民政府严惩反革命分子。大会最后明确宣布：“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中国无产阶级将坚持斗争到底！”^②这是苏兆征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钢铁誓言和战斗决心！在这次大会上，苏兆征继续当选新的执委会委员长。

此时，汪精卫集团反革命叛变活动越来越显著，局势日益危急。六月底，在汪精卫集团的怂恿下，发生了军队非法强占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的办公地点并进行骚扰劫掠的事件。苏兆征当即挺身而出，严正要求当局立即将军队撤走。他还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当场揭露军队非法强占全国总工会办公地方的事实^③。尽管后来军队撤走了，但苏兆征对此仍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且积极着手对付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叛变活动。当时正在武汉访问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就军队非法强占全国总工会办公地点事征求苏兆征的看法。苏兆征冷静地回答说：“我们今天就在里面办公了。谁晓得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情？”^④

鉴于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叛变活动日益表面化，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在国民政府中任职的共产党员，以示抗议。七月

①《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载《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出版。

②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决议案》，载《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出版。

③《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速记录》，原件存武汉市档案馆。

④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千千万万中国人民》。

中旬，苏兆征便与谭平山联合正式发表了辞掉劳工部、农政部部长职务的《辞职书》，严斥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已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揭露“国民政府领域之内屠杀之事迭见不鲜，党部则被捣毁，工农团体及其自卫之武装，则被解散”，“广州三二〇之故技。复发现于长江流域”，他们的所作所为，“使革命转入反革命的途径。”^①与此同时，苏兆征还当机立断地将劳工部的十余万元存款全部取出，尽数发给武汉失业工人救济所，用以救济失业工人，免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攫取。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终于公开叛变了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苏兆征和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一道，勇往直前，在白色恐怖中继续带领人民群众进行英勇的战斗。

五

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了惨无人道的野蛮大屠杀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为挽救革命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大屠杀而继续战斗。

针对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革命，七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举行会议，就如何举行武装起义以挽救革命和反抗国民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立即着手准备于南昌举行一次武装起义。会后，苏兆征立即动身，出发到九江等地，深

^① 《谭平山、苏兆征辞职书》，载《向导》，第二〇一期。

入工人群众之中，细致地进行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积极配合南昌起义的举行。

八月一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发动了南昌起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成为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起义前夕，由于苏兆征要参加筹备八七会议的召开，临时赶回武汉，没有直接参加起义。但在起义成功后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苏兆征仍然被选为革命委员会的委员。

八月七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我党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苏兆征同瞿秋白、李维汉、蔡和森、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毛泽东、罗亦农、邓小平等二十二人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出席了会议。会议严正批判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地位，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等文件。苏兆征参加了《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的起草工作^①，并与瞿秋白、李维汉三人组织委员会负责对《告全党党员书》作文字上的最后修改工作^②。会议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后来叛变）、瞿秋白、罗亦农、顾颉章（后来叛变）、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九人为正式委员，毛

①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

②转引自曾雁行：《“八七会议”情况介绍》，载《党史研究》，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泽东、邓中夏、周恩来、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后来叛变）、李立三等七人为候补委员。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还兼管工委工作。

根据八七会议所确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会后各地党组织纷纷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开展武装斗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州的工人群众和革命士兵举行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起义前，苏兆征在上海参加了广州起义计划的制订工作；后因工作需要，他留在上海，未能直接赶回广州参加起义。但由于苏兆征在广东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因而仍被推选为工农民主政府的主席（未到职前由张太雷代理）。一位当时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朝鲜同志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大会选举了十一人为苏维埃政府成员，新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是苏兆征。他是广州工人，曾领导一九二五年的香港罢工……苏兆征是一位好的工人领袖，全部广州工人都是他的忠实追随者。”^①

八七会议之后，在全国陷于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他（苏兆征）以党的使命来往沪汉之间，一无所畏，中国党的组织便在这种艰苦的勇敢的工作中维持起来。”^② 约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间，苏兆征正式调上海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还负责中央财务小组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苏兆征化名黄先生，装扮成一个大茶叶商人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并把家人从广东接来上海，以作掩护。有时，他又化装成海员工人模

①（美）尼·韦尔斯、（朝）金山著：《在中国革命队伍里》，香港南粤出版社出版。

②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

样，亲自到码头与来自各地的海员联系，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他把个人安危置于脑后，出生入死，为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而日夜奔忙，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性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还抓紧时间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以提高自己的理论和工作水平。

一九二八年二月，在苏兆征的主持下，中华全国总工会于上海秘密地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研究工会在当前形势下的任务和工作部署。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当时各地工会几乎全部陷于瓦解，加上反动派组织黄色工会来欺骗和控制工人群众，以及我党在工运工作中所出现的“左”倾盲动情绪，徒然暴露了更多的同志，致使我赤色工会已不可能公开领导工人进行斗争。根据这种情况，苏兆征在会上主张采用工厂委员会的形式来团结不同工会派别和不同政治见解的广大工人，为自身的经济利益而进行斗争。这一主张，由于切合当时斗争的需要，为大家所采纳，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目前总任务的决议案上，肯定“目前在群众运动中工厂委员会的组织是十分必要的。”^①

这期间，苏兆征还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泛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第二次会议。他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会上作报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背叛革命、进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罪行，介绍当前中国工人阶级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反抗斗争的情况与经验。

^① 《中国工人阶级的指南针——全国总工会目前总任务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载《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二卷，工人出版社出版。

会后，苏兆征离开上海赴苏联，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召集的第四次大会。还在大革命时期，苏兆征就积极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的活动。一九二四年五月，赤色职工国际派代表到广州召开太平洋沿岸运输工人大会，苏兆征代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出席了这次大会，对促进东方运输工人的团结和反帝斗争作出了贡献。一九二七年五月，赤色职工国际又在汉口召开太平洋第一次劳动会议，苏兆征是这次会议主席团的成员。会上决定成立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作为联络宣传及行动的机关，苏兆征被推选为秘书处成员。从此，他逐渐闻名于国际职工运动之中。在一九二八年三月举行的第四次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上，各国代表都十分重视中国职工运动的斗争经验，专门组织了一个有三十五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委员会来详细讨论。经过热烈的讨论和认真研究，大会对中国的职工运动问题，作出了有关决定。苏兆征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八月，苏兆征在莫斯科还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向大会致贺词，并在大会上先后作了两次报告，介绍了当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情况。苏兆征被选为大会主席团的成员，纲领起草委员会委员，并与瞿秋白等三人被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后来，他又应邀出席了苏联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大会，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情况的报告。他还当选为农村工会国际的副委员长。这样，苏兆征便成为国际职工运动中享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了。

在莫斯科期间，苏兆征出席了于一九二八年七月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苏兆征坚决拥护大会的正确路线，并对陈独秀放弃革命领导权，断送工农革命利益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严正的揭露和批判。在这次大会上，苏

兆征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在苏联期间，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曾特意接见了苏兆征、周恩来和瞿秋白等中国同志，请他们介绍了中国国内革命斗争的形势和经验，并对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见解。

艰苦严酷的斗争环境，长期忘我紧张的工作，苏兆征终于积劳成疾，并患了阑尾炎。因身体虚弱，医生建议他在苏联先休养一段时间，待身体康复后再施行手术。但苏兆征一心惦念着祖国的革命事业，特别想到许许多多为革命牺牲的同志和正在受苦受难的劳动群众，更使他无法安心休养。他不顾医生和同志们的劝阻，毅然抱病回国。

一九二九年一、二月间，苏兆征回到了上海。他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和虚弱有病的身体，也顾不到先回家里与家人团聚，便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二月中旬，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苏兆征在会上作了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的报告，并认真地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赤色职工国际对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贯彻到会议中。他还虚心检查及认真总结了前一段白区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工运中“往往采用红色恐怖手段，这是错误的”，“这是脱离群众的办法”。他再次总结及强调了关于工厂委员会对于当前形势下进行工作所起作用，认为“工厂委员会善于运用，很可以团结工人及锻炼工人的斗争情绪”，“是一个夺取群众的顶好办法”^①。这次会议总结了工会过去的工作、明确了今后

^①苏兆征：《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报告》，载《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二卷，工人出版社出版。

的任务，并针对过去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改正的办法，对国内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会议结束不久，苏兆征旧病发作。尽管病情严重，但他仍以党的利益为重，严守党的秘密，既不愿将病情告诉别的同志，以免增加党的负担，也不肯将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地址告诉家人，以免给党造成不利和危险，直到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时，家人经过一番周折，才把他送进一家私人医院医治，但因拖延了时间，生命已处于垂危状态，无法医治。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同志闻讯立即赶往医院看望他，这时苏兆征已是奄奄一息了。但他仍极力挣扎着，用十分微弱的声音时断时续地说着：“广大人民已无法生活下去了，要革命，等待着我们去组织起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奋斗”。后来他又用手指着胸口反复地说：“大家同心合力，一致合作，达到革命的最后成功！”^①苏兆征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念念不忘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念念不忘加强党的团结，对革命事业依然充满必胜的信心。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苏兆征同志因抢救无效，不幸与世长辞！

苏兆征同志逝世的第二天，即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悼念苏兆征同志不幸逝世的三十二号通告。通告说：“苏兆征同志在这几年的工作过程中，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的精神和坚决的政治意识，的确是党的最好的指导者”，“兆征同志的革命精神，真是全党同志的模范”。

^①龚饮冰：《纪念苏兆征同志逝世三十周年》，载《中国工人》一九五九年第四期。

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追悼苏兆征同志，并开展宣传；同时号召全党同志要牢牢记住苏兆征同志“大家努力，达到革命的胜利”的遗言，“要一致地继承着苏兆征同志的精神，向前奋斗！”^①三月十五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也向各级团组织和团员发出了悼念苏兆征同志的第四十五号通告。通告说：苏兆征同志是共青团的名誉团员，他非常关心和了解工农青年的疾苦，并非常注意指导青年运动，因此他的逝世，“不但是共产党的重大创伤，同时也使共产主义青年团丧失了一位得力的指导者”。通告要求共青团员“继承他的精神，努力奋斗，以完成他未竟的事业。”^②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发出了关于悼念苏兆征同志不幸病逝告各级工会的第九号通告^③。当时白色恐怖正弥漫着全国，不可能公开举行大规模的悼念活动，但是各地党团组织和革命群众仍然通过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以纪念这位党和职工运动的杰出的领导人！

一九三〇年二月，苏兆征同志逝世一周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此发出了第十号通告，并且专门出版了纪念册，《劳动》周刊社也专门出版了纪念特刊，一再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领袖苏兆征同志表示深切的纪念。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间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也特意为苏兆征同志的逝世默念致哀。

① 龚饮冰：《纪念苏兆征同志逝世三十周年》，载《中国工人》一九五九年第四期。

② 《团中央通讯》，第二期，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出版。

③ 《中华全国总工会通告——第十号》（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九日），载《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二卷，工人出版社出版。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苏兆征同志亲属，黄平、刘达潮、冯桑、梁国志、冯永垣、方世林等老工人，淇澳大队老人、干部的调查访问记录；龚饮冰的回忆录。
2. 广东《群报》（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上海《申报》（一九二二年一至三月）；上海《时报》、上海《新闻报》（一九二二年一至三月）；《工人之路》（一九二五年六月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至七月）；广州《民国日报》（一九二五年六月至一九二六年十月）；《劳动》（一九三〇年二月）；《向导》（一九二七年）；《政治周报》（一九二六年）；《中国海员》（一九二六年）等报刊。
3.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工人出版社出版；《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出版；《苏兆征纪念册》，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三〇年二月编辑出版；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工人出版社出版。

徐 特 立

蒋崇伟 邹秋龙

徐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教育家。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光辉的贡献，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同志的高度评价。他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一切优良品质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骄傲”，是“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把他的“一切优良品质发扬光大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任务。”^①

钻研古近科学，奔赴民主革命

徐特立，原名徐懋恂，按徐氏辈顺，又名徐立华，一八七七年二月一日（清光绪二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当时叫善化县，民国初并入长沙县）五美山荷叶墩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徐树照，除种田外，还经常给别人做零工、赶脚、烧瓦。父亲有一手烧窑做瓦的好手艺，所经营的

^①中共中央祝徐特立同志七十大寿的信，载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解放日报》。

“徐家窑棚”，在附近比较闻名。特立四岁时，母亲病逝，姐姐出嫁，十四岁的哥哥徐立太，随父下田地劳动，维持生计。他和一个两岁的妹妹静寂凄凉地守在家里，不久以后，妹妹送给陈姓做了童养媳。

特立八岁那年除夕晚上，父亲因给数里外的一个颜姓地主推车运石块修祖坟，一直没有收到工钱，便于这天下午至颜家收工钱买物品过年。当时北风呼呼，大雪飘飘，全家盼望父亲回来吃年夜饭，可是一等再等，老是不见回来，直到次日——元旦天晓，方见彻夜未眠疲惫不堪的父亲，因颜家赖帐，两手空空而归。幼年的特立开始意识到社会的不公平，在自己的心灵里打下了难以泯灭的烙印。

还有一件事使幼年的特立永远难忘。当时居住在附近的一位童养媳，被婆家残酷折磨而死。他对这个被封建礼教吞噬的幼女感到由衷的同情。从而促使他后来很重视妇女解放和重视女子教育。

特立十二岁。伯祖父去世。伯祖父是一个中医，父亲决定将他过继给伯祖父。伯祖母嫌家里人手太少，不久为他娶一童养媳。这位童养媳姓熊，娘家很穷，父母双亡，由亲属作主嫁来徐家。她比特立小十个月，连个名字也没有。过门后，特立对她一直很好，还给她取名为“立诚”。一家老少三口，无劳动力，全靠收点租子维持生活。伯祖母是一个勤俭节约，善于持家的人。他后来回忆说：“我受祖母的治家教育最深刻，我一生刻苦和我妻能在二十岁以后脱离我独持家政五十年，都和祖母的教导有关。”^①

^①徐特立：《我的生活》，见一九八〇年第七期《新湘评论》。

特立九岁时，父兄因饱尝不识字的痛苦，便决心凑集一点经费，送他入附近一所蒙馆学习，读“四书五经”一类的书籍。最初半年，蒙师只教学生读写，死记硬背，从不讲解书的内容和字义，因而学了之后，既不能理解，又不能运用，收效不大。这使他产生了抵触情绪，半年之后，便转到一个张姓蒙师的私塾学习。这位先生教书非常认真，教一句解释一句，要求学生甚严，而且动辄打人。调皮的学生往往逃学，而特立却喜欢这个先生。这位蒙师还注重教学生以做人的道理，除教特立读“四书五经”外，还教他读朱柏庐^①的《治家格言》和杨椒山^②的遗嘱。朱氏《治家格言》讲的都是日常琐事，特立读后，觉得它与“四书五经”比较起来，文字浅显易懂，道理切实有用，对自己很有启发。杨椒山因弹劾权臣严嵩惨遭杀害，临刑前写给儿子一极有感情的遗嘱，还留下了这样一首绝命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少年时代的特立对于杨氏这种不畏强暴，疾恶如仇，坚持正义，死不反顾的品格和气节，深表同情。读了杨氏遗嘱之后，为之流泪不已。后来他回忆说：“使我对书籍发生兴趣的，却是这两篇文章，而不是《论语》。”^③

特立十五岁那年，转到浏阳河畔一座大古庙里读私塾，老师是一个有学问的和尚。这个和尚老师除教他读八股外，还教他静坐、读佛经和禅宗语录。他从此开始接触到一些唯心派的

①朱柏庐，名用纯，字致一，明末清初昆山人。

②杨椒山，名继盛，字仲芳，明容城人，嘉靖进士。明世宗时，以列举严嵩十大罪状被杀。

③徐特立：《我的生活》，见一九八〇年第七期《新湘评论》。

哲学。

一八九三年，特立十六岁。伯祖母病情严重，经求神拜佛，均不见效，就许愿到南岳衡山进香。为使祖母转危为安，特立与同乡十余人，共租一条小船顺浏阳河而下湘江，再逆水南行，前往南岳。在约四天的水上行程中，这十余人嫌船行的太慢，天天斥责船夫，而特立却为船夫无故受责愤愤不平。他心想：我若是一船夫，决不运人，只运猪；我读书如取得科甲，就只做教官，不当欺压百姓的官吏。从此，他改名为徐特立。意即“特立独行，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

同年，特立伯祖母病故。病葬负债，使得他的家境愈趋窘迫。他在读完六年蒙馆之后，终于辍学在家，一边劳动，一边自学。这时，他为自己的前途而苦恼，一心想找个职业，弄碗饭吃。

和尚老师的影响，幼年时期的种种不幸和挫折，使特立曾一度产生过皈依佛教，出家当和尚，以脱离尘世苦难的念头。但又觉得自己是过继一房之后嗣，应该传宗接代，出家当和尚太不舍乎人情。辍学两年之后，十八岁的特立开始在五美乡小塘湾边教蒙馆，一边读书，继续翻阅伯祖父遗留下来的一些中医学之类的书籍。

五美地处长沙和浏阳之间，特立经常前往长沙，逐渐接受了康、梁的维新思想，拥护他们的变法主张。他决心执行自己的读书计划，钻研近代科学，寻求御侮救亡的道路。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维新人士或被杀或逃走，一切复旧。这给特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痛恨清廷的昏庸腐朽，敬慕维新志士为国捐躯的英勇精神。

徐特立根据自己边教书边读书的计划，努力博览中国的经、

史、子、集，刻苦攻读国外传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国文等学科的基本知识。他在读古代史书中，看到中国古时也有些人半种田、半读书，并不是整年整季整日专读书不做工，而是白天做工，晚上读书；天晴做工，天雨读书；春夏秋三季做工，冬季读书。《三国志·王肃传》中就有“学足三余”的说法，所谓“三余”，就是指的：晚上是白天之余，冬是春夏秋之余，落雨是天晴之余。“学足三余”，就是抓紧空余时间努力学习。徐特立于此受到启示，他不但抓住了“三余”，而且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手不释卷地学习。他学习《说文》，苦于篆文不易熟记，每天只学二、三字，晚上睡不着或平时走路，常常用右手食指在左手掌中写来写去。《说文》部首五百四十个字，花了一年时间才读完。他学数学，常把一本表解装在口袋里，走路时，先翻看一条定理或一个题目，边走路，边思索，边记忆。走了一段路程之后，掌握了，再翻看另一条定理或另一个题目。学心理学，伦理学，对其中的术语，也是选抄成小本子，放在口袋里读熟的。他后来谈到自己学习的方法时说道：“我读书的办法总是以‘定量’‘有恒’为主。不切实际的贪多，既不能理解又不能记忆，要理解必须记忆基本的东西，必须‘经常’‘量力’才成。”^①他读书严守一个“少”字诀，不怕看得少，就怕不坚持，下苦功夫，力求看懂、看通。他还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方法，边看书边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感想和意见，并用本子摘出书中精采

^①《小学教师自学经验谈》；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二四一至二四二页。

的地方。这样读书，速度固然要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学的东西很扎实。记得牢，懂得透，就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目的。特立这样刻苦坚持业余自学数年，终于掌握了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等课程的基本知识，为日后进入中小学教这些课程奠定了基础。他说：“我从半教半学，读了许多古书，还读了旧的地理、历史和数学。……一九〇六年，我离了蒙馆成了学校教师，同时教地理、历史、数学三科，教小学兼教中学。……一直教到中学以上的高等师范学校。”^①

一九〇五年，特立二十八岁。当年清朝政府举行考试。特立出于前途考虑，同时也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文化水平，乃报名参加考试。初次应试，虽未考取秀才，但因他预考被录，名声和威望大为提高，年俸由十四串而上升为六十串，一跃四倍，这是他引以为自慰的。然毕竟应考落第，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职业问题。正当他为前途而纳闷的时候，社会改革和时代进步给他带来了一线光明。一九〇五年清朝政府被迫废科举，办学校。长沙望麓园新办起了一所宁乡师范学校，徐特立考入该校一个学制为四个月的速成班。虽然他的文化程度已在一般教员之上，但教学内容和方法倒很新鲜。特别是校长周震麟，系同盟会员，刚从日本留学归国，在学校里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同时，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也传入湖南，这些都使他深受影响，迅速地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和革命主张，“走上了反康梁而相信孙文的道路”^②，而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民

① 《小学教师自学经验谈》；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二四一至二四二页。

② 《六十自传》；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十页。

主主义者。

徐特立在宁乡师范结交了进步老师朱剑凡和进步同学姜济寰、何雨农等。毕业典礼会上，周震麟校长热情洋溢地说：

“我们办这个学校，不是专为培养你们当个好教员，得到社会上的名誉和地位，更重要的是希望你们创造事业，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①徐特立深为周校长这种鼓励所感动，以后他回忆这一情景时总是说：“我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革命事业，这几句话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②

宁乡师范毕业后，他与姜济寰、何雨农二同学一起，在离长沙三十里的梨江，创办了一所梨江高小。姜、何家庭较富裕，自认出钱；徐特立没有钱，自愿出力，不拿工资，只吃饭，在学校教几门课程。熊瑾玎就是梨江高小第一期的学生。是年中秋节，徐特立回到家里，方知妻子生下了第三个孩子，而仅三岁的第二个孩子又患了严重的痢疾，家里既缺米，又缺柴火。家庭与学校相距五十华里，他为了不影响学生学习，坚持既上课，又照顾产妇和病儿，只得两头忙。上午上完四节课，匆忙赶回家煮饭、煎药、洗衣服，搞到深夜睡一觉，天未亮就起床赶到学校吃早饭，继续上四节课。这样坚持了十余天，充分表现出他那忘我的事业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一九〇六年春至一九一〇年，徐特立应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的聘请，初次进长沙城至该校任教。讲授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等课程。这时，长沙城内流传着《猛回头》、《浙江

①②转引自周世钊：《我们的师表》，北京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十二页。

潮》、《中国魂》、《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他阅读后，思想上进一步发生变化，认定只有推翻清朝专制政府，中国才有出路。他和朋友朱剑凡等，经常商谈时事政治，把学校作为传播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宣传革命的阵地，影响扩大到他校，扩大到社会。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在中国展开铁路权利的争夺战。清朝政府为了大借外债，竟然把修筑铁路的权利送给列强，颁布天下干路国有政策，把民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激起全国进步人士的反对，粤湘鄂川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保路运动。一九〇六年，在湖南兴起的反对铁路国有运动，徐特立是发起人之一。他和几个同志密商，决定发动长沙各公私立学校一齐罢课。他召集私立学校的教师开会，又把印好的传单分送给公立学校的教师，号召大家起来斗争。他站在斗争的前列，斥责胆小怕事和思想保守者的游移和阻拦。周南女校一职员对他说：“什么罢课，什么反对！我看只要黄纸写的上谕向墙上一糊，什么也完了！”徐特立从容地回答说：

“上谕不上谕，我不管它，课是一定要罢的！”几天之后，长沙城内各公私立学校师生全体起来罢教罢课了。这是长沙最早的罢课运动，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它鼓舞了长沙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为后来长沙人民起来响应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清朝政府媚外投降的政策，助长了残暴成性的帝国主义者的气焰，致使全国各地教案相继发生。一九〇〇年七月和一九〇二年八月，湖南相继爆发了衡州教案和辰州（即今沅陵）教案。辰州教案中，群众被惨杀十余人，清朝驻辰州的一个“游击”（下级军官）后来被解往长沙杀害。善化县的苏知县，为收尸哭了一场，后来也被罢官。苏知县的女儿在周南女校读

书，徐特立对此案件，了解得很清楚。接着，一九〇六年又发生江西南昌教案，江西按察使余肇康被撤职，南昌知县被杀害。徐特立对于清廷统治者这种对外屈服、对内镇压的政策痛心疾首，怒不可遏。一九〇七年，他至长沙修业学校兼课。一天，他在该校操场作时事报告，慷慨激昂地痛陈帝国主义的暴行和清朝对之屈服投降的政策：列强的侵略，教士的横行，中国人民被杀被辱，以及清朝政府出卖国家主权，鱼肉人民……越讲越激昂，越讲越悲愤，声色俱厉，热泪如倾。突然，他纵身从台上跳下来，跑进厨房，取来菜刀一把，当即砍断左手小指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报仇雪耻的决心。顿时指血不止。他写了血书后，晕倒了。而台下群情激愤，无不摩拳擦掌，义愤填膺。校长彭国钧（后来大革命时期，“马日事变”爆发后，成为反共的国民党右派）耽心事态扩大，又鉴于湖南立宪派人士罗杰（又名罗峙云）、栗戡时即将赴京请愿，当即用徐特立断指流下的一盖碗鲜血，血书“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个字交罗等带进北京，以宣传他们的主张。不明真相者以为徐特立断指是请求立宪，实际上出于对帝国主义和清廷统治者的抗议，“借以激励学生反对洋人的侵略”^①。当时省内外的某些报纸曾经报道过这一新闻，还有人作了一副对联予以赞扬：“罗峙云仗义执言，效申包胥^②之哭；徐特立拔刀断指，有南

①徐特立断指一事，后来有不同的记述。我们采用了徐老自己在《六十自传》、《我的生活》中的说法。

②申包胥，春秋楚国大夫，与五员友善。五员将逃往吴国时，对申包胥说：“我必覆楚”。申包胥答道：“子能覆之，我必能兴之。”及吴伐楚入其都城郢时，申包胥乃至秦请求派兵救楚，依城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水不进口达七日，秦哀公乃出师定其国难。楚昭王返国赏申包胥的功勋，申避而不受。

霁云^①之风。”一时徐特立成为一个有名的爱国主义者，蜚声湖南，名扬全国。

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〇年，徐特立在长沙的四年中学教学中，感到基础教育——小学教育问题不少，直接影响到中等教育，便决计离开中学，研究小学教育。一九一〇年春，徐特立前往上海，入江苏省教育会所办之单级小学训练班，跟从比他还年青的杨月如、俞子夷二先生学习了四个月，边学习，边考察上海的小学教育。接着，他又东渡日本参观、考察小学教育约两月。回国后仍至周南女校任教，并兼小学部校长。为了将所学得的新鲜知识和自己的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推广先进经验，改进教学，提高小学教学质量，他发起创办了《周南教育》周刊。他亲自动手写文章，自己校对，自己发行，自己筹款。这是湖南最早的教育刊物，深受教育界欢迎。在他的倡导下，一九一〇年，湖南破天荒地举行了第一次全省学生成绩展览会，他每天课余前往参观，将各校成绩详加审阅评比，从中总结成绩，发现缺点，明确改进教学的方向。在此基础上，他又利用课余时间，整理自己的参观笔记，写出了一个小册子《成绩批评小册》，以每本三分的低价钱卖给各校教师作为改进教学的参考。这个小册子，既有理论，又有实际，是他外出至上海、日本学习教学理论和经验，同他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以及全省各校的先进经验相结合的产物。《周南教育》和《成绩批评小

^①南霁云，唐顿丘人。安禄山反叛，霁云从张巡守睢阳。城中食尽，霁云乞师于贺兰进明。进明无出师意，又欲留霁云，大饗之。霁云哭诉说：“睢阳将士不食月余日矣，义不忍独食。”因而拔刀断一指，一座大惊。将出城，抽矢射中佛寺之浮图，说：“吾归破贼，必灭贺兰。”复冒围而入，城陷被俘，英勇献身。

册》，对湖南改进小学教学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后来，他回忆这些事时说道：“我认为实际第一，书本第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可以不要，而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则越多越好。”^①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省城教育界人士，在徐特立、何雨农及其他革命人士的努力下，积极参加了焦达峰、陈作新所领导的长沙起义。长沙起义胜利后，湖南要成立临时议会，他到处发表自己的政见，竞选当议员，结果被选为临时议会的副议长。在议会里，他和一部分议员主张各县县长由人民选举，经过多次斗争，议案获得通过。但议长熊兆周是个官僚派的代表，反对这个主张，暗中和官绅勾结，把已经通过的议案搁置起来，不提交给政府，使之无法实现。一部分议员继续斗争，结果议会被武力解散，民主共和成了泡影。通过这些实践，徐特立认识到从议长至议员，不少人心怀鬼胎，总想捞个一官半职，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国计民生，而是个人的升官发财。他痛恨某些人挂着革命党的招牌，争权夺利，当上官就背叛人民的可耻行径。他认识到辛亥革命已经失败，革命政党已经变质。愤懑之余，毅然辞去副议长的职务。几乎与此同时，他还曾应邀到省教育司做过几个月的科长。其后他主张发展平民教育，反对司长陈某削减学生数额，裁汰个人不喜好的教员。因权不在手，反对无效，于是立即交出委任状，离开教育司。正如他后来所说：“因此我认为政府总是坏的，革命党做了官就要叛变，我还是回到教育界去，用教育来改革人心

^①转引自周世钊，〈我们的师表〉，北京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十八页。

罢！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一个教育救国论者”^①。

热心教育救国，坚持反帝反封

徐特立离开省教育司后，担任善化高小（后改为长沙第一高小）校长。当时，他的同窗好友、长沙知县姜济寰打算大力发展教育，在全县建立一千所国民小学。为此，准备先办一所师范学校培养师资。姜请徐特立担负这个学校的筹建工作。他接受这个任务后，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困难不少，任务艰巨。善化高小设在化龙池，房屋非常破旧。他将善化高小一部分房子腾出来，并就校内的走廊、过道等处，添辟一些房间，作为长沙师范的教室和办公室。他又与湘岸樵运局负责人商量，将该局存放在善化高小后面的硝磺拨给学校变价使用，得了一千余元，用以解决长沙师范开办的经费问题。在他的努力下，长沙师范终于在“盘根错节，历尽艰辛”的情况下创办，并于一九一二年春招收六个班（四年本科两个班、一年的一部讲习科两个班、六个月的二部讲习科两个班）的学生。半年后，又觅定荷花池的泐潭寺，稍加修建，定为永久性的校址。徐特立担任该校的第一任校长。当二部讲习科学生毕业的时候，徐特立高兴地为他们书写了这样一首《毕业歌》：“休夸长沙十万口，子弟不教非我有。十八乡镇半开化，少数通人难持久。莫谓乡村阻力多，盘根错节须能手。莫谓乡村馆谷薄，树人收获

^① 《六十自传》，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十三页。

金如斗。大家努力树桃李，使我古潭追邹鲁。”^①既概述了他办教育的艰难，也说出了他办学的目的和意愿。

长沙师范诞生后，面临着种种困难。一九一三年秋，袁世凯的爪牙汤乡铭督湘。他把学校视为制造革命党的机关，蓄意克扣和停发教育经费，致使不少学校关门或停课，长沙师范也面临着难以维持的局面。徐特立不忍坐视数百学生失学和长沙县创办一千所小学计划的破产，决定将已初具规模的全部校舍租给省立第一中学使用。而本校全部师生却搬至简陋的城隍庙，照样继续上课，以每月几百元的租金收入弥补学校经费之不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后来，在自己的工作中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过一定成绩的田汉、曹伯韩、张怀、黄德安等，就是长沙师范这个时期的学生。

徐特立早就痛恨封建君主专制，极力主张民主政治。他担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后，注意发扬民主，从不搞个人专断。他立即着手组织校务会议，成立学生自治会。开校务会议时，学生会必有两人以上代表参加。校内一切重要事务，不论是教务、训育、事务诸方面，均是先提交校务会议讨论和决议，然后公布执行。这种民主做法，是当时长沙各校少有的。正因为徐校长作风民主，平等待人，一些教师即使薪金比较低，也愿意应徐校长之聘，来他领导的学校任教。

在旧社会的制度下，徐特立办的学校也是无法做到为广大工农子弟开门的。但他“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②，尽可能地照顾劳动人民的子弟入学。他在长沙师范曾经破格录取了一个退

^① 《十老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五二页。

^② 《留法老学生之自述》；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五页。

伍兵和一个铁匠。退伍兵叫廖栾，曾在长沙一个店里当雇工，从来没有进过学校，仅识二三百字。经过考试，因成绩太差，未被录取。廖一再请求录取，恳切地对徐校长说：“我也知道我的程度不行，但我有志读书。”徐校长见其求学心切，就破格录取了廖，笑着对廖说：“我就取你这‘有志读书’四个字。”铁匠叫黎升洲，也因成绩不合格，经徐校长介绍到湖南军械厂做工一个时期后，再行吸取入学的。廖、黎入学后，刻苦学习，进步很快。廖后来还跟徐特立赴法勤工俭学，解放后曾一度在湖南省工业厅当干部。黎后来在中小学教了几十年书，解放后曾先后在大连、长沙教中学，并曾被评选为湖南省的优秀教师。

徐特立以爱护学生著称。他一次查夜，发现一个学生在床上呻吟，当知该生烂了脚后，便亲自打了一盆水给这个学生洗脚。等这个学生洗完脚上好药，才离开寝室。后来事情传开了，一些好心的教师说徐校长不爱惜自己的身分，竟然给学生洗脚。话又传进了徐校长的耳朵，他说：“好事有人夸大，好象坏事有人夸大一样，……我只稍微做了一点，……看看学生洗脚，就说我替学生洗脚，是把我的一点好处夸大了！”

徐特立特别关心贫苦学生，经常节衣缩食，掏钱支援他们。他发现本科第一班学生田汉刻苦好学，是一个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可是该生家庭经济困难，没有钱买书，就把自己在书店里买书的折子拿给田汉到书店里选购自己喜爱的书籍，书款统一由他自己清偿。夏天，田汉没有蚊帐，蒙头睡觉，徐校长又送给他一床蚊帐。一九四七年一月，徐老七十寿辰时，田汉从上海寄诗一首到延安向徐老祝寿，诗中颂扬徐校长“辛亥创长师，艰难尝已备；始在化龙池，再营泐潭寺；人才相继出，

高风良未坠。”最后谈到他“学生遍天下，春风无不被，寒极暖亦近，雪深草弥翠。”^①没有忘记过去徐校长的关怀照顾，自己受益甚多的情景，洋溢着对徐老的衷心敬爱和深厚情谊。

由于经费困难，长沙师范教职员的工资待遇一直是比较低的。作为校长，徐特立拟定自己同主任、庶务、缮写等一样拿工资，每人每月二十元。他以这二十元开支伙食、购买书籍、接济家庭、救济困难学生等等，显然是不够用的。他只得到外校兼课，增加部分收入，以解决经济问题。

一九一三年，徐特立在长沙师范任校长时，得知家乡的丁家小学因经费拮据而停办，给附近的农民子弟上学带来了困难。他便拿出自己工资的一部分，资助该校迁至五美观音庙，改称五美高小，增建校舍，置办校具，聘请教师，都由他从工资中掏钱供给。观音庙是一个香火兴隆，迷信盛行之地，五美高小迁来后，却遭到了封建迷信势力的责难和反对。徐特立对该校师生说：“这里不准办，就搬到我屋里去办，我把房子献出来。”接着，他又想方设法筹集经费，为该校在观音塘自己的老屋前面添建了两间教室。一九一六年，五美高小正式在徐的住宅里建立起来，日后，这所学校在徐的支持和影响下，为党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熊瑾玎、蒋长卿等同志就曾在该校担任过校长。

徐校长总是千方百计地节省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开支，他的家属一直留在乡下，夫人在家喂猪种菜，维持家庭生活。学生问徐校长：“您为什么不把家搬到长沙来呢？”他回答说：“家里不进城，孩子可以在农村学校念书，让他们多懂得些艰

^①田汉：《懋师七十大寿》，载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解放日报》。

苦，养成勤劳朴素的习惯，比在城市的学校好得多！”他每次步行八十里回家，连往返的午餐费也舍不得花，带些家炒的薯片之类的东西，在路上作为午餐之用。徐特立后来谈到自己勤俭节约，艰苦办学时写道：“我自己没有财产，也没有办公赚过钱，有什么能力创办学校呢？我的办法就是：……每日多上课两小时，一月多得六十元，分给两个高小^①用。家留在乡下，节省日用，谢绝一切应酬，绝对不请朋友吃酒肉和茶点。……”^②。

徐特立一贯勤俭朴素，克己奉公。当时，中学教员的穿着，不是中式长袍马褂，就是西装革履。一些留学生回国后，一派洋打扮，装出一副洋相。而徐特立一年到头，穿着布衣布鞋，活象乡下一个劳动人民。一天，他去周南女校会见朱剑凡校长，新来的传达室工人不认识他。当他说明是长沙师范的徐校长和来意后，那个工人望着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还有所怀疑，便对他说：“你说徐校长来会朱校长，徐校长在哪里？”徐特立笑眯眯地回答说：“我就是徐校长嘛！”那个工人虽客气地让他进去了，但还感到诧异。

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徐特立也有其独到之处。他善于因材施教，发展学生的特长。他利用“窗户报”^③等多

①两个高小，指他创办的梨江高小和五美高小。

②《六十自传》；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十二页。

③当时长沙师范学生读书蔚然成风，爱好文学，写诗歌和散文者甚多，偶有写游戏文章贴于自修室的窗子玻璃里面，供从室外走廊上过路的人阅读。最初有曹伯韩、黄德安的《晚钟报》，接着产生了张怀的《晨钟报》、田汉的《祖鞭报》等，后来又出现了比较守旧的《閤运报》，彼此之间展开笔战。因均贴在窗户上，故称“窗户报”。徐特立不但不加禁止，而且因势利导，挑选其优秀作品登在自己编辑的教育周报上，助长其争鸣气象。

种形式启发和引导学生，教育学生。他热爱学生，关顾贫苦子弟，重视妇女求学。他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富有民主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向一切有长处的人学习，善于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他讲课富于表情，常做手势，生动具体，深入浅出，内容既丰富又扎实，深受学生欢迎，不但在长沙，而且在湖南省，都是有名望的教师和受人尊敬的校长。

徐特立在长沙师范当了两年多的校长，亏空六百多元，没有力量偿还，不得不辞去校长职务，受聘到湖南第一师范、修业学校任教。后来，还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兼课，并兼任了湖南孤儿院院长。经过几年的时间，他才用自己的薪金还清这笔帐。由此而被人视为“毁家兴学”的典范。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徐特立在省立一师担任教员。讲授修身、各科教学法，并兼任实习主任。大致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这里学习和从事早期革命活动。徐特立热情地支持和积极地参加了学生的一些革命活动。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为了登上皇帝的宝座，竟然承认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全国人民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袁运动。湖南人民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之下，也掀起了反袁斗争高潮。徐特立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斗争。当时，一师教师廖笏堂，在船山学社讲学，也谈论帝制不合国情民意，表示反对。但回到学校，却在课堂里大吹袁世凯有才能，有魄力，宣称帝制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徐特立和杨昌济、王季范、袁仲谦等富有正义感的教师，深恶这个人的卑鄙行为。便邀用一部分进步学生的名义，写信给这个教师，痛斥他“一人之身，两种面目”，使之再不敢妄吹帝制。

当时一师校长张干，比较年青，富有事业心，聘请了一些

品德高尚、学有专长的先生来校任教。但他在政治上比较保守，在学校礼堂里悬挂着袁世凯的“训令”，禁锢学生的革命思想，进步师生早就十分不满。一九一五年六月，张干竟然规定每个学生要额外交纳十元的杂费，致使那些贫苦家庭出身的子弟面临于失学的危险，弄得校内校外舆论哗然。毛泽东因势利导，起草了一篇四千余字的《驱张宣言》，历数张干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积极推行封建教育制度的种种罪行。弄得张干坐卧不安，竟然恼羞成怒，扬言要开除毛泽东等十八人的学籍。徐特立和杨昌济等素持正义、喜鸣不平的教师，则奋起召开全校教职员会议，抗议张干倒行逆施的行为，有力地支持了进步学生的革命活动。后来，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为徐特立六十寿辰举行的庆祝会上致词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①。

这时国内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以一九一五年九月《新青年》杂志创办为起点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在向着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这时湖南人民也正在走向新的觉醒，长沙的爱国知识分子相继地成立了自己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和健学会。健学会是由省教育会会长陈凤荒^②等发起，于一九一九年六月成立，主要成员系中学校校长和教员，“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

①转引自杨开智：《龚士当年万户侯——毛主席青年时期革命实践的片断》，见一九七七年九月七日《文汇报》。

②陈凤荒，又名陈凤芳、陈润霖，曾任楚怡学校校长，湖南教育会会长、教育司司长。后来转向反动。

旨”。徐特立同何叔衡、朱剑凡等加入了健学会，积极推动它的爱国斗争。

一九一九年夏，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激起爱国学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五四”爱国运动。湖南人民在新民学会和毛泽东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的组织 and 推动下，也掀起了一个反日爱国高潮，进行罢课游行、抵制日货、焚毁日货等斗争，并在斗争中建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使学生爱国运动进一步扩展成为各阶层人民参加的爱国运动。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以后，即积极进行扩大其基层组织——救国十人团的工作。徐特立积极地参加了扩展十人团的工作，在他领导下的所属各校教职员救国十人团就发展到二百五十余团之多^①。救国十人团的主要工作是抵制日货，开展爱国救国的宣传，发动群众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人民群众的爱国运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仇恨和恐慌。一九一九年秋冬，北洋军阀张敬尧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的指使下，疯狂地镇压湖南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封闭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武装镇压了长沙各界群众举行的焚烧日货大会，查禁了各界救国十人团，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湖南人民联络省内外各种进步力量，发动了一场驱逐张敬尧的斗争。徐特立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斗争，他会同各校的进步校长和教师，开展索薪、辞却校长职务的斗争，并亲自往返活动于城乡之间，向学生和群众

^①蒋询：《“五四”时期湖南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见《‘五四’运动在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八十二页。

揭露张敬尧兄弟“虎豹豺狼”^①的滔天罪行。一九一九年夏，张竟下令通缉徐特立，声言要封闭他所办的五美高小。这时，徐特立正在筹办路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

一九一九年，徐特立已经四十二岁。并教了二十余年的蒙馆、中小学和中高等师范。他为了打破因循守旧、安于习俗的传统，学习新技术、新思想，决定积极响应蔡元培、吴玉章所倡导和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奔赴法国做一个“扶拐棍的留学生”。

一九一九年夏，徐特立卖掉一部分书籍器物，筹集了一笔经费后，秘密离开长沙到上海，着手熟悉法国的生活习惯，办理出国手续。因侥幸地碰上了一个相识的华工水手，他们一行十余人，享受特殊待遇，只花了平日船票费一百元的一半（五十元），于九月二十八日登上一艘法国邮船，搭铺于船尾厕所旁之甲板上，正式开始旅欧航程。途经香港、海防到达西贡，由于船上载运的货物牛皮等起火，在西贡耽误了十多天。接着继续航行，经新加坡，穿过麻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经科伦坡、吉布堤、红海至苏伊士运河。再穿过地中海，经原英属马尔他岛，绕过意大利南端，航行五十余天后，于十一月中旬到达法国南部马赛，然后坐火车抵达法国首都巴黎。旅途中，徐特立忍受了晕船的痛苦，往往几天没有吃饭，黄胆水都呕了出来。

到达法国后，他先进入木兰省公学法文补习班，插班学习

^①张敬尧一九一八年三月入湘，当上督军兼省长以后，伙同他的三个兄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横行城乡，无恶不作，弄得全省人民怨声载道，民不聊生。群众斥之为：“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认定“张毒（督）不除，湖南无望。”

法文。由于年岁大，记忆力差，记单字比较困难，他谦虚地向自己过去的学生学习。经过七个月的刻苦学习，基本上掌握了一些常用法语，凭借“图”、“式”的帮助，能勉强地阅读数学书籍之后，便进入法国南部圣徕猛钢铁厂，一边做工和替中国工人煮饭，一边学习。这样半工半读学了一年多，方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

当时中国留法学生形成为两大派系，一派是官费生和有钱的自费生，即贵族派；一派是勤工俭学的平民派。两派学生在国内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来法国后的生活条件、待遇均迥然不同。华法教育会在李石曾、吴稚晖等的把持下，一味压制勤工俭学生，致使他们陷于失业、失学和饥饿的境地。后来，双方为争夺里昂大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里昂大学是以解决勤工俭学生的求学为名，在国内进行募捐所得，加上法国政府“退回”庚子赔款经费，专为中国留法学生而创办的。当时，里昂大学校长兼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吴稚晖，私自在国内招收一批军阀官僚子弟，并侵吞国内为勤工俭学生捐献的经费，使得许多真正的勤工俭学生饥寒交迫，流浪异国，无处存身。一九二一年九月，里昂大学建成，勤工俭学生在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陈毅等领导下，进占里昂大学，为争取上学权利进行坚决斗争。这时，吴稚晖玩弄流氓手段，竟然勾结中国驻法公使陈篆和法国政府，派出二、三百军警包围里昂大学，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的罪名，强行将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陈毅等一百〇四名勤工俭学生装入囚车，押上火车，转马赛上轮船，送回国内。

徐特立赴法以后的一个时期内，虽然同情勤工俭学生的窘境，为他们的痛苦而焦虑和奔走，寻求各种援助，但由于他仍

然迷恋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并未直接参加留学生中的政治斗争，甚至还劝导过一些青年不要置身于政治斗争。至里昂大学事件爆发时，徐特立目睹勤工俭学生受苦受压的惨状，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不平，他与黄齐生先生急从巴黎赶至里昂，支持勤工俭学生的斗争，坚决反对陈、吴之流压迫贫苦学生的暴行。他亲自出面与吴稚晖交涉，为营救被害学生而挺身斗争。但由于中法反动派的互相勾结，个人交涉终于未能达到目的。然通过这场斗争，徐特立认识到，出国留学，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为官僚军阀富人所专有，以培养其奴仆和爪牙，而贫苦学生只有投身革命斗争才有出路。后来，一九四六年，他在追悼“四八”烈士时回忆道：“黄齐生先生和我在法国时已经是四十以上的人，自问当时还不是革命的人物，由于中国没有改良的道路，迫而出此，一逼再逼，终于使我们竟成了革命先锋队中之一员。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就组织了S Y，后改为留法中共支部，而被迫回国的也多参加了革命，多成为大革命时代的中坚人物。如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向警予、刘白坚、林蔚等同志，他们已在大革命时期及内战时期牺牲了。剩下的如周恩来、陈毅、聂荣臻、李富春、王若飞、李卓然、蔡畅、罗迈、李立三、何长工等同志，都是我党独当一面的干部。至于华法教育会中某些人物，自己既不需勤工，却有勤工俭学生的捐款可吃，过着阔绰的生活，拿到博士、硕士学位，如褚民谊、曾仲鸣……有些已当了汉奸。”①

一九二二年，湖南省政府曾致电驻法公使。委托徐特立考

① <回忆留法勤工俭学时代的若飞同志和黄齐生先生>，见 <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一〇页。

察法国教育，年俸一千元。但徐特立毅然拒绝军阀政府的笼络，他致函湖南《大公报》负责人，请代向省政府交涉。要求取消原案，恢复他的勤工俭学资格。一九二三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三年后，欠债筹款到比利时参观半年，接着又到德国参观四个月，于一九二四年夏回到阔别四年的祖国，一心想为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贡献力量。可是军阀官僚政府只顾鱼肉人民，对归国的留学生徐特立等采取冷漠的态度，工作上不作任何安排，使之处于受歧视，受压迫的境地。

当年暑假，一部分因限于名额没有考取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简称“一女师”，因校址在长沙城内古稻田，故又称“稻田师范”）的女学生，纷纷向徐特立诉说失业失学的痛苦。他深表同情，沉思片刻后，笑着说：“再办一个吧！”他就在长沙师范附属小学的空房子里摆上一张桌子，放置笔、墨、砚池和报名簿，要她们自愿报名。当时长沙师范的校长杨茂林是他的学生，他便向长沙师范借了几间空房子，稍加修理，辟为教室和办公室，他又向长沙师范和其他学校借了一些破旧的桌椅和黑板，修修补补，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一所新的长沙女子师范学校，与长沙师范学校如同兄妹一般，终于在荷花池畔矗立起来了。学校的简陋可以想见，除一个炊事员和几个能吃苦的教员之外，其余就是徐特立自己了。他任校长，兼教员和勤杂工，除负担学校行政工作外，还兼任一部分教学工作，以及摇铃和扫地等事务。他的艰苦奋斗精神，感动学生们勤奋学习，主动参加勤俭建校。一天，木工送来一些新制的便桶，徐校长正在亲自动手油漆，一群学生从旁经过，他呼唤她们说：“来！大家动手！”一小时后，这些桶子在学生踊跃参加劳动的情况下，很快就油漆好了。学校开学半年后，又将原来

只一层的教室升高为两层的楼房。还从各方募来一些残破的书籍，加以拼凑修补。勉强有了一个供学生课外阅读的图书室。还想方设法收买了一些破旧的仪器，供师生教学之用。旧历除夕，他为了替学校借钱还债，深夜还在外面奔波。回到学校，走进厨房，看到晚餐后没剩什么菜，就用开水泡点米饭吃。老师们知道了，抱着不安和钦佩的心情说：“这是徐校长的特别年夜饭。”

一九二五年二月至一九二七年二月，徐特立担任一女师校长。他到校后第一天，庶务室按照惯例安排一个勤务员为校长服务。他当即破除这个惯例，说：“学校的勤务员应为全校服务，单独为校长安排一个勤务员是浪费，我们应该反对这个浪费。”一女师历史虽然较久，但设备也很简陋，基本的教学设备也很欠缺。他看到学校没有化学实验设备，影响教学质量，就想建立一个化学实验室。没有钱，又没有仪器和药品。他就清查学校的储藏室，发现有一部分可以利用的旧物品，又跑到旧货店，买回一满筐破铜烂铁和旧玻璃瓶，再使用一部分学校里节余下来的办公费买回一些药品，仪器不足，就指导木工制造一些代用品。这样，一个简陋的化学实验室就建立起来了。于是继梨江高小、长沙师范、五美高小、长沙女子师范之后，省立一女师又在徐校长手里完备和发展起来了。徐校长就以白手起家，因陋就简、修修补补，艰苦建校而闻名，被人称为“徐二鏊锅”^①。

徐特立来一女师后，象过去一样，日夜不停地工作。夜晚

^①湖南地方以铁水补漏锅为职业者，叫鏊锅匠。徐特立排行第二，故称之为“徐二鏊锅”。

经常提着马灯，带着训育员巡视寝室。一经发现学生谈话，编毛绳衣，做其他事情，就苦口婆心地劝导她们按时就寝。徐校长不仅在政治上、学业上严格要求学生，还极端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健康。天气变化，提醒学生增减衣服，开关门窗。查夜时为学生盖好被子。平时关照害病的学生。因而又被学生视为慈祥的外婆，故有“徐家外婆”之称。每当查夜，学生中有谈话者，其他学生起而制止说：“不要讲话了，徐家外婆来了。”谢觉哉同志曾在一诗中赞颂道：“独辟名山业，慈祥号外婆”；“外婆不易做，事事要克己”。徐校长为了让学生睡好，自己不知耽误了多少睡眠啊！

当时一般中学教员，到学校里上课，仍然往往坐着“三丁拐”（三人抬的轿子）来来去去，继续保持一种绅士派头。而徐特立下雨天经常撑把雨伞，穿双古式“钉鞋”，平时总是挟着讲义讲稿，在城内大街小巷里穿来穿去，于是，又逐渐流传着“徐二叫化”、“徐二神经”的称谓。在那些上层人物的眼里，觉得他古怪、特殊、寒酸，是不会享福、不会做人的傻子，这个称谓里含有讽刺、挖苦的意味。而在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心里，则是一个赞誉之词。后来，徐老七十寿辰，谢觉哉在给徐老的贺信中说：“没认识你以前，就听到你的许多事实，当时使我感动很深的，是你的‘徐二外婆’、‘徐二叫化’的外号。你对青年男女，象外婆对外孙子一样的母爱——纯真而又勇毅的母爱，你把所有及劳动所得，尽数贡献于社会，而自己却过着类似叫化的生活。”^①这是进步人士和劳动人民的评价和观感。不怕困难，不考虑个人私利，克己奉公，干别人

^①谢觉哉：《贺信》，载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解放日报》。

不愿干的事情，做“聪明人”不愿做的“傻子”。这就是徐特立特有的精神和特有的性格！在徐特立的心目里，职位无高低之别，职业无贵贱之分，凡是于国家和人民有利的事业，就是崇高的事业，就是他乐意干的事业。

徐特立对学生一向是进行耐心的说服和教育，从不简单粗暴，也不声言厉色地斥责。他在一女师对教师们说：“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的方法，更不应该有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的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①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饭厅的走廊上，悬挂着一块黑板，经常亲自在上面写诗（被称作“黑板诗刊”），对学生进行批评和表扬。他在一女师任校长两年，书写的黑板诗就达一百余首之多。从流传至今的十余首看，有表扬成绩优异者：“女儿智力何曾弱，十二三班作例观，学算刚刚三载半，几何三角一齐完。”^②有表扬注重身体锻炼者：“人人共道伯畿强，一跃先登上女场。倘使女儿皆若辈，立将衰弱转强梁。”^③也有批评不良现象者：“我愿诸生青出蓝，人才物力莫摧残。昨宵到底缘何事，打破厨房碗一篮。”^④这些诗说明徐校长善于及时抓住典型事例，对学生进行循循善诱的教导。

黑暗的旧中国，是一个豺狼当道、群魔乱舞的世界，那有正直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出头之日呢？后来，徐特立回忆自己在这个时期的遭遇时写道：“长沙县（包括现今的长沙县和长沙

①转引自周世钊：《我们的师表》，北京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四十四页。

②③④《十老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四九、一五〇页。

市——引者)的教育。民国八年以前,差不多都是我一手办的,不独创办了男女两师范^①,而且创办了实习批评会,教员训练班,一周的、一月的、三月的,各种各样的都有。长沙一共有八百个小学校,所有教员都是短期间由我一手培训出来的,在长沙教育界我应该是‘长沙王’;但是反动势力来到了以后,我在长沙县教育局都没有被选资格,我和旧势力不两立。”^②一九五七年底,徐特立在谈到这段社会经历时还说道:

“我们年轻时遇到的是国家存亡问题。我参加过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从一九一一年起又立志教育救国。我十八岁就教蒙馆,只有四个学生。以后教中学,还办过几所小学和师范学校。那时我想赶走敌人是后一辈人的事情了,我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国富民强了,我只有尽心教育青年一代,将来依靠他们救中国,为穷人做好事。我为这种理想奋斗了好几十年。一九二四年我从法国留学回来后,还是继续办教育。不过这时我思想上很苦闷,感到教育救国的路行不通。因为我教育出来的学生中,有些后来竟成了压迫人的人。”^③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赵恒惕在长沙以“反共产”为幌子,疯狂镇压群众爱国运动。他指使各校开除进步学生,结果,长郡中学开除了曾三等,并逮捕入狱;兑泽中学武装开除了段湘等八人出校。因曾三、段湘等为省学生联合会负责人,遂遭到长沙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反抗,他们于十一月九

①长沙女子师范是稍后于一九二四年创办的,徐老在这里是笼统而言。

②《六十自传》: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十三页。

③《徐老新年谈幸福》,同上第二九二页。

日向教育司请愿，三千余学生包围了教育司，要求撤换反动校长，要求集会结社自由和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要求撤退驻校军警。教育司召集各校校长开会讨论处置学生示威行动。赵恒惕亲自出席，表示欲以武力驱散学生。各校长皆噤不发言，少数反动者随声附合，只有一女师校长徐特立表示不赞同，被赵“斥其不合”^①，表现出徐特立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的优良品质。

徐特立由欧洲回国后，结交了一些共产党员做朋友，如陈章甫（陈昌）、罗学瓚、熊瑾玎、周以栗、曹典琦、廖锡瑞、黄芝岗、毛际科等。他办长沙女子师范，一些共产党员在那里担任教职员，成了学校的支柱。学生中，朱端绶、郑杰等也是共产党员。这时，徐特立对于中国共产党虽还没有深刻的认识，但他却喜欢共产党员，认为他们忠实积极，不图名不图利，埋头苦干，为学校工作，为学生服务。这也是他日后转向共产主义的一个客观条件。

献身农民运动，转向共产主义

一九二六年冬至一九二七年春，我们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迅速地在全国兴起，猛烈地打击了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统治。使北伐战争发展为一次深刻的人民革命。徐特立过去虽曾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失败，但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入中国，

^① 《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第四九七页。

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所以他未能正确地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而迷恋于教育救国，政治上一时显得停顿和沉闷。但他依然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激烈立场，热爱祖国，同情劳动人民，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现在面对火山般爆发的农民运动，他觉悟了、苏醒了、复活了。一九二七年春，他回到离别不到半年的家乡，看到乡村完全变了样，恶霸地主的威风被打下去了，流氓、烟、赌也不见了。过去政府禁止鸦片烟毫无办法，现在农会晚上开个会，男女老少一齐行动起来，马上就禁绝了。农会成立后，法院无案可审，大小诉讼，农会开个会就公平解决了。混乱黑暗的社会，经农民运动一冲洗，顿时呈现一片光明，人们的思想也跟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的大儿子笃本，过去在中学读书时就想恋爱找对象，受到他的严厉批评：“你还没有立业，怎么就能成家？你要先有为社会出力的思想，掌握为社会服务的本领，不能过早地去想个人家庭和幸福。”如今，笃本已积极投入农民运动，并且入了党，整天为革命奔忙和工作。当别人要给他介绍对象时，他回答说：“现在革命工作这样忙，哪有闲心考虑个人问题啊！”徐特立亲自创办的五美高小，面貌也完全变了样，师生都踊跃参加农民运动。女学生全都剪了短发，与男学生一样参加斗争土豪劣绅。学校采用的教材也增添了革命内容，他自己写的《留法老学生之自述》也选进了语文课本。他看到这些变化后，逢人便称赞“农协”之伟大。他看到了工人和农民的力量，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作用。后来他回忆说：“我下乡住一个星期，使我从十八岁到五十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我过去所崇拜的康梁和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这时我做了农民的小学生，我

也就从学校跳到农民协会工作”^①。他参加了湖南省农民协会，并担任教育科长，兼任湖南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同时加入了国民党左派队伍，担任国民党长沙市党部的工农部长，协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李维汉、何叔衡、郭亮、柳直荀等，全力推进工农革命。

一九二七年五月，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反动军阀何键在湖南策动了“马日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镇压工农运动，革命群众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徐笃本在敌人追捕中，冒寒游水渡江，后来染病牺牲。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国民党左派人物，也四处逃散。徐特立在逃亡中到处寻找共产党，却无意地在长沙郊区黎家坵黎尚瑾^②家里，遇到了隐瞒政治身份来此避难的李维汉。李是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人，也是徐特立在湖南一师任教时的学生。黎系一个地主家庭，来往人员复杂，隔壁房间里就有人在那里一边打牌，一边痛骂共产党，叫喊要屠杀革命人士，李维汉和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李维汉问他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毫不迟疑地表示：“我已经五十一岁了，只要共产党这样一个先进的党，能允许我这老朽的人加入组织，那我就真获得了新生，还愿意吗？”于是，经李维汉介绍，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人彭公达批准，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失败，胆小鬼纷纷脱党，投机分子相继投敌的情景下，老教育家徐特立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敌人是一个示威，对叛徒是一个打击，对同志则是一

① 《给小学教师的一封信——论小学教师和土地改革》，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二〇页。

② 黎尚瑾，女，共产党员，徐特立的学生；其父黎雪渠，教育工作者，与徐特立关系亦较好。

个极大的鼓舞。不少同志纷纷议论说：“真是疾风知劲草，岁寒知松柏啊！”后来，徐老七十寿辰时，陆定一曾经深有感触地回忆说：“当时得到消息，说有一个年已五十的湖南老教育家徐特立，却在这样的時候加入了党。这种消息，该是多么令人兴奋，多么令人增强对中国民主事业与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信心啊！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就这样对全党同志上了第一课：困难时不要动摇，应当更坚决的奋斗，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徐老给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他的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①曾三同志也曾撰文谈到徐老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时写道：“要您信奉一个主义，很不轻易，但您一经信奉就一直干到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②

徐特立入党后，党派他赴武汉工作。他先秘密地回到五美老家，告别妻子儿女。临行时，夫人含泪相送。他想到以后难以回家团聚，甚至可能这是最后一诀。他走出数十步后又走回来，不停地抚摸着孩子的脑袋，盯着孩子的脸蛋，看了又看。最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家乡，暗地里抵达武汉，受到昔日在一师任教时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等的热情欢迎，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立刻参加武汉农讲所的工作。不久，又与谢觉哉等一起编辑和印刷《大江报》。

七月，按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的统一部署，各路革命人士云集南昌，准备在张发奎的部队中发动起义。徐特立受党中央

^①陆定一：《人民教育家——祝徐老七十大寿》，载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解放日报》。

^②曾三：《您是中国人民的典范》；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十一页。

的派遣，与林伯渠、郭亮、毛泽覃等同志秘密经九江奔赴南昌。毛泽东要徐特立暂时不要公开身份，仍以国民党左派的面貌出现，以便争取和团结更多的人士参加革命斗争。七月二十七日，徐特立抵达南昌。当时江西的形势异常紧张，省主席朱培德已离南昌，与汪精卫、张发奎等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由省民政厅长姜济寰兼代省主席，主持省政府工作。姜为徐特立青年时代的同学和好友，关系非同一般。党组织决定派徐特立去做争取姜济寰先生参加起义的工作。根据党的决定，徐特立移居姜的公馆，并相约林伯渠（湖南知名人士，与姜亦有旧交）、郭亮（姜在长郡任教时的学生）同去做姜的工作。徐特立对姜说：“你我都是湖南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如一同参加革命，将对三湘子弟影响很大。”在徐特立等的热情帮助下，姜同意参加起义，并为配合起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四个厅长，有三个参加了起义。起义后，姜被革命委员会任命为江西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后来起义军在潮汕作战失利，姜济寰跟随我党领导同志转移到上海后，前往日本避难，脱离了革命队伍）。

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正式爆发，起义军胜利地占领南昌后，徐特立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并担任革命委员会所属党务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起义部队整编后，由两湖和武汉等地逃亡出来的党团员和农协会骨干分子，编为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的第三师，师长为周逸群，徐特立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由于该师党团员骨干较多，政治工作出色，战斗力较强，在起义军南下，转战赣南闽粤边的过程中，往往作为先头部队，进行艰苦的前卫战斗。因连续行军作战，气候炎热，徐特立于途中身染疟疾，病势严

重。后来被转移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徐特立一方面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另一方面随时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对该院医务人员进行思想发动和争取工作。医院院长傅连璋医师，在交谈中得知徐特立的社会经历及其参加革命的经过后，表示敬佩，并在党的教育和徐特立的影响下，加入了革命队伍，为起义军积极工作。傅连璋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那时，起义军二十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同志正患重病，也住在医院附近老古井旁边的一座楼上，我也经常去替他医治。他烧得很厉害，加上年纪大了些，身体也显得虚弱。但是，他那坚定乐观的心情，却使你看不出他象一个重病的老人。他病较好以后，常爱找些话和我谈谈，问我多大年纪了？做医生几年了？等等。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他已经五十岁了，那年刚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许当时我的惊异的表情，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说：‘五十岁，正是做事业的时候。我起码还能有三四十年好为党工作呢！’那年我才三十三岁，可是有时自己竟想到：青年时代已经过去了。当我站在这位年已半百但还刚刚踏上了他的新的征途的共产党员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这种想法太可笑了，同时，也有一种新的强烈的愿望，在我心中产生。”^①

徐特立在福音医院住院十来天，刚退烧脱离危险，便和身负重伤住院的陈赓一起，坚决要求回部队，随军出发，向潮汕进军。九月二十三、四日，部队攻入潮汕后，强大的敌军从四面八方向我军包围靠拢，徐特立率第三师一部分驻守潮州。为

^①傅连璋：《南昌起义的伤员》，见《在毛主席教导下》，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九十三至九十四页。

了解决粮饷问题，他亲自外出筹款。当他完成任务准备回部队的时候，部队已被敌军包围，无法归队。接着部队被打散，他从一位同志的口中得知前委流沙会议的精神，便果断地决定从甲子港一带乘小船经广州、香港脱险至上海。

在革命遭到失败，白色恐怖盛行面前，他毫不动摇，也不气馁。青年时代，他痛恨旧社会的世道，曾经在一首《书愤》的诗中愤慨地写道：“为恶既无恶报，为善又无善报，何必安分守己，不做土匪强盗！”他还引用古人的格言以示人说：

“大丈夫冻死当冻死，饿死当饿死，安得受人泡沫以偷生。”现在面对敌人血腥的屠杀政策，贺龙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回湘西去重整旗鼓，进行武装斗争。徐特立则“想上山当‘土匪’，同贺龙同志到湘西去”^①打游击。党中央根据他和贺龙的意愿，派他和贺龙、周逸群、郭亮、柳直荀组成五人小组，秘密进入武汉，定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到湘西开辟新的根据地。他和贺龙等至武汉后，因为交通来信太迟，失掉联络，没能赶上原来同行的同志。这时，他恰又染上了肠胃病，且病的厉害，半年之内灌肠十五次之多，只得留武汉和上海治疗。

一九二八年，徐特立病愈后，党中央派他赴苏联进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这时他已五十余岁，但学习起来特别的有劲头，一边学习俄文，一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时，又积极参加了反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他认真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当他读到《联共（布）党史》关于民粹派一章的时候，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觉得自己还没有共产

^① 《六十自传》，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十三页。

主义的头脑，还是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严格检查自己的历史，发觉自己取名为特立就不对头。因为“特立”是表示“特立独行，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的意思。他说：“真正要做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为了要改造污浊的社会，必须深入社会，与群众为伍，以了解各种情况；只应该要求自己入污泥而不染，而不是不入污泥。”^①

徐特立在莫斯科学习时，尽管生活比较舒适，学习十分紧张，却时刻惦念祖国，关切国内动态，特别是苏区的发展和红军的斗争。他在莫斯科学习的两年，正是国内革命形势大变化的两年。一九三〇年，他胜利地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风尘仆仆地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在上海隐蔽一个时期之后，奉党中央的命令，化装成商人，假道香港、潮汕、大浦，机警地穿过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重重封锁线，于当年十二月三十日到达赣南革命根据地。当天苏区广大军民正在欢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围剿”，活捉敌酋张辉瓒的伟大胜利。而在这里指挥这个震惊全国的战役者，是他在湖南一师任教时的学生、现已成为党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毛泽东，以及在南昌起义炮火中结识的战友、现已成为我军卓越的指挥者朱德。他来到这个生疏之地后，碰到了不少的老同志，人缘很熟悉和亲切。这时，红一军团总部设在宁都小布赤坎一幢两层的民房里，他一来到这里，就与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左权等住在这幢简朴的民房里。

当时，红军俘虏了许多敌军官兵，毛泽东和朱德就请徐特

^①转引自熊瑾玎：《革命老人徐特立》，工人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三十六页。

立去担负教育俘虏的工作。徐特立遵照毛泽东、朱德的意见，深入俘虏兵之中，进行个别谈话，了解到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苦，便帮助他们认清个人和家庭受苦的社会根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强迫穷人打穷人的滔天罪行，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打仗的革命意义，使绝大多数的俘虏兵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在开始做俘虏兵教育工作的时候，由于人数多，徐老和工作人员缺乏经验，出了一些问题。如开饭时，既不登记，也不规定数量，任凭他们吃多吃少；在途中转移时，请老百姓分散给俘虏煮饭，送来有先有后，结果吃食不匀，先吃者饱胀，后吃者挨饿，常常发生矛盾。一个俘虏兵建议：应该等老百姓把饭煮好后，同时拿出来，同时开餐，就可以克服这种吃食不匀的现象。徐特立认为这个意见提得很好，立即采纳他的建议，并让他去做这个工作。后来这个俘虏兵参加了红军，在长期战争中锻炼成了一个很好的干部。

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反革命头目蒋介石，经过四个月的准备之后，调集了二十万军队，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五月十六日，战斗开始打响，徐特立主动要求参加战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前两天，他随同朱德到山上察看地形，发现前面已经出现敌军，他拍着朱德的肩膀轻声地问：“老总，前边看到敌人了，为什么还不打？”

朱德回答说：“还远着，不能打！”又说，“远了我们一打，打垮他一部分，其他部分就跑了。要等到距离相当近才打，打垮这一部分，接连又打垮另一部分。但也不能等到太近了才打，那会使自己施展不开，还容易让敌人合围自己。所以远了不打，近了不打。小了一个团不值得打，打了解决不了问

题；大了又打不下。所以小了不打，大了也不打……。”^①

朱德的丰富作战经验，徐特立十分钦佩。在这次战争中，他跟从部队从赣江边上一直到福建建宁。

敌人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被粉碎。隔了一个月时间之后，七月间，蒋介石又纠集三十万军队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他们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气势汹汹地闯入我中央根据地。毛泽东和朱德等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方针，并采用“敌进我也进”的办法，把敌人引进赣南根据地，然后待机破敌。在盛夏三伏的酷热季节里，红军和敌人平行地走着，只隔一天的路程。徐特立当时尚不了解毛泽东、朱德的作战意图，一次边走边问：

“泽东同志，敌人和我们平行着走，我们为什么不打？”毛泽东风趣地说：“他们要打时不打，我们要打时才打。”^②接着，举了很多战例讲解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方针。通过战争实践和毛泽东、朱德的帮助，徐特立对红军的战略战术也逐渐地有了了解和研究。后来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时，尚能生动地讲述关于游击战争的课程。

还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徐特立跟随红军前进，除在红军中配合形势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外，还和几位领导同志一起，于戎马倥偬之中开始他毕生喜爱的教育工作。不过，现在进行的教育工作与过去有着本质的不同，而是一种为工农兵服务的新型的人民教育工作。为了使广大指战员和地方武装干部认清

^①集群：《徐老苏区生活片断》；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一六五页。

^②集群：《徐老苏区生活片断》；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一六六页。

形势，了解敌情，提高斗志，红军总部在驻地举办了部队骨干训练班，通常又称随营学校。这种随营学校是我军建军以来，指战员系统地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开始。学员来自各军各部的干部，红军总部的战士——通讯员、警卫员、勤务员也一概编班参加学习。教学条件简陋异常，不仅无教室黑板，而且没有纸笔墨砚，教员上课以木炭代粉笔，以白墙壁代黑板，学员就用木棍作笔，沙盘作纸，用心听讲，勤学苦练。学习条件虽然极其简陋，但教员却闻名中外。政治教员毛泽东，军事教员朱德，语文教员徐特立，历史教员董必武，地理教员左权。后来，这种随营学校逐步发展成为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种军事院校，为我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干部，为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徐特立除了在红军中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和在随营学校上课外，还经常配合形势，为地方搞宣传，作报告，开展民运工作。他经常把自己过去在苏联学习时的所见所闻，同国内的革命斗争实际结合起来，鼓励大家以苏联的工人、农民为榜样，为巩固和扩大苏区，壮大和发展红军，实现全国人民的解放而努力奋斗。一九三一年三月八日，各界劳动妇女在宁都黄陂三堂村召开国际劳动妇女节庆祝大会，徐特立在会上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地向大家介绍了苏联妇女的生活和斗争。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党的前委决定让一些老同志不再随军行走，留在地方开展工作。一天，毛泽东找徐特立谈话，提出党和红军要关心群众生活，要关心群众的教育，为着革命需要，要发展教育事业，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毛泽东请他起草一个苏区的教育方案。他根据党组织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深入到兴国和雩都等地，进行调查研究，起草了一个扫

盲教育的方案，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扫盲办法。毛泽东赞成这个方案，并作了修改和补充。徐特立还深入各区乡，指导和帮助组织识字委员会——分会——识字小组，把群众组织起来学文化。参加识字小组的都不识字，就派一人去分会学习，学会了一些字以后，又回小组教其他的人。识字委员会主要是为分会培训教师。他还亲自在兴国办了一个九十人的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扫盲骨干。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来自全国的工农兵代表，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徐特立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和瞿秋白一道负责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瞿秋白任部长，徐特立任副部长。但瞿秋白从一九三一年夏到一九三四年初一直在上海，和鲁迅先生一起领导左翼文化活动，苏区的教育工作，实际上由徐特立负责。

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赣南地区劳动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文化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当时，瑞金全县只有一所中学和两所小学，全部学生只有两三百人，大部分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农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都是文盲。一九三一年春，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当地又错误地处置了一部分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给方兴未艾的文化教育事业带来了新的困难。徐特立迎难而上，决心把他过去那种“历尽艰辛”的办学精神，在这里焕发出新的生命。

徐特立凭借他多年的经验，深知要普及人民教育，首先就要培训出一批人民教师。于是，他选定瑞金县城北一栋背靠池塘的两层旧民房作校舍，创办了师资训练班。不久以后，这个师资班发展为列宁师范学校。他通过当地政府部门的努力，把

农村中比较能识几个字的人都动员起来接受训练。因此第一期学员二百余人，文化程度尚可。但以后几批都是从翻身农民中选拔出来的，其中还有文盲，须从扫盲做起，教学更加困难。这个师资训练班的全部教学工作由他一人承担，一切教材课本由他一人动手编写，一切课程由他一人讲授，一切问题由他一人负责处理。他与学生同甘共苦，自己种菜、煮饭、摇铃、扫地，参加熬硝盐，等等。地方党委很重视他的事业和工作，特意派一个同志前来专管生活问题，以减轻他的负担。

徐特立学问渊博，知识丰富，文理各科均能讲授。但因年岁较大，湖南土音较重，且缺了门牙说话不大关风，上音乐课，教唱歌实在有点吃力，往往弄得满头大汗。一次，他遇上昔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现在红军学校、《红色中华报》工作的李伯钊同志，便对她说：“伯钊，我们列宁师范没有唱歌教员，你在这方面有专长，能兼任几个小时的课吗？”李伯钊为徐老那种诲人不倦的精神所感动，出于对革命老前辈的尊重，满口答应了他的要求，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每周到列宁师范上两次课，帮助完成教学任务。

列宁师范学校前后共培养了六百多名教师，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区各乡创办列宁小学。当时瑞金全县有一百四十多个乡，每乡都有一所列宁小学。在大力普及义务教育，广泛发展列宁小学的同时，徐老还大力开展社会教育，成立扫盲协会、识字委员会，举办成人识字训练班、夜校等，普遍开展业余文化学习。

在徐特立的积极倡导和指导下，苏区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由列宁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教员担任扫盲任务。他发动广大群众互教互学，掀起了一个“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

亲、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群众运动。这样，就挖掘了各种潜力，使扫盲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了。徐老谈到采用这些方法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时，总是谦虚地提及教育界老前辈陶行知先生，把陶看作是自己的老师。他说：“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我在江西所行的与小先生制密合，但我只有行动没有理论。他发明了理论，他实际上比我高明，我不是他的学生，但我常常尊敬他为师，我与故旧通信，暑假名常署‘师陶’。”^①

徐特立很重视文化学习中的教材问题。他亲自组织和指导教材编写委员会，根据政治斗争和形势的发展，编写、审查、翻印和出版了大量的教材和识字课本。这些教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程度，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水平。从列宁小学语文课本中的一个片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富人贵，穷人贱，穷人吃苦几千年。
富人懒，穷人勤，穷人辛苦不堪闻。
富人饱，穷人饥，穷人生活好惨凄。
富人少，穷人多，及早觉悟学苏俄。
苏俄穷人解放了，丰衣足食无折磨。

教材编出后，徐特立均一一过目，提出中肯的意见。他很重视教材的系统性，从易到难，由浅入深，密切结合学生的生

^①徐特立：《再论我们怎样学习》，载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解放日报》。

活实际，反对内容空洞的概念化和口号化。翻阅当时列宁小学课本的《前言》，就可看出它的一般。编者向荣在《前言》中写道：

“这部书编给一般儿童初就学用的，暂编八册。此书编好四册后，便付给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徐特立同志审查。徐特立同志审查后，他指出本书的缺点，太偏重于政治，日常事项太少，且内容深浅，几册都没有什么区别。……特立同志来信说：‘此项读本为应目前需要，用一二学期后或再编或改正，当更增完善，目下可不用中央教育部审定的名义。’因此这部书，……只得将来由中央政府教育部再编或修改。”

在党和徐老的直接领导下，苏区还办起了各种专科学校，除红军大学、列宁师范学校外，还先后创办了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通讯学校、商业学校、卫生学校、农业学校，为党培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革命干部和专门人才。瞿秋白、徐特立还亲自兼任了苏维埃大学的正、副校长。

徐特立在工作中，一贯注重实际，讲求实效，反对任何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他在教育部长的六年任期里，仅发出一个对各县颁布教育制度的指示，其它各种工作，均采取书信的方式进行。

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徐特立很重视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他要求各校师生深入农村阶级斗争，协助政府进行战争动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参加“扩红”和“查田”等运动。各校师生还经常自编自演各种节目，开展文艺宣传活动。学校领导还给优胜者颁发奖品，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作出更大的成绩。

在党和徐特立的直接领导下，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由于实行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创办各类专门学校的结果，使得入学的儿童增多，广大劳动人民纷纷摆脱了文盲的困苦，为党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和革命骨干。一九三一年七月，徐特立曾亲自前往兴国县居住数月，具体指导这个县的教育工作。在全县党组织和人民的努力下，这个文化基础本来较差的县成了苏区扫盲的模范县。至一九三三年，全县已有百分之六十的学龄儿童进入了列宁小学（全县学龄儿童二万二万左右，入列宁小学的有一万二千余名），另有一万五千余名列宁夜校学员和二万二千余名识字班学员。至一九三四年秋红军撤离苏区时，兴国县已经办起了三百多所小学和中学，拥有八百多名教师，文盲已经减少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以下。另据一九三四年三月，中央苏区的赣、闽、粤三省的不完全统计，共有列宁小学三千一百九十九所。学生达十万人；补习学校有四千五百六十二所；识字组二万三千二百八十六个（组员仅江西一省即达十二万人）；俱乐部一千九百一十七个^①。这些光辉业绩有力地说明，徐特立是中国人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我们党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家。

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沙洲坝大礼堂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徐特立继续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和工农民主政府委员，仍负责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随着国民党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加紧，苏区的物质条件极差，粮食、药品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异常紧张，尤其是食盐难以买到，十分昂贵，最困难的时候，一元银元只能买七钱

^① 《红色中华》，一九三四年三月。

盐。在极端困难的生活面前，他首先关心的是学生，毫不考虑自己。每次开饭的时候，他总是迟迟不到，一找原来是在厨房里帮助伙夫做饭菜。他总想看到分配给学生的食盐下了锅才放心。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营养不良和工作劳累，徐特立身体虚弱。后来染上了严重的痢疾病，险些卧床不起，经医生精心治疗，方得脱险转愈。

敌人频繁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不仅使得文化用品非常贫乏，书籍奇缺，就是要知道一点时事新闻，也要靠部队打进一座县城，缴获一些近期的报纸，方能看到一点国际国内新闻。要阅读一、二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简直是海底捞针，很不容易。徐特立弄到一本经典著作，就反复阅读，他常背诵苏东坡的两句诗来形容自己的百读不厌：“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了自知。”他后来回忆当年这种情景时写道：我在江西时，“马克思主义的书，除半部《列宁主义概论》外，只可找到三五本《共产党宣言》。当时我有一本《共产党宣言》，经常藏在床上禾草中，也竟被人们窃去，这是我最痛心的一回事，因为这是我学习理论的唯一工具。但是因为无书可读，只读一本小册子，一读二读三读以至无限制的读，每次都发现有自己未了解的新东西。”^①

正当徐老全力以赴从事的苏区教育事业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时候，战争的乌云却越来越在苏区的上空密布。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严重错误，虽经广大红军指战员、广大党员、

^①徐特立：《再论我们怎样学习》，载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解放日报》。

干部和群众浴血苦战，也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敌人的包围圈越拉越紧，苏区越来越小，教育部也被迫随同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从沙洲坝迁到云石山附近。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一个天高气爽的早晨，云石山下的大路上红旗飞舞，战马嘶鸣，浩浩荡荡的红军主力部队开始进行战略大转移。这时徐老已经五十七岁，是长征队伍中年岁最高的老同志。党中央把他和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一起编在红军野战医院中央工作团，董必武任主任，他任副主任。朝夕相处的老战友何叔衡，因留下不能同行，他和谢向何告别时，心情特别沉重，紧握着手，依依不舍。彼此鼓励，互相叮咛，期望着有朝一日重新聚会。

红军开始长征后，敌机象老鸦一样，天天盯着我军不放。一天，乘行军休息之机，徐特立和中央机关几个战士，围坐在一个小山坡上召开支委会。忽然一架敌机嗡嗡地由远而近飞来，掠过人们的头顶飞过去了。对此，大家习以为常，不大介意。不料，大约是敌机发现了开会的同志，又突然飞转来，对着这个山坡一个俯冲，扔下一颗炸弹，不偏不倚地落在人们围圈中间的空地上。大家即时仆卧在地，炸弹掀起的泥土，差点把大家掩埋起来。幸好炸弹是个哑巴，没有开花。大家站起来，拍打着身上的泥土。董老笑着说：“炸弹落地不开花，恐怕是马克思、列宁的在天之灵，在保佑我们吧！”徐特立扶起他随身携带的红缨枪，用他那浓厚的长沙腔接着说：“恐怕是我们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马克思、列宁还要我们继续干下去哩！”一场惊吓换来一阵欢笑声，大家换个地方继续开会。

一九三四年底，红军浩浩荡荡开向湘黔边境的时候，正是隆冬季节，北风呼啸，寒雨纷飞，到处是一片原始森林，渺无

人烟，山峰象陡壁一样，一座座高耸入云。徐特立和广大战士一样，也穿着两件薄薄的单军衣，披着一块油布，戴着一顶斗笠，脚踏草鞋，手扶竹杖，冒着风雨，拉纤似地向前迈进。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徐特立所在的部队随大队伍开进遵义城，驻扎在一所中学里，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会议是在紧张而又激烈的气氛下进行的，全党、全军对这次会议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一天，他和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几位年老同志，从外面开会回来休息，以严肃而又急切的心情，议论中央这一重要会议。董、林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他们执行错误的战略战术引起的。徐特立接着说：“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首先发言，对那些错误的战略战术进行了批驳，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大多数同志都支持毛主席的意见。我认为毛主席的意见完全正确，是党心所向，军心所向，民心所向！”^①

红军进占遵义期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整编了部队，精简了机构，徐特立根据组织上的决定，进一步扔掉了“坛坛罐罐”，但在马鞅子里仍然装满了他喜爱的书籍、苏区编写的教材和资料，作为日后从事教育事业的工具和本钱。

早在红军突围长征前夕，瞿秋白为了照顾徐特立，换给他一匹好马和一个强壮的饲养员。可是他总是让给体弱和患病的同志骑，自己扶根手杖，慢慢地不停地向前步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步行了二万里以上，骑马的路程不过二三百里。同志

^①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八月版第一九七至一九八页。

们说：“徐老徐老真是好，不骑马儿跟马跑。”后来他谈到这段革命经历时也说：“马能代步，但是在当时是不可靠的‘腿’。那时前有顽敌，后有追兵，脑袋顶上还有敌机威胁，一旦把马打死了，还得靠自己的腿走路。事实上我的马中途丢了，要不是先有思想准备，体力上的准备，这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是很难走过来的。”①

长征中，徐特立模范地遵守革命纪律。每次宿营，他都提醒大家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他所驻扎的遵义的一所中学里，红军战士住宿时有取书架上的书作枕用的，离开时，他均一一为之清理，使之毫无散失。四年之后，一九三九年，黄齐生路过遵义城，群众中还流传着红军这一极为普通而又普遍的事情，听后很是感动。黄曾在一诗中写道：“万里长征后，曾过古播城，富不惊赤化，贫乐道红军。一老称特最，群萌感泽深，黄官书有幸，检点赖蒐存。”

徐特立每到宿营地，不肯休息，主动地打水、做饭、洗衣服，检查和布置工作。衣服破了自己补，鞋子坏了自己制，没有吃的东西就带头啃树皮草根，没有歇宿的地方就睡在露天上甚至雪地上。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自抵卓克基以后，我的衣服，从脚上的鞋一直到头上的帽子，都是自己缝的。在缺乏粮食的草地，我也一般的吃草。”②他总是把方便让给同志，困难留给自己。一九三五年六月，徐特立所在的部队渡过大渡河以后，开始长征中最艰苦的一段路程——爬雪山过草

① 《徐特立同志谈锻炼身体》；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三〇八页。

② 《我和党有历史上不可分离的关系》；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五十八页。

地。他们一共翻越了三座大山，第一座是夹金山。翻这座山的前夜，在山脚下宿营，天气炎热，大家穿着单衣。这时，徐特立已没有伞，没有油布，也没有马和饲养员。晚上睡在两块石板中间，狭得象一口棺材一样，身上盖着一块蓝布，晚上下雨，蓝布湿了，毯子和衣服还是干的。半夜出发，走到半山，雨雪交加，披在身上的毛毯湿了，衣和裤子也湿了，因为山陡，往上爬，费力大，体温增高，并不觉得冷。天将亮，往下行至半山，雪停了，湿衣湿毯，浑身感到寒凉，只得加劲跑步向前。在半山腰，回首一望，全是一片银光眩眼的大雪山，徐老诙谐地说：“我们好长时间没看见过玻璃了，这里真是一个玻璃世界，多好看啊！”

部队翻越雪山之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横跨草地，北出陕甘。徐特立随部队驻扎在卓克基，收拾粮食，作好过草地的准备，他和广大战士一样，参加割麦，麦子割下后，又把麦子搓出来磨成面粉，装满干粮袋。组织上要求同志们背足自己所需要的粮食，否则，进入荒无人烟的草地，就有被饿死的危险。徐特立出发前后，与其他同志一样，尽量挖野菜、煮马皮充饥，千方百计地不动用储备粮。恰在这紧要关头，谢觉哉突然病得很厉害，急需粮食维持生命。徐特立见此情景，就慷慨地将自己珍藏下来的粮食全部送给谢觉哉。后来谢在《赠徐老六十生日》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漠漠沮洳地，峨峨暴冻冈，是谁皆束腹，赠我竟倾囊。”讲的就是这些历史情况。徐特立在长征途中为何这样坚强和乐观呢？后来，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我的愉快精神如故。其他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也一般愉快如故。其总的原因，就在于只要党存在，红军存在，我们在政治上是有出路的。我们

党的自信心，群众的自信心，结合成为战胜帝国主义的民族自信心，因此就战胜了一切肉体上的困难。”^①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因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光荣牺牲，徐特立正式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的部长。后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他担任边区教育厅厅长，着手发展边区教育事业。他亲自指导编写教材，他主张小学语文教材，识字要从简到繁，内容要丰富，象百科全书，即不但要有政治思想内容，还应有自然常识、社会常识和生产常识；由浅入深，体现认识的规律；内容丰富，体现思想性、政治性和知识性；注意文化基础，把政治思想教育与文化基础知识紧密结合起来，做到学用一致。徐特立还主张，小学算术教材，要加一些简单的代数、几何、三角的常识，理由是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应用这些常识^②。后来抗日战争时期以至解放后六十年代，我们党领导编写的小学语文教材和算术教材，大致都遵循和贯彻了这些原则。

为了使劳动人民更快更有效地识字，徐特立在苏联时期曾同瞿秋白、吴玉章研究了中文拉丁化拼音的新文字，共拟订了二十八个字母，以求准确地拼出全部中国汉字。现在，徐特立积极地领导推行这种新文字运动，为中文拉丁化的拼音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他说：“我是新文字运动（即拉丁字母拼音法）的积极推行者。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扫除文盲，发展边区的教育事业。我们一到陕北，就办起了一个文盲师范。招

① 《我和党有历史上不可分离的关系》；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五十八至五十九页。

② 董纯才：《怀念我们的一位良师徐特立同志》，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三十六至三十八页。

收的都是文盲半文盲，教给他们新文字，只要一个短时期的学习即可成功，毕业后便担任小学教员和识字班的先生了。”^①徐特立创办的文盲师范，在鲁迅先生逝世后，党中央为了纪念这一伟人，就命名为鲁迅师范。文盲师范的创办是扫盲史上的一个创举，是徐特立对教育事业又一重要贡献。

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延安各界为徐特立六十寿辰举行了庆祝大会。前一天，毛泽东怀着尊敬的心情致书徐特立为他祝寿。信中高度地概括和评价了徐特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及其高贵的品德。信中写道：“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很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在庆祝会上，邓颖超同志亲自给徐特立系上一条红领巾，并发表讲话，热情地赞扬徐特立的优秀品质。徐特立自己也很兴奋地讲了一小时的话，表示了自己仇恨和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的意志和决心。他的一些老战友和学生，以徐特立致力于教育和其他社会进步事业，经历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纷纷要求他写出自己的光荣历史，供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素来不肯谈自己的徐特立，为同

^①董纯才：《怀念我们的一位良师徐特立同志》，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三十六至三十八页。

志的热情所感动，终于以朴素的语言，用三千多字写了一篇《六十自传》，发表于《全民周刊》，概括地介绍了自己的斗争历史和社会经历。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顺应时代而前进的人。他说：“我的生活随着社会从人类被压迫向着解放走，从失败向着胜利走，一切生活都配合中国革命的发展，随着激烈的社会变化，使我的生活成为多方的不固定的，但总是前进的。”

奋发团结抗战，致力反蒋建国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建立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派徐特立回湖南，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名义，出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和王凌波（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一道离开延安途经武汉，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负责人周恩来同志请示后，于十二月九日抵达长沙，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于寿星街（起初设于犁头街南方旅社和东长街徐家祠堂），恢复和发展湖南党的组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湖南老教育家徐特立，须发尽白，而精神颇实，身着灰布短衣，乘武汉特别快车来长。……”当时长沙各界人士，从《长沙晚报》和《民国日报》等报纸上，得知十年杳无音讯的徐特立突然回到长沙，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并络绎不绝地前来八路军临时办事处探访和会见，求教国际国内形势，聆听革命真理。他们看到徐特立的确“精神颇实”，但并不“须发

尽白”。而是须发皆青^①。从精神到形态，均不象一个上了花甲的老人。对于来访者，他都热情接待，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争取和团结的工作。到达长沙后的第三天，他就在银宫电影院（现新华电影院）宣讲党的洛川会议精神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听众达三、四千人，把整个影院挤得水泄不通。当天下午，徐特立还会见了报界记者，谈了抗日诸问题，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他说：“有人以为日本没有煤，没有铁，我们抗战六个月，日本帝国主义就必然崩溃。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危机是事实，可是把它估计得这样低，不但离开事实，而且是于长期抗战有害。”^②他又尖锐地指出，“那些‘唯武器论’者，对抗战前途悲观也是不当的。我们虽然没有大量现代化的武器，我们可以从敌人那里夺取，我们可以从战争中补充。”他满怀信心地说：打游击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拿手戏，我们将通过游击战发展壮大，越战越强。有人表示怀疑，问：共产党、八路军有没有工厂？我们回答：有！又问：设在哪里？我们说：过去设在南京，现在设

^①关于徐老发色的变化，历来有不同的记载。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以讥讽反动派的口吻，把他和谢老描写为一对“白发土匪”。一九三七年二月，谢老在一篇日记中谈到徐老时写道，“你满六十岁的这天，黑头发戴着红巾”。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四八烈士”之一黄齐生先生的孙子结婚，徐老和谢老均去参加婚礼，谢老又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徐老头发很青，只有几根白的，因作一寿联：六十九岁犹黑发，旧新中里见完人。”建国后，徐老的头发才逐渐变白，最后成为一白发苍苍的老人。

^②李廉颇、杨晓刚：《徐特立同志抗战时期在湖南》，载一九八〇年第二期《革命文物》。

在东京。徐特立越讲越激昂，最后深刻有力地指出：“对日本帝国主义想和平是不可能的，绝对、绝对不可能的。唯有从抗战中求解放才是活路。以后，徐特立外出讲演十分频繁，当时的联合大学、青年会礼堂、教育会礼堂、荷花池中央戏剧学院、火宫殿等处，均是他经常应邀讲演和作报告的地方。他那百折不回的意志，迎难而上的毅力，严肃认真的精神，平易近人的作风，至今还在长沙人民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当时，火宫殿是社会底层人们娱乐和饮食的场所，徐特立很重视来这里做宣传工作。一次，他以生动诙谐的语调、通俗流利的语言，宣传抗日，抨击时弊，获得了工人的热烈拥护和赞扬。当时《观察日报》曾经这样报道说：“徐先生本来是深入民间的，以他那滑稽的口吻，把国家大事说得很周详，抢去了不少说书人的买卖。听众越来越多，徐先生讲了又讲，到了午餐的时候，大家公请了徐先生一顿，这充分地表现了那一群的民众，并不是不关心国事的。”一九三八年的一天，徐特立应邀前往他昔日任教的一师讲演，学校当局虽曾提出不谈“党务”、“政治”、“军事”，只着重谈“做人”、“治学”、“做事”三项相限制，但徐特立亲临该校，引起了全校师生的轰动，进步学生更是欢欣若狂。徐特立演讲，以慷慨激昂、诚恳亲切的言词，对抗日救亡的形势、爱国青年的任务和应走的道路进行了深刻的论述，激起学生们的爱国热情进一步高涨，纷纷表示对人民抗日战争的无比向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多次干扰，湖南党的组织也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徐特立到长沙后，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立即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的地下组织，成立了以高文华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工委。他是省工委委

员，并担任统战部长。一九三八年，徐老和省工委深入工矿、农村、码头、学校作社会调查，恢复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先后向党中央写了五个调查报告。他在《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中写道：“国家的军事工业部分的移到湖南，重工业工人较过去增加，……矿工并不因军事减少，反有增加。我们开始有组织。”“交通工人和建筑工人也迅速增加，散漫没有组织的农民在这条件下集中起来，是我们很好的工作对象。……长沙城附近铜官镇有著名的窑业工人三、四千，有党的组织，工作还好。……长沙码头有江西逃来的同志在码头上劳动，不久以前我们和他们接了头，谅已有组织了。”这些记载凝聚着他和省工委的精力和心血。

“释放政治犯”，是国共合作达成的协议之一，可是，国民党顽固派竟违背诺言，拒不执行。一九三八年春，当徐特立获悉原工农红军抗日先遣军参谋长乔信明等三十多位同志，从国民党江西监狱转移到长沙陆军监狱时，就大义凛然地前往监狱看望他们。国民党当局迫于徐特立在湖南人民中的崇高威望，不得不令其看守把监狱打开，让所有“政治犯”出来列队等候徐特立会见。徐特立以激动而又亲切的心情对他们讲了话，谈到国共重新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形势，讲到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最后满怀激情地对他们说：“太阳快出来了，天就要亮了！”鼓舞他们的斗志，坚定他们的信心。他回办事处后，马上开出乔信明等三十余同志的名单，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国民党顽固派不但不予释放，反而急忙将他们转走，妄图杀害他们。徐特立挺身而出，直接找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交涉。经他的坚决斗争，乔信明等终于从桃源监狱中获释出来。徐特立又指示办事处同志，将他们接来长沙治病和学习。后

来，乔信明等在办事处安排下，去武汉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后，经西安前往延安，或分别奔赴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新的贡献。

徐特立和省工委在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的同时，为了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增强党的战斗力，又多次举办培养党员训练班，他亲自讲课，并编写了《党的建设讲授提纲》。

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为抗日群众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保证。在湖南党组织的领导下，湖南省长沙市先后成立了各界抗敌会、文抗会、妇抗会、工抗会、学抗会、商抗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其中以文抗会最为活跃，影响最大。由于徐特立的授意和支持，地下党组织的精心筹划，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相继地创办了《观察日报》、《抗战日报》、《长沙日报》、《前进》、《火线下》和《长沙青年》等报刊。徐特立还与《观察日报》、《抗战日报》的负责人黎澍、潘开茨、田汉、廖沫沙等同志，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心他们的进步和安危，及时将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精神传达给他们，以便进行宣传 and 刊登，在经济上也给予定期资助。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各报刊撰写文章，指导他们办好报纸和刊物。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他发现《抗战日报》上《晚会之歌》一短剧中某些内容，与我党的路线政策不尽一致，立即致函该报，指出其“错误对于目前的外交和国内的统一战线是不利的”。接着还指出：“目前是全民抗战，包括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民在内，是各党各派联合起来。”以此纠正《晚会之歌》错误之所在。该报编者公开表示“诚恳接受”，并说：“承蒙先生指出这个大错误，使我们有更正的机会，这是十二分感激的。”正如他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抗战给我的机会》一

文中所说：一切人都是时代的产物，“革命空前的发展，帮助了我个人空前的发展。”我本来是一个极不爱写文章、不大公开发表政治言论的人，但革命形势的发展，“逼得我不能不发表言论，不能不写文章。所以只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写了超过有生以来十倍以上的文章”^①。当时收集在《抗战中的政治问题》一书中的文章，仅占他当时书写的文章的一半，就将近十万字之多。书中对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坚持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对国民党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关于战时训练干部，加强农村工作，建立农民武装，以及揭露托派、汉奸，驳斥“亡国论”、“速胜论”，坚持持久抗战的方针，等等，都作了深刻的论述，为湖南人民指明了抗战的前途和方向。

徐特立还十分关怀青年。当时来办事处的青年络绎不绝，他亲切地接待他们，还指派专人负责这方面的组织和教育工作，并为他们办了几期学习班，亲自给他们讲课。在他和办事处的热情帮助下，一批批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陈述自己的宏伟志愿，要求驰赴延安，奔往前线。两年中，办事处输送到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步青年达五、六百人，为革命增添了新的力量。徐特立的次子厚本也一心去延安，儿媳刘翠英亦坚决要求同往。他的夫人刚见到阔别十年的老伴，只想合家欢聚，没有想到儿子和媳妇又将远行久别，一时思想跟不上来。他便给夫人做工作，很有风趣地说：“何谓丈夫？丈夫就是一丈远，丈夫和媳妇是不能离开一丈远的，应该让他们一

^① 《抗战给我以机会》；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十六页。

起去。”结果儿子和媳妇一路同行，经过各种困难和曲折抵达延安，参加革命，进入陕北公学学习。一九三八年，厚本突染重病，经西安返回长沙治疗。不久，病逝于湘雅医院。这样，他两个儿子，都为革命而先后去世了，仅留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孙女。他虽然十分伤心和难过，但并不悲观。他首先做儿媳的思想安定工作，教育她继续革命，说她年轻，答应给她另找爱人。他特别地嘱咐亲友，万不可向老太太透露厚本去世的真情。只说厚本已出国至苏联学习，以免老人家过于悲伤，损害身心。儿媳刘翠英，后来追随他继续革命，并改名徐乾，变媳为女，真诚地爱戴他，长期担任他的秘书，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生活。徐特立经常教育广大青年，国难当前，只有斗争，才能闯出自己的光明前途。他曾致函湘潭青年店员王汉秋，并题赠一副对联，鼓励他们“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把个人事业同国家的前途密切地联系起来。

徐特立在办事处的工作，既繁忙而又艰苦，上有敌机的空袭轰炸，下有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和汉奸的破坏，但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对各种人“门户洞开，来者不拒”^①。诚如他自己所说：“接见的同胞，日以百计，至少也以数十计”^②。他经常对各界人士发表演说，回答他们的问题，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抗日主张，忙得不可开交，往往通宵达旦。有时不脱鞋子，倒在床上，勉强躺上二、三个钟头，次晨又爬起来继续工作。他经常是身着八路军制服，手持一把雨伞，徒步走来走去，与国民党军阀、官僚那种发国难财，花天酒地，大车

①② 《抗战给我以机会》，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十六至十七页。

子进小车子出的剥削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人民群众看出了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和国家的前途寄托于中国共产党身上。一天，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设宴招待他，并请他给国民党军政人员作报告。他按时抵达其传达室，说明要会见张主席。门卫说：“张主席今天要欢宴八路军代表，无暇会见。”虽经他再三说明身份，那人看到他的穿着和模样，又没有带名片，表示怀疑，还是不让进入。他只好折回办事处取名片。张治中先生久等，不见他来，派人至办事处迎接，经询问，方知事情始末。

徐特立对国民党上层人物张治中等做了不少的争取工作，同民主党派黄炎培等进步人士保持了经常的联系，还亲往他们的寓所做客，同他们进行坦率的交谈，鼓励他们团结进步，共同抗日救国。

一九三八年九月，徐特立作为湖南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扩大六届六中全会，领会了会议的精神，增添了新的力量。年底，又途经重庆，居住于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和南方局请示和汇报工作。周恩来还派了两位同志，协助他总结过去在苏区领导办教育的经验，作为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教育革命的借鉴。

一九三九年初，徐特立回到长沙。他目睹国民党火烧长沙后一片残垣废墟的荒凉景象，无法遏制心头的怒火。他急忙找人了解情况，得知大火后的善后工作，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已经妥善解决，才放下心来，这时，办事处已迁往邵阳，他便风尘仆仆地赶往邵阳，参与召开湖南省委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传达和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会上，叶剑英同志和徐特立都讲了话。

一九三九年六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杀害了涂正坤、罗梓铭等六位同志。徐特立怒不可遏，奋起严厉声讨顽固派的罪行，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办事处开办的邵阳民众书店也遭查封，徐特立闻讯后，随即写了一篇檄文，托人到衡阳国民印务社印刷，又派专人拿到邵阳的戏院散发。从此以后，国民党日益反动，八路军办事处无法继续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坚持斗争，仅由徐特立以八路军驻湘代表名义对外进行活动，并曾由邵阳转移至湘潭、衡阳等地开展工作。一九三九年秋，徐特立曾在长沙三公祠公医院内，对田汉主办的长沙戏剧艺人讲习班讲演，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国内形势，戏剧与抗战的关系，文艺工作者的职责诸问题。十一月间，社会上风传日军将再次进攻长沙，田汉便将参加过抗敌宣传队的湘剧艺人组织起来，分成七个抗敌宣传队，奔赴各地演出。出发前两天，在中山路银宫电影院隆重地召开了艺人讲习班结业和湘剧抗敌宣传队授旗大会，徐特立亦应邀出席指导。冬末，抗敌宣传队由外地演出回长，再次在学官街洞庭戏院演出田汉编导的《土桥之战》。国民党湖南当局竟以剧队充当共产党喉舌为由，指令警察局拘留剧队负责人徐绍清，并勒令抗敌宣传二队立即解散。他们还以湘剧艺人曾听过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徐特立在公医院的演讲作口实。宣布正在外地演出的其他六个湘剧抗敌宣传队一律撤销，下令将各队的证书、旗帜、文件等统统没收。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愈演愈烈，手段也越来越凶。后来，国民党反动军阀、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竟然凶相毕露，指使其衡阳警备司令部，口头通知徐特立，限期离湘。一九四〇年，徐特立离开湖南抵达桂林，以口头答记者问的形式，在《救亡日报》上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驱共的罪行。

该报曾经这样报道：“中国抗战可敬可佩的沈钧儒老先生刚回重庆，又来了一位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徐特立老先生。谈话从欧战谈起，并用手指分析。借咳嗽吐痰之机，请问徐老先生是路过此地，还是来此访友。答：一不是路过此地，二不是来此访友。我是奉命驻湘，因有衡阳欧阳警备司令派来宋秘书长说，是奉薛长官之命，要我在一星期内离开衡阳。我说，既是薛长官命令，应有文字通知，何以要你宋秘书长口头通知要我离开衡阳。宋说：是我衡阳警备司令要我口头对你说，你老先生离不离开，可由你自己选择。我怕不离开衡阳，又有平江惨案发生。我已去电前方，如果回电要我驻湘，我即逗留不久回湘。”徐特立在桂林《救亡日报》上发表这一消息后，旋即返回衡阳、长沙，进行地下工作。一九四〇年八月间，他离开长沙，经重庆返回延安。

徐特立回延安后，负责筹建自然科学学院，接着担任该院院长。以后又担任党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仍兼任自然科学学院院长），继续从事党的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

党中央为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于一九四〇年在延安创办自然科学学院。当时，我们外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受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条件很差，困难甚多，既缺乏有水平的专家、教授，也谈不上现代化的科学仪器设备和宽敞明亮的教室。除了徐特立，都是些年青人，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还不到三十岁，大都缺乏工作经验。学生分属于大学部、高中部和初中部，最小的年龄只有十二、三岁。学校座落在几个山坡上，大家挤在黑暗的窑洞里上课。如果开大会、上大课，就在窑洞外面的空坪上集合。徐特立来后，不管是教学方针还是课程安排、政治思想工作、后勤工作，一件件，一桩

桩，他都过问。他经常到各处巡视，那里有问题，就在那里解决。无论怎么忙，他还是坚持讲课。如果是开大会、上大课，无论是盛夏三伏或隆冬三九，他总是不戴帽子，一讲就是几个钟头。他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为师生做出榜样。他是院长，后勤部门按规定安排他单独住一个窑洞，他说：“大家住的都很挤，为什么让我一个人住呢？”定要叫青年教师张凌光、沈哲民同志同他一起住，三人同睡一个炕。晚上办公，看书学习，他本可以单独用一盏灯，但为了节省油，也一定要三个人共用一盏小豆油灯。学院的师生大都是来自祖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缺乏严格的考验，开始对这样的艰苦生活不大习惯。但在徐特立的言传身教下，大家非但不感到苦，反而感到苦中之甜，个个精神焕发，学习、工作、生活既紧张，又愉快。当时，学院里传诵着这样一首诗：

我们的生活艰苦而又紧张，
我们的革命热情却日益高涨。
谁说我们没有课堂？
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课堂。
蓝天是我们的屋顶，
高山是我们的围墙。
谁说我们没有教具？
自创的教具更加漂亮。
谁说“土包子”不能办大学堂？
我们的信心比泰山还稳固，
我们的意志比钢铁还坚强。
为了祖国的新生，为了民族的解放；

任何困难也不能把我们阻挡。①

徐特立反复强调学习自然科学的重要性。他说：科学“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所以前进的政党必然把握着前进的科学。”②他认为，我们党“不独应该把握着全国的政治方针，还应该把握着全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方针”③。我们当今的科学研究，应该是为抗战建国服务，“为着生产，为着解决抗战的物质问题。”④

当时，对于如何进行我们党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建设，在自然科学院甚至在党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边区科学技术人才缺乏，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这个矛盾更加突出了。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陆续建立了一批工厂，如石油厂、纺织厂、化工厂、机械厂、造纸厂、炼铁厂以及兵工厂等等，都在迫切需要技术人员。就当时那么一点技术力量，怎样使用？是统筹安排，让一部分科学技术人员参加生产建设，一部分科学技术人员搞好科学教育工作、培养新生力量呢？还是只顾眼前生产建设的急需而不办、缓办科学教育？或者只顾办科学教育而不考虑当前生产建设的迫切需要呢？有人主张只搞生产建设，不必办正规学校。如果办学校也只能搞短期的技术教育，不必搞系统的教学。他们甚至主张把自然科学院改为

①夏光伟：《在徐老身边工作是幸福的》，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五十六至五十七页。

②《祝〈科学园地〉的诞生》，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六十六页。

③《怎样发展我国的自然科学》，同上，第六十页。

④《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五十页。

比较高级的职业学校。徐特立认为，既要支援当前生产建设的需要，又要坚持把自然科学院办下去，主张统筹兼顾，不能只顾眼前，不考虑长远需要。他认为，我们党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象政治、经济、军事等工作一样，每一步骤，既要从我们当前的实际需要出发，又要照顾将来。“见近不见远”，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实利主义；“见远不见近”，则是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他主张党的方针政策，“应该顾到实际条件的可能和需要，如果没有人力物力的一定基础，幻想提高科学是不可能的。如果当抗战开始时，在边区即提出学校正规化，不需要军事和政治的训练班，是非实际的。如果当没有中小学生的时代而提出建立自然科学院也是非实际的。但是有了起码的条件，只等待着条件完全具备，而不愿意在已有的条件下加以创造，只知道天定胜人而不知道还有人定胜天，同样是错误的。可以说，空想主义和实利主义对于科学建设同样是有害的。”^①

徐特立严厉地批判了国民党那种“人才既少，用之又不得当，因此科学教育委之于书商，而军事秘密谋之于外国顾问”的买办方针。他指出，我们边区的文化教育和经济落后，外受日寇的压迫，内受国民党的封锁，科学人才有限，图书仪器和机械输入不易，一切关于科学技术问题都要一件一件地从头做起。这就需要我们自力更生，极力提倡科学，优待技术人员，有领导地开展科学研究，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我们的文化、科学和教育事业。他满怀信心地说：“虽然如此困难，真正的改造世界，终属之于先进的政党及其人民，殷忧启圣，多难兴

^① 《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见《徐特立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六十一至六十三页。

邦，是为我们的写照。”^①

徐特立认为理论必须与实际密切结合。他说：“研究科学如果停止在书本上（即原则上），与停止在解决目前的生活问题上，同样是非实际的。”^②他十分重视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教学，主张先博后约。他认为大中学教育过早地专门化是有害的，知识面太窄了，就无法进行深造。他说：“如果缺乏最基本的科学知识，只有专门技术，必然会行不通。而且任何大学都不是纯理论的，在第一年只是补足中学时普通程度的不够，二三年才开始专门化，第四年分科更细。至于中等学校，除职业学校外，只是中等普通，大学一年生才算是高等普通，普通原则问题越能多了解，就越能专门化。过早的专门化就只能守成不能创造。在边区新的环境下，如果只有普通科学基础不够的专门家，想把科学推向前一步是不可能的。”^③他列举苏联的经验教训说：“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曾进行设计教学，废止科学系统，结果儿童所了解的只是个别问题的经验，而科学降到最低的水平。在第一次五年经济建设前不久停止了设计教学而提出系统化的口号。”^④他坚决反对忽视基本知识的好高骛远倾向，认为这犹如平原孤峰，无源之水，而“平原孤峰是难于存在的”，“无源之水是会枯竭的”。徐特立还把读书、钻研学问生动地比作打仗，要注意两点：第一是“攻坚”，第二是“掠野”。所谓“攻坚”，就是要象攻克敌人的据点一

①② 《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见《徐特立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六一至六十三页。

③④ 《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见《徐特立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六十三、六十四页。

样，掌握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和最新成果。古今中外，凡是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都是下苦功夫，长期刻苦钻研的结果。但是只“攻坚”还不够，还必须更广泛地学习新的知识，扩大知识的广度，这就是“掠野”。学习就“象作战一样，其中心对象是守住中心据点，一切掠野是为着攻坚，是为着守这一据点。”^①

徐特立还强调指出，我们研究自然科学是为了认识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进行经济建设。他说：“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及使用自然科学，无法跳跃其必然阶段，人类支配自然，必然要依据它的必然性来支配。我们今日来谈科学建设，首先是对于科学必然性有初步的了解，不然就会变成无原则的主观主义者，和无原则的实利主义者。”^②

我们党长期革命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证明徐特立这些意见是十分正确的，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由于徐特立的辛勤劳动，终于把自然科学这株幼苗在贫瘠的荒山上建立起来了，它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从一九四二年开始，我们党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徐特立积极地参加了这个运动，对王明一类自谓神圣、自命不凡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指出他们把马恩列斯的“唯物辩证法变成了新旧约、可兰经及南无阿弥陀佛”，他们“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可是有一句最主要的没有读，

① <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见<徐特立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六十一至六十三页。

② <我们怎样学习>，同上，第七十一页。

即《费尔巴哈论》上说的“一切东西在辩证法面前没有神圣”^①。他们虽然满嘴马克思主义的口头禅，其实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判断一个同志是否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是看他嘴巴上能否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而是看他行动上是否能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解决革命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他说：“离开职业事业专凭一己的意见议论人们的政治水平，必然要把马列主义空洞化、庸俗化、书本化。”^②

早在一九四〇年，徐特立就倡导反对迷信和盲从，强调广大革命群众的实践才是检验和发展一切真理的标准。他说：“不把一切真理（马、恩、列、斯的都在内）当作教条，不加了解而相信，不加以执行而只当作神咒而崇拜。”^③他告诫广大青年：“一切事业一切学说一切前人的遗产摆在你们面前，你们都不拒绝都欢迎，但那都不是神圣的，都要经过你们的脑来分析，经过你们的手来试验。检查的标准不是成规，而是你们革命的大多数人的行动。……同时一切要经过自己的脑，不是盲目的服从而不是自觉的服从，一切不经过脑的信仰是迷信。对于一切真理都要经过自己的脑加以分析，加以集体的讨论，不把任何真理神圣化，还要经过自己的手及群众的手执行过，在革命过程中，还要加以补充，加以发展。”^④

徐特立在批判主观、盲从和迷信的同时，还指出，反对教

①②徐特立：《再论我们怎样学习》，载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解放日报》。

③《我对于青年的希望》；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四十八页。

④《我对于青年的希望》；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四十八页。

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有效办法“是要靠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实践而学理论，……即有的放矢。从实践中纠正理论发扬理论，则理论不是教条，其文章不是党八股而是行动的指针。”^①

徐特立十分热爱和尊敬毛主席。当人家提起他是毛主席的先生的时候，他总是说：从前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当过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那不过是一日之师，而毛主席则是我的终身之师。他要求大家向毛泽东学习。他说：“泽东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特别是他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此外在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知识是多方面的，非常渊博。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自以为是。”^②

在贯彻党的整风运动的方针政策时，徐特立曾致函自然科学学院党的总支委，强调指出：“检查领导，检查整个工作，这是主要的。至于谁负责却是次要的，最后才检查思想上的错误。”“批评不是打击，要有原则，要有事实，热骂可矣，但不许冷嘲和暗箭伤人（不指人不指事即暗箭）”。又说：“少抓小问题，只抓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思想有无大的倾向，其余一切都包围在大问题的周围。”“目前无论何人，无论何问题都要彻底的解决纠正，而不是打击，不是调换，撤职和辞职，一切工作只能改善不能放弃。”^③自然科学学院的整风运

①徐特立《再论我们怎样学习》，载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解放日报》。

②董纯才：《怀念我们的一位良师徐特立同志》，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三十三页。

③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解放日报》消息：《自然科学学院整顿三风》。

动，在他和党组织领导下得到了顺利的开展，工作不断改进。

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康生干扰党的整风方针和政策，在审干中搞逼供信，搞扩大化，打击和迫害一些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甚至对十几岁的娃娃也不放过，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徐特立无私无畏，不顾风险，挺身而出，维护党的方针政策。他声色俱厉，义正词严地质问那个在自然科学学院搞运动的人说：“你们有证据吗？”“有什么根据要这样干？”他顶住逆流，亲自到窑洞去看望被审查的同志，坚定他们对党的信心。他说：“我是院长，我就要过问，我就要负责！”由于他的坚决抵制，自然科学学院及时地煞住了那股歪风。

徐特立针对党内不同程度上所存在的“左”倾排外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提出打破关门主义，提倡学术自由，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说：今后我们应该“互相学习，互相批评，只有学术上的真理，没有党派上的成见和辩护。”^①他对于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韩愈所讲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都予以肯定的评价，指出：“真正有学问的人没有不虚心学习的”^②。可是，我们党内那些自命不凡的“马克思主义者”却高视阔步，鄙视一切，不愿向下级学习，向群众学习，闭关自守，自我孤立，不去吸取宝贵的精神食粮，从而停止了自己吸收的生命和排泄的生命。徐特立提醒全党注意：我们党的抗战

① 《我们怎样学习》；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六十八页。

② 《我们怎样学习》；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六十九页。

政策，已为国人所拥护，党的威信也大大地提高了，除非敌视我们的人，谁都对我们的党和党员怀着敬意，然而我们应该明白，“其实我们除政治及运动战外，差不多很少可以自夸处。我们的政治干部有许多也是抗战前后才学习政治，并非真正深刻的了解马列主义，……自己对于马列主义也并不高明。目前我们应该改变狭隘的自夸的态度。党员应该向非党员学习，干部应该向群众学习，政治干部和技术干部应该互相学习。”^①徐特立指出：“虚心向朋友们学习，是共产党的优良的历史传统。”^②当时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有非党的副院长和教师，徐特立很重视他们的专长，注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整风学习和教学研究中，让他们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有不懂的问题，还虚心向他们请教。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生活十分艰苦，大家继续过着供给制的生活，穿的是粗布衣，吃的是玉米、小米，有时还吃一些黑豆及其它杂粮。按规定，他吃小灶。所谓小灶，比起大灶来，不过是多一点白面、油腥而已。可是，他连这一点“优待”也往往送给病号和体弱的同志，屡经同志们的“批评”和“抵制”，不几天，他又照样拿着小灶烹调的食品送给别人了。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加紧反共，敌伪蒋合流，加强了对解放区的包围和封锁，解放区军民的生活更加困难了。这时徐特立加紧生产劳动，力求自力更生。他种的蔬菜可以自给，公家给他的伙食费，他尽量节省，三个月的供给作四个月使用，减少公家的开支。他经常外出开会、讲演，步行于北门

^{①②}《我们怎样学习》，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七十、六十八页。

杨家岭和南门参议会之间。他还经常坚持晨操、晨跑和洗冷水脸,用各种方法锻炼身体。延安青年组织体育运动会,他六十多岁了还参加一百码的游泳比赛。他喜欢接触干部、青年和农民,而群众也喜欢和他接近,谈思想,谈生产,谈工作和生活,问这问那,亲密无间,往往一谈就是几十分钟,甚至几个钟头。他真做到了“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徐特立十分痛恨革命队伍里的自私和不正之风。当时某些同志在比较稳定和和平的环境里,就把革命、困难和群众忘记了,只顾私人,不顾公家,只图个人生活得好,不管群众的疾苦,有点变得象军阀、官僚、恶霸了。一次开会的时候,徐特立跳起来,批评这种腐化堕落的现象。①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徐特立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闭幕时,徐特立发了言,他说:“我这个人别的没有什么,但是国一定是要爱的!帝国主义是一定要反对到底的!”发出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呼声,博得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十二月,他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内战阴谋,义正辞严地说:“我极愿意即刻就看到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和统一,如果今天看到,明天即死,也就偿了我对国家民族的宿愿。原子弹并不能征服我五十年的民族民主的宿愿,而是使我愤恨和兴奋,使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老头。我并希望中国一切老头,响应总司令二十年的号召,以准备反抗中美的反动派联合来屠杀。”②

①陆定一:《人民教育家——祝徐老七十大寿》,载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解放日报》。

②《学习朱总司令》;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〇六页。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一百六十万正规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挑起了大规模的内战。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反击，八个月之内，歼敌七十余万，迫使敌人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分东西两翼，向我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发动猖狂的进攻。

为了粉碎胡宗南匪帮的进攻，党中央指示陕甘宁解放区军民充分做好备战工作，并决定中央机关部分同志首先撤离延安。为了照顾年近古稀的徐特立，中央指定他于一九四六年冬撤离延安，有关组织分配给他一头驴子代步，并交待随从人员，要尽力量安排好他的生活。但他执意不肯骑牲口。一定要坚持步行，让毛驴驮书籍资料，和给有病的同志乘骑。他说：

“我们搞教育工作的，这些书就是武器，没有武器怎么能打击敌人呢！”为了避免敌机轰炸，队伍经常是昼伏夜行，白天住宿和做群众工作，夜晚行军。他与大家一样披星戴月，昼夜兼程地前进，谢绝一切照顾。

不久，徐特立一行风尘仆仆地到达绥德。绥德是陕北高原东北部一个县城，也是专署机关所在地。从这里往东不远，就是波浪滔滔的黄河。河东的吕梁山一带正闹灾荒，不断有饥民逃来河西解放区，陕甘宁边区政府也特意拨了一批款项救济这些灾民。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农历十二月十九日）是徐特立七十寿辰。绥德地区地县领导干部提出要为他做寿。但他看到河东吕梁山一带农民为蒋阎暴政所害，颠沛流离，惨不忍睹，执意谢绝。他当即作诗一首：《七十客绥，哀吕梁灾民并自寿》，谈起他目睹灾民“败絮不蔽体，充饥惟秕糠，老弱转沟壑，少壮半逃亡”的悲惨景状；当地党政军民群众为之祝寿称觞，他以为“苦乐两相形，不觉倍感伤”。但又感到却之不

恭，于是：“请勿事铺张，瓜果代鸡豚，清茶代酒浆，题字代寿联，词短意更长”^①。表现出他急国家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艰苦与共，破旧立新的崇高品德和风尚。

徐特立生日的前几天，党中央忽然派来一辆大卡车接他返延做寿。他乘车到达战事气氛十分紧张的延安后，方知在胡匪叫嚷“马上要拿下延安”的情景下，我党在延安为他隆重举办祝寿活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既显示了我党我军的沉着应战，以鼓舞边区军民的斗志；同时也是对敌人的一个示威和嘲弄。

寿诞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中央负责同志亲临徐特立居住的窑洞祝贺，俗称“暖寿”。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边区政府举行了热烈的庆祝大会，各解放区负责人也纷纷来电祝贺，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均为徐老题词。毛主席的题词是：“坚强的老战士”；刘少奇副主席的题词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周恩来副主席的题词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朱总司令的题词是：“当今一圣人”；彭德怀副总司令的题词是：“徐老是人民的教育家”。党中央给徐老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业绩，号召全党同志学习和发扬他的革命品德。信中说：“你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你是热爱光明的，你为了求光明，百折不挠，在五十岁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你对于民族和人民的事业抱有无限忠诚，在敌人面前，你坚持着不妥协不动摇的大无畏精神，你的充沛的热情，使懦夫为之低头，反动派为之失色。你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你的知识是和工农相结合、生产相

^① 《十老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六六页。

结合的，你把群众当做先生，群众把你当做朋友。你对自己是学而不厌，你对别人是诲人不倦，这个品质使你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你痛恨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你的朴素勤奋七十年如一日，这个品质使你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骄傲，把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发扬光大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任务。”^①

祝寿会上，中外来宾们摩肩接踵地参观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彩缤纷的寿幛、祝词、贺礼。朱总司令在会上致祝词，他说：“徐老从中国的封建社会到革命时代的七十年生活中，使他锻炼成为一位模范的革命教育家和科学家。早在江西苏区时，他就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作风”。朱总司令号召大家：“以不断学习徐老的优良作风来庆祝他的七十大寿。”^② 在各界代表致词之后，徐特立在长久的掌声中健步登台致谢词，他首先感谢党和大家的盛意，并历述不少老人，当此新时代里似青年般的跟着时代前进，同时，无数青年也在时代的浪潮里锻炼得更加坚强而能干。最后，他兴奋地对大家说：“现在蒋管区几十万青年学生，正在轰轰烈烈推动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老者也要和他们齐头并进！”^③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延安。十三日，国民党十四个整编旅，约十余万人，在胡宗南指挥下，大

①中共中央祝徐特立同志七十大寿的信，载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解放日报》。

②③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一日《解放日报》消息：《热烈祝贺徐老七十大寿》。

举进攻陕北解放区。我军在陕北的部队仅二万余人，实行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于三月十九日主动撤出延安。在此之前三天，十六日，徐特立在党和同志们的催促下，从容地离开延安，辗转于陕北、晋绥，越过同蒲路，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阜平，居住于县城附近的温塘村。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区和晋冀鲁豫区连成一片，华北人民政府在平山县成立，徐特立也随之搬到平山县附近。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迅速扩大，我们党已经接管和正在准备接管大量中小学。为此，徐特立率领一支从延安来的干部队伍，与当地党政宣传教育机关相结合，集中力量编辑新的中小学教材。

当地教育机关组织编辑的八本初小国语课本出版后，立即送交徐特立审查。徐特立阅后，热情地肯定了课本的优点，同时也认真地提出了改进意见，并郑重地给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负责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小学国语我和今吾同志曾一流览，认为有某些字句和少数课文虽有些不合处，并不关重要。至于全书是反映我们革命的活动，与过去一切课本有区别。但各册相互间及各课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国民需要最低限度的知识全面性和计划性，都和辛亥以来的国语教科书无甚差别。这一问题在中国历史发展近百年来未能解决，目前我们急需解决。至于怎样解决，不是片语能尽，容迟面谈。”^①寥寥数语提出了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小学教材编写中都必须重视的根本问题，即革命性与科学性，“各册相互间及各课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国民需要最低限度的知识全面性和计划性”，也就是

^① 《关于编写小学国语课本的问题》；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二三页。

中小学阶段必需的基础知识，如何系统地全面地安排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三月，徐特立参加了党中央在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随党中央迁往北京西郊香山。接着，他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进入北京城，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为建立和巩固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新的斗争。

终身奋斗不知老 一代师表启后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某些同志以为革命大功告成，开始滋长一种骄傲自满，贪图舒适，追求享受的思想和作风。而徐特立却在建国前夕，一九四九年二月七日，在《祝吴老七十大寿》一诗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旨高意远地认为：“前途之艰巨，基本在建设，幸勿过乐观，成功在兢业”；且以“您我励残年，尽瘁此心血”^①，而与吴老共勉。进入北京以后，他回首过去，瞻望未来，重新制订了一个二十年学习计划和工作计划。依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他每天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开会、作报告、写文章，忙个不停，他孜孜不倦地批阅和草拟文件，翻阅的文件资料往往是几种以至数十种，严肃谨慎，一丝不苟。一九五〇年起，他还担任过一个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的名誉主席。

徐特立长期驰驱南北、久经风霜进入北京，正是国家饱经战火，一切都很困难的时候，组织上分配他和中共中央宣传部

^① 《十老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六九页。

的同志住在一起，房子陈旧，他一进屋，第一脚就踩断了一块地板，险些跌了跤子。当时，一些同志建议他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要求换一幢房子。但是，他不同意。一九五二年，为便于群众来访和保存图书资料，组织上决定给他盖几间房子。他知道了，一再反对。他说：“现在人民生活还有不少困难。我怎能为自己盖房子，花费人民的钱财呢？还是等将来生产、建设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说吧！”

徐特立一生没有任何嗜好，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每天只泡一杯清茶，一直喝到深夜，不换茶叶，实际上早就和白开水完全一样了。他进入北京后，环境变了，生活条件改善了，但他仍然保持着延安时期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有些同志关心他，认为他七十多岁了，建议他吃菜泥和细粮。但他觉得菜泥会把肠胃养娇，细粮营养差、总吃也不好。他说：“吃得杂一些，粗一些，营养倒是更丰富些，还能使肠胃增强消化、吸收各种食物的能力。”他坚持主杂搭配，从多种蔬菜中吸取营养，经常是几块白薯，一碗青菜，素餐便饭。衣着也仍是那样的朴素，经常穿一身普通的干部服，几套延安时代留下来的破旧布衣，当作传家宝，舍不得更新。一件呢大衣已经加了几个补丁，国家几次按章给他换新的，他回答说：“农民一件棉衣要穿十几年，甚至一代传一代，我这件还可以再穿几年。”家里人事先未同他商量，为他制了一、二套新衣，事后挨了他几次批评。由于工作需要，家里人给他做了一套毛料服，买了一双皮鞋，他平时从不穿用，每次参加宴会或接待外宾，才临时换上。回来后，又立即脱下来，仍然穿上布衣、布鞋。节约水电这些细小的事情，他也很留心。有时家里人和工作人员夜晚睡觉时没有关好走廊的路灯，或是自来水龙头没有拧紧，他即

使上床睡下了，发现了灯光，听到了滴水声，即使是冬天，他也要爬起来关掉电灯，拧紧水龙头。他平时教育家里人和工作人员说：“要注意节约水电，滴水成河呵！一度电要多少钱呀！你们想过没有？我们节约一度电和一滴水都是为着社会主义呀！”

徐特立一生不事铺张，不图享受，从不请客送礼，也谢绝一切应酬。一九五一年，他回忆说：“我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两年，只开支五元酒席费，为请法国记者宴会。我的节俭作风自儿童时代养成至今，已成了天性。我一生节衣缩食，勤俭朴素，当时才能做些社会事业，后来参加革命就能艰苦奋斗，克己为公。”^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特立仍以主要精力领导新中国的人民教育事业。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他相继发表了《在教师节谈新民主主义教育》、《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课程标准的重要和课本的活用》、《教育讲座》、《论国民公德》、《各科教学法讲座》、《小学教师自学经验谈》、《小学校的体罚问题》、《青年的学习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对于建国后的形势和文化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宗旨、教育的对象、教育的方法，以及培养国民公德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论述。他指出：我们国家的历史正处在“有世界意义的转变关头”，民主革命“即将全面胜利结束”，新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正在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始。这种新的建设任

^①徐乾：《难忘的教诲，深切的回忆——纪念徐特立同志诞生一百零二周年》，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一一一页。

务，一方面摆在科学人员面前，另一方面摆在文化教育工作者面前，特别是教师的面前。建设需要的现代科学、现代技术，依赖于电气化。“不识字的人是不适宜于解决电气化的。而且仅仅识字也还是不够的。”^①他提出，我们应该“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多种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与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改造旧知识分子^②。他还指出：在大规模经济建设面前，“青年学习问题就更感觉重要了”，他们既要学文化，也要学政治，“在劳动青年面前，文化学习更加是特别突出的任务。”^③

一九五三年，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在小学教师队伍中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震动，很多教师想离开教育界，投身到工厂、矿山中去参加经济建设。他们认为当小学教师没有出息，没有前途。有的甚至把小学教师的工作说成是“吃粉笔灰”、“给小娃娃抹鼻涕的事情”、“不能发挥一个革命青年的作用”，不安心搞教学工作。中央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小学教师》杂志编辑部的同志，把这些情况向徐特立汇报后，他十分关切地说：这个情况很重要。指示他们抓紧时机，把这件事作为一个题目，号召和发动全国的小学教师开展一次大讨论。最后由《小学教师》编辑部加以总结，使广大的小学教师受到一次现实而又深刻的热爱本职工作的教育。结果，按照徐特立的建议，在中央教育部的领导下，在小学教师中和在《小学教师》杂志上，展开了“小学教师有没有前途”的讨论。从一九五三年九月到一九五四年三月，不到半

①② 《在教师节谈新民主主义教育》；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二七页。

③ 《青年的学习问题》；同上，第二四六页。

年，《小学教师》杂志收到了全国各地广大小学教师近四万件来稿。通过讨论，大家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讨论结束的时候，徐特立应《小学教师》编辑部的要求，写了《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前途问题》一文，为这一讨论作了总结。他在文章中指出：小学教师的政治地位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由国家的社会性质决定的。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是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翁，“既然每个人民都有了政治地位，如果说小学教师没有政治地位，这是不合逻辑的”^①。现在面临着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小学教师要求参加这个建设是十分正确的。要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必须靠全国人民的分工合作和积极参加。“教育建设是整个国家建设必要的任务之一”，而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科学和技术的基本教育，这种伟大的任务就落在小学教师身上”^②。

一九五六年秋，徐特立乘赴湘视察工作之机，曾偕同夫人回到家乡。他身为中央委员，党的高级干部，却毫无“衣锦还乡”的思想和派头。当时从长沙市到五美乡还没有通公路，他坐汽车沿着长浏公路至江背下车。五美乡的贫下中农得知他回老家的消息，便派轿子前来迎接，他坚决谢绝，坚持步行二十多里回到老家。接着以一个老农民的姿态访问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和亲友，从容语笑，亲如一家。他童年时的一个亲密伙伴，姓陈，排行第三，家庭异常贫困，常与他一起上山砍柴，累了又一块休息，还经常互相给对方梳理辫子。徐特立参加革

^{①②} 《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前途问题》；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二五四、二五五页。

命，离别五美以后，陈留居五美，贫困如故，连老婆也娶不起，后来才收留一个从湖北逃荒来的女人做妻室。现在，这个昔日的“陈三伢子”，被尊称为“陈三爹”了。徐特立没有忘记自己的“贫贱之交”，决心亲自去拜访这个陈三爹。但当地干部和群众认为他七十九岁了，农村的路又不好走，决定派人把陈三爹接来会见。陈三爹也很想念他，听说他回来了，正在急忙动身前来看望。两位老人会面后，如同手足，谈笑风生，欢叙别情。徐特立还拉着陈三爹一起照了相，以作留念。

徐特立回到家乡后，殷切地关心着他一九一三年所创办的五美高小。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他离开湖南时，曾将维护该校的责任托付于他的妻子和一个侄儿，后来国民党反动派蓄意摧毁这所有革命意义的学校，迁移了地扯，更改了校名，改“五美高小”为封建色彩极其浓厚的“四维小学”。解放后，一九五二年，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由湖南省人民政府教育厅拨款修复，并请徐特立亲笔题写了“五美学校”的校牌。他来到学校后，高兴地听取了学校负责人的汇报，和师生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满面笑容地视察了面貌一新的校容。当他了解到教师工作认真负责，学生学习成绩优良、身体健康、思想进步之后，内心感到由衷的高兴，连声说：“好，好！”表示赞许和满意。当时，有人建议，五美学校应该同时办小学和中学两部。徐特立说：“小学和中学都是农民所需要的，能够同时办固然好；但我原来创办这个学校时，是一个规模很小的高小，最好仍以办好小学为主。就是要办中学，也不要压倒小学，因为小学教育更是农民所需要的基础教育。”^①徐特立

^①周世钊：《我们的师表》，北京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七十六页。

这个意见，对于我们今天在小学的基础上办附属中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徐特立出席了大会，并继续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一九五七年一月，徐老以八十高龄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他过去的一些老学生。现在长沙市担任中小学教师和教育行政工作，听说他来长沙，都要求同他会见，聆听他的教诲。一天，按照预约他在交际处同这些同志见面。他恳切地对大家说：“我一生热爱小学教育事业。因为小学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基础不稳固，上面就建筑不起来。刚才听到你们很多人当了几十年的小学教员，这是极好的。当今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基础事业更显得重要。我相信你们有决心，有把握在这方面做出更好的成绩来。一切工作要做好，都离不开两条：就是实事求是和虚心学习。教育工作者必须有勤勤恳恳的态度，老老实实的作风；还要从书本中、实践中不断学习，虚心向群众学习，向学生学习。”^①谈话连续进行了三个多钟头，大家都感到收获很大。不少同志说：“希望徐老多来长沙，使我们多进行几次这样的聚会。”

一九五八年，在我们党领导下，开展了一个勤工俭学和教育革命运动。徐特立根据我们党的革命经验和针对当时的错误倾向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然并不是否定读书和书本知识的意义。书是一定要读的，正确的书本知识也是极为重要的。不读书，我们

^①周世钊：《我们的师表》，北京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七十八页。

如何继承和借鉴旁人积累起来的许多斗争经验呢？列宁曾经告诉我们，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遗产，只有用这种知识来丰富自己，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所以，问题并不在于读书，而是在于我们读书的方法和立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工作经验。”^①在当时片面强调实践，强调生产劳动，忽视书本知识，忽视课堂教学的情况下，徐特立这些意见显得更加正确和难而可贵。

徐特立认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不可偏废的根本原则，至于具体的道路则可以有多条：一是由小学而中学、大学，当中也要有课余劳动和一定时期的集中劳动；一条是中小学毕业后从生产劳动中进行业余学习，以继续提高；再一条就是没有进过“正规”中小学的劳动人民，只从业余学习中提高科学文化。“这几条道路虽不同，但我们总是要把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到工程师、农艺师的水平。”^②他还说：“我们必须谆谆告诫青年同志，不要只想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这一条道路前进，而要由多条道路前进”^③。

徐特立还指出：在反动统治阶级尚未推翻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重要任务是革命，是武装夺取政权。“当反革命的统治已被推翻，剥削阶级已被消灭或者已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已经建立，这时候虽不是没有阶级斗争，但最重要的事情，已是发展生产。革命是从前老一代最重要的历

^① 《五四运动和知识分子改造》，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二七四页。

^{②③} 《解答关于教育方针的几个问题》，同上，第二六三、二六五页。

史任务，发展生产是现在新一代最重要的历史任务。”^①青年一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要从艰苦奋斗中，使这又穷又白的中国，在生产上做出奇迹”，赶上英美苏等先进国家^②。要完成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只靠少数的工程师、专家的智慧是不成的，只靠亿万人民硬干也是不成的，必须使科学文化和广大劳动人民结合起来，发挥广大群众无穷无尽的创造性，使生产很快地提高。这就要使广大劳动者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提高文化，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五八年，在社会上片面强调突出政治、批判“成名成家”的时候，徐特立多次鼓励“青年要有志气，要做科学家，要发现许多新方法新道理，那就不能只在书本子里去发现，只有从改造事物的劳动中去发现。”^③他举例，多次谈到毛主席和陈云同志，他说：毛主席不仅没有进过陆军大学，连陆军小学也没有进过，他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学习战争，成为“古今中外最优秀的军事家之一”，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写出了不朽的军事著作。陈云只读过几年小学，以后当学徒，参加革命，在工作中学习，成为“卓越的政治家、经济学家”，领导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九五七年七月底，他亲自前往北京第一师范学校，接见即将毕业离校、奔赴工作岗位的应届毕业同学。鼓励他们在任何艰难环境中，“能克服一切困难，勇敢地创造奇迹。”希望他们热爱专业，一生都做教师，再也不想别的，但要努力“成为专

①②③ 《解答关于教育方针的几个问题》，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二六〇、二六一页。

家”、要钻研教育科学。在工作中“能解决实际问题，有创造，就是专家了。”并说：“没有条件，自己创造条件，有了小创造才能有大创造。”^①

徐特立在向干部、工人和学生的讲话中，还反复地向青年一代进行了勤劳朴素、艰苦奋斗的教育。他说：“现在我国的外面还有帝国主义，内面还是经济落后，文化落后，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国防、经济和文化建设。目前我们国家的困难仍多，我们当学生的和参加革命工作的就不可能过早地提出过优裕生活的要求。特别是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还困苦。我们的生活如果太过好了，远远超出群众的水平，也是不应该的。”^②他还强调指出：“勤俭两字是永远永远需要的，现在需要，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有了勤俭，社会才能前进。”^③

一九五七年二月一日是徐特立的八十寿辰。一些老同志、老朋友和他昔日的老学生想为他祝寿，庆祝一番。他为了增产节约，避开在京亲友的祝贺，借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之机，提前离京赴湘。可是，他在长沙的老学生和亲友也不少，纷纷提议设宴、茶叙，以表祝贺，他亦坚决谢绝。他说：“去年全国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人民生活困难的还多；中央正大力提倡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我们怎可为了个人的生日，浪费人民财产呢！”最后，他同意在生日的前一天，借荷花池长沙女子师范学校集合一部分昔日学生，举行一个教育讲座。大家正在

① 《徐老的嘱咐》：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二八八页。

② 周世钊：《我们的师表》，北京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六十九页。

③ 《劳力与劳心并进，手和脑并用》：见《徐特立教育文集》第二五八页。

准备这一天的喜事。但不久得到他的秘书通知说，他因事赴广州去了。他终于以这种办法避开了亲友的祝贺，在火车上度过了自己的八十寿辰。

解放以后，徐特立鉴于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反复强调要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以保证我们党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他一九四九年十月给《河北教育》的题词、一九五〇年给湖南“一师”的题词以及一九六三年在上海的题词，均强调以“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作为我们的党风、校风和刊风，作为我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准则。他说：我们党的延安整风“连续大整两年，三风之一风是学风，学风中最主要的是‘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两句话九个字”^①。他还精辟地指出：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本质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没有它，一切革命，一切建设，一切工作与学习都会有偏差，都会有走上恶风的危险。”^②他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党的作风，无产阶级的作风，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关系着我们党的事业能否胜利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他还深有感触地指出：“‘实事求是’一语说起来十分简单，做起来难于登天。尤其是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卖学问，卖知识，常常不问市场情况，一切从主观出发，不易接受批评，又缺乏反省（即缺乏自我批评），以学风中毛主席所指出的话来概括，就是‘自以为是’。”^③

一九五八年，社会上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一

①③《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三四、一三三页。

②周世钊：《我们的师表》，北京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七十四页。

些人为了放“卫星”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是年秋天，徐特立南行途中路过河南，在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陪同下，到一个公社参观。茫茫棉田杂草丛生，颗颗棉桃多未吐絮，一个介绍情况的人，声称亩产皮棉能达几百斤。徐特立当即表示：“我不相信，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等我回来还要到这里，看看到底摘了多少斤。”介绍情况的人还说稻子亩产能上万斤。他听了，更加不高兴地对周围的同志说：“这不可能！不透空气，稻子怎么能生长呢？这是普通常识嘛。”^①

徐特立从河南回京后心情沉重。后来通知他去徐水参观，他坚辞不去。徐乾劝他：“在外面讲话可要注意啊，不然会说你反对大跃进。”他沉思片刻，说：“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困难了。但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他还说：“讲大话容易，到头还是老百姓遭殃。”^②

一九六一年，党强调发扬民主，总结三年大跃进失误的经验教训。秋天的一个早晨，徐特立用毛笔在一张旧公文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浮夸风其目的是骗他人，结果把社会信用失掉，使自己孤立而垮台，并人格也丧尽。一切自谓聪明缺乏考实作风者必遗害社会且灾及子孙。”^③真是下笔千钧，发人深省。

建国后，特立年事日高，记忆力逐年衰退。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给中央写信，请求免去他担任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职务，让年轻有能力的同志来接

①张冈吾：《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徐特立同志晚年生活片断》，载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②③张冈吾：《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徐特立同志晚年生活片断》，载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替。他在信中说，若不这样，我是很不安心的。不久，杨尚昆、陆定一老同志去看望他，问他为何感到不安，他说：“不让贤怎么能安心呢？就是要让贤嘛！”^①他每次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看到代表增多了，回到家里就兴致勃勃地说：“青年是国家未来，只有青年人成长起来，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②

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在对青年的一次谈话中说：不要以为长征时期过去了，延安时期过去了，从此可以坐享清福了，那是不对的。要知道，创业难，守业更艰。他希望广大青年继承和发扬革命老前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然，革命胜利的果实，可以得而复失”^③。一九六二年冬，徐特立回到湖南，曾给《长沙日报》题词：“创业难，守业亦难，须知物力为艰，事事莫争虚体面，老老实实，勤俭建国，发愤图强。”一九六五年五月，他已经快八十八岁，当谢觉哉坐在推车里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向谢谈起自己的一个想法，想回到湖南乡下去喂猪。谢听了，深有感慨，回到家里，当日在日记本上赋诗一首：“九十高龄力有余，身闲不住待何如。老人又羨耕和读，想旁桑荫学养猪。”^④

徐特立一生素持正义，刚直不阿。在党内的长期斗争中，严肃认真，独立思考，以党和人民的利益定是非，从不投机取巧，更不随声附和，表现出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

①②张冈吾，《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徐特立同志晚年生活片断》，载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③《对青年人的几点希望》，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二八〇页。

④王定国：《徐老是谢老的好战友好兄长》，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六十三页。

他目睹歪风邪气绝不明哲保身。十年动乱的初期，林彪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无端诋毁和恶意攻击朱德委员长，事后，他大义凛然地前往朱德家，表示看望和慰问。

徐特立一生十分重视身体锻炼，直至晚年依然坚持各种体育活动。他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身体好，才能为党为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①他认为，健壮的身体不是吃、喝、玩、乐所能成功的，而是通过艰苦的劳动和各种体育活动的锻炼“斗”出来的。他说：“好身体也靠‘斗’。农民的身体比较好，因为大田在村外，柴火在山上，不管刮风下雨，都得上山下田，长年累月就斗出一副好身体。工人的身体也比较好，他们每天扛大活，抡大锤，也斗得浑身是劲。都是斗出来的。”又说：“从前地主老财说，常吃鹿茸、燕窝、人参、银耳能强壮身体，延年益寿，穿绫罗、绸缎、呢绒、皮毛能祛暑御寒不得病。实际上地主老财冬裘夏纱，最经不起寒暑。我没见过有几个地主老财长寿的。真正经得起酷暑严寒的是衣不蔽体的劳动人民，真正健壮而长寿的是食不厌粗的劳动人民。当然在过去劳动人民也有病残夭折的，这是旧社会的罪恶。要身体健壮主要靠锻炼，靠斗。”^②这实际上是他的切身体会，也是他长寿的基本经验。

徐特立进入北京后，继续坚持每天晨光熹微时起床，在庭院中作缓慢的跑步，坚持洗冷水脸。有时还打乒乓球，夏天坚持游泳。平时工作上下班，外出作报告，联系工作，上街买东

①欧阳先云：《人民的楷模》；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一九〇页。

②《徐特立同志谈锻炼身体》；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三〇六页。

西，跑新华书店买书，尽管有组织上分配给他的小车子，只要路途不远，他总是坚持走路。有一段时间，他住在西单附近的西堂子胡同，有时去东城作报告，他总是按照“安步以当车”的老习惯，徒步来往。平时就沿着西单过西四，再经过府右街返回西单。他说：“走路，也有个走法。走路要用劲。‘坐似钟，立似松，行似风’走路要象一阵风。走路，要用腿劲，也要用手劲，用全身的劲。”^①他散步，往往把手靠在背后，挺起胸脯走。徐老八、九十的高龄，始终背不驼，腰不弯。

徐老锻炼身体，既全面，又有规律，每天早晚散步，工间休息时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打乒乓球，午饭后进行日光浴。平时外出，经常爬山。他八十多岁还登过香山的鬼见愁和桂林的明月峰。他说：“爬山有上有下，有攀有登，练的劲更全面。”^②

徐特立一生始终向前看，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曾对“一师”的学生说：“青年们不但应该经常锻炼身体，增进健康，还必须抱革命的乐观主义，不把烦闷困累自己。几十年来，我在工作和事业中不知遭遇多少挫折、打击和失败，但我有一种长处，就是不论在什么恶劣的情况下面，从来不发愁，不着急，不唉声叹气。我是这样想的：失败是一种损失，失败后又来一个发愁，着急，不是再加一层损失吗？这未免太不合算了！我不干这种傻事！一个人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唯一的办法就是爬起来再走。……真有决心毅力的人，失败每每真是成功之母，愁什么！急什么！”^③

①②《徐特立同志谈锻炼身体》，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三〇七、三〇九页。

③周世钊：《我们的师表》，北京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八十页。

徐特立是一个善于工作、善于休息的人。他说：“一个人要养成工作时全心全意工作，学习时专心致志地学习，休息时安心安意地休息。”^①有些人玩扑克，打麻将，一玩就是半宵，他认为这对身体、对革命都是百弊而无一利，他极表反对。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们敬爱的老革命家和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平凡伟大马列真，一代师表启后昆。道德文章垂万世，堪称革命一完人。”^②敬爱的徐特立是中国人民的师表，共产党员的楷模，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徐特立：《我的生活》，载一九八〇年第七期《新湘评论》。
2.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3. 湖南长沙师范学校编：《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
4. 《十老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5. 周世钊：《我们的师表》，北京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
6. 熊瑾玎：《革命老人徐特立》，工人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
7. 魏杰：《艺心胜似柏心丹——田汉同志在长沙》，载一九七九年第五期《新文学史料》。

① 《徐特立同志谈锻炼身体》，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三〇八页。

② 曹瑛：《怀念敬重的徐老》，见《怀念徐特立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版第二一八页。

刘志丹

李振民 张守宪

刘志丹，名景桂，字志丹。一九〇三年十月四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金汤镇。祖父刘士杰是清同治年间的拔贡，秉性刚直，喜欢打抱不平，颇受乡亲敬重。父亲刘培基是乡里的秀才，志丹出生时，他在金汤小学教书，后转而经商，一度担任地方民团文职副官。志丹六岁后，随母回到金汤镇北三十里的山村老家楼子沟，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稍长，就读于永宁山本县县立高等小学堂。由于军阀官僚和豪绅地主的残酷统治，陕北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志丹自幼生活在群众之中，目睹家乡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十分同情穷苦人民。他和家里的长工张万银关系很好，亲昵地称张为“干大”（对长辈的一种尊称），有空即随张一起上山劳动。张万银也很喜欢志丹，常向他讲说贪官豪绅的罪恶，加以陕北一带，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为民除害的故事又流传甚广，这些都孕育了少年志丹对旧势力仇恨的种子。志丹勤奋读书，立志改变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但究竟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却还是茫然的。小学毕业后，十八、九岁的志丹，抱着朦胧地改造社会、复兴中华的愿望，于一九二二年徒步来到离家六、七百里的榆林，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时值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潮的影响逐渐波及偏僻的陕北，志丹迅即跟上时代的潮流，从此开始了他艰

苦奋斗的革命生涯。

在时代的激流中成长

榆林中学是当时陕北二十三县唯一的一所中学，在文化落后的陕北高原要算是最高学府了，但浓厚的封建教育仍然充斥着这个学校。校长杜斌丞是个爱国人士，为了振兴教育事业，他力主改革校政，设法延聘名师，志丹入学后，正是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等进步教师陆续来校任教的时候。由于他们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榆林中学的面貌开始改观，逐渐变得活跃起来了。志丹因为和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老师经常接触，深受他们的熏陶和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常常使他激动得彻夜难眠。不久，榆中学生在魏野畴帮助下发起组织学生自治会，一九二三年后，志丹当选为会长。在他的主持和进步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会积极开展各项活动：推销革命书刊，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剧社、画社等团体，开办了平民小学，同陕北军阀井岳秀操纵的封建迷信组织同善社作斗争，并胜利地领导了榆中学生反对旧势力的一次罢课风潮。后来旅京陕西学生进步组织——共进社发展到榆林，志丹立即成了这个组织的骨干成员。他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亲自带头演话剧和为刊物撰稿，并以学生会名义，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教堂进行文化侵略、搞间谍活动的罪恶，劝说学生中的教徒退教，表现十分活跃。一九二四年秋，李子洲在陕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支部，志丹等成为榆中第一批团员。一九二

五年春，榆林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志丹随即转为共产党员。从此，他的眼界更加开阔，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更为得力。六月上旬，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北，志丹立即组织榆中学生积极响应，上街游行示威，开展援沪募捐，宣传抵制日货，进行街头讲演，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潮，使闭塞的陕北高原顿时沸腾起来了。

志丹在陕北学生运动中，一开始就显示出他的组织才能。一九二五年七月，他被选为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赴三原参加全省学生代表会议和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因交通不便，旅途延误，到三原时学代会已经结束，只赶上参加共进社的会议，被选为该会第一审查委员会委员。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榆林地区共进社活动情况的发言，并满怀激情地为大会题词：“共进！共进！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惜牺牲，杀开血路！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①表现了高昂奔放的革命热情，充满了对未来前途的无限信心。

一九二五年秋，广东处于革命高潮，党组织决定选派志丹等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这时，他中学尚未毕业，校方不准退学，家庭也希望他毕业后再去。但志丹的心早已奔向当时的革命中心，便说服家庭，冲破了校方的阻拦，断然离开榆中，绕道山西，经天津乘船南下，于是年冬到达广州。翌年初，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炮兵科。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苏联帮助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下创办的一所革命军事学校，充满着革命救国的热烈气氛。志丹到后，眼界为之一新，和政治教官恽代

^① 《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第三五一页。

英、肖楚女，政治部宣传科长王懋廷及留校工作的第一期学员陈赓、唐澍等同志交往甚密。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关怀下，他热情学习，政治上也十分活跃。由于不服水土，一度曾患重病，医生让他休学，但他意志坚强，重病后仍坚持学习，不曾稍息。

一九二六年秋，志丹在黄埔军校毕业，随军东征。这时，冯玉祥从苏联回国，成立国民军联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要求我党选派干部到其部队工作。冬，志丹奉命被派往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马部多系回民，实行的是封建家长制和雇佣军事教育，一说要打仗，从上到下，都伸手要钱。但由于回民尚武，骑兵较多，这支部队还有一定的战斗力。志丹到任后，耐心地向马鸿逵进行说服工作，指出：参加革命的军队，就要有革命的行动。征得马的同意，志丹在军、师、团、营逐级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制定新的军容风纪，又开展了新式练兵。回民战士和下级军官大都出身穷苦，灌输革命思想后，觉悟迅速提高。这支部队后来在解围西安，东出潼关，会师中原的战斗中，行动迅速，作战有功，这与志丹所做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分不开的。

次年春，豫陕正处在革命高潮中，被赶出陕境的吴佩孚余孽刘镇华部，还盘踞豫西山区作乱，志丹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代表，去豫西收编刘镇华的军队。刘镇华阴险狡滑，不愿接受改编，但又怕得罪冯玉祥，尔后对己不利，便企图以重金收买刘志丹，要志丹在冯玉祥面前替他说好话。刘志丹立场坚定，严词怒斥刘镇华的收买阴谋，使其狼狈不堪，不得不答应接受改编。

时势造英雄。志丹这时虽只有二十三岁，但因为他一入党

就完全置身于党的领导之下，性格坚强，勇于进取，乐于迎着
一个又一个的风浪前进，所以很快成长起来了。

渭华起义展红旗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蒋介石背叛革命。六月下旬，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也在军队实行“清党”。他借“集训”为名，下令将刘志丹、宣侠父、方仲如、刘贯一等几十名在该部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扣押于开封，逐个进行“审查”。冯玉祥威逼共产党员“必须宣言脱离共党，听国民党之领导，守国民党之规则”^①，否则要“查明枪决”^②。志丹等毫不畏惧，断然拒绝了此一无理要求。七月中旬，冯玉祥下令将这批党员押送出境，原想借湖北反动派之手杀害之。志丹等二十余人便被分别装进两辆闷子车，送出武胜关，甩在湖北孝子店车站。这些共产党员机警地躲过了敌人的暗算，设法到武汉去找党。到武汉后，始知武汉政府亦已叛变，遂又辗转通过地下关系找到了党组织。按照党的指示，大部分同志被派往苏联，一部分参加南昌起义，志丹奉命回陕，担任省委交通，往返于上海和豫陕间，进行联络工作。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在革命的紧要关头，纠正了陕西党组织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

① 《冯玉祥日记》，北平东方书社，一九三〇年八月版。

② 转引自《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党务报告》（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战争时期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实行策略上的转变，并通过了农民斗争和军事运动等九项决议案，强调党必须掌握武装力量，组织革命兵变，准备武装起义。

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陕西省委进行改组，撤销了犯有右倾错误的原省委书记耿炳光，改选潘自力为书记。新省委成立后，接连发出党内通告，部署武装起义，并具体划分了陕西各地的暴动区域。通告强调武装部队的起义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指示建制上接受军阀李虎臣收编、实际上由我党控制的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中共党员）部积极准备起义。与此同时，志丹、唐澍、廉益民、吴浩然、谢子长等，陆续被派往该旅加强领导工作。志丹等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在许旅驻地洛南三要司和河南卢氏一带，帮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建立赤卫队，培训革命武装骨干，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并公审和处决了几个恶霸地主，迅速扩大了革命影响。三月，渭华地区因“宣化事件”^①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陕西省委决定首先在这个地区发动起义，为了加强领导，正式成立陕东特派委员会，刘继曾为书记。四月六日，陕东特委根据省委关于渭华暴动的《行动大纲》，具体制定了起义计划。与此同时，省委又转发了一九二七年冬中央致朱德的信，强调革命军队一定要脱离军阀部队，作农民暴动的“副

^①指渭南我党区委机关被捣毁引起的事件：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渭南反动豪绅捣毁我党区委机关所在地——宣化观小学。次日，中共渭南县委发动了部分学生和农民，打死肇事反动豪绅刘铭初，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此后，敌人进行反扑，先后封闭了渭南县中、渭南东关小学等我党活动据点，并捕去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四十多人，使这个地区的敌我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力”，并指示许权中旅迅速扩大力量，以配合渭华农民起义。这时，李虎臣乘冯玉祥主力离陕参加军阀混战之际，发动了反冯战争，企图独霸陕西。李除以大部兵力围攻西安外，并调驻商洛地区兵力进攻潼关。唐澍、志丹等在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和组织部长李子洲的支持下，五月上旬率领部队撤离潼关，开赴华县高塘，和五月一日在渭南崇凝镇已经爆发的农民暴动相结合，正式宣布起义。八日，在高塘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军民联欢大会，热烈庆祝工农革命军的诞生。志丹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通俗地说明了社会上贫富不均的原因，指出：要想不受穷，只有起来闹革命。大会正式宣布了西北工农革命军的诞生，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前敌总指挥，刘继曾任政治委员，许权中任军事顾问。革命军近千人，下分四个大队、一个赤卫队和一个骑兵分队。革命军成立后，志丹、唐澍、刘继曾即以总司令部名义颁布布告，略称：“土豪劣绅和财东，剥削穷人真个凶。加以放账驴打滚，卖儿卖女还不清。”指出：“西北工农革命军，他是咱的子弟兵……贪官污吏都打倒，我们要作主人翁，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过成好光景。”^①革命军所到之处，大力帮助农民群众开展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进一步推动了渭华起义的发展，很短时间内，东起少华山，西至临潼县，南靠秦岭，北到西（安）潼（关）公路二百多平方公里地区的反动政权被基本摧毁，打土豪，分财物，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农民群众热情歌唱：“不爱银子不爱财，光爱工农苏维埃；不爱金子不爱钱，光爱人民新政权”。

^①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文物处藏品。

渭华地处豫陕交通要道，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党领导革命军民在这里发动起义，使敌人大为惊恐。因此，从六月上旬开始，敌军先后向这里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由于起义军民团结奋战，头两次进攻均被胜利粉碎。六月十九日，敌人又调集了孙连仲等三个师的兵力，在宋哲元指挥下，分左、中、右三路向革命军发动第三次围攻。因敌进攻兵力过强，我军原计划转移陕北的路线已被切断，根据情况的变化，革命军决定向南山撤退，以保存力量。为了阻击敌人，志丹率部在高塘附近骆驼渠的半坡上，和宋哲元亲自指挥的中路敌军一个师作战。骆驼渠是革命军司令部的前沿阵地，敌人用重炮连续轰击，战斗十分激烈。面对数倍于己之敌，志丹镇定自若，一面指挥革命军英勇阻击，一面掩护司令部和伤病员迅速撤退，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形成对峙局面。与此同时，在唐澍的指挥下，五、六百手持长枪、锄头的农民，英勇地击退了自赤水西川进攻的敌人。革命军在完成阻击任务后，于二十二日相继撤退至洛南两岔河。但立足未稳，又遭李虎臣部五旅之众的进攻，唐澍壮烈牺牲，革命军被迫转移蓝田山区，只剩下不到二百人。渭华起义失败了。七月初，根据省委指示，陕东特委在蓝田张家坪召开军事会议，志丹在总结失败原因时指出了以下几点：1. 光杆斗争；2. 军事冒险；3. 脱离群众；4. 烧杀政策^①。严肃指出了这次起义中政策上一些“左”的错误。会后，志丹和子长等回省委汇报工作，一部分同志离开部队分散活动，部队由许权中率领，离陕开赴河南确山地区，途中在邓

^①郑殿华：《渭华起义回忆》；见《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县失利，全军覆没。

渭华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地区爆发的一次农民运动和军队配合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它打击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势力，扩大和加深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为志丹、子长等后来在陕甘、陕北领导武装斗争，创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出生入死的兵运工作

一九二八年七、八月间，志丹等冒着敌人通缉的危险，化装潜回西安，向省委汇报了渭华起义的情况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秋，省委派志丹和子长等回陕北工作，任志丹为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志丹在途经家乡保安时，曾和当年榆中同学、保安县党组织负责人王子宜及皖北暴动失败后回到家乡闹革命的曹力如一起，整顿地方党的组织。他们利用党员担任县教育局长的方便，安排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全县七所小学，以学校为立足点，开展革命工作。冬，志丹到达陕北特委所在地——榆林，参加特委工作。特委书记杨国栋慑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主张只做点宣传工作，不搞武装斗争，甚至荒唐地提出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志丹和特委其他成员一起，同这种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九二九年春，志丹返回保安，根据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派大批党团员打入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开始以主要精力从事兵运活动。当时，保安民团团总路仰之横行乡里，群众恨之入骨，县长及地方上一些士绅与路也有矛盾。志丹和王子宜、曹力如一面分头联络士绅们，争取他们赞成改

选民团，一面揭露路仰之欺压老百姓的罪行，鼓动群众到县长那里告状，要求改选团总。县长迫于人民压力只好答应改选。党组织又通过社会关系提出志丹、力如为团总候选人，并巧妙地争取了多数选票，使志丹、力如当选为正副团总。选举胜利后，路仰之收买了一部分人，企图拒绝志丹上任。党组织又及时发动广大团丁进行抗争，结果把路煞费苦心安排的拒绝志丹上任的示威，变成了欢迎志丹上任的仪式，使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志丹担任团总后，立即对民团进行整顿，废除打骂，改善生活，加强政治教育，建立党的组织，把一个本来反动的民团，改造成为党掌握的武装力量。

这年七月，中共陕西省委在渭南举行全体会议，志丹虽未到会，但由于渭华暴动时他在群众中很有影响，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八、九月间，省委任吉国桢为陕北特委书记，志丹仍继续负责特委军委工作，在陕甘一带活动。那时候，陕甘交界地区北至定边，南至淳化、耀县的桥山山脉，是个“三不管”的地区，军阀统治比较薄弱，不少土匪搞几杆枪就可割据一座山头，一些因反抗压迫走投无路的农民也常在此聚义，封建社团如哥老会、青红帮等也在这里占有地盘。志丹看清了这个特点，就号召党团员占山头闹革命。他常说：连土匪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在这里闹革命呢？从一九二九年在一九三一年，志丹、子长利用亲友等各种关系，先后打入陕甘边界一些军阀军队和民团进行兵运活动。志丹先于一九二九年夏秋，打入陕北军阀张廷芝部队；一九三〇年春，又打入驻甘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任十六团副团长。陕北特委同时派张秀山、贺晋年、张东蛟、高鹏飞等一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相继进入苏部工作，并

且在苏部秘密地建立了党的军委（张东蛟任书记），大力做争取群众，训练军事干部的工作。随后，志丹、子长又回陕北打入地方军阀谭世霖部队活动，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一九三〇年夏，志丹、子长等随谭部驻防庆阳、吴旗交界的三道川，准备利用机会举行起义，不意突遭张廷芝的袭击而失败。

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志丹和子长同到绥德参加陕北特委（书记为赵伯平）第五次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决定继续进行兵运工作，条件成熟时实行兵变，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这次会议正值立三左倾错误时期，按照立三左倾错误的要求成立了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子长、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但是，由于立三左倾错误很快就被纠正，实际工作中并没有贯彻执行。会议期间，特委曾提议由志丹继续担任军委书记，留机关工作，志丹以基层武装斗争更重要为理由，请求派他仍回陕甘边搞兵运，特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另由北方局派孔祥桢为军委书记。

九月，志丹回到保安，向党组织传达了特委会议精神，研究了扩大革命武装的计划。这个月的下旬，志丹即和曹力如等一起在永宁山一带组织革命武装。他们先是借用陇东民团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到甘肃合水县太白镇以商借粮草为名，击毙该镇民团团总黄毓麟以下十余人，缴获枪枝六十余支，骡马几十匹。战斗胜利后，志丹带着这支队伍，驰骋于保安、安塞、合水、甘泉一带，几个月内使部队发展到二百余人。人马发展了，志丹又抓紧机会在永宁山南石峁湾的深山密林里进行练兵。当时民谣曾有：“刘志丹练兵石峁湾，要把世事颠倒颠”等句。后因遭优势敌人“围剿”，转移途中失利。

一九三一年春，志丹奉命继续和苏雨生合作，任该部团

长，驻旬邑职田镇，准备起义，不慎暴露，被当地豪绅告发，志丹被捕，囚禁彬县，部队亦被缴械改编。志丹“虽受镣锁囹圄，仍暗中策令其他同志工作，毫无惧怠”^①。旋经党组织和南汉宸、杜斌丞等通过杨虎城关系营救获释。

同年四、五月，志丹出狱后，根据省委指示，利用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又打进平凉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陈明知志丹是共产党员，但对志丹的能力十分钦佩，又想利用志丹反对当地其它军阀张廷芝、谭世霖，扩充自己实力。志丹心中有数，亦借此以陈的名义在桥山的南端宁县成立了一个旅，号称十一旅，自任旅长，人枪三百余，并不断吸收当地农民及共产党员参加。这期间，陕西省委曾有一个策动甘军五个旅兵变，拖出建立桥山根据地的计划，并派高岗（时任省委交通，全国解放后，因与饶漱石阴谋反党，分裂中央，被开除出党）到平凉和志丹进行过联系。但是这些起义多系单纯的兵暴，没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且在路线上带有某种盲目性，因而都没有成功。志丹的十一旅也因与陈部发生火并而被打散。志丹在危急情况下安排了党的工作，连夜出走，只身回到南梁，以百折不挠的精神，集合起部分失散了的战士，沿着桥山山脉，逐渐又发展成一支二、三百人的队伍。

志丹在兵运工作中，面对千变万化的复杂形势，出生入死，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胆略，一向被当作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虽经多次挫折而从不气馁，并善于从实践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前进的道路。这种利用军阀间的矛盾，发展革命武装的做法，当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的，但并

^① 《烈士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

不是根本办法。正象志丹后来所总结的：“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公开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出去搞。”^①正反映了他思想认识上的日渐成熟。

从陕甘游击队到红二十六军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号召组织群众性的反帝运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国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十月下旬，志丹领导的队伍在甘肃合水县灵锦庙同杨仲远、阎红彦、师祝杰等率领的部队^②胜利会合，到南梁一带休整。是年冬，转移至合水县柴桥子。根据当时全国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部队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

一九三二年二月，根据省委指示，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家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后叛变）任政委，杨仲远任参谋长。改编之始，志丹即离部队赴省委汇报情况，随后在渭北搞了一段农运工作，又返回陕甘边。此时，游击队已分编为三、五两个支队，志丹任第三支队队长，率部在永寿、乾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五月十

①王世泰：《“九一八”以前志丹同志的军事活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陕西省档案馆抄件。

②系由西渡黄河而来的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及陕北几股保运武装组成。

日，省委改任志丹为总指挥。这时，敌人部署重兵数旅“进剿”陕甘游击队，省委指示游击队立即北上。志丹主持召开队委会议，分析了敌情，认为分驻中部（今黄陵）、宜君、洛川之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一团战斗力弱，且距榆林、西安均远，增援不易；这一带又系山区，游击队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利于作战；于是决定向该地区行动。五月十五日夜，志丹指挥游击队奔袭旬邑马栏镇，一举歼灭敌五一一团两个连及民团一部，缴枪二百余支。十七日，一天之内又连歼凤凰山守敌五一一团两个连及焦家坪、五里镇两地民团共五百余人，缴枪四百余支。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在五里镇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扩大红军，队伍迅速发展至一千五百余人。二十日，继续向敌进攻，歼灭了白水县及中部县民团百余人。随后，部队在宜川英旺镇歼敌八十六师一个营，缴枪三百余支，弹药两万发。至此，敌八十六师转入守势，中、宜、洛反动民团基本被歼。在此次反“围剿”中，志丹和他领导的游击队，依靠地方党组织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运用游击战术，半月之内，挺进数百里，经过五个县，大小九战，八次获胜，共歼敌一千四百余人，缴枪一千二百余支，粉碎了敌人的“进剿”。六月上旬，志丹率游击队自富县东移，在集义镇消灭民团一部，进至韩城的上官庄，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五十余人的赤卫队。原计划在此开辟游击根据地，但因遭强敌袭击，伤亡较大，被迫退至甘肃正宁麻子掌时，部队思想混乱，在行动方向上发生了南下三原和北上桥山的争执，相持不下，最后决定就地开展游击战争，阎红彦被选为总指挥。这时，执行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却指示“红军开始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反对游击战争。七月下旬，省委派代表到游击队，进

一步推行左倾错误，对刘志丹、杨仲远、阎红彦等进行批判，戴上“逃跑主义”、“上山路线”等帽子加以打击。八月，当部队打下正宁五顷原后，又错误地提出死守只有十几户人家的五顷原，消灭附近敌人的坚固据点，二十天分完土地等一套过左的计划。志丹坚决同这种“左”倾错误进行了斗争，并耐心进行说服。但这些人根本不听，仍令进攻敌人设防坚固的城镇，结果连打败仗，使部队遭受极大挫折，被迫退至马栏附近。

八月底，省委又派子长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志丹为副总指挥，率部南下耀县地区。此时，敌人分三路对游击队开始了新的“进剿”。敌第一路贺高侯部千余人，由旬邑土桥经安子洼向照金进发；第二路井岳秀部一个营配合民团二百余人由宜君进占马栏，企图截断红军退路；第三路由胡三带领富平、耀县、铜川三县民团四百余人，以素著恶名的耀县团总蔡子发为首，由耀县进攻照金，情况非常严重。但子长、志丹沉着应战，在摸清敌人部署后，当机立断，决定避敌主力，歼其薄弱环节，趁敌贺高侯部进展迟缓，当晚运用以退为进的战术，先佯装向宜君、铜川方向后撤，埋伏在照金以西二十华里的地方，诱敌蔡部进驻照金，游击队立即杀了个“回马枪”。拂晓，当敌还在酣睡之中，即被我四面包围，在大雾中激战不到两小时，打死民团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团总蔡子发，歼敌四百余。照金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战后，由于敌人又集结几个县的兵力联合反扑。为了避敌主力，部队只好撤离照金，北上保安。临离照金时，志丹留下他的特务队，交由两当兵变失败后回到这个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习仲勋领导，就地坚持游击，开辟根据地。

九月，游击队进攻保安失利。十月，再战又失利，撤至合水县梢林地区的平正川，部队情绪低沉。子长、志丹在这里召开队委会，决定分散活动，筹集粮款，解决冬衣问题，并寻机消灭小股敌人。会后，游击队分三路活动：志丹带领一个大队到合水塔尔原；杨森、黄子文带领六十余人到三原武字区；杨仲远、阎红彦带骑兵队到照金一带活动；子长依靠群众的掩护，带领三十余人，留住平正川、豹子川的山林里，照看伤病员。经过一段工作筹得了一批粮款，取得了一些胜利，部队又恢复了战斗力。

十二月上旬，各路游击队在合水县黑慕原、塔儿原地区会合，旋即南下淳化地区游击。此时，根据中央北方会议的决定，省委指示游击队开往宜君转角镇整编，准备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省委书记杜衡为此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部队，利用改编机会极力进行宗派活动，打击原来的领导干部。同月二十二日，杜衡在宜君杨家店召开党团员大会，对游击队一年来的活动横加指责，诬蔑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有反革命阴谋”；攻击他们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①、“土匪路线”、“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并且蛮横地撤销了子长、志丹等同志的领导职务，强令子长、红彦去上海临时中央“受训”，志丹、仲远虽因杜衡不懂军事，勉强被留在部队，但不分配重要工作。二十四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军二十六军第二团（当时只有这一个团），王世泰任

^①梢：梢林。“梢山主义”指只在山林里进行活动，与“上山主义”同一含义。

团长，杜衡兼军、团两级政委。为了便于控制部队，杜在改编中规定干部必须从班长和战士中“选举”、由政委任命产生，原游击队排以上的干部全部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面对这种无情打击，志丹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修养。他心地坦然，顾全大局，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积极协助王世泰做好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并尽一切可能来维护部队的团结，遇到战斗，则精心协助拟定作战计划，争取打胜仗。由于他工作出色，干部战士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①。

由于杜衡一意孤行，一味蛮干，红二十六军成立半年多时间，就被搞垮了。

本来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就决定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因为照金位于旬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五县之边，北连桥山，南接渭北平原，其间山岳连绵，便于红军活动。同时，这里曾是陕甘与渭北游击队的老游击区，群众基础好，居民大多是外来灾户，有土地革命的迫切要求，当地虽有几个民团，但人数不多，居住分散，其中庙湾民团又和红军订有友好协定，加以习仲勋、李妙斋等率领的游击队一直在此活动，红二团成立后，又正式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党政组织均已建立，只要路线政策正确，在这里是大有发展前途的。但杜衡坚持推行左倾错误，只知斗争，不搞联合，主张打倒一切。当时白军有些军官是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和红军干部有秘密联系，送枪枝弹药给红军，杜衡就骂红

^①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载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军干部勾结军阀。对和红军订有友好协定的庙湾夏玉山民团也要进攻，结果使周围民团联合起来反对红军。后来又烧了香山寺，惹得几百个和尚也成了革命的对头。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小，只剩下照金中心区薛家寨，孤零零地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情况十分困难。

一九三三年五月下旬，杜衡召开党政军干部临时联席会议，在会上作形势报告时，故意夸大敌人进剿的严重性，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重建新的根据地，说什么渭华形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又距西安甚近，可威胁敌人反动统治中心，宣称这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针”。志丹坚决反对南下，指出：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的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那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杜衡根本不听，诬蔑志丹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在杜衡的错误决定下，红二十六军主力二团被迫南下，五月三十日，到达三原武字区，经高陵玉桥渡口过渭河后，杜衡被强大的敌人所吓倒，中途动摇，以向省委汇报为名，私自离开部队跑回西安。不久省委机关破坏，杜衡被捕叛变。杜衡离队后，政委由汪锋担任，志丹任参谋长，与追击的敌人边走边战，进到蓝田张家坪时，被五千多优势敌人包围。志丹等见势不利，立即召开队委会，决定丢掉辎重，分三路轻装突围。志丹、曹士荣率一路，汪锋、杨琪率一路，王世泰、吴岱峰率一路，在终南山一带苦战两月，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团覆没，造成了极可痛心的损失。

志丹带领十余人冲出重围，又被围困在深山老峪里，靠采

寒野果充饥。时值盛夏多雨，加之敌人重赏通缉志丹，经常派兵搜山，处境十分困难。革命的严重挫折，动摇不了志丹坚定的意志，他亲切地和战士们谈心，鼓舞士气说：“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呀！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后来他动员大家突围，在通过封锁线时又遭到敌人的袭击，大部分同志牺牲了。志丹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死里逃生，一个人冲了出来，隐蔽在一个深山里，昼伏夜出。一次，从一个险峻的高崖上滑了下去，摔成重伤，又遇着一场暴雨，几乎丧生。但他坚强地战胜种种困难，后来遇见红二十六军先锋队一个战士，才扶他下山，和失散的王世泰、曹士荣等会合。下山不远，又路遇叛徒险遭出卖，幸赖他们智斗敌顽，得以脱险。后在渭南党组织的帮助下化装成游乡小贩，担着货郎担子，渡过渭河，绕道洛河川，爬山越岭，奔向根据地。一路非常危险，但志丹等仍坚持不丢掉武器，他们把货郎担子分做两层，上层放货物，下层放武器，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带着几枝驳壳枪回到了照金根据地。

奠基南梁和首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九三三年夏，全国革命形势又有一个新的发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察绥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同时，中央红军胜利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又创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抗日运动和红军的胜利推动了陕甘革命斗争的发展。在陕西省委领导

下，七月二十一日，陕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在耀县通电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受挫后，与新成立的耀县游击队（负责人张邦英、张仲良、陈学鼎）等部，先后转入照金，壮大了在艰苦斗争中坚持创业的照金根据地。同时，由于这时陕西省委被破坏，陕甘边摆脱了左倾错误的直接统治，形势很好。八月十四日，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举行了党政军联席会议，批判了分散红军的错误主张，通过了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革命武装力量，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十月四日，志丹由南山脱险回到照金，即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部队甚为振奋。志丹总结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教训，对习仲勋说：“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习仲勋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志丹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左倾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①

由于红军集中指挥，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很快就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敌急调四个正规团和三原、耀县、淳化等六县民团共六千余人，发起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指挥部分析敌情，认为敌人“进剿”兵力较大，不宜在狭小的根据地内与敌人周旋，要粉碎其进攻，必须转移外线作战，深入敌后打击敌人。于是决定留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主力红军北上。十月中下旬，志丹和泰吉遂率红军北上。配合游击队一举攻克敌人守备薄弱的甘肃合水县城。接着在合水毛家沟门和杨家店子进行战

①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斗，三战三捷，歼敌数百人，重挫了敌人锐气，大振了红军声威。此后，部队继续在合水、庆阳一带游击，又接连获得一些胜利。

十一月上旬，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总指挥部，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志丹的建议，总结了以往武装斗争的经验，并讨论了部队改编、根据地建设和行动方针等问题，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先成立四十二师为主力，王泰吉任师长，志丹任参谋长，高岗任政委，下辖第三团和骑兵团，全师人枪五百余，并决定建立师党委。同时，会议鉴于红军暂时撤离照金根据地，部队在无后方的情况下，连续作战十分不利，为坚持和发展革命武装，决定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新的革命根据地。南梁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处，东距延安、西距庆阳、北距保安均远，南临原照金根据地，四周地形复杂，敌人统治薄弱，便于开展游击战。会后，志丹和泰吉为完成建立南梁中心根据地的计划，分兵两路积极扫荡反动民团。师部及第三团向东北行动，在洛川之葡萄沟门击退敌人一个营。骑兵团向西北方向行动，全歼新堡民团，后在梨园堡、阎家洼子歼敌两个连，接着又歼赵沟门民团，然后会师二将川。此次行动为建立南梁根据地打下初步基础。随后，部队利用战斗空隙，分兵发动群众，以连为单位，分别到平正川、太白川、白马庙川、二将川一带，打土豪分粮食。十一月下旬，首先在合水小合沟四合台成立了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不久，南梁附近农村都相继建立起农会组织，并建立了约一千人的赤卫军。此时，陕甘边根据地的范围，以南梁为中心，北至黑水坡，南至莲花寺，西至老爷岭，东至平正川，幅员达百余华里。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

争，就如燎原烈火发展起来了。

红军的胜利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十二月初，西安绥靖公署调集驻保安、合水、庆阳等县的正规军四个营及地方民团共约五千余人，分九股向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志丹和泰吉缜密部署，决定红四十二师南下作战，以二路游击队之一部打击来犯南梁根据地之敌。但此时正值福建事变发生，敌人未能立即发动进攻，红军遂乘机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在正宁、旬邑、淳化一带扩大武装。在此期间，志丹写了《军事教育大纲》作为教材，对部队进行军事整训。

一九三四年一月上旬，红四十二师返回合水廉家砭。因王泰吉请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师党委决定志丹任师长，杨森任政委。二月，敌人又重新发动进攻，红军配合地方游击队和敌人连打九仗，均获胜利，特别是四月西华池一仗，全歼敌人一个团部和两个整营，取得了重大战果。此后，志丹根据师党委决定，率红四十二师南下三原、淳化、耀县，帮助开展第三路游击战争。五月，敌人又跟踪追迹调兵“围剿”。志丹遂率部回师南梁，随后又经过一两个月的战斗，第一次“围剿”即被粉碎。总计从一九三三年冬到一九三四年夏，在陕甘边特委的正确领导下，志丹等率红二十六军主力和游击队配合作战，从南到北，大小战斗三十余次，歼敌三千余人，解放了陕甘地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敌人成百据点，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建立了大片地区的工农兵政权和十四个游击支(中)队。同年秋，在梨园堡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贫农团、农会、赤卫军、工、青、妇、儿童团等组织也相继建立。边区党政军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到

群众生活都作了明确规定。为了培训干部还办了军政干校，志丹兼校长，习仲勋任政委，马文瑞、蔡子伟、吴岱峰等负责教学工作，分批轮训各级干部和战斗骨干。各乡还办起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陕甘边银行还发行了布制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根据地的经济文化日益繁荣和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有了很大发展。一九三三年夏，以崔田夫、马明方为首的陕北特委，决定划陕北为四个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三四年一月，谢子长回到陕北，由中共中央北方代表任命为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在陕北特委和子长的领导下，陕北游击战争迅猛发展。同年七月二十八日，子长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陕甘根据地，参加了陕甘边特委在阎家洼子召开的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干部扩大会议，推子长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会后，子长率领红二十六军三团返回陕北，先后在安定、绥德、清涧、横山等地连打胜仗，粉碎了井岳秀部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不幸的是，八月二十六日，子长在清涧河口战役中弹负伤。十月，中共中央北方代表孔原派巡视员黄翰来陕北，指示统一陕北、陕甘两个地区的武装力量及改编陕北游击队问题，决定调志丹负责西北军委工作。遵照北方代表的指示，十二月，陕北各路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后改为八十一师，师长先后为杨琪、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十二月底，志丹亲率红二团和陕甘五、六支队赴安定，并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到水晶沟、柳沟、灯盏湾等地，多次探望辗转养伤的子长，两人就陕甘和陕北两地区统一领导、两支红军统一指挥共同作战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谈得十分融洽。二月五日，志丹参加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周家硷（今属子洲县）举行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正式

统一了两地区党政军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军事委员会以及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志丹当选为西北工委委员和西北军委主要负责人^①。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志丹、子长提出的粉碎敌人新“围剿”的战略方案，为进一步推动西北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新的反“围剿”斗争开始后，志丹又兼任了前敌总指挥。

在第二、三次反“围剿”斗争中

一九三五年二月，蒋介石由于对西北革命形势发展的极度不安，调驻河南的高桂滋部八十四师及陕、甘、宁、晋四省军阀军队，总兵力约四万余人，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此时，根据地武装虽有迅速发展，但红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主力还只有四千人左右，游击队也不过三千多人。面对这种形势，如何粉碎敌人的进攻？当时红军领导人中有两种不同意见：以志丹为代表的一种意见，主张向南发展，进攻延长、延川、保安、安塞，以与陕甘苏区打通；另一种意见主张攻打敌坚固据点绥德、米脂、佳县、吴堡，以与神府苏区打通。大多数同志同意志丹意见。志丹即据此和周家硷会议精神，亲自为西北军委起草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动员令分析了敌我形势，命令首先打击深入陕北根据地但

^①关于西北军委主席的说法有二：一说谢子长为主席，刘志丹、高岗为副主席。一说刘志丹为主席，谢子长为副主席。关于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的时间，亦有两种说法：一说同一会议上成立，一说军委先工委而成立。均待进一步核实。

对陕北人地生疏，又与陕北军阀井岳秀互有戒备的高桂滋部，尔后向南、向西发展，使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为了保证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动员令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实现严格的军事化，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反对散漫习气和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动员令下达后，根据地党政军民立即投入战斗，红军所到之处，群众紧密配合，赤卫军站岗放哨、带路送信，妇女补衣做鞋、看护伤员，整个根据地森严壁垒，众志成城。

反“围剿”战开始后，红二十七军先和敌人接触。红二十六军主力接着北上，四月二十二日，在横山寺儿畔首战告捷，歼灭井岳秀一个精锐连。五月一日，两支红军在赤原县白庙岔胜利会师，当日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志丹和两支红军的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会场洋溢着兄弟部队亲密团结的气氛。会后又进一步进行了深入的战斗动员，士气更加旺盛。接着在志丹统一指挥和根据地群众武装协同作战的配合下，红军连战皆捷。先在吴家寨、马家坪歼敌高桂滋部两个营又一个连，迫使驻安定县瓦窑堡和延川县永坪镇的敌人撤离逃跑，十日安定解放。这是西北革命根据地解放的第一座县城。根据地军民乘胜再战，又在清涧无定河边，歼高部一个连。接着，再以声东击西的奔袭战术，制造假象，扬言要打清涧和绥德县城，给敌人造成错觉，主力则兼程南下，隐蔽运动到延长城下。三十日凌晨，志丹亲自指挥攻城，全歼守敌四百余人，一举解放了延长县城，吓得附近甘谷驿民团自动投诚，延川守敌弃城而逃，延川遂告解放。延长和延川相继解放后，前总决定乘胜拔除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中间的敌人据点，以便打通两根据地的联系。为此，制定了先夺甘泉，孤立延安，然后再打安塞的作战计

划。六月四日，红军昼夜兼程，南下奔袭甘泉。但因意图暴露，敌人戒备增强，未能得手，志丹遂改变原计划，在甘泉虚幌一枪，率主力沿洛河两岸西上，于六月中旬重重包围了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在政治争取无效后，红军挖地道爆破寨墙，强攻占领山寨，歼敌二百余人，俘虏了安塞县新旧两任县长，解放了安塞县城，安塞县境的地主武装、反动民团亦被相继扫光，基本上打通了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六月下旬，志丹又率红军主力挥师北上，奔袭靖边县城——镇靖。该城西山寨是个制高点，火力足以控制全城，地形对我不利，敌人负隅顽抗，战斗十分激烈。由于主力红军和赤卫队紧密配合，经过反复强攻，终于全歼了守敌一个营，胜利攻下镇靖。靖边县城打开，保安随之孤立，“围剿”根据地的敌人大为震惊，保安守敌不战而逃，红军不费一枪一弹解放了保安城。接着，志丹又令贺晋年率红一团乘敌人外出抢劫之际，在老君殿高家塌全歼高桂滋部一个营，击溃两个营，打伤团长艾捷三。至此，敌人第二次“围剿”被彻底粉碎。总计此次反“围剿”中，缴获长枪三千支，轻重机枪二百余挺，俘虏约两千人，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六座县城，使陕北、陕甘两根据地完全联成一片，在二十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三十多个县，根据地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主力红军发展到五千人左右，游击队发展到四千人，形势一片大好。

第二次反“围剿”中连打了几个漂亮仗，取得了很大胜利，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主力红军和游击队紧密配合，并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下取得的结果；同时也集中体现了志丹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在指挥作战中，善于审时度势，捕捉战机，常

常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劣势对优势而战胜敌人。特别是在接连取胜的形势下，他仍十分注意总结经验，一再告诫部队戒骄戒躁，因而能够提挈全军，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第二次反“围剿”取胜时，正是中央红军长征快要到达陕北的时候。蒋介石为了使中央红军无立足之地，于八月间，又发动了对西北工农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妄图一举摧毁这块我党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革命根据地。正因为这样，蒋介石对这次“围剿”下的本钱更大。他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且自兼总司令，除调集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阀军队外，还调集了驻陕西的东北军主力和国民党中央军一部分，共十多万人，超过红军十余倍。志丹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制定了集中主力红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趁敌部署尚未就绪之时，先发制人，八月中、下旬，在东线的绥德、吴堡一带，首先打垮了刚渡过黄河的阎锡山部两个旅，迫使阎军退回山西。接着又集中兵力进攻北线敌人。正在这时，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红二十五军，由鄂豫陕苏区西征北上经陕甘边到达陕北。志丹亲自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并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保安瓦子川热情迎接。九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在延川永坪镇胜利会师。会师后，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在永坪镇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简称永坪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并改组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为统一红军指挥，确定三个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十五军团成立后，海东、志丹即率部南下。十

月二日，在延安以南的劳山地区全歼敌一一〇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击毙敌师长何立中。劳山战役的胜利对敌人震动很大，瓦窑堡守敌八十四师所部连夜弃城逃往绥德，我军乘胜追击，拔除了瓦窑堡周围原安定县敌人的全部据点。五日，根据地首府迁驻瓦窑堡。这时中央红军已进至甘肃通渭、静宁地区，敌“西北剿总”一面急调大军阻击，一面电令董英斌、王以哲、孙楚等部，立即在陕北“聚歼”刘志丹、徐海东部，“不准与毛、周靠拢”，反“围剿”斗争进入紧张阶段。

受诬入狱和重见天日

正当反“围剿”斗争胜利进行的紧要关头，王明左倾错误却在陕北恶性发展。早在一九三四年初，陕北特委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就被无端指责为“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①，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又决定“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和“肃反运动”。他们先是利用永坪联席会议决定的组织上的变动，不公正的将志丹排斥在新的省委和军委领导之外，同时安插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担任要职，接着即以肃反为名到处捕人。他们始则攻击志丹“一贯右倾”，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继则干脆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凡是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捕，严刑逼供，指名要招出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

^①张秀山：《裹革沙场虽死犹生，纪念先烈以启后人——纪念刘志丹同志牺牲四十周年》，载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日《解放军报》。

首领”，并残酷地杀害了一批干部。但许多忠于党和革命的干部，虽经多次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拒不承认他们的诬陷。当时，志丹正在前线，他们采取欺骗手段，以调往北线指挥作战为名，于十月初劳山战役之后将他骗离前线。志丹在途经安塞县真武洞时，恰好碰见从瓦窑堡来的通讯员，通讯员认识志丹，说有一封给十五军团的急件，顺手交给了他。志丹一看，原来是密令逮捕自己和其他人员的名单。他对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但他有极高的党性。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丝毫不顾个人安危，镇定地把信交还通讯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说我自己去瓦窑堡了。”^①随即策马扬鞭，毫不犹豫地毅然直赴瓦窑堡，打算向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申诉，宁愿自己就捕，不要逮捕前线其他指挥员。但他一到即被投入监狱，连他的带着五岁幼女的妻子同桂荣，也被同时禁闭起来。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无视志丹这种赤胆忠心和大义凛然的行为，竟然胡说：志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党对其信任”，并进一步错误地断定志丹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诬陷他率领红军打开县城消灭白军，纯系反革命欺骗群众的“花招”。志丹蒙受不白之冤，在监狱受尽折磨。但他面对随时可能被处死的残酷现实，始终泰然处之。

陕北这次左的错误的肃反，制造了大量冤案，造成了革命根据地人人自危的恐怖混乱局面。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

^①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载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机捣乱，根据地一些地区发生了“反水”现象。同时，敌人也增调兵力，完成了对根据地新的“围剿”部署，妄图从南北两路夹击红军而消灭之。内遭错误路线的破坏，外受强大敌人的包围，本来形势大好的革命根据地，一下陷入了岌岌可危的严重局面。

正当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陷于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围剿”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喜讯传来，军民振奋。毛泽东等同志是在突破腊子口后，始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个刘志丹，到达陕北后，了解到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肃反，刘志丹等已被关押，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代表党中央，奔赴瓦窑堡接管左倾错误领导控制的保卫局，经过审查，于十一月初，将刘志丹等受诬被捕人员全部释放。志丹出狱后，陕北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志丹。志丹先见到周恩来，亲热地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①接着周恩来又领他去见毛泽东。他们亲切的安慰和鼓励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志丹毫无怨言，立即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处理，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在党中央召开的受害同志座谈会上，志丹一再谦虚地表示：我们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强调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①张秀山：《裹革沙场虽死犹生，纪念先烈以启后人——纪念刘志丹同志牺牲四十周年》，载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日《解放军报》。

毛泽东同志不但及时纠正了陕北的错误的“肃反”，并且亲自指挥红军打击敌人的进攻。接着，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配合，打了著名的直罗镇一仗，最后粉碎了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红军声威大振，根据地空前发展。之后，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将陕北与陕甘根据地重新划分为陕北、陕甘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委，并相应的建立了政府机构。同时，又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统一管辖西北的革命武装，并将陕甘游击队和地方武装编成红二十八军。志丹先后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要职。在此前后，有些受迫害的同志出自对王明及其左倾错误执行者的义愤，多次要求志丹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反映，处理犯错误的人。志丹胸怀坦荡，一再进行解释说服工作，他一方面严肃批评那些犯错误的人是“不相信从土地革命中生长出来的红军，不相信从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而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①另一方面又一再劝慰受害同志，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常说：党内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结论^②。一九三六年初，他要习仲勋转告受过整的同志：“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那一个人的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

①刘志丹：《三边事变的经验与教训》，载中共西北局机关报《斗争》第八十二期。

②王子宜：《纪念伟大的革命战士——刘志丹同志》，原文存陕西省档案馆。

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①他向部队讲话时，每次都要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顾大局识大体，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加强团结。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受害同志都不计个人恩怨，勤恳为党工作，陕北红军和中央红军团结得亲密无间。周恩来多次赞扬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

东征抗日 英勇献身

一九三五年底，华北事变以后，全国抗日形势迅速高涨。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二十八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十二月八日，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合署名发表了《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指出亡国灭种的大祸已迫在眼前，揭露蒋介石围攻革命根据地，实际上是要“把我们陕甘的土地人民卖给日本帝国主义，要使我们做亡国奴。”号召劳苦群众争当红军，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宰割，“和万恶的敌人血战！”“来保卫我们神圣的苏区！”

一九三六年二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为适应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渡河东征。十七日发布《东征宣言》，并随即派主力红军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在汾河河谷击败阎锡山的堵截，逼近同蒲铁

^①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载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察哈尔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蒋介石对毛泽东亲自率红军渡河东征怕得要死，慌忙下令从洛阳、徐州等国防要地，调遣十个师以上大军配合晋绥军拦截红军去路；同时，又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攻陕甘红军后方。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党中央命令志丹和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担任侧翼，从佳县以北渡黄河，插入晋西北地区，配合中央红军迅速打通走向抗日前线的道路。

志丹率领部队向黄河挺进的行军中，沿途受到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听说刘志丹带着红军回来了，甚至专程几十里跑来看望，志丹的宿营地经常挤满了亲切慰问的群众。一次在神木县境，一位七十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大娘，也拄着拐棍，颠颠跛跛地赶来探望，众人笑着说：“大娘，你怎能看见老刘啊！”她说：“看不见，我还摸不着吗？”志丹立即站到老人家面前，拉着她的手，亲切地说：“大娘，我就是刘志丹。”老人家把志丹从头摸到脚，又从脚摸到头，激动地流着热泪说：“好哇！……好哇，你真是咱们老百姓的好人啊！”在场的好多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充分反映了志丹和广大劳苦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月，红二十八军打下神木沙峁镇后，住在贺家川一带进行紧张的渡河准备。志丹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经过昼夜不停的详细调查研究，最后选定在通往山西兴县的沙峁头渡河。三月底，部队在志丹指挥下，胜利渡过了黄河。渡河后立即摧毁罗峪口敌军指挥部，随即向兴县黑峪口、康宁镇横扫过去，沿途连获胜利。当部队进至山西临县白文镇时，接中央军委急电：“为了配合红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着令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

沿岸地区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中阳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①志丹率领部队立即由白文镇出发，经过激烈战斗，自离石按时到达三交附近。四月十三日，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政委下达了消灭三交镇敌军的命令。三交镇是山西省中阳县一个重要渡口，河西就是陕北根据地绥德。该镇周围都设有坚固工事，并有一个团敌人防守。志丹为打好这一仗，昼夜不眠，亲自观察地形，仔细研究敌情，严密部署战斗。四月十四日^②，在围攻三交镇的战斗中，志丹一直在军部指挥所里紧张地指挥战斗，由于过度疲劳，眼里充满了血丝，同志们劝他休息一会儿，他怎么也不肯，笑着说：“不知怎么一回事，枪一响，一点也不困了。”当他得知一团攻击不太顺利时，便立即和政委宋任穷商议，让宋留在军指挥所掌握全面情况，他亲自来到一团指挥所，和指战员一起研究突破敌军碉堡的方案，指出：“这次战斗与河东整个红军的安危有关，要号召每个共产党员拿出最顽强的毅力，狠狠打击敌人，争取战斗的胜利。”当日午后，正当他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指挥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时，不幸左胸中弹，伤了心脏，当即昏迷过去，清醒过来后，仍以顽强毅力，断断续续地告诉身边同志：“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①转引自裴周玉：《回忆和刘志丹同志最后在一起的时刻》，载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日《陕西日报》。

②关于刘志丹的牺牲日期说法不一，经查证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四日的说法较为可靠。主要根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关于东征的档案资料、周士第日记、志丹牺牲时在身边的军委驻红二十八军特派员裴周玉、志丹的警卫员谢文祥及红二十八军有关干部伍晋南、于占彪、白寿康、高克恭、杨树元等同志访问纪录。另据天津《大公报》（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西安《西北朝报》（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亦记为四月十四日。

志丹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西北红军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最早创始人之一。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为劳动人民解放奋斗的一生。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得失，时刻将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对党赤胆忠心，无限忠诚；对敌斗争勇敢坚决、威武不屈，任何艰难险阻、高官厚禄都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意志。他虽遭多次失败，总是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在党内斗争中，他一向光明正大，襟怀坦白，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同志，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左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虽受诬陷，不自矜功，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特别是他无限热爱人民群众，经常和群众打成一片，同志们和老乡们都一直亲切地以“咱们的老刘”称呼他。他每到一地，就立即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善于了解当地社会情况，地理环境等，对陕甘宁边区的山山水水、村庄道路都十分熟悉，人们称他为“活地图”。他指挥作战有方，爱护战士情同手足，行军中他的战马经常让给伤病员骑，有时还亲自抬担架。他一生艰苦朴素，只知吃苦，不图享受，完全和普通战士一样，身穿千补百纳的粗布衣，脚蹬自己编织的麻草鞋，牺牲时战友们清点他的遗物，除了衣袋里几份党内文件和六支香烟外，其他一无所有。刘志丹啊，真不愧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①，不愧为“红军模范”^②、“共产党员的模范”^③。

①毛泽东题词（一九四三年），原件存志丹烈士陵园。

②朱德题词（一九四三年），原件存志丹烈士陵园。

③陈云题词（一九四三年），原件存志丹烈士陵园。

志丹同志的优秀品质和对革命事业的杰出贡献，使他在红军和人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威信，西北人民对他怀有深厚的感情。当他牺牲的噩耗传出后，陕北高原顿时为之震动。四月二十四日，根据地首府瓦窑堡数千人集会追悼志丹，广大群众和红军指战员莫不为失去这位象自己亲人一样的红军领导人而无比悲恸。“沙场喋血报党国，留得万民哭志丹”^①，正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情。为了纪念刘志丹，一九三六年，党中央应广大群众要求，将保安县改名志丹县。一九四一年开始兴建陵园。一九四二年，志丹牺牲六周年时，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②一九四三年五月，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志丹县为刘志丹举行隆重的公葬典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云、林伯渠、李富春、彭德怀、叶剑英、贺龙、徐向前、蔡畅等党政军领导人以及李鼎铭先生等均为志丹陵题词，续范亭因病未能参加葬礼，也遥寄哀诗，中有：“有志竟成千古业，丹心一片付工农。多痛未能亲执紼，西望云天吊将军”^③等句，深切地表达了广大老同志对刘志丹的真挚感情。

由于戎马倥偬，志丹虽然没有能够给我们留下多少文字上的遗产，但他为人民解放事业赴汤蹈火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却炳耀千古，传颂万世。流传至今的刘志丹的许多革命故

①贾拓夫：《哭志丹同志》。

②原件存志丹烈士陵园。

③原件存志丹烈士陵园。

事和民谣颂歌，不正是历史和人民给予这位杰出革命家的公正评价吗？正象周恩来同志的题词：

上下五千年，
英雄万万千。
人民的英雄，
要数刘志丹。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刘志丹：《三边事变的经验与教训》，中共西北局机关报《斗争》第八十二期，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八日版。
2. 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八日），原件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3. 《烈士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志丹陵碑文。
4. 《共进》半月刊（一九二五年）。
5. 陕西《国民日报》（一九二七年五月）。
6. 《陕西省委通讯》，一九二七年第一期，陕西省档案馆藏件。
7.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叶剑英、陈云等领导人为志丹陵题词（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原件存志丹烈士陵园。
8. 《解放日报》（一九四三年四月至十二月）。
9. 王子宜：《纪念伟大的革命战士——刘志丹同志》，陕西省档案馆藏抄件。
10. 王世泰：《“九一八”以前志丹同志的军事活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抄件。
11. 李力果：《西北的一颗红星》，见《红旗飘飘》第五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2. 阎红彦等：《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
13.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载一九七

九年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14. 张秀山：《裹革沙场虽死犹生，纪念先烈以启后人——纪念刘志丹同志牺牲四十周年》，载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日《解放军报》。
15. 裴周玉：《回忆和刘志丹同志最后在一起的时刻》，载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日《陕西日报》。
16. 聂洪钧：《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见《革命史资料》第一期，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17. 《红色中华》，第二六〇期至二七一期（一九三六年三月三日至四月二十六日）。
18.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七、八辑，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年版。
19.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20. 董纯才：《陕甘宁边区简史》，见《党史资料》一九五三年第五期。
21. 齐礼总编：《陕甘宁边区实录》，解放社一九三九年版。
22. 同桂荣、刘景范、李建彤、张光、刘力真、李维汉、刘澜涛、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汪锋、马文瑞、王子宜、阎揆要、郭洪涛、张秀山、方仲如、赵伯平、贺晋年、吴岱峰、刘继曾、高克林、刘贯一、张邦英、张达志、张宗逊、高朗亭、马云泽、齐心、张光远、马文彦、郑自毅、曹志麟、王芾南、李文芳、张文华、周益三、王英、刘约三、李波涛、李维钧、韩志颖等同志回忆材料或访问记录。

谢子长

张守宪
李振民 梁星亮

谢子长，原名世元，又名德元，字子长，号浩如，化名秋阳。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九日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父亲谢标朋，以务农为业，兼开柴草店。子长从小随大哥谢德惠、二哥谢占元在家劳动，是个放羊能手。由于陕北文化落后，子长十四岁起才读冬学，十七岁时转入县城小学。一九一五年安定县进步人士郭海宽反对袁世凯称帝，惨遭县官杀害，子长遂联合进步师生控告知县，颇受师友爱敬。一九一九年，子长考入西安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次年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这时，陕北已开始受到“五四”运动后新思潮的影响，子长受革命潮流的鼓舞，以战斗的姿态投身到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

在大革命的年月里

子长在榆林中学上学一年，曾担任校学生会负责人。一九二一年底，为反对帝国主义召开太平洋会议，在校长杜斌丞的支持下，榆中学生罢课三天，在校内外集会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行径。当时，帝国主义在榆林等地利用办教堂作幌

子,推行文化侵略政策,麻醉人民。陕北军阀井岳秀为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在各地开办迷信团体同善社。学生会积极组织进步学生开展非基督教运动和反对同善社的宣传活动。经过斗争,部分学生退教。学生会还组织学生宣传妇女放足,不扎耳眼,不带耳环。为改善同学的伙食,子长亲自下厨办伙,受到大家的好评。

一九二二年春,子长在中学未及毕业,就回家乡创办小学。但在那时,办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费无着,困难极大,特别是由于军阀豪绅鱼肉乡里,穷人家没有几个孩子能上得起学。严酷的现实使子长心灰意冷,认识到仅靠办学是救不了劳苦大众的,他心中十分苦闷,常思救国之道,决心投笔从戎。同年秋,子长只身赴山西,考入阎锡山办的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但这种学兵团不过是旧军阀的讲武学堂,不仅不能满足革命者的要求,而且对他无异是一种精神上的束缚。一九二四年,子长毅然离开学兵团,回到安定,办县民团,任团总。随后,又奔赴京津,探求革命真理。其时正值“五卅”运动爆发,全国范围掀起了蓬勃的反帝斗争高潮。在革命高涨的京津两地,子长经常接触陕西旅京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白超然、白志诚、白志强、李波涛、白志立等,并通过他们结交了中共北京地区党的负责人之一刘伯庄。在他们的影响下,子长认真阅读马列主义书刊,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同年,经白超然、白志诚介绍和北京地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底,经中共北方区委介绍,子长回到陕北与中共绥德特别支部(次年春改为地委)负责人李子洲、王懋廷取得联系。根据党的指示,回到安定,继续办县民团,仍任团总。此时,子长的友人李象九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陕

后利用同井岳秀部下石谦的同乡关系，当上了安定县巡官。谢、李二人便利用公开的身份，在安定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石谦先后升任营长和团长。为了利用这个关系发展革命势力，子长受命首先帮助李象九招收一批进步学生和贫苦农民，在石谦营里建立了学兵连，李任连长。不久，子长把自己领导的县民团也编入石谦部四团三营十二连，自任连长。还通过中共绥德地委负责人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荫、蔡楠轩，调来一批党员任班、排长和负责教育训练工作。李、谢连里每天除两个小时军事训练外，其余时间主要用来学习政治和文化。子长经常对士兵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教育，讲解马列主义常识，教士兵唱他编的歌，其中有“孙文在广东，列宁一声唤，双手迎接世界共产党”等语。他和李象九还多次邀请李子洲、杨明轩等共产党人到部队讲演，宣传革命道理。子长对士兵十分关怀，不惜变卖自己的家产改善士兵生活，深得士兵爱戴。随着革命思想在部队中的传播，子长、象九等在石谦团中秘密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由李瑞阳担任书记，李象九、谢子长、史唯然等任支部委员，发展了阎红彦、雷恩均等一批新党员。连队还组织了士兵自治会，举办俱乐部，学唱《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歌曲，演新戏，搞球赛，气氛十分活跃。同时，在官兵中提倡艰苦朴素，自己缝衣做鞋，禁抽鸦片和喝酒，使连队里很快建立起新的革命生活。

一九二六年夏秋，在北伐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影响和推动下，在中共北方区委的正确领导下，陕北的革命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此时，石谦升任十一旅旅长。中共绥德地委很重视这支受党影响的部队，先后派李瑞阳、杜衡、冯景异、阎

揆要等到石谦旅同子长、象九一起工作，开办青年军事训练班。一九二七年春，石谦旅中的党组织由特别支部改为直接受中共陕甘区委领导的军支，杜衡任书记，子长、象九等均为委员，几个营、连都建立了支部，一百多名官兵入了党。由于国共合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在中共军支和子长等同志的努力下，促使石谦接受全旅官兵在宜川集义镇附近进行政治军事大集训的建议。子长等借此机会把许多进步书刊散发给官兵，并直接向石谦宣传革命道理，使石谦及大部分官兵倾向革命。

一九二七年一月，子长率部由宜川返安定驻防，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联合当地学生和进步士绅，组织讲演团和劝导妇女放脚的天足会等团体，向群众宣传识字、禁烟、剪发、放足，破除迷信。子长善于作统战工作，他向安定县知事张鸣盛建议“整理地方，召集全县民众共图改革计划”，以便作出“兴利除弊”^①的决议。张知事欣然接受，于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召开了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子长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在讲话中指出：“安定从前开会既无程序又无结果，此次大会应从新组织，并将议决案件须确实施行。”^②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组织大纲〉及其“细则”和〈农民协会章程〉等三个文件，还作出了关于天足会、农民协会、保卫团及捐税等八个方面的决议案。〈大纲〉和决议案以“改进地方一切行政事宜，解除民众痛苦为宗旨”^③，对改革教育、革新社会、兴利除弊的办法作了明确规

①②③见〈谢制农民运动协会章程〉（一九二七年三月），原件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定。《农民协会章程》根据外地农运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农协的性质、任务、组织机构和权利，明确指出“本会以团结农民，互相维持、改善自己的生活为宗旨。”^①以上几个文献当时统称为《谢制农民运动协会章程》，它体现了子长兴利除弊的革新务实精神。在这次会上子长当选为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农民协会促成会委员。

会议结束的当天，为贯彻执行会议精神，子长和十连连长李瑞成联名发布了《敬告安定父老昆弟》的布告，散发《敬告父老兄弟们》的传单。布告强调“我们既是民众的军队，自然以拥护民众利益为前提”，“不但要将这次议案尽力帮助实行，而且对于你们将来兴革事宜，还要当努力。”最后号召“大家更要不分界限切实的联合起来，共同奋斗，完成国民革命。”^②传单指出：军队“务必实是（事）求事（是）拿上最诚恳的心志，助我同胞起来自决痛苦，从此以后你们再不要受军队的无故欺负了，凡是路过的士兵，不能任意拉差；就是办公的军人，都已与他们发给旅费，不论吃了你们的饭，买了你们的货物，及其用了你们的草料等事，他们必要按实价给发，不准赊欠登帐，亏损可怜的老百姓。所以除出布告外，恐民众不能周知，又出此传单，以后若有不肖兵士违令损民等事，望即速送来或报告我们，必严厉惩办，决不宽容。”^③子长说到做到，身体力行，他带头不住民房，和士兵一起住在城隍庙大

①②③见《谢制农民运动协会章程》（一九二七年三月），原件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殿里。子长领导制定和通过的几个重要文件，对唤起民众和推动农民革命运动起了很大作用。为了贯彻执行这些决议，子长协助上级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安定县特别支部（冯景异任书记，康忠治、郭朗亭分任组织、宣传委员），加强对全县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还建立县级和十四个区的农民协会及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二月二十九日，子长又主持召开了安定县市民大会，通过了《各团体宣言》，号召各团体紧密团结，并提出了“铲除压迫我们的各种坏东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官僚”、“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改善我们民众的生活”^①等口号。

子长特别重视农民运动。为培养骨干，他协助党组织开办了安定县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给学员上课，在学员中发展党员，还抽出时间到农村调查研究，宣讲《农民协会章程》，揭露军阀和贪官污吏的罪行。子长亲自领导县农民协会开展对土豪劣绅和高利贷者的斗争，拘禁和审判了大土豪宋运昌、李耀辉、王伯阳，赶走了全县两个最大的高利贷者王玉书和馬子厚，当众烧毁文约、帐簿，宣布欠债作废，撤换了混进农协中的地主豪绅。由于党组织和子长的积极领导，安定县农民运动空前高涨，压迫农民的贪官污吏、恶霸兵丁和高利贷者以及公款杂税的浮摊滥收一时销声匿迹。贫苦农民扬眉吐气，社会秩序空前安定，群众对子长的领导非常敬佩，亲切地称颂他为“谢青天”。

^①见《谢制农民运动协会章程》（一九二七年三月），原件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清涧、渭华举义旗

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北方，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等惨遭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绞杀。子长得悉，义愤填膺，五月三十日和六月一日，亲自和冯景异等共产党员领导安定县农民协会召开代表大会，追悼李大钊，声讨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血腥镇压革命的罪行，决定武装农民，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八月间，白色恐怖笼罩陕西各地，国民党反动派大搞反共反人民的“清党”运动，党组织大部分遭到破坏，农会、工会和学生会等革命团体被解散，陕北党组织活动的据点——省立延安第四中学和省立绥德第四师范被井岳秀下令封闭，中共延安、绥德地委负责人被驱逐出境。霎时，黑云压顶，大批革命同志被捕入狱，人民重陷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陕西省委派魏野畴、唐澍、白乐亭等秘密来到清涧巡视工作，野畴讲了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指示子长、象九等继续留在石谦部队中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作好武装反抗陕北军阀的准备。为了加强军队中党的力量，决定留唐澍、白乐亭同子长、象九一起开展工作。

八月下旬，同情革命的十一旅旅长石谦在榆林被井岳秀派刺客暗杀，反动营长康子祥被任命为代理旅长。接着井岳秀部师长高双成令李象九营开赴延安，准备将其改编为“骑兵团”；同时令谢子长连从安定县开往宜川接防，阴谋分而歼之，借机消灭这两支所谓“赤化”了的部队。子长、象九、唐澍、乐亭等立即召开党的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会将会议的情况汇报省委。省委指示：敌人妄图借整编、换防之名，消灭我

李、谢部队，我李、谢部队不能坐等敌人消灭，应立即举行起义。不久，省委为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而召开的“九二六”会议文件传到部队。其中《军事运动决议案》指出：“本党的军事行动已经是迫不容缓了，……我们的军事根据地，除去东南以西北为重要，所以在西北上培植革命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①。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成立了陕北军事委员会，唐澍任书记兼中共军支书记，子长、象九、乐亭等任委员，统一领导和指挥起义。军委成立后，在清涧县城召开了党员大会和排长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唐澍、子长等传达了省委关于起义的指示，对起义作了具体部署，决定驻清涧的四个连首先起义，然后会合延川县的一个连南下宜川，与宜川其他三个连会师。同时派代表联合驻守神木之高子清旅，与高约定在神木起义，共同夺取绥德、米脂，夹攻榆林，消灭井岳秀的反革命武装。会后党员和广大战士非常兴奋，有的彻夜不眠，擦枪拭弹，严阵以待。十月十四日晚^②，在一片“为石谦旅长报仇”的口号声中，起义枪声在清涧县城打响。在城内到处贴标语、散传单、逮捕恶霸豪绅，扩大政治影响。还缴获了井岳秀部下高双成私贩鸦片数万两和驮骡四十余匹，同时向大商人筹集现洋二十余万元，使经费问题得到完满的解决。按计划起义部队于次晨撤离清涧南下，子长率领十二连打先锋，途经延长县城时，里应外合，一举歼灭了驻军两个连并一个营部，子长

①见《陕西省委通讯》一九二七年第一期，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②清涧起义的时间说法不一，还有说是十月十日或十月十二日，因均系回忆，有待进一步查考。

亲自处决了敌营长祁梅卿。驻宜川敌人闻讯后，即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向该县准备参加起义的三个连发起攻击。这三个连在党的领导下，当即迎战，激战一昼夜。二十日，我清涧、延川起义的部队赶到宜川城下，敌代旅长康子祥率部逃跑。三支起义部队在宜川胜利会师。附近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纷纷前来参军，至此，起义部队发展到一千七百多人，三千多支枪，形成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武装力量。

对于起义部队的纪律教育，子长也十分重视。在清涧起义爆发的当天晚上，李象九营的一个卫兵乘机抢了老百姓的财物，子长发现后，立即找李象九研究处置办法，他说：我们做革命事，是替人民谋利益、解除剥削压迫的大事，并不是为当土匪来抢人做坏事！我们是共产党员，应该是共产党的队伍，这样抢人、刁人，对得起党吗？说得李象九心悦诚服，下了这个卫兵的枪，卫兵不告而逃，子长即派兵尾追，将其处决，借此教育起义部队严守纪律，以儆效尤。他在向官兵讲话时说：我们时刻不要忘了老百姓，不论走到那里，都要爱护他们，要给他们办好事。谁要是乱抢老百姓的东西，就要受到严重的处罚。从此，起义部队官兵中违犯群众纪律的行为大为减少。

宜川会师后，对起义胜利后的行动方针在领导人中发生了争论。唐澍、子长等虽然还不懂得与农民相结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理，但却主张立即打起革命军的红旗，整顿干部队伍，纯洁部队，提拔政治可靠、立场坚定的人任连、排干部，主动进攻延安，相机消灭敌人，扩大革命力量。而李象九则持不同意见，提出仍沿用旅的旧番号，必要时可接受军阀收编，并反对整顿干部队伍。由于意见分歧，部队滞留宜川，唐澍去省委汇报。唐走后，李象九打出十一旅的旗号，自任旅

长，委任唐澍为参谋长，谢子长、王有才、李瑞成为一、二、三营营长。这时，敌二十二军驻延安之第二师师长高双成一面写信麻痹起义部队，一面又调集六个营的兵力，进逼宜川。在敌人未到之前，子长又提出交通不便，敌人难以同时到达，因而应集中力量主动出击，各个击破敌人。但李象九不接受这一正确建议，按兵不动，致使敌人用二十多天时间完成了包围部署。原定在神木起义的高子清旅看无能为力，没有动作。当敌人发起进攻时，防守宜川城外重要阵地凤翅山、二郎山的部队擅自撤退，因而失掉制高点。李象九决定撤出宜川城。由于指挥不当，撤退时又遭敌军堵击，部队损失很大。只有子长带领的一营二、三百人和其他少数官兵由南门突围冲出，退据宜川以西，不久转移到韩城西庄镇。李象九又不顾子长等反对，竟然接受了军阀王保民的收编，改称独立旅。这时，陕西省委派唐澍、阎揆要、白志强等来到韩城，传达了省委指示，总结了清涧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在韩城重组军委，准备发动第二次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以子长营的一百多人为基础，唐澍、子长任总、副指挥，揆要任参谋长。军委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和“劫富济贫”等斗争口号，并决定将部队带到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唐澍、子长、揆要遂于一九二八年元旦率部北上，向清涧、安定一带进发，途中由于轻信了宜川城内只有敌人一个连的传闻，贸然决定攻打宜川。部队连夜行军八十华里，拂晓袭入宜川城。实际上敌人有一个营的兵力，激战半天，我伤亡重大，即向西北撤退，行至延长交口时，又遭敌人袭击，加之沿途给养困难，连续行军，士兵非常疲乏，一部分逃跑失散。一月底到甘肃合水县的豹子川时，只剩下几十个

人。清涧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一九二八年二月，子长、唐澍回到省委汇报了清涧起义失败的经过和经验教训。旋奉省委命去洛南三要司许权中旅工作，唐澍担任旅参谋长，子长任营特派员兼副营长。根据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许旅积极准备在渭华地区举行武装起义。

一九二八年五月，渭华起义爆发。子长任新成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第三大队队长。六月三日，子长率第三大队到赤水镇和当地农民一起，处决了散布谣言、破坏革命的商会会长赵登科和商号经理赵绍普及反动政府的两个敲诈勒索的收税委员，没收了“三兴合”、“祝寿昌”等大商号的财产，将大部分分给贫苦农民，其余作为革命经费之用。六月初的一个夜晚，我陕东赤卫队同敌渭南县保安团在该县的塔山脚下发生激战，子长闻讯，率部急往增援，两面夹攻，猛冲猛打，把伪民团打得落花流水，仓皇溃逃。六月十日左右，敌骑兵师进攻高塘镇，在此之前，革命军第二大队被派往赤水公路一带进行游击活动，子长率领的第三大队受命袭击华县城。由于革命军对敌情侦察不够，防范疏忽，致使东面敌军一直冲到司令部东北三里多远的骆驼渠时，才被哨兵发觉。在此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总指挥唐澍先后派赤卫队队长张汉泉和总部参谋长王泰吉指挥部队英勇还击。但因寡不敌众，仍未能击退敌人的进攻。此时适值子长和高克林（时任总部参谋主任）执行袭击华县城的任务后率领部队归来，路经瓜坡时，发现敌我正在激战，便立即投入战斗，从东西两面形成对敌夹攻之势，敌误以为中了我军埋伏，惊慌失措地丢下许多箱迫击炮弹，逃回华县城。六月十九日，敌人又分兵三路发动大规模围剿。由于敌

人兵力过大，军委决定同敌人死拼硬打，撤进秦岭山区，以保存革命力量。尔后，宋哲元又指挥一师敌军，从赤水东西川向高塘进攻，使用重炮轰击革命军的前沿阵地。子长奉命率部防守，奋勇阻击，激战竟日，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但由于兵力悬殊，子长在袭占高塘和魏家原后，又被迫转移到洛南县境内的两岔河山区。渭华起义失败后，七月初，根据省委指示，子长、志丹离开部队，回省委接受新的任务。

艰苦的兵运工作

一九二八年八月，子长、志丹回到西安，向省委汇报了渭华起义的经过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这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全国重赏通缉志丹、子长等，由于形势险恶，在西安难以开展活动，随后省委派子长和志丹回陕北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志丹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子长任军委委员。

一九二九年初，中共陕北特委在米脂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传达了党的“六大”决议，并作出在陕北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会后，子长受命到宜川凤翅山作争取改造梁占魁土匪部队的工作。是年春，子长利用原来与李象九等人的关系，建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一战线。为了大力争取陕北的地方实力，开展革命斗争，子长和陕北特委先后派党员赵洪枝、赵文蔚、马云泽、阎红彦、李维均等去杨庚武部（时驻守宜川延长交界的后九殿山寨）建立了党组织，准备在陕北创建农村根据地。但后来这支一千多人的部队由于受敌旅长高双成的欺骗，除一个营仍在我党领导下外，余均被高部收编，杨庚武和一大批干部被杀害。

一九三〇年一月，根据陕北特委的兵运工作计划，为利用宁夏驻军苏雨生扩充势力之机发展革命，子长又受命西去宁夏打入苏雨生部队中活动。在苏部，子长曾取得旅长职务。在子长、志丹的指导下，成立了党的军委（张东皎任书记），举办了学兵队，大力做争取群众、训练干部的工作。不久，子长、志丹离宁夏回陕北，打入地方军阀谭世霖部队，分任团长和营长，利用公开的职务收集了各地为逃避反革命追捕的党团员和革命同志，争取民团、哥老会部队，在敌人力量薄弱的陕甘宁边界地区活动。是年夏，子长、志丹率部驻防庆阳、吴旗交界的三道川训练部队。准备起义时，由于遭到军阀张廷芝部的袭击而失败。

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子长、志丹到绥德参加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第五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研究了如何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决定继续开展兵运工作，条件成熟时实行兵变，建立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子长、志丹被任命为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正、副总指挥。

一九三一年春，根据省委指示，子长继续去甘肃平凉一带从事兵运工作。

同年秋，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①由于遭到敌人围攻，处境非常困难。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该部于九月八日西

^①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系一九三一年夏，在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下，于汾阳和中阳交界的一个村庄正式成立。骨干是高桂滋部地下党员和太原兵工厂的地下党员。先后由拓克宽、阎红彦任大队长，黄子文、杨仲远任政委，胡廷俊、白锡林、吴岱峰任副大队长和副政委。

渡黄河。过河后在安定县枣树坪，先后通过地下党员、子长的哥哥谢德惠及共青团陕北特委负责人兼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找到了陕北特委。在陕北特委的帮助下，游击队迅速发展 to 百余人。接着又于九月下旬先后联合了杨琪、师祝杰等陕北几股保运武装。十月二十日，游击队在杨仲远、阎红彦等率领下，到甘肃合水县灵锦庙同刘志丹领导的部队会合，随后到南梁地区进行休整。志丹、仲远、红彦派马云泽去平凉同负责兵运工作的子长取得联系，商讨会合后的行动计划。子长得知，便去西安向省委报告。省委指示立即组织陕甘游击队，并派子长到南梁地区传达。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陕西省委根据志丹、仲远等领导的两支部队的具体情况，以及西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决定将这两支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子长任总指挥，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对外通电表示坚决抗日。在内部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和有关游击战争的文件，开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通过学习，使许多同志提高了思想认识，明确了红军的政治任务，开始纠正了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不良倾向，为建立和扩大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转 战 陕 甘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反帝同盟军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在甘肃正宁县三家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子长任总指挥，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后叛变）兼任政委，杨仲

远任参谋长，马云泽任经济处主任，下辖一、二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队和一个警卫队，共三百六十余人。同时，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各大队成立党支部。从此，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为后来陕甘红军的创立奠定了基础。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积极开展练兵运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宣传队和“列宁室”，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还决定以陕西的淳化、耀县、旬邑、宜君和甘肃的正宁、宁县为区域，开展对敌斗争。

二月十三日，子长指挥游击队消灭了旬邑职田镇民团，捣毁了敌区公所，逮捕了罪大恶极的豪绅，在该镇召开了群众大会，烧了区公所的帐簿和地主豪绅的契约，组织了农民协会，领导群众进行分粮抗捐斗争。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使统治阶级恐慌不安，陕西军阀命令警卫团三营和彬县、旬邑、长武三县的民团约千余人向职田镇扑来，妄图消灭红军。子长得悉敌人的进攻计划后，当即指挥游击队撤至职田镇以东二十华里之阳坡头，占领有利地形待机歼敌。二月十五日，敌于职田镇扑空后，次日晨继续向阳坡头前进。当敌先头部队进入阳坡头村边时，子长指挥两个步兵大队出击，猛打猛冲，将其击退，敌复以猛烈火力向我射击，形成对峙。这时，子长当机立断，令阎红彦带两个冲锋枪班，向敌迂回侧击，攻入敌阵，敌人顿时混乱，该敌三营七连连长、我地下党员李明轩乘机掉转马头，大喊：“红军来了，快跑！”士兵争相后逃。子长指挥游击队趁势全线反击，敌溃不成军，四处逃窜，我军跟踪追杀，将敌警卫团三营和民团一部歼灭，毙敌一百六十余名，俘敌四百余名，缴枪四百余支。战后，子长亲自向俘虏进行宣传，对愿意参加红军的数十人，开了欢迎会，其余发了路费，开会欢送，

遣散回家，对伤俘进行救护，将敌尸体运往彬县埋葬，揭穿了敌人“红军杀害俘虏”的欺骗宣传，从此游击队的政治影响更大了。二月十九日晚，游击队南下清水原、土桥原，发动群众打土豪。这时，敌警卫团、特务团由淳化进至旬邑，准备再次“进剿”。子长率部避开敌人，转移至耀县照金。二十日元霄节夜，趁敌不备，全歼该镇民团，缴枪三十余支。二十一日，子长在香山主持召开了游击队队委会议，总结了作战和发动群众的工作经验，决定向敌人兵力薄弱的铜川、宜君地区行动。二十四日，游击队进入宜君地区，五天之内，先后消灭了瑶曲镇民团及驻焦家坪敌十六师一个连，击溃一个营及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的两次进攻，歼敌二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之后，又西跨桥山，进入黄陵上畛子地区，决定乘敌陕军十七师与甘军暂编十三师于陇东混战之机，出击陇东，袭击山河镇，开辟新的根据地。

山河镇是敌正宁县府所在地，城内驻暂编十三师百余人。三月十九日夜，游击队从上畛子一带出发袭击山河，因走错路，耽误了时间，以致只得白天攻坚，战斗失利，伤亡较大。二十二日，子长率部进入山河以南四村原、湫头原，在这里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委员会，成立赤卫军、贫农团、少先队和妇女会等群众组织。

四月十三日，游击队在当地赤卫军和农民千余人的配合下，再袭山河镇。驻西峰镇之敌一个营前来增援。子长指挥游击队集中力量打敌援兵，歼敌二百余，战后撤回四村原。这时，旬邑县地下党组织向游击队报告，旬邑城内只有敌警卫团两个连及民团一部驻防，警戒疏忽，防守不严。子长决定奔袭旬邑。四月二十日，游击队从四村原出发，星夜兼程，次日拂晓

进抵城郊，立即发起攻击，除残敌数十人窜入魁星楼顽抗外，其余均被歼灭。

战后，推行王明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游击队巡视工作，他对游击队成立以来的主要成绩不作全面评价，更没有对省委要求游击队攻打城镇和平原地区的错误指导方针作任何检查，反而把由于作战经验不足，两次攻打山河失利的责任全部推到指挥员身上，采取了“左”的惩办政策，错误地批判斗争谢子长，诬蔑子长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撤了子长总指挥的职务，强令子长离开游击队，去甘军警备三旅王子元部搞兵运工作。子长顾全大局，以革命利益为重，去王部后积极策划起义。五月五日，组织了靖远起义，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部队到水泉休整，由于未发动群众，加之思想上麻痹轻敌，遭敌突然袭击，张东蛟不幸牺牲，起义归于失败。七月一日，子长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派共产党员苏杰儒等到甘肃合水县西华池向新编警备十一旅一团一连连长、地下党员高鹏飞传达了相机起义的指示。高连建有党支部，可以掌握全连的行动。恰于此时，敌旅部命令该营开赴庆阳。党支部决定利用换防的机会举行起义，并派人与陕甘游击队联系。七月七日，得到陕甘游击队的回信，有把握即举行起义，红军在宁县盘客原策应。七月八日，高鹏飞等率部利用出操的机会，缴了第二连的武装，消灭了敌人一个营部，取得起义成功，随即和陕甘游击队胜利会合。此后，游击队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骑兵队，队员增至五百人。但由于七月下旬省委派代表到游击队推行左倾错误，对游击队领导人阎红彦、刘志丹、杨仲远、吴岱峰等进行无情打击，使部队又一次遭到极大的损失。

在困难的日子里

由于杜衡等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致使陕甘游击队屡遭挫折。陕西省委鉴于情况严重，为了扭转困难局面，八月三十日，又派子长回游击队担任总指挥。子长到任后，当即率部南下耀县地区，和广大指战员一起，精心组织战斗，使游击队转危为安。照金战斗的胜利，就是一例。

当时，敌人开始了新的“进剿”。以陇东警备九十七、九十八团从山河、早胜等地自北向南进发；八十六师五一团以铜川为中心，由东向西进攻；陕西警卫团与何升全支队在彬县、旬邑等地“搜剿”；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以照金地区为中心堵击，企图四面围攻游击队。九月十一日，游击队进至照金以南之杨柳坪，从捕捉的敌探口中获悉情况非常严重，子长经与志丹、仲远、红彦等商议，当即决定避敌主力，打其弱点，游击队向西后退二十华里，采取迷惑敌人，而后以奇袭手段消灭该敌。当日敌进至照金扑空，误以为游击队已经逃跑，异常骄傲。子长等指挥游击队当夜回戈直奔照金。十二日拂晓，在照金以北坟滩、柿坪等地，当敌还在酣睡之中即被我四面包围，在大雾中激战不到两小时，歼敌四百余人，缴枪三百余支，击毙敌富、铜、耀三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团总蔡子发。照金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与群众的斗志。

一九三二年九月下旬，子长率部攻打保安失利，又重新部署进攻，但敌军大量增援保安，我军未及防备，再战失利。十月上旬，游击队转移到墩儿梁、八卦寺一带又遭敌人的追击，战斗三度失利。为摆脱敌人的进攻，游击队被迫撤至南梁附近

人烟稀少的合水白沙川一带，住在破窑洞里，没有粮吃，没有衣穿，部队情绪低落，但子长照样乐观坚定。针对当时困难的局面，子长、志丹召开队委会，决定游击队分散活动，筹集粮款，解决冬衣问题，寻机消灭小股敌人，恢复部队的战斗力。会后，游击队分为三路：一路由刘志丹带领一个大队七十多人到甘肃合水塔尔原一带活动；一路由杨森、黄子文带领六十多人到三原武字区活动；一路由阎红彦、杨仲远、杨琪带领骑兵队到耀县照金一带活动，并与省委取得联系。子长带领吴岱峰等三十余人，留住陕甘交界的白沙川、瓦子川一带，照看伤病员，一面与陕北特委联系，一面指挥游击队活动。在艰苦的战斗岁月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游击队经受挫折与失败是难免的。子长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次不成再来一次，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老子不行交给儿子，儿子不行交给孙子，有志者事竟成。”^①当时天气已渐寒冷，伤病员既无医药，又无粮食，全靠野果、野菜充饥，处境极为艰苦。子长知道老百姓生活十分困难，尽量不打扰群众。游击队买的粮食运不回来，他和留守人员一起去背。游击队筹得少量衣物，子长总是先发给伤病员，自己则在篝火旁铺一条毛口袋过夜，平时放哨、查哨、碾米、煮饭、抬伤病员、给伤病员洗伤换药，子长总是带头去干。他这种吃苦耐劳、以身作则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大家，游击队上下团结一致，士气高昂，战胜了重重困难。经过一两个月的艰苦奋斗，各路游击队在不断取得胜利，不但恢复了部队的元气，而且得到巩固和发展。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上旬，各路游击队在合水会合后，接到

^①杨林：《纪念谢子长同志》，载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

省委的指示：根据党中央北方会议的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令游击队开往宜君转角杨家店整编。十二月中旬，杜衡以中央和省委代表身份来到游击队。当时陕西省委极其错误地认定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等同志“有反革命阴谋”，要杜衡将他们搞掉。杜衡到部队后极力进行宗派活动，打击原来的领导干部。十二月二十二日，杜衡在宜君杨家店子召开党团员大会，宣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诬蔑子长、志丹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的错误，“游击队领导人反革命阴谋”，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蛮横地撤销了子长、志丹、仲远、红彦等同志的领导职务，并擅自决定给子长、红彦以留党察看处分（后经中共上海中央局查明事实真相，撤销了这个错误决定），强令子长、红彦离开部队，送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志丹、仲远虽被留在部队，但不分配重要工作。十二月二十四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该军仅有这一个团）杜衡兼军、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志丹、仲远虽被留在部队，但却降职使用。子长和一批老同志被迫离开陕甘。

在杜衡推行的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主力红二团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下旬南下渭华地区，六月上旬在蓝田张家坪遭强敌袭击而失败。同年五月底，被杜衡派到陕北任第一支队政委的杨仲远在安定县谭家峪遭敌袭击牺牲，一支队受到很大损失。杜衡在一九三三年夏天离部队回到西安被捕叛变，成为可耻的叛徒。志丹等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突出重围，返回照金。

一九三三年夏，子长、红彦在上海中央局“受训”期满，

被派往北方工作。到天津后，又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往张家口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师长许权中）工作。抗日同盟军是在我党影响和组织下，由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中共党员）等爱国将领领导的一支倾向革命的部队，子长在十八师负责党的工作，同时协助权中指挥作战。抗日同盟军先后在张北县和沽源县等地与日伪军激战，收复了康保、沽源、宝昌、多伦、独石口等地，把日、伪军驱逐出察哈尔省境。同盟军的行动，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全国人民掀起了大力援助同盟军的热潮，但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的围攻。在敌人的围攻下，同盟军将士大量伤亡。权中和子长所在的十八师，驻在阵地前沿，在权中、子长的指挥下，进行英勇的反击，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仍沉着地指挥冲杀，但敌人兵力过于强大，权中、子长且战且走，历尽艰险，才退到河北顺义县。十月中旬，在数倍于我的敌人疯狂进攻下，十八师终因弹尽粮绝被打散。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子长回到北平。

恢复和发展陕北根据地的斗争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子长等回陕领导游击战争，子长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当时陕北根据地正值困难时期，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谭家峪、枣树坪、延川战斗中伤亡较大，支队领导人未请示上级就决定压枪散伙，转入地下。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子长由北平经太原渡黄河，回到安定。敌人听到子长回到安定的消息，寝食不安，立即对安定一带实行戒严，行人都要严加搜查，子长不能回村里居住，就和同志们一起住在山洞里。时值隆冬，天寒

地冻，大家仍然穿着单薄的衣服，没有吃的，还要躲避敌人的搜捕，经常转移。子长和同志们的手、脚都冻破了，鲜血直滴。但他仍然充满革命乐观情绪，经常给大家讲革命道理，总结多次失败的教训，指出一支队压枪散伙的错误，鼓励同志们坚持斗争，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在这期间，子长给红二十六军和志丹写了一封亲笔信，派南贵臣去联系。志丹接信后，当即回信并送来银元二百元，解决了经费困难。为鼓舞群众士气，子长派刘明山等处决了当地民众所痛恨的伪保长韩九成。经过一段工作，于三月八日在刘家屹崂，由子长主持会议，宣布第一支队正式恢复，任命李盛堂、谢绍安为正、副支队长，刘志清（后叛变）为政委。一支队恢复后，在子长的指导下，打土豪，筹经费，采取夜战奔袭等方式，打了几次胜仗，鼓舞了士气，壮大了斗争声势。六月，陕北特委派贺晋年同志任一支队政委。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至六月底，部队扩充到七十多人、枪。子长还协助地方党组织成立了赤卫军、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据地，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在陕北特委和子长的领导下，除已建立的二、三支队外，又先后成立了陕北游击队第四、五支队和安定县第八、十三支队、佳县第六支队。

一九三四年四月上旬，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党团特委扩大会议，再次决定普遍组织革命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队总指挥部，扩充一师红军，成立陕西省工农民主政府，使各个游击区联成一片。七月八日，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下辖一、二、五支队。七月十七日，子长经过周密的侦察和部署，在城内地下党员的

策应下，指挥各支队和赤卫队六百余人奇袭安定，占领了伪县府，歼敌数十人，缴获一批弹药物资，还打开监狱，救出被捕的党员和群众几十人。奇袭安定后，为了粉碎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攻，调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一部北上，子长、洪涛率各支队和二百余名赤卫军南下陕甘边，七月二十三日在南梁地区之阎家洼子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杨森、政委高岗、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兼师参谋长）会合。二十八日，在阎家洼子召开连长以上干部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各支队干部联席会议。会议检查总结了四十二师的工作，着重分析研究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革命形势。为使两支红军更好地协同作战，扩大苏区，决定红四十二师步兵第三团（团长王世泰，参谋长杨琪）去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和群众粉碎井岳秀部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这次会议决定由子长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子长和志丹领导的两支红军的会合，给陕北和陕甘边人民带来了胜利的希望。

子长回到陕北短短的几个月，局面大为改观。他带领部队转战安定、清涧一带时，沿途的群众都争相欢迎，主动帮助红军站岗、放哨、煮饭，有的还杀猪宰羊，慰劳亲人。子长每到一地，他住的地方都被群众挤得满满的，一有空，他就和老乡谈心，拉家常，有时直到深夜，深受乡亲们们的爱戴。

裹革沙场 虽死犹生

一九三四年夏，正当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国民党西北军阀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七月，陕北军阀井岳秀乘陕北游

击队南下陕甘边之际，派遣一个师配合地方民团向以安定、绥德、清涧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敌人采取扎据点、筑碉堡、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在他们所到的地区实行残酷的烧杀抢掠，并强化保甲制度，强迫群众并村，妄图断绝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正当陕北根据地军民与敌作殊死斗争之际，在陕甘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帮助下，八月十五日，子长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一、二、五支队由南梁到达安定地区。十七日起，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子长指挥主力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在景吴家塌及绥德张家圪台连获胜利。

红军屡战屡胜，大大鼓舞了群众的士气。张家圪台战斗后，当地群众纷纷要求红军攻打河口。河口位于清涧县黄河岸边，地势险要，敌人的碉堡、工事林立，敌二十二军的一个连一百多人又在这里驻扎，易守难攻。八月下旬，子长等商量决定攻打河口，拔掉敌人的这颗钉子。八月二十六日深夜战斗打响，由于敌人凭借有利地形死守，红军连攻数次未克，直至天明，仍未攻下。这时，子长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重新组织力量，配备了火力强攻，予敌以重大杀伤，迫使敌人逃往清涧县城，保卫了清涧以东的革命根据地。就在这次战斗中，子长不幸胸部中弹，鲜血渗透了他穿着的紫褐色夹袄，他用衣襟掩住伤口，继续指挥战斗，直到胜利。为了稳定部队和群众的斗争情绪，子长传出命令：对他负伤的事要保密，不许声张。战后，子长又带伤率领红军北上，攻打安定县董家寺，击溃敌人一个营的进攻。至此，红军四战四捷，军威大振，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当时敌人报纸曾这样记载：“近日陕北驻防军多被匪缴械俘虏，驻军虽全力剿除，惟

因匪出没无常，时而千百成群，时而三五分散，难以奏效。”^① 九月十五日，子长仍带伤指挥新编一、八支队、保卫队与驻守安定县民团内的地下党员白应奎等里应外合，攻入县城，击毙团总李丕成，将伪民团几十人、枪全部拉出。九月十八日部队转至安定崔要沟，根据陕北特委神堂沟会议精神，以陕北游击队一支队为基础与八支队共二百余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子长亲自授了军旗。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由于陕北特委和子长的正确领导及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大力支援，陕北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红色政权相继建立。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陕西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在安定县白庙岔村召开，决定成立陕西省工农民主政府，选举马明方、霍维德、崔田民为正、副主席。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应陕北特委和子长的邀请，志丹率红二团和陕甘边五、六支队亲赴安定。翌年一月中下旬，志丹多次到灯盏湾、水晶沟等地探望养伤的老战友谢子长。两人就当时的形势、党的政治策略、军事战略战术、两地区和两军统一领导、军委主席人选等问题交谈很久，意见十分融洽。只是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上推让未决。志丹让子长担任军委主席，子长对志丹说：“我以西北军事特派员的的名义，指定你为主席。”志丹说：“那就交给联席会议作决定吧！”志丹临走时，摸着子长盖的薄被子，关切地说：“你的被子太坏了，应当给你换块好的。”子长笑了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坏点没关系。”志丹走后，子长对身边的同志说：“老刘来了就好了。”^②

^①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榆林《上郡日报》。

^②叶滨，《子长负伤以后》，载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解放日报》。

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联席会议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根据子长和志丹的建议，讨论统一两地区党政领导和反击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两个特委的工作，谢子长等为委员。并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推选子长、志丹为主要负责人^①。子长因养伤未到职，实际工作由志丹负责。

子长在战斗中总是亲临前线，身先士卒，不怕牺牲，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河口战斗中，子长身负重伤后，虽经同志们再三劝说，仍坚持不离开战斗岗位。起初，他骑在马上指挥战斗，后来，马骑不成了，就坐在担架上继续工作。八月二十八日，子长还出席了中共陕北特委在市場里召开的扩大会议，通过了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和粉碎敌人新的“围剿”等决议。直到十月间，子长的身体实在难以支持，才到离家不远的杨道砦村去休养。敌人时刻侦探子长的行迹，图谋杀害。为了避开敌人追踪，红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把他从杨道砦转移到周家硷，再转移到磁圪湾、水晶沟。后又转移到安塞县韩呼里村。狡猾的敌人又从水晶沟追来。看护他的外甥、保卫队中队长薛兰岗把消息告诉他，子长激愤地说：“抬我走吧，抬不动就一枪打死，你们逃命，绝对不要让他们把我捉去！”^②他住在安定县灯盏湾时，整天看望子长的干部和群众络绎不绝，院子里、村子里、道路上都挤满了人群，警卫人员动员他们走，但是谁也不愿意离开，都想最后见一面“谢青天”。快过

^①刘、谢谁为军委主席以及军委、工委是否同时成立，说法不一，有待查考。

^②叶滨：《子长负伤以后》，载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解放日报》。

春节时，子长病情恶化，但他仍关心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和生
活。一天，薛兰岗去看望他，子长问战士们怎么过年？兰岗
说：“已准备有肉和白面。”子长亲切地嘱咐说：“有这么多
好东西，应该让同志们吃好些。可以做八大碗叫大家吃嘛！”
临终之前子长仍念念不忘红军的建设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当
他感到自己的伤无好转的希望时，他痛苦地流着泪说：“就
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①子
长心里只有人民，只有革命。农民周海旺去看望子长，紧紧地握
着他的手说：“你放心啊，老谢！病会好的。这几天咱们的红旗
到处飘着呢！土豪劣绅到处挨打着呢！”^②子长又满意地笑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子长由于病情恶化，不幸与世
长辞，时年三十九岁。子长逝世后，为防止敌人乘危袭击，中
共西北工委决定：暂不发讣告，不举行丧礼和追悼会，不戴黑
纱；对下级和老百姓绝对保密，行文、布告仍签署谢浩如的职
衔姓名。子长的家属毫无怨言，件件依允。直到五月上旬，安
定县城和延川县永坪镇等地解放后，才逐渐解除保密。

谢子长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西北红军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的最早创始人之一。他一生驰骋疆场，英勇奋斗，胜不矜功，
败不丧志，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西北党
组织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不仅自己献身于革命，
还教育全家成为一个革命的家庭。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
年，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子长的亲属在战场上牺牲和刑场上
就义的就九人。为了纪念子长，一九三五年中共西北工作委
员会决定改子长的家乡安定县为子长县。一九三九年，中共

^{①②}叶滨，《子长负伤以后》，载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将子长的遗骨移葬于子长的家乡枣树坪，并修建了子长烈士墓。毛泽东先后两次亲笔为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①，并亲笔为子长墓写了碑文^②。

一九四六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又为子长在瓦窑堡修建了陵墓。二月十九日，举行了隆重的移葬公祭，凭吊者逾两万人，毛泽东再次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③朱德题词：“子长同志，陕北人民领袖，前仆后继。”^④中共中央西北局送的挽联上写着：“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真、贺

①原件存子长烈士陵园。

②碑文原文为：谢子长，名德元，安定人，一九二五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即以共产主义为解放中国人民之道路，创农民运动讲习班，组织农协，领导人民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人民因有谢青天之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子长起义于清涧，继参加渭南暴动，败不丧志，奔走西北、华北各地。九·一八事变后，于陕甘之间组织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即是第二十六军之前身。一九三三年赴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陕北组织第二十七军，协同刘志丹诸同志创造了陕甘宁边区。一九三四年于河口之役负伤，一九三五年春因伤逝世。党政军民各界感子长之功德，改安定县为子长县以志纪念。于政府及人民为子长立墓之时，书以叙之。

毛 泽 东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三日——引者注）

③程秀山：《子长陵》，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

④题词在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匪军侵占瓦窑堡时所破坏。

⑤《瓦市二万人举行公祭，子长同志灵柩移葬》，见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

龙、刘伯承也题了词^①。谢子长光辉的一生，受到党和人民高度的赞颂。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王世泰：《忆子长》，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2. 《谢子长同志革命事略》，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3. 阎红彦等：《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
4. 叶滨：《永恒地记在人心》，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5.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
6. 董纯才：《陕甘宁边区简史》。
7. 贺晋年、吴岱峰：《陕北人民的领袖》，《解放军报》一九八〇年二月三日。
8. 陕西《国民日报》，一九二七年六月。
9. 史唯然：《谢子长的一个故事》，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10. 《瓦市二万人举行公祭，子长同志灵柩移葬》，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11. 程秀山：《子长陵》，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12. 杨林：《纪念谢子长同志》，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13.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14. 雷恩均：《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①题词在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匪军侵占瓦窑堡时所破坏。

- 主办《社会科学》一九八〇年第二期。
15.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省民政厅合编，《革命烈士谢子长同志事略》，存陕西省档案馆。
 16. 《谢制农民运动协会章程》，一九二七年三月印，原件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17. 《陕西省委通讯》，一九二七年第一期，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8. 毛泽东为子长烈士墓和子长烈士陵园的题词（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六年），原件存子长烈士陵园。
 19. 吴岱峰：《谢子长同志革命事略》，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20. 刘明山：《人民英雄，浩气长存——回忆谢子长同志》，《陕西日报》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八日。
 21. 尤祥斋、谢绍明、薛兰斌、薛兰岗、刘明山、李维汉、马明方、习仲勋、刘澜涛、贾拓夫、马文瑞、阎揆要、汪 锋、贺晋年、吴岱峰、郭洪涛、张达志、高朗亭、高克林、白超然、赵伯平、方仲如、王子宜、马云泽、张秀山、刘景范、李维钧、李锦峰、吴志渊、王超北、杨合亭、齐 心、张光远、周益三、庞志杰、吴化之、同桂荣、李建彤、马佩勋、冯又新、李瑞阳、王蒂南、张 光、王 英、李波涛、刘约三、呼延震西、张文华、陈天秩、刘依仁、崔田民、朱 敏、谢文祥、王 仪等同志的回忆材料和访问记录。

许 权 中

张守宪 董建中 李艳玉

许权中，一八九五年十月八日诞生在陕西省临潼县交口镇辛理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原籍山东省临淄县许家终村，一八八九年山东百日大旱，权中父亲许文会拖着一家老小，背井离乡逃难流落陕西临潼县。六年后，权中在这里诞生。在权中出生的时候，家境更加贫寒。

一九〇四年，权中九岁，进入本县高等小学，一边当工友，一边读书，成绩优异。正当他见识初开的时候，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汉三镇响起了革命的枪声。权中深受辛亥革命影响，带头剪去辫子，投笔从戎，参加了当地同盟会会员曹印候组织的敢死军，杀死知县，光复了临潼县城。不久，敢死军失败，曹印候被杀。辛亥革命在全国也都很快失败了。

一九一二年权中高小毕业，因家贫不能继续升学，便在本县万仙屯小学教书。一九一四年考入不交食宿费的西安单级师范，一九一六年未及毕业即转入三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

一九一八年一月，三原陕军营长张义安为了反对督军陈树藩，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设军政府，自称靖国军，推举曹世英、胡景翼为总副司令。二月，于右任奉孙中山命回陕，靖国

军推于为总司令。靖国军按新式办法练兵。在这种情况下，权中参加了陕西靖国军。先后任班长、中队长，总司令部副官、三等参谋和绘图科长。一九二〇年冬，权中被该军保送到广东韶关云南讲武分校炮科学习。次年冬毕业回陕，任靖国军第三路中尉排长，在淳化县通润镇训练新兵。他同战士一起，每日清早冒严寒跑二十多里路，到沟底河中作破冰沐浴。由于训练军队成绩卓著，很快升任连长。

一九二二年，权中随曹世英、胡景翼入河南。曹、胡所部被吴佩孚（属直系）改编为中央陆军第三师，权中任连长，参加了直军对河南督军赵倜的作战。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间，直奉战争爆发，属于直系的冯玉祥倒戈反直，占领北京各要地，并和胡景翼、孙岳、米振镖联合，囚禁了直系军阀头子曹錕，打败了吴佩孚。吴率残部退到天津，后沿海南下逃往武汉。在这次兵变中，权中作战英勇，得到胡景翼的器重。是年冬，国民军成立，冯、胡、孙分任总副司令兼一、二、三军军长，权中在二军胡景翼部第三独立团任营副。国民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拥护国共合作，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事。一九二五年春，权中任国民二军第二师营长，参加讨伐豫西直系军阀刘镇华部憨玉坤的战斗，憨战败自杀，刘只身逃往山西。是年权中升任团长，经旅长史可轩的介绍，赴北京见到了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李大钊热心地培养教育他，促使他提高了觉悟，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接受了权中的要求。北京之行，使权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六年春，国民二军遭到帝国主义和直奉军阀的联合攻击而失败，后移防河南新乡，权中兼任新乡留守警备司令。一次，权中率四个连兵力与吴佩孚支持建立的土匪武装两个师

作战于获嘉县。当侦察到该匪军在新乡以西一个大寺院里集中时，他立即派王立安带了不到两个连的兵力在天亮前包围了寺院，经迅猛攻击，歼灭了全部匪军，并俘虏了正在叩头念符的两个师长。在返回新乡途中，将匪师长枪决，为当地人民除了两害，深受民众称赞。同年四月，国民二军退至河北磁县，旅长史可轩准备去苏联参观，由陈冠三代理旅长。五月中旬，陈冠三暗中接受了军阀吴佩孚部的改编，被任命为三十九旅旅长。六月，该旅驻防北京附近的涿州、良乡、上苇店、门头沟一带。此时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张宗昌密谋联合进攻国民军，攻打多伦和南口。权中为了恢复国民二军，联合国民一军，粉碎敌人的阴谋，准备率部起义。他先后派共产党员张汉泉、任警斋、马文彦去北京和张家口，向中共北方区委及国民军总部报告情况及起义计划。权中的计划得到北方区委和国民军总部的支持。李大钊指示许部：要策应北伐军进攻汀泗桥，相机而动。国民军代总司令兼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派许骧云部前往接应起义。这些活动被陈冠三发觉，准备镇压。权中当机立断，命令部下立即动手，于七月中旬的一天，抢先击毙了反动旅长陈冠三的几个亲信，陈只身逃跑。部队在门头沟宣布起义。在党的影响下，经过权中的说服和争取，陈旅的另外两个团长贾玉斋、马子和（克哉）也响应了起义，起义部队达二千余人。起义成功后，吴佩孚非常恐惧，除下令通缉许权中和扣押在京的四百多名陕西人外，还派田维勤师进攻许部。权中沉着应战，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指挥部队且战且退，奋勇杀敌，转弱为强。战至妙峰山时，亲率一营兵力激战三昼夜，歼敌千余人，敌军大败而退。为此事，京津报纸以特大字报道，以少御众。“此举使吴佩孚不能及时南下布置督战于汀泗

桥。北伐军战事得以胜利进行。”^①后由于多伦失守，敌人抄了后路，张之江下令撤退，权中才率部随国民军第一军到绥远包头，驻守南海子。部队经过整编，权中先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第二师团长、旅长、代理师长。

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于右任从苏联参观回国，此时正值北伐。在我党的帮助下，冯玉祥响应北伐，于是在绥远的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决定分兵南下陕、甘、宁，攻打军阀刘镇华，解西安之围。当时西安被号称镇嵩军的军阀刘镇华围困了几个月，饿殍满街，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权中任援陕第三路司令，率领部队由包头过黄河，经河套入陕西省神木县大保当，十月初经榆林到延安。在延安党组织召开的双十节庆祝北伐胜利的大会上，权中发表演说，表示要迅速南下与军阀刘镇华决一死战，誓解西安、三原之围，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会后，又率部日夜兼程，战胜缺衣少食的困难，于十月下旬胜利到达泾阳、三原、高陵一带，与正在围攻三原的刘镇华军作战。权中为摧毁敌军阵地，亲自打炮，经过激战，赶走了刘军，解了三原之围。在三原，权中被任命为警备副司令兼渭北清乡司令。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党的领导和国民联军的援助下，西安城解围，刘镇华军被赶出陕西。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于右任、邓宝珊任总副司令，史可轩任政治保卫部长兼警卫师（又称政治保卫队）师长，权中任政治保卫部委员兼警卫师旅长、代师长。党组织非常重视这

^①许权中一九四二年八月为母亲逝世写的《行状》，原件存许权中女儿许建民家中。

支军队，特派中共陕甘区委军委负责人陈家珍任政治处长，还派马明方、武培谟、白诚哉、罗伯福、邓重庆、马子敬等大批共产党员作政治工作。同年二月，为了培养军事干部，党组织派权中协助史可轩，李林创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可轩、李林任正副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高克林任党的总支书记，权中任总队长。军校招收学员五百余人，其中党员一百五十多人，各级干部和政工人员几乎全是共产党员。权中负责军事训练和讲授军事理论，他常引用《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名言教育学员苦练军事本领和注意调查研究。他还亲自带队操练，深受学员的爱戴。该校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干部，建立了一支在我们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在当时有“西北黄埔”之称。

一九二七年六月下旬，冯玉祥开始追随蒋介石反共，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七月下旬，他急令史可轩、许权中率领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和中山军事学校的师生一千多人立即离开西安，开往河南前线，妄图乘机消灭这支革命军队。在此紧急情况下，为了保存这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中共陕西省委曾设想两个方案：第一，部队开出潼关受冯玉祥节制，史可轩下野，部队由许权中统帅。因为权中与冯部将领过去有过一些旧的关系，现在还可以利用，以此为党保存革命实力。第二，抗冯，或者转移陕北山区独立发展。最后决定走北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按照省委的指示，可轩和权中打算表面上执行冯的命令，由西安开拔向河南方向走，但过渭河后即很快穿过蒲城、澄城、韩城等地到陕北的宜川，与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石谦旅李象九营会合，驱逐军阀井岳秀，占据陕北，作为发展革命的根据地。

七月二十四日，可轩、权中率部从西安出发北移，到草滩

乘船至临潼交口镇，然后步行北上至康桥镇。再往北前进至富平，就要通过陕军田生春的防地，可轩早年和田交往甚密。于是，七月二十九日，可轩先去富平县美原镇找田生春要求接济一些粮秣。但由于田已为冯玉祥所收买，当可轩到美原后，即为田所杀害。可轩的不幸遇难，革命同志无不万分悲痛，大家立誓为可轩报仇，遂推举权中为军队总指挥。当时，部队处境极为危难，四周遭到陕军田生春、冯子明、甄寿珊等部的包围，去陕北已不可能，又失去和省委的联系。权中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研究行动方向，他说：老师长的牺牲，使我们认识到，任何时候对敌人都不能有丝毫的幻想，我们一定要保住这支革命武装。为了不被敌人所消灭，可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找主求生”。既要使部队合法存在，又不被敌人所控制，这就是会议定下的原则。但是，要在军阀混战割据的夹缝中保存住这支军队，落在权中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啊！投靠谁呢？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暂时“投奔”冯子明。权中在康桥与冯子明进行了严肃的谈判，提出的条件是：（一）部队由许权中直接指挥；（二）部队驻防关山镇；（三）任何时候为史可轩报仇不得干涉。冯子明一一答应。部队被冯部编为独立第三旅，权中任旅长，进驻临潼关山镇。

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成立了旅党委，高克林任书记，许权中、杨晓初、张汉泉、高志凯等为委员。与此同时，部队还吸收了许多在地方上站不住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入伍。一方面保护了革命同志，另一方面又壮大了部队的力量 and 改善了革命军队的成份。

这时，由于党中央曾指示许旅要参加鄂豫陕边的起义，所以部队逐步向南转移。在关山驻两月后，移驻高陵县。冯子明

对许旅始终心怀鬼胎，图谋借机吃掉这支革命武装，便派赵杰三及惠介如监视许旅的行动。但赵杰三是许权中过去的好朋友，遂向权中透露了冯子明的阴谋，引起权中和旅党委的高度警惕。十月间，部队又转移到蓝田县许家庙一带。十一月五日，冯子明命令许旅开赴河南。十一月十五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许旅设法留陕，准备相机起义。在此情况下，权中婉言拒绝执行冯子明的命令。于是冯即指使在许旅担任参谋主任、同蒋介石有勾结的惠介如，策动徐裴威和杨锡民两个连长举行暴乱。在此危急时刻，杨锡民（共产党员）即刻向权中报告了这一重要情况。当晚，权中召集连以上的军官会议，并把惠介如押到会场。权中说：“兄弟们，我为了给老师长报仇才守住这个摊子，为了给老百姓做些好事才搞工农革命，这也正是革命军的本分。”“可是，现在有人想把我们的摊子搞垮。……”^①

“我们愿听旅长的命令，决不被人利用。”^②大家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

惠介如被处决了。但是他的同谋韩威西跑到冯子明那里报了信，冯撕破了假面具，第二天，即密令赵汉章旅围击许旅。同时还派来一支部队，日夜兼程直奔黑龙口，企图占领通往秦岭以南的要道，把许旅从四面围困起来，加以消灭。

“干，接受史可轩同志牺牲的血的教训，是采取主动的时候了。”^③权中果断的作出了决定。他抽出两个排的兵力，一

①②③杨晓初：《渭华起义片断》，见《星火燎原》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九一一至九一二页。

个排摆在蓝田县东，阻击敌人的进攻，打破敌人由网峪经牧护关抢占黑龙口的计划；另一个排夜渡灞河支流，偷袭敌人前卫司令部。就在敌人甜睡着的时候，开了火。敌前卫司令部遭到突然袭击便向回逃，所有的部队也跟着司令部撤回十八里之外。权中率部趁机连夜急行抢占了黑龙口，粉碎了敌人全歼许旅的诡计。

度过这一危机后，旅党委在黑龙口召集紧急会议，根据权中的建议，决定把部队拉到洛南，利用李虎臣和冯子明的矛盾，先“投奔”李虎臣，站住脚再去省委请示。十二月底部队从黑龙口开到洛南三要司。李虎臣见许旅从冯子明部拉出来，正合他的心愿，也没有细追究什么，就把许部编为第八方面军新编第三旅，权中任旅长。权中率部在困境中苦斗，经过几次改编，多次移防，终于为党保存住这支革命武装力量。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精神，和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中央对陕工作的指示^①，召开了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布置全省暴动问题，并决定调许旅去配合陕西东部的农民起义。为了加强对许旅的领导，省委先后派刘志丹、唐澍、谢子长、吴浩然，廉益民（卢少亭）、周益三、李大德等到许旅担负重要工作，唐澍任旅参谋长，刘志丹任旅参谋主任，谢子长、周益三任营特派员。同时省委还从地方上抽调许多党团员到许旅工作。一九二八年三月省委书记潘自力转来中共中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给朱德及军中全体同志的信，强调要“发动群

^① 《中央公函陕字第九号》（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众以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中央的信中还提出“由军中挑选得力的同志派入乡村……”，“必须很技术的有计划的布置工农武装暴动前的必需条件”，“工农暴动的主力必须是工农群众自动起来的武装。”^①三月底，省委又成立了陕东特派委员会，以刘继曾为书记，负责具体领导渭（南）华（县）地区农民起义。陕东特委根据省委关于渭华暴动的《行动大纲》，具体制定了起义计划。刘继曾到许旅传达了省委关于组织渭华暴动的决定，要求许旅扩大武装，准备起义。

根据党的指示，权中对部队进行了组织整顿，肃清内部的坏分子，撤掉那些不称职的指挥员，把一些优秀的党团员提拔到基层领导岗位。同时，部队加强了军政训练，办起了小型兵工厂，自修自造武器。权中常给干部讲课和领着队伍操练，还深入兵工厂，挥动大铁锤制造武器。旅党委加强了政治工作，并派出干部去附近农村协助地方党组织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建立赤卫队，开展反霸斗争，把粮食分给农民度春荒。还公审和处决了大恶霸地主阮化生和何豹子，扩大了革命影响。为了适应起义的需要，渭华地区的党组织在三月底也选派共产党员孙敬堂、王化民、薛自爽等二十八人到许旅学习军事，权中和旅党委配备专门干部对他们进行训练。这些同志在部队经过不到一个月时间的军事训练后，在许旅委派的李大德（中共党员、营级干部）的率领下，每人配备一支枪，四个手榴弹及一些子弹返回渭华，打土豪，破坏敌人的电线和交通。他们的革

^① 《德兄并转军中全体同志》（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六期。

命活动，极大地鼓舞了渭华人民的斗争意志。在斗争中，这支地方武装壮大了力量，很快发展成为一支有一百多人、五、六十支枪的队伍。根据斗争的需要，这支武装改编为 陕 东 赤 卫 队，李大德、薛自爽任正副大队长。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盘踞商洛的李虎臣趁冯玉祥主力出陕参加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与奉系军阀混战之际，发动反冯战争。他一方面率领四旅兵力（包括许旅）赴潼关，阻击冯部宋哲元部回陕；一方面派丁增华部于五月十日包围了西安。军阀混战为渭华起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陕 东 特 委 抓 住 时 机 决 定 立 即 举 行 渭 华 起 义。于 是 在 渭 南 县 和 华 县 南 靠 秦 岭 山 脉、北 临 西（安）潼（关）公 路，东 起 少 华 山，西 到 临 潼 县 的 南 北 三 十 余 里、东 西 只 十 余 里，面 积 约 二 百 平 方 公 里、人 口 约 九 万 左 右 的 地 区 爆 发 了 大 规 模 的 有 农 民 群 众 与 革 命 武 装 部 队 相 结 合 的 起 义。

中 共 陕 西 省 委 决 定 发 动 渭 华 地 区 农 民 起 义 的 同 时，即 指 示 许 旅 不 要 参 加 李 虎 臣 攻 打 潼 关 的 战 争，迅 速 开 往 渭 华 配 合 农 民 起 义，建 立 革 命 根 据 地。狡 猾 的 李 虎 臣 把 许 旅 加 在 中 间，企 图 一 箭 双 雕，一 方 面 让 许 旅 替 他“火 中 取 栗”，削 弱 革 命 势 力，一 方 面 阻 击 冯 玉 祥 主 力 入 陕。战 争 打 了 几 天，敌 军 不 断 增 援，许 旅 伤 亡 甚 大。在 此 情 况 下，唐 澍、刘 志 丹、高 克 林 等 率 领 部 队 撤 出 战 斗，开 赴 潼 关 南 原 宣 布 起 义，举 起 了 红 旗，经 石 头 峪 向 高 塘 镇 挺 进。五 月 六 日 起 义 部 队 到 达 高 塘 镇。

五 月 八 日，在 高 塘 镇 举 行 了 盛 大 的 军 民 联 欢 大 会，热 烈 庆 祝 西 北 工 农 革 命 军 的 诞 生。这 一 天 恰 好 逢 集，陕 东 赤 卫 队、各 村 赤 卫 队、农 民 协 会 会 员 及 各 阶 层 群 众 和 起 义 部 队 一 万 多 人 高 举 红 旗，敲 锣 打 鼓，欢 聚 在 会 场。权 中 和 唐 澍、志 丹、继 曾 等 负

贵同志参加了大会。大会正式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主席刘志丹、前敌总指挥唐澍、政治委员刘继曾、顾问许权中、秘书长许尚志、参谋长王泰吉、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参谋主任高克林、经济委员会主任杨晓初、军党委书记吴浩然。全军共编为四个大队（赵亚生、武培谟、谢子长、雷天祥分任队长）和赤卫队（队长张汉泉）及骑兵分队（队长由许权中兼任）。

工农革命军成立后，立即张贴布告，公布政纲，号召劳动人民起来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自己当家作主人，建立苏维埃政权。布告指出：“土豪劣绅和财东，剥削穷人真个凶。加以放帐驴打滚，卖儿卖女还不清。要帐手提桃桃子，打人不论亲弟兄。于今穷人要睁眼，大家团结来求生。西北工农革命军，他是咱的子弟兵，大家同心一齐干，铲除土豪和财东。贪官污吏都打倒，我们要作主人翁，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过成好光景。”^①从此，渭华起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渭华塬上，权中指挥第四大队、骑兵分队在崇凝镇一带同陕东赤卫队和农民协会相配合，在摧毁地方反动政权的基础上，普遍建立起村苏维埃政权。掀起了打土豪的高潮，烧毁地契文约，没收地主的财产，分给贫苦的农民。渭华起义的军民，在很短的时间内，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形成了渭华塬上的红色政权割据局面。渭华塬上的广大农民第一次扬眉吐气，受苦农民高唱：“农民苦，农民难，一年四季不得闲；农民苦，农民难，打的粮食叫地主都收完。共产党，领导咱，打土豪，除劣绅，为咱农民来伸冤。”

渭华起义沉重打击了敌人在陕西的反动统治。当起义刚爆

^①原件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发时，军阀们正在为争夺地盘而混战，无暇顾及。五月中旬，陕西军阀混战暂告结束，李虎臣部被战败，冯玉祥部取胜。从6月上旬开始，冯玉祥部宋哲元率几个师的兵力向渭华地区猛扑，进行“围剿”，妄图扑灭革命烈火。革命军在党的领导下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英勇抗击，粉碎了敌人两次大的进攻。战斗结束后，工农革命军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敌我力量的情况，讨论了革命军向何处发展的战略问题。权中和一些同志认为我军枪弹物资来源缺乏，敌强我弱，渭华地区是豫陕两省的咽喉，地处交通要道又距中心城市西安较近，是敌人必争之地，无回旋余地，革命军在该地区如继续坚持同敌人硬拚，对革命十分不利。他建议向山区转移，进行游击战。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把部队撤往陕北，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会后，当即派刘继曾到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派许尚志去渭北购买弹药和勘察地形，为部队向北转移作好准备。

六月十九日，敌人又发动新的“围剿”。宋哲元派三个师的兵力分东、西、中三路向我军事政治中心高塘及塔山据点进攻，妄图一举消灭起义军民。由于敌人进攻的兵力过大，革命军转移陕北的道路被切断。军委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决定不能再同敌人在渭华地区死拚硬打，准备将部队先撤进南山，以保存革命力量。

西路敌人的一个师，由地主薛良臣、史明鉴带路打前锋，从渭南出发，经崇凝镇闪击塔山前沿阵地。权中和雷天祥指挥陕东赤卫队的一个中队，与数十倍之敌展开激烈战斗，歼敌甚众。但由于我军没有重型武器作掩护，致使指挥所前沿阵地被敌炸平，所有营房工事被摧毁。权中率部转移阵地。根据军委的命令，工农革命军和农民武装向涧峪口，箭峪口一带撤

退。权中指挥西线革命军及赤卫队，在崇凝、箭峪口一带与敌激战一夜，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终因敌众我寡，不得不退向南山。第二天拂晓，西路敌军又向塔山附近的清明山，凤凰山进攻，中路和东路敌军又向退至箭峪口、牛峪口、涧峪口的工农革命军发动猛烈攻击。这天，西线的战斗十分激烈。当权中指挥革命军及陕北赤卫队从箭峪口将要进山时，由大地主薛良臣带路的一团敌人妄图封锁箭峪口，切断工农革命军的退路。在此关键时刻，陕北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带领剩下的十余名赤卫队员，迅速占领箭峪口前面的侯家岩，利用有利地形，英勇抗击敌人。中午，敌我双方又为争夺箭峪口西侧的铁家岭高地，展开了肉搏战。权中和已多处负伤的薛自爽指挥工农革命军及赤卫队员共三十多人，坚持战斗四小时，击退了敌人三、四次猛烈的冲锋，掩护了西线工农革命军主力部队和陕北赤卫队的安全退却。自爽同志壮烈牺牲。晚上，权中和杨晓初指挥所余部队由箭峪口进入牛峪，翻过山到黄沟峪顶露宿一夜，第二天撤退到蓝田县许家庙。东线部队在唐澍、志丹率领下于六月二十二日也相继撤退到洛南县的两岔河。部队仅剩下三、四百人。后又遭李虎臣五旅之众的进攻，部队伤亡很大，唐澍等同志壮烈牺牲。至此，轰轰烈烈的渭华起义被淹没在血泪之中。

六月下旬，志丹、继曾与撤退到蓝田县的权中取得联系，决定全军在张家坪集中。7月初，在张家坪由志丹、继曾主持召开了军委会议。按照省委指示精神，会议决定：第一，将红旗暂时收起来，不开展苏维埃运动；第二，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身份已经公开的离开部队，转移到各地进行地下工作，身份未公开的，仍留部队工作；第三，把部队交由权中指挥，通

过权中的个人关系，开展统一战线，设法保存党领导下的这支革命武装力量。

会后，权中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并通过中共蓝田特区负责人赵伯平吸收当地一部分农民武装扩大了部队。为了保存这支革命力量，权中派人去龙驹寨（今陕西丹凤县）与陕军师长刘文伯（权中的旧友）联系并取得同意，即率部迅速进驻商县黑龙口。两三天后，蓝田县民团团团长尹耕辛（中共党员）带领三、四百人、枪加入了革命军。七月十五日，工农革命军在黑龙口改编为刘文伯师的第九旅，权中任旅长，旅所属仅一个团。部队在黑龙口加紧训练，准备重整旗鼓。这时，冯玉祥企图消灭陕军，刘文伯力不能敌，打算撤到湖北襄阳一带投靠岳西峰。权中率领的九旅也准备退到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河南省确山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于是，权中率部经商县到龙驹寨与刘文伯部一起出荆紫关，经河南浙川、镇平向邓县进发。沿途消灭不少小股敌人。八月二十三日，刘文伯师进驻邓县时，该县地主豪绅假意表示欢迎。进城后，立即遭到地主豪绅控制的红枪会武装的包围和袭击。二十四日清晨，刘文伯师由城内整队出发，地主豪绅又假意护送，但等他们一离开，即陷入红枪会武装的包围。面对数万受蒙蔽的农民群众，枪开不得，武器已经失去了它的效用。当日下午在鸡滩街全师被迫缴械，权中率领的九旅也由此失散。渭华起义失败后，辛辛苦苦保存下来的革命武装力量就这样失掉了，权中痛心疾首。

邓县失败后，党中央通知权中由武汉去上海转赴苏联学习。一九二八年秋，权中去苏联，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军大学学习。他努力钻研马列主义和军事科学，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和个人经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常与叶剑英、张仲实、方仲

如等同志交流学习心得体会，讨论问题。他对同志诚恳、忠厚。当时，他还结识了苏联一些红军将领，布琼尼元帅曾赠送给权中一支象牙手把的左轮手枪。

一九三〇年夏，权中学习结束，从苏联回到上海，党中央派他去北方局军委工作。到天津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权中在狱中，坚持对敌斗争，虽屡遭严刑拷打，但坚守党的机密，只回答：“我叫徐广斌，山东人，皮货商”。每次受刑下来鲜血直流，血肉模糊，当他回到牢房，难友们关切地问他：

“要紧吧？”权中总是神情泰然地回答：“不要紧，不疼！”^①权中坚贞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傲骨高风。一九三一年冬天，有一次看守监狱的卫兵给权中买来一包咸菜，包菜的破报纸上登有江西瑞金召开全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的消息，权中看后高兴地跳了起来，并把这张报纸送给其他党员看。权中在狱中为对付敌人的摧残，坚持锻炼身体，常对难友说：“不怕死而才不死。”^②一九三二年夏，经党组织的营救和友人刘文伯、米哲沉出钱保释，才获得自由。

权中出狱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向长城各口及察哈尔进犯。在这民族危亡时刻，蒋介石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号召，愿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切军队签订共同抗日协定。一九三三年春，党派吉鸿昌到察北组织抗日队伍。在党的推动和领导下，五月二十六日以吉鸿昌和抗日将领冯玉祥、方振武为首，在张家口成立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担任前敌总指挥，宣布对日作战，得到全

^{①②}冯润璋：《忆许权中》，载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群众日报》。

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权中受党组织的派遣，到张家口任同盟军军委常委兼副军长和十八师师长，他很快召集旧部，并在杨虎城将军的大力支持下，补充了大批人员和武器，十八师成为抗日同盟军的主力师。他曾向党组织讲：冯玉祥还是让蒋介石给教训过来了！权中还和宣侠父、刘镇远、武止戈、吴化之、周益三、王琳等同志一起协助吉鸿昌拟定作战计划，分兵三路向北出击，在张北县和沽源等地与日军激战。鸿昌、权中带兵迅速，又猛又勇，先后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独石口等地，把日伪军完全驱逐出察哈尔省境，全国民气为之一振。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却和日寇相勾结，张开了共同围攻同盟军的大网，同盟军将士大量伤亡。权中所部位在前沿，他沉着的指挥进行反击，炮弹在他身旁不断地爆炸，警卫员李果几次拉他都拉不下去。由于众寡悬殊，十八师面临全部牺牲的危险，权中临危不惧，率部突围，且战且退，辗转苦战，历尽艰险，终于把部队带到河北省顺义县。后又遭国民党军队围攻，部队被打散。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权中秘密地化装到了天津找到党组织，从事地下斗争。一九三四年秋，根据党的指示回到陕西韩城，化名杨鉴，以教小学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三五年去天津，在中共河北省委军委工作，一九三六年春因病请假回到家乡临潼辛理村。在养病期间，他创办民生小学，聘请进步教师，为革命培养人材，并以学校为阵地，进行革命活动。权中在家乡常参加劳动，推土车、种地，样样都能干，还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当农民议论国民党反动派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无法生活时，权中因势利导地说：只要我们穷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这样的世道不久就会被推翻的。一九三六年

夏，权中派党员黄子文去陕北向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请示，要求派他到杨虎城部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他的请求，同年经党中央联络部长李克农介绍，汪锋、谈国帆把权中的组织关系由河北转到陕西。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前，爱国将领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派许建安给权中送信，大意是：权中弟！救亡图存，在此一举，速来西安，共商大计。权中急速赶到西安。被杨虎城任命为警备二旅副旅长。十二日清晨，按照张、杨二将军的部署，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活捉蒋介石；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系所有军政大员，解除西安城内蒋系部队武装，扣留西郊飞机场停留的几十架新式轰炸机和监视北门火车站蒋系过路的部队。十七路军方面部署由警备二旅担任城内动作的任务。权中指挥总部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包围西京招待所和花园饭店，扣留了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调元、万耀煌、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诚等十余人。与此同时，警备二旅旅长孔从周指挥所部，迅速解决了国民党宪兵第二团和保安团的武装。但省会公安局包围了几个小时还未攻下。这时候，东北军已在临潼华清宫外将蒋介石捉到。杨虎城急欲恢复西安城内秩序，又命令权中指挥他的卫士队去攻打公安局。在权中的指挥下，不到半小时，即攻下这所公安局，从而解除了城内蒋系势力的全部武装。

双十二事变后，应张、杨将军的邀请，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率领的中共中央和红军代表团到达西安。杨将军在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后，任命权中为十七路军独立旅旅长，指挥阎揆要（党员）和韩子芳两个团。该旅成立后，周恩来派汪锋去作党的工作，还多次找权中谈话，指示工作。权中在西安事变开始时，也和西北军、东北军的多数将领一样，认为必须杀蒋，但

是经过周恩来的开导和教育，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有了正确的认识，并向党组织表示，坚决按中央的指示办，还向周围的人员积极宣传解释党的主张。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党一方面积极促进谈判成功，另一方面也作好抵抗南京何应钦派部队向陕西进攻的准备。权中奉命率部做好战斗准备，布防渭南一带。为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邀请方仲如到旅部任政治部主任。权中还亲赴渭北云阳镇和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研究作战计划。许旅驻防蓝田时，权中送给当地党组织二百多支枪，帮助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处决了一批当地的反动分子，派副官刘光智去商县给程子华、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送电台。他还亲自坐着许建安开的大卡车，深夜去龙驹寨给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送弹药，往返几百里，天明前又赶回驻地蓝田。西安事变期间，国民党特务多方造谣破坏，权中在田一民的帮助下，处决了企图拉走民运会武装纠察队的特务分子。权中日夜工作，积劳成疾，终于病倒。在西安广仁医院治疗期间，叶剑英亲自探望。一九三七年三月，权中所部驻防耀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解除了当地危害革命的恶霸雷天一的反动武装，利用请雷吃饭的机会派王英、王建业将其处决，为民众除了一大害，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内外联系拔了一个钉子，缴获的武器分给了地方党组织，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在驻防耀县期间，权中选派旅参谋长韩钟麟和许多进步青年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还派许建德给驻在旬邑县马栏镇的红军送收音机、钢盔、防毒面具等物资。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路过耀县时，权中热情接待，请求指示工作。同年春，权中所部改编为九十六军一七七师五二九旅。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民族危亡日

益严重，权中深为祖国前途担忧，请缨前方杀敌。他是西北军中第一个率部出征的抗日将领。八月下旬，权中率部从三原誓师出发，东渡黄河，去华北参加抗战，九月在易县紫荆关进行游击战，掩护主力部队的安全撤退。还在唐县与八路军一一五师骑兵团联合阻击日寇，获得许多胜利。十月初守备曲阳东西口、南青观一带，将西犯之敌击退。因晋北忻口战况紧急，十月十二日奉令兼程驰援，十九日晚赶到忻口，没有休息，即到第一线战壕，布置了一千五百公尺长的防线。权中亲率两个团，协同友军，同日寇激战十四昼夜，坚守阵地，使敌人未能越雷池一步。是役歼敌一千多人，使日寇坂垣师团大为震惊。因权中平时对部队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严格的训练，官兵作战非常英勇。每次作战，权中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带头冲杀，身先士卒。十月二十六日，日寇的一颗炮弹在权中身旁爆炸，他立即昏了过去。醒来后，拣了一块一尺多长的炮弹壳，题字于上：“落于吾右，而未使吾成仁，岂其有意留吾以救国耶？抗战将四月，失地犹未还，吾知勉之。”^①权中率部三千余人参加抗战，官兵不怕牺牲，顽强作战，虽然伤亡过重，最后只剩下三百余人，却没有一人逃跑。连国民党的一些将领，也盛赞许旅的英勇顽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就曾对记者说：“自许旅增加上来以后，形势已转危为安。”^②

一九三七年秋末，权中被调任一七七师参谋长，十一月曾任晋东南自卫军指挥官，一个月后仍任一七七师参谋长。十二

^{①②}许权中：《前线归来》，原载西安《二中校刊》第十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

月中旬，因公从山西前线回到西安，应第二中学校长江隆基的邀请，给全校师生员工作了《前线归来》的报告，讲述了日寇的残暴和国民党中央军溃败给华北人民带来的灾难，热情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总结了战斗的经验教训，强调要用革命思想武装军民。特别提出：“我们应该组织游击队”，“要向群众宣传，提高民族意识，动员起来，军民打成一片，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①一九三八年，权中所部驻防陕西合阳，他胃病复发，正在休息，但他应合阳中学的邀请，日夜编写游击战讲义，并抱病去学校作报告，他根据红军游击战和自己的战斗经验，通俗而又生动地讲述了游击战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和常识，深受师生的欢迎。

一九三八年五月初，日军大举进攻晋东南，一七七师师长和九十六军军长逃到西安。权中挺身而出，率一七七师一部挺进到山西永济县张营镇，与日军激战四昼夜，官兵前仆后继，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因敌众我寡撤至吴王渡，又遭强敌包围。权中临危不惧，率部与日军血战二日，亲自指挥特务连坚守吴王渡南门，连续九次击退日军的进攻，保卫了军、师司令部。接着该军又收复晋南十余县，给日寇以重大杀伤，阻止了日寇的西进。一七七师之战斗力这样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权中重视军民关系，老百姓积极支援战争。该师每到一地，权中即协同政治部门组织青少年歌咏队，对群众进行抗战教育和军事训练，他还采用各种形式揭露日寇烧杀抢掠的残暴罪行，向军民宣传抗日必胜的道理。九十六军在大王庄召开军事会议时，

^①许权中：《前线归来》，原载西安《二中校刊》第十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

许多进步的军官都赞扬权中临危从容镇静，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的高尚品德。权中有功不居，谦虚地说：“这次吴王激战，保卫了革命，保卫了吴王，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应归功于各位官兵的奋勇杀敌的爱国精神，我本人也很感激。”^①

权中在山西抗战有功，却激怒了国民党顽固派，他们不以功论赏，反而拿功臣来问罪，撤去权中一七七师参谋长职务，被任命为毫无实权的该师少将参议。长期的戎马生涯严重地损害了权中的健康，一九三八年冬，权中胃溃疡病发作，被迫离开前线回到家乡养病。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秋，权中奉党的指示，以养病为名，利用一七七师参议兼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参议的合法身份，进行地下斗争。他积极鼓励和支持张性初及同情革命的刘文伯先生主办《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促进了西北地区的民主运动。一九四一年春，打入国民党胡宗南战干团内部的共产党员王智德向权中汇报工作，反映敌人活动猖狂，地下党在战干团工作危险的情况，请求解决办法。权中指示说：“怕什么！共产党员头上又没有刻字！”“我来掩护你，给你的上司写信。”一九四二年，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权中派人护送智德去延安工作。权中通过各种关系，介绍和护送王俗明、韩毅、张光、任明等去陕北参加革命。在临潼，权中还积极支持地下党员谈国帆、王志温等坚持地下武装，处决了反动镇长。当时临潼交口地区革命形势比较好，工作开展的很活跃，经常主动出击敌人。有一度敌人根本不敢到这里来，交口地区当时被人们称为关中的“小边区”。这一切也是与权中的努力分不开的。

^①赵国珍：《忆许权中烈士革命事迹》，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国民党顽固派对权中的革命活动，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迫害，要尽反革命两面手法。他们一方面派匪特暗中监视，利用地主恶霸进行武力威胁；另一方面，胡宗南、蒋鼎文出马“请”权中谈话，劝说只要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就可以高官厚禄。权中断然回绝了这种无耻的诱降，愤怒地说：“你们今天要求我骂共产党，那么我明天也可以骂国民党，如今你们要怎样处理就怎样来处理好了。这是人格问题，至死不能做这样违心的勾当。”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高风亮节。一九四三年，权中的家乡交口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住地西安灞桥读书村又遭特务的日夜监视，随时有被杀害的危险。同志们考虑到他的安全，劝他及早离开。他泰然自若的说：“一个革命的志士应具有牺牲的精神，革命不能畏死，怕死就不能革命。”为了摆脱敌人的监视，权中和几个同志商量，决定先去河南洛阳九十六军军部，而后通过关系，经四川去延安。他到洛阳后，被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任命为中将参议兼该集团军眉县万家塬垦区主任，去四川的计划未能实现。权中将计就计，毅然回到陕西眉县，利用公开职务，以搞生产为名，组织了两个连的革命武装，准备在千阳、眉县一带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十二月上旬，权中带领任耕三（三十八军垦区主任）赴千阳一带察看地形并召集干部部署工作，九日路经凤翔和李子萼先生（权中的老师）会面交谈后即返垦区，骑马行至眉县槐芽洪水沟时，被胡宗南、徐经济（伪陕西省保安处长）、崔镇山（伪保安队大队长）指使的特务所暗杀，时年四十九岁。同时遇难的有任耕三和刘兴坤（中共党员，权中的警卫员）。权中遇难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主席极为悲痛，曾询问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早把权中同志接回延安？

全国解放后，为了悼念权中同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中共西安市委、陕西省军区分别在临潼和西安举行许权中烈士遇难六周年追悼大会，西北军区送的挽联上写着“革命先驱，人民功臣！”^①西安各界人士送的悼诗是：“一生为党为国家，誉满天下众人夸。武装起义闹革命，鲜血灌成胜利花。”充分表达了党和人民对权中英烈的深切怀念。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北京晨报》（一九二六年）。
2. 许权中：《前线归来》，原载西安二中校刊第十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
3. 许权中一九四二年八月为母亲逝世时写的《行状》，原件存许权中亲属家中。
4. 许权中给周益三的信（一九四三年），原件存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5. 《中央公函陕字第九号》（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6. 《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六期（一九二八年初出版），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7. 《陕西省委通讯》一九二七年第一期，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8. 冯润璋：《忆许权中》，载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群众日报》。
9. 赵国珍：《忆许权中烈士革命事迹》，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0. 杨晓初：《渭华起义片断》，原载《星火燎原》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①张光：《西安临潼各界追悼许权中》，载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群众日报》。

11. 陕西《国民日报》，一九二七年三至七月。
12. 张光：《西安临潼各界追悼许权中》，载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群众日报》。
13.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期，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14.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15.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省民政厅一九五九年编写的《许权中同志史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6. 张雅君、许建安、许建芳、许共和、许黎英、许建民、张建成、徐定伯、徐岳、潘自力、刘继曾、方仲如、高克林、张仲实、阎揆要、汪锋、赵伯平、孔从洲、徐彬如、屈武、王炳南、吴化之、李果、谈国帆、米哲沉、庞志杰、尤祥斋、王超北、周益三、赵鹏九、马文彦、王立安、李慕愚、李建彤、刘威诚、田一民、王智德、孟浩、王英、张光、王蒂南、陈天秩、彭淑贞、侯镜如、李锦峰等同志的回忆材料或访问记录。

毛 泽 覃

刘仁荣

毛泽覃，号润菊，是毛泽东的小弟弟。出生于一九〇五年，从小就受到毛泽东的关怀和教育，在急风暴雨的年代里，艰苦奋斗，努力工作，既从事过工农运动，又参加过革命战争，在长期斗争中，逐渐成长为我党的一名好干部，红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一九三五年牺牲于江西瑞金县，时年二十九岁。

山 冲 少 年

韶山，是湖南省湘潭县境内的一个偏僻山冲。这里奇峰矗立，清溪回流，万木竞翠，百花争芳。一九〇五年古历八月二十七日，毛泽覃就诞生在这个美丽的山冲。

毛泽覃出世后，在家乡度过了他的童年。六、七岁的时候“发蒙”，曾在清溪寺、瓦子坪等处读书，学习用功，成绩优良，受到老先生和长辈们的夸奖。课余时间，他时常风里来，雨里往，跟随大人到田间做一些农活，是一个热爱劳动的孩子。晚上坐在自家的火炉旁边，总爱缠着大哥、二哥以及别的叔叔、伯伯“讲古”。什么“舜帝南巡”、“武王伐纣”、“赤壁之战”、“武松打虎”等等，往往使他听得入迷。特别

是他的大哥毛泽东，当时在省城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看过许多古今中外的书籍，知识广博，每当寒暑假回家时，不仅讲一些古代的故事给他听，还给他讲“太平天国造反”、“长沙饥民暴动”等一些近世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得他从小具有一种爱打抱不平的反抗精神。

少年时代的毛泽覃，在村里和学校接触到的大多数是一些穷苦的孩子，目睹他们家里的贫困生活，官府与豪绅收税、催租、逼债，逼得许多人家逃荒讨米，家破人亡。社会环境的影响，加上大哥的教育，就使他从小在思想感情上和贫苦农民紧紧连在一起。

一九一八年年初的一个晚上，就在家里的那个火炉旁边，刚从省城回来的毛泽东把俄国革命的消息告诉全家，虽然毛泽东当时还不真正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革命信念，给家里的人印象很深。此时的毛泽覃，尚不满十三岁，他对大哥讲的“革命”，虽然还不很理解，但却非常向往，立志将来做一个革命者，为国家和人民贡献力量。他向大哥提出，请求带他到省城长沙去读书。毛泽东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同意弟弟的请求，在寒假结束后，就带着他离开韶山，到长沙学习。

一九一八年春的一个晴朗日子，英气勃勃的少年毛泽覃，跟随大哥，来到省会长沙，进入第一师范附小高十四班学习。在革命新思潮的影响下，在毛泽东的教育下，他经常和许文亮、易礼耕等接受革命思想影响较快的同学一起，议论中国和世界的大事，批评国家和社会的腐败。遇到什么不平等、不合理的事情，他就站起来申张正义，主持公道。一次过中秋节，学校一个姓熊的庶务办了一些好菜，只给老师吃，不给工友

吃，毛泽覃很气愤，立即将此事报告当时担任附小主事的毛泽东。工友们都称赞他是一个关心工人生活的好孩子。后来，毛泽覃还曾到过一个中学读书。在此期间，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二年秋，毛泽覃进入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补习学校除补习中学程度的文化科学知识外，十分注意引导学员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造就人材^①。毛泽覃在此学习，认真攻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列著作，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程度。对于老师讲马列经典著作的课，他都仔细听，认真记，勤学好问，从不缺课。一次，他因外出去搞工人运动调查，离开学校。回来以后，听说同学们又学过《国家与革命》一书，便主动找老师补课。

补习学校在学习过程中，经常组织学员深入工厂农村，调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强调学员应“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②。毛泽覃在此学习，一有机会，就去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和革命实践。他曾到长沙码头创办过工人夜校，深受工人欢迎。还曾到一个远离长沙的矿山去参加罢工斗争，历时一个多月。平时在清水塘，他也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参加劳动，一有空闲，就到附近的菜园里去挖土，拔草，养成了很好的劳动习惯。

①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载，《新时代》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

②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上。

当时，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湘区党机关所在地——清水塘。毛泽覃和另外几个补习学校的学员，也曾住在这里。毛泽东对他们严格要求，热情帮助，经常给他们讲解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然而，此时的毛泽覃毕竟年小，没有受过更多的锻炼，不免有点顽皮。一次，他们几个青年看到毛泽东和杨开慧有一个小箱子，白天放在身边，晚上当枕头睡，视若宝贝，很想揭开它的“秘密”。一天，恰好杨开慧不在家，他们几个嘀咕一阵，轻手轻脚，把这个“枕头箱”转移到杨老太太的房子里，藏了起来。这个箱子是放党内文件的，杨开慧回家后发现箱子“失踪”，非常着急，和杨老太太到处寻找。这时，他们几个躲在窗外，吃吃地笑。毛泽东知道是他们开玩笑藏起来的，立即停下工作，喊他们进房来，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着重地讲到遵守党的纪律和保守党的秘密的重要。然后指出，他们都还没有入党，不能乱动党内文件。接着，毛泽东针对他们各自的缺点，向他们提出不同的要求。对于这个小弟弟的思想和性格，长处和弱点，毛泽东是非常清楚的，平时一有机会，就教育和批评他，鼓励和鞭策他，此时望着他那幼稚而又顽皮的样子，加重语气地说：你嘛，年小无知，还要多多学习，多多锻炼。接着，杨开慧也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帮助。

为了迅速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毛泽东在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帮助他们纠正错误思想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培养和加深他们的无产阶级感情。

一个黑沉沉的夜晚，乌云密布，寒风长鸣，在清水塘那个青砖小院里的油灯下，几个青年坐在毛泽东和杨开慧身边，闪

着眼睛，屏住呼吸，倾听毛泽东讲述工人和农民遭受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悲惨故事。讲着讲着，毛泽东拿出一份水口山工人苦难生活的调查材料，要毛泽覃读给大家听。

这份材料是毛泽东亲自调查整理的。一九二二年夏，毛泽东曾经去到常宁水口山铅锌矿，了解工人生活，传播革命火种。当时，矿上发生过一次严重事故。一天，把头王继前逼着七个工人在窿内一个矿洞宽大、岩石松裂的老砂棚里，站在用三根木柱子、几块木板子搭成的台子上，拿着锤子、钢钎凿岩，凿着凿着，突然一声巨响，砂棚顶上一块巨大的石头垮了下来，把七个人全部压在底下。附近巷道的工人闻讯赶来，设法把石块搬开一看，死者已经粉身碎骨，只见许多石块上沾满了血和肉酱。工友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从碎石中一点一点地把死者的骨肉收集起来，分成七份，用草纸包着捧出窿口。死者的家属见捧出来的是亲人的肉酱，一个个扑倒在上面，呼天喊地悲痛欲绝。毛泽东将水口山工人这些苦难生活的材料，带回湘区党委，作为研究工人运动的资料和自修大学的教材。

夜已很深，几个青年忘却疲劳，忘却寒冷，静听着毛泽覃读这份材料。毛泽覃满怀对劳动人民苦难的同情，读着读着，不觉声音哽咽起来，两行眼泪夺眶而出。毛泽东因势利导，要他们讨论：工人为什么这样苦？有什么办法来解救工人的苦难？讨论中间，毛泽东教育大家，哭没有用，眼泪救不了穷人，只有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才能使劳动人民获得解放。讨论以后，毛泽东还要求每个人都写一篇心得体会。毛泽覃的那篇体会写得很好，表示要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工人阶级，每一滴血都滴在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上。

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湘区党委和毛泽东决定

派毛泽覃和朱舜华等，去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让他们到轰轰烈烈的斗争风暴中，去接受新的考验。

烈火红心

一九二三年三月下旬的一天，毛泽覃等几个朝气蓬勃的革命青年，乘坐去衡阳的小火轮离开长沙。上船以后，他含着晶莹的泪花，向前来送行的毛泽东挥手告别。毛泽东再三嘱咐弟弟，到水口山以后，要好好锻炼和改造自己，首先要到敲砂棚去敲砂，还要到矿井里去劳动，要学习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虚心请教，穿长衫的人和穿短衣的人结合起来。

他们从长沙坐小火轮到衡阳，又从衡阳坐小木船到松柏，蒋先云派人来接，然后再坐摇车到达水口山。

来到水口山后，毛泽覃和朱舜华担任工人俱乐部教育股委员，兼任工人学校教员，并以此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毛泽覃分工负责团的工作，具体联系机械科的工人和团员。在此，他遵照大哥毛泽东的教导，经常到敲砂棚、机器间、矿井里去劳动，每个星期天，总是要利用这个白天没有课的休息日，下到矿井里去，和工人一道采掘矿砂，体验工人生活。他与机械科工人积极分子宋乔生、陈梅生等关系极好，常和他们一起劳动、学习、开会、谈心，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陈梅生特意把自己精心制造的一把珍藏多年的漂亮短镖赠送给他。

毛泽覃对于自己担任的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当时，水口山的工人学校分补习、小学两部，补习部专为工人工余求学而设，小学部专为工人子弟求学而设。工人学校开学以后，白

天，毛泽覃在小学部教书，对遭受旧社会摧残的工人子女十分关心。晚上，毛泽覃在补习部上课，满腔热情地向工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他们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他还和教育股的同志一道，办了一期骨干训练班，参加的大部分是他所联系的机械科的工人。他们向这些经过罢工斗争考验的工人积极分子，进行共产党、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基本知识教育，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

一九二三年十月的一天，毛泽覃在水口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当即经历一场严重的考验。这年年底，湖南军阀赵恒惕派来他的亲信宾步程，带着许多反动武装，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包围了工人俱乐部，逮捕和屠杀工人。在蒋先云的领导下，毛泽覃、朱舜华等临危不惧，迅速处理和转移文件，立即率领广大工人与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经过一番搏斗，他们很快就被宋乔生、陈梅生等许多工人巧妙地保护和隐藏起来，继续坚持工作和斗争。

不久，毛泽覃被调回长沙，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委书记处书记。此时，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建立，一场大革命的风暴正在酝酿和兴起。他遵照党的指示，经常深入工厂、码头、学校，向工人、青年和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他和田波扬、肖述凡等许多从事青年运动的同志以及广大团员和青年一块工作、学习。他们曾公开发表过一个宣言，一致认为：青年“乃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一生的理想和事业，“皆须于青年时代树立深固基础，其关系至重且大。”因此，一方面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凡社会恶习，概行屏绝”，抛弃“世俗之颓靡”，以求“立身之不苟”；一方面要

认真掌握文化科学知识，认清“科学所以启人理智，艺术所以表现感情，体育所以强健身躯，皆人生所需要，尤青年所当为”，应于这几方面努力学习和实践，以备“将来致用于社会”^①。毛泽覃善于根据青年的特点开展工作，积极引导他们坚决走共产党指明的革命道路。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成为坚强的战士。

一九二五年春，毛泽东偕同杨开慧从上海回韶山，一面养病，一面从事农民运动。毛泽覃亦随哥嫂回韶山。他曾到银田镇的白庙开办农民夜校，借小学的教室做夜校的课堂。白天给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上课，晚上给附近村子里的农民上课。他最喜欢以讲故事的方式吸引大家，例如《水浒传》中李逵的故事，《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故事等等，讲得非常生动，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有时在讲完故事后，便把话题转到现实，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掠夺和土豪劣绅的压迫与剥削，耐心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

这年秋天，军阀赵恒惕通缉毛泽东，毛泽覃根据大哥的指示，先行去到广州，接洽有关工作。此后，他又跟随大哥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曾先后在黄埔军校和广东区委工作，还在广东省农民协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作过。

一九二七年四月中旬，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疯狂进行反革命大屠杀。毛泽覃奉党的指示，同在广州期间结婚的爱人周文楠乘船经上海转移到武汉去。他原打算到上海后

^①田波扬、毛泽覃等：《湖南青年学艺社宣言》，载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上海《国民日报》《觉悟》副刊。

先去找二哥毛泽民，但认真地一想，二哥的单位是否遭到破坏？二哥本人是否已经转移？由于情况不明，于是他们立即离开上海，没想到在船上碰见了二哥。兄弟俩打了一个照面，便坐在一块，为了防备国民党反动派的密探，假装互不认识。他们声称是做生意的商人，又拿着一本孙中山先生讲三民主义的书，一边看，一边讲，以此来作掩护。船到武汉以后，他们很快就到武昌都府堤找到了大哥毛泽东。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他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上尉军衔。这时，汪精卫正在与蒋介石暗中勾结，准备公开叛变，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他在国民革命军中忘我地工作着和战斗着，很少回住处去看一看。

一次，毛泽东特意把二位弟弟找来都府堤住处，一家人围坐在一张方桌旁边，以打麻将为掩护，分析和研究当前的形势，决定今后各人的去向。毛泽东向二位弟弟指出，汪精卫一伙肯定要叛变，我们不能在此等着别人屠戮，要尽快地转移，或者跟部队走，或者回湖南去，要同革命的军队和人民一道，为挽救革命而斗争。毛泽东表示要随部队到江西去，大家均表同意。最后决定，他们兄弟三人根据党的安排，各自奔赴自己的战斗岗位，刚生过孩子的杨开慧和即将临产的周文楠，返回湖南，坚持斗争。

不久，毛泽东根据党和毛泽东的指示，离开武汉，前往南昌，踏上新的革命征途。

奔 向 井 冈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

承等同志的领导下，于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前夕，毛泽覃随第四军到达九江。汪精卫、张发奎等在庐山召开秘密的反共会议，决定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实行“清党”，马上逮捕驻在九江的第四军政治部中的共产党员。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得悉这一阴谋后，立即通知该军政治部负责人(中共党员)，使得党组织能及时布置有关同志转移。根据党的指示，毛泽覃迅速处理完党内有关的工作后，即化装离开九江，赶往南昌，参加起义。由于南浔路沿线到处驻有敌人，中途受阻，未能及时赶到。毛泽覃到达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南下。他在城门口遭到反动军警的盘问和搜查，但见他身着长衫，又藏有一个第四军军部上尉书记官的符号，不知真假。卫兵带他去见上司。他说自己是奉军部的命令到此，负有重要任务，谁敢扣留，将来定要严加惩处。敌人见他神色镇定，恐怕抓错，以后难脱关系，就客气地放了他。毛泽覃机智地脱险后，立即南下追赶起义大军。路上历尽艰险，脚走烂了，钱用光了，只好卖掉那件长衫，得了几块钱做盘费，继续前进。快到临川时，被起义军的哨兵发现，怀疑他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将他扣留。哨兵将毛泽覃押解到临川，周恩来等好几位领导同志都认识他，立即安排他到以叶挺为军长的十一军政治部工作。起义部队在临川经过一番休整后，继续南下，转战到广东的潮州、汕头。毛泽覃亦随军到达潮汕地区。部队在此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经过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毛泽覃又随一部分队伍转移至饶平，然后与朱德、陈毅率领的从三河坝撤下来的部队会合。随后在朱德、陈毅等的领导下，转战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大庾、汝城、韶关一带山区。在此，得知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走上井冈山的消息，朱德非常高兴，立即派毛泽覃去井冈

山与毛委员联络，汇报有关情况。

那是一个初冬的日子，蜿蜒的群山罩着低沉的阴云。毛泽覃身穿一套国民党正规军军官的服装，带着证件，化名覃泽，顺利地通过反动派一道又一道关卡，来到茶陵坑口。

坑口是茶陵与宁冈的交界之地。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并建立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为了保证我军前线和后方的交通联络，掩护与接送伤病人员，通过袁文才同当地某些人的关系，派出一个没有暴露工农革命军身份的连队，以“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驻扎在坑口。连长陈伯钧听说来了一位身穿国民党军官服装的人物，立即警惕起来。

毛泽覃首先找地方上的一些当权人物打交道。当时，住在坑口的伪团长罗克少，闻报国民党正规军的一位长官来到这里，立即率领一班土豪劣绅出来迎接。他看了毛泽覃的证件以后，又听毛泽覃讲话的口气很硬，不敢怠慢，命令摆酒接风，设宴招待，晚上还陪着打了几圈麻将。毛泽覃机警地和敌人周旋了一番，打听到有井冈山的一个连驻扎在这里，便找到该连的驻地。陈伯钧了解到这位“特殊身份”的人物与毛委员的关系和他所负的使命以后，立即派人送他上井冈山去见毛委员。毛泽覃向毛委员汇报了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留下的部分队伍艰苦转战到达湘南的情况，随后便留在井冈山，积极投入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不久，毛委员派毛泽覃到乔林开展革命工作，从事建党活动。

乔林，位于井冈山北麓黄洋界哨口下面的群山之中，是紧靠两省边界的一条狭长走廊。一个天气晴朗的冬天早上，毛泽

覃率领两个部队干部，离开茅坪，踏上通往乔林的道路。毛委员一边送行，一边叮嘱他们，要在广大农村迅速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要在斗争中培养先进的工农分子入党，加强对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毛泽覃牢记着毛委员的指示，到乔林后，首先通过访贫问苦，召开各种小型的调查会，对于当地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情况，做了广泛而细致的调查。接着，恢复农民协会，创办农民夜校，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一天晚上，在村东头一个土墙房子的堂屋里面，坐满了人，在松明下，大家认真地听毛泽覃讲课。他亲切地说：过去，中国没有共产党，穷人如在黑暗之中，不晓天日，总是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不能翻身。现在，共产党来到世界上，穷人有了救星，好象天亮时候，太阳从东方升起来，大放光明。我们穷人要站起来努力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夺回我们的劳动果实。又说，从前土豪说穷人是块“死铁”，没有用处。我说穷人是块好铁，大有用处。共产党好比一座通红的熔炉，铁在熔炉里可以百炼成钢，好钢好铁能够制造好刀好枪，打起敌人来最有力量。只要我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跟着毛委员，跟着共产党，革命就一定能胜利。接着，他针对那种认为“穷人受苦是命中注定”的错误思想，讲了几个当地贫苦农民受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故事。其中一个是这样的：

离乔林不远的井水背，有个穷人，一字不识，十七岁给地主做长工，用泥团记出工的天数，每干完一天活，就在他的箱子里放一个小泥团。干完一年，没提防狗地主往他的箱子里倒了一碗水，泥团成糊，结帐那天，他回答不出这一年有多少

个工，地主不肯给钱，他就算白干了一年。第二年到另一个地主家里做长工，每干完一天活，便在小箱子内放一根小柴棍。到了年底，没提防狗地主又把他的一箱子小柴棍偷偷烧掉，他又算白干了一年。第三年再换一个地主家做长工，他改用纸笔画圈的办法来记出工天数，并且不管白天黑夜，都把那张纸藏在身上，小心保存，免得地主偷去。年终结算，没想到狗地主算盘珠子一响，这里一扣，那里一扣，结果又被扣得分文不剩。这个长工的父亲气愤不过，上吊自缢。不久，他的母亲也被活活气死。

碰巧这个故事中的长工就在场，毛泽覃一讲完故事，他就满腔怒火地站起来，控诉陈云开等土豪劣绅的罪行。陈云开就是这个故事中的头一个地主。接着，好几个人发言控诉陈云开对穷人的压迫和剥削。群众怒吼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就从陈云开开刀！”

这时，毛泽覃等同志抓住火候，立即组织和领导群众向土豪劣绅展开斗争。就在第二天的清早，一声锣响，农民协会集合一千多人，有的手执梭镖，有的背插大刀，更多的人是拿着棍棒、扁担、斧头、柴刀。出发前，毛泽覃亲自动员，随后，带着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到陈家泉村，围住陈云开家。狡猾的陈云开不承认自己是土豪，说什么他也是吃粗茶淡饭的穷人。这时，一个给陈云开做过长工的青年农民，从他屋里提出几串腊肉、火腿、山珍、海味，走到大伙面前。群众立即燃烧起仇恨的怒火，纷纷挤上前来，一桩桩，一件件，清算陈云开的罪恶史、剥削帐，算得陈云开汗流夹背，目瞪口呆。一声呼喊，愤怒的群众冲进陈家大院，打开他的仓库，挖出他的浮财，将他的金银财宝没收归公，上交政府，粮食、衣服、耕

牛、农具等物则由农会统一分配给贫苦农民。

经过斗争实践的考验，毛泽覃着手发展新党员，建立党支部。一天深夜，在村中间一栋青砖房子的楼上，毛泽覃主持新党员入党宣誓。房子一头放着一张桌子，点着一盏油灯，墙上挂着一面红旗，上面画着镰刀斧头的图案，写着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字母“CCP”，红旗下面贴着入党誓词：“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会场庄严肃穆，十几个新党员心里热呼呼的，在毛泽覃带领下，先唱《国际歌》，然后一齐举起右手，面对鲜艳的红旗向党宣誓。宣誓以后，毛泽覃给新党员颁发党证，接着又一句一句地解释入党誓词，勉励党员革命到底。就这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宁冈的最早一个农村党支部，在乔林乡建立起来。经过上级批准，由毛泽覃担任支部书记。接着，他又在乔林建立了乡工农兵政府和暴动队，发动和领导广大群众，进一步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党支部和乡工农兵政府建立后，毛泽覃曾因工作的需要，一度离开这里。在这期间，一个名叫陈彭寿的家伙，被土豪劣绅用酒肉拉拢和腐蚀，叛变投敌，写密信给鄱县十都挨户团团团长贾少隶，要他带人来偷袭乔林，扑灭乔林的革命烈火。我党的一个地下交通员觉察，给了这个叛徒以应有的惩罚。毛泽覃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报告毛委员。毛委员指示他，要抓住这件事进一步对党员进行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于是，他再次来到乔林，举办党员训练班，训练党员。

鉴于陈彭寿的叛变事件，毛泽覃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官僚、买办、土豪劣绅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与他们是不共世界、不共

天日的。第一要记得宁吃穷人的红米粥，莫吃地主的糖和肉。打仗的炮子、炸弹不可怕，地主的糖和肉比炮子、炸弹更厉害，你若吃了他的，革命就会松劲，敌我界限就分不出来，终究要被拉过去，成为革命的叛徒。他还提醒大家，要特别警惕那些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这种人外面穿红衫，心里藏黑货，是一些“红皮白心”的人，我们一定要谨防他们，不要上他们的当。

接着，毛泽覃给大家讲解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他说：党支部就象一个火车头，这个火车头出了毛病，革命列车便不能前进。又象一栋楼房的墙基，墙基不好，整个楼房就会倒塌。然后又说：要建设一个坚强的党支部，提高党的战斗力，就要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还有一次，毛泽覃给大家讲了一个“三子”的故事：乔林有个姓刘的老头，受土豪的欺负，他的田和屋被霸占，小孩卖掉，老婆气死，剩下他孤苦伶仃一个人。土豪还说：三里有一亭，五里有一庙，你有一根棍子、一个篮子、一把勺子，就可了此一生。毛泽覃讲完这个故事后气愤地说：土豪劣绅好比毒蛇猛兽一样，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他们无事生端地坑害穷人，弄得穷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只好拿起“三子”，走东家，串西家，到处讨米要饭。生在庙里住，死在庙里躺，死后没有埋的地方，被抛在荒野里，暴尸露骨，去让野狗咬，乌鸦啄。毛泽覃一番话，讲得许多人痛哭起来。最后，他教育大家说，我们受苦的人，要不走这“三子”终生的路，就要团结起来，努力革命。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经过训练，乔林的广大党员更加生气勃勃地投入战斗。开春以后，乡党支部在毛泽覃的指导下，带领暴动队员在鄞县的九都打了一次土豪。事先，他们派了两个同志（一个铁匠，一

个裁缝)前去侦察,打听到酃县九都大土豪尹子樵的老婆生了一个儿子,当时,尹子樵在长沙附近的一个县当县官,要回家来给儿子做满月酒,准备办一百桌酒席,宴请四乡豪绅。这两个同志侦察回来后,把情况汇报给党支部和乡工农兵政府。在尹子樵做满月酒的那天,毛泽覃从工农革命军中拨来二十条枪,率领一百多人,由铁匠带路,连夜赶往酃县九都,半夜时分,悄悄地将尹子樵家包围起来。留在尹家做内线的裁缝,偷偷打开后门。铁匠带人从后门摸进去,恰好尹子樵从过道里朝后院走来,几个暴动队员迎上前去,当场缴了他的驳壳枪。尹子樵吓得连忙跪倒在地,磕头求饶。毛泽覃一声令下,队员们一涌而入。那些到尹家来贺喜的穿长马褂的豪绅,一个个被吓得面色腊白,瘫软在地。暴动队员把三十几个土豪一一捆绑起来,又把尹家敲骨吸髓得来的财物,以及四乡豪绅送的礼物,全部搜了出来。不多一会,大家便带着金银财物,整队离开尹家。直到暴动队员撤至两县交界地的时候,酃县九都、十都、十一都的挨户团才追来。毛泽覃一方面派人回井冈山送信,一方面指挥暴动队员阻击敌人。不久,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赶到,一个冲锋,把酃县挨户团打得呼爹叫娘,各自逃命,我方人员未受一个损失。

乔林,经过斗争锻炼,成为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个坚强堡垒。乔林乡工农兵政府和暴动队,由于工作出色,作战有功,曾获得毛委员奖给的红旗。

泉江火炬

一九二八年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第一个春天到来

的时候，毛委员率领工农革命军的健儿向遂川进军，打垮了反动地主武装肖家壁和罗普权的靖卫团，迅速攻占遂川县城。毛泽覃参加了这次战斗。战斗结束以后，随部留在遂川，担任团政治部代理主任，并任遂川县委委员和县游击大队党代表。

遂川是井冈山的南大门，夺取遂川，对于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着重大的意义。毛泽覃根据毛委员的指示，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和工农武装。他首先来到距县城五里的西庄，耐心地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群众悄悄地告诉他，村子里有两个向土豪告密的坐探。毛泽覃查明后，立即逮捕和惩罚了这两个坏家伙。随即恢复农民协会，组织暴动武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闹暴动的斗争。暴动群众冲进土豪家里，分了他们的谷米浮财，烧了他们的地契债约。在暴动中，西庄群众取出从前藏起来的六支枪。毛泽覃望着这些枪，非常兴奋地抚摸着。他问大家：“这玩意是怎么保存下来的？”群众告诉他，西庄在大革命时期就成立过农民协会，在共产党员王次棣的领导下，从敌人手里夺得一些枪支。大革命失败后，敌人在村子里大肆捕人杀人，到处搜查武器，王次棣出主意把枪藏在祠堂的匾额里，敌人翻箱倒柜，挖地三尺，没有找到这些枪枝。后来，王次棣在西庄站不住脚，党组织便把他转移到南康去做地下工作。

当毛委员从毛泽覃等的汇报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要派人把王次棣找回来，后来又接见了王次棣和西庄的代表，指示他们：要以六支枪为基础，尽快地把游击队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彻底革命。要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保卫政权。回到西庄以后，毛泽覃、王次棣根据毛委员的指示，号召贫苦青年参加游击队，当即有四十多人报名。接着，在遂川城万寿

官成立了县游击大队，由王次樛任大队长，毛泽覃任党代表。

县游击大队成立后，毛泽覃又率领工农革命军和县游击大队的部分干部和战士，高举暴动火炬，深入遂川四乡，在泉江两岸的广阔土地上，点燃了熊熊的革命烈火。

在大桥，毛泽覃在胡家祠堂召集农民协会会员开会，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号召穷人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和土豪劣绅。随即组织暴动队，到坑口打了土豪赖芳远，没收了赖家的粮食、衣服、腊肉、家畜等物；又到横冷打了土豪冯久远，没收了他家的财产，缴了他的三支长短枪、一支三角锄和两支雷火炮。

在白樟，毛泽覃在一个祠堂里召开群众大会，亲自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从前吃辛苦，今日出头天。”他说：穷人只有革命才有出路。土豪劣绅就是我们革命路上的石头，我们要搬掉它，如果不搬掉它，它就会把我们碰倒。接着，率领暴动队打了陈耀堂的土豪，并把胆敢违抗罚款令的陈耀堂逮捕起来，送往茅坪关押。

在上坑，有两个罪大恶极的土豪畏罪潜逃，群众害怕“老虎回来伤人”，不敢大胆起来。毛泽覃立即派人出去侦察，打听土豪的下落，最后抓住了这两个凶恶而狡猾的家伙，予以严惩。群众解除了顾虑，提高了觉悟，纷纷投入了暴动的洪流。

在草林，毛泽覃跟随毛委员来到这里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落实党对工商业的政策。当他得知镇上的几个土豪将大批财物转移和埋藏起来，一时没有找到，便带着几个本乡本土的游击队员，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终于在一条山沟中的几栋房子里，将土豪埋藏的许多粮食和财物搜了出来。

在广泛发动群众、领导农民暴动中，毛泽覃不辞劳苦，东奔西走。他的工作魄力，他的革命品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覃对战士和群众非常关心。每天晚上他都坚持查铺，发现有的同志被子没有盖好，就轻轻地帮助盖好。平时总是叮嘱大家，要注意保护好自已的脚，不要冻坏，不然打起仗来就跑不动。有的战士负伤或生病，他经常去探望和慰问。一次，一个伤员在送往红军医院的途中，由于山上风大，冻得直打哆嗦。毛泽覃发现后，立即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盖在伤员身上，而自己忍受着寒风的袭击。他还经常帮助老乡做事。一天，他在路上看见一个老大娘挑东西，走路有点费劲，立即赶上前去，帮助老人家把东西挑到家里，使她非常感动。住在村里，他每天都起得很早，时常串东家，走西家，看看群众煮的什么饭，弄的什么菜，对群众的生活极为关怀。无论战士和群众，无论大人和小孩，都非常敬重他，喜欢他，与他的关系很融洽。在白樟的时候，许多青年舍不得离开他，找到他说：“老毛同志，你走的时候可不要瞒着我们，我们要跟你一起去闹革命。”

毛泽覃在战士和群众面前，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遵守革命纪律。人们看到，他总是与普通战士和贫苦老乡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苦在一起，乐在一起。在白樟的时候，他住在一个姓胡的暴动队长家里。胡家贫穷，生活清苦，毛泽覃和他们一起喝稀粥，吃野菜。那位暴动队长的妈妈过意不去，想给他弄点好菜，几次拿鸡蛋去煮，都被他发现后劝止。一次，老妈妈怎么也不听劝说，两人争了好久，毛泽覃表示，如果硬要煮蛋，他就“罢餐”。结果，那位妈妈只好含着眼泪又把鸡蛋放回去。

经过一段广泛而深入地发动群众的工作，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又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在热烈的鞭炮声中宣告成立。毛委员率领毛泽覃、陈正人等部队和地方的负责同志出席了成立大会。这次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是毛泽覃领导的政治部负责的。为了庆祝工农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工农翻身后的第一个春节，毛泽覃特意找到何长工，要他编了几段歌词，并要搞宣传的同志配上曲子，教大家唱。在庆祝大会上，红军和群众高兴地唱道：

过新年，过新年， 今年不比往常年，
共产党军到这里， 又分谷来又分田。

过新年，过新年， 你拿斧子我拿镰，
高举红旗开大会， 穷人翻身掌政权。

捍 卫 罗 霄

正当工农革命军主力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的时候，赣敌朱培德派出伪二十七师七十九团一个营，占据宁冈新城，企图在县靖卫团的配合下，进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委员随即率领部队赶回宁冈，于二月十七日在茅坪召开军事会议，制定攻打新城的作战方案。毛泽覃奉命率领遂川游击大队赶到茅坪，出席军事会议，接受战斗任务。晚上，部队出发之前，他又召集遂川游击大队开会，进行战前动员。当天深夜，工农革命军和地方游击队悄悄地将新城团团围住。毛委员亲自来新城对面的旗山岭上，指挥战斗。

这次战斗打得很激烈，敌人凭着他们的武器好，机枪多，拚命抵抗。打到中午时分，毛委员命令南北两门加强火力吸引敌人，东门战士揭开附近房屋顶上的瓦片，架起我军仅有的两挺机枪猛烈射击，压住敌人火力，迅速组织力量，首先从东门突进去。主攻东门的是一团一营和遂川游击大队。毛泽覃与一营长根据毛委员的指示，决定火烧城门，组织力量强攻。在战斗中，毛泽覃身先士卒，机智勇敢，率领部分战士和游击队员，出敌不意地冲到城墙底下，一面命令战士在东门堆起柴草，浇上煤油，点起熊熊烈火，一面指挥早已组织好的登城突击班和冲锋队，在滚滚浓烟和烈火中，迅速架梯登城，双管齐下，首先攻破东门，杀入城内。这时，敌人企图打开北门逃窜，又遇到我教导队的阻击。于是转向西门逃出，恰好正中我二团一营和部分赤卫队、暴动队的埋伏。敌人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共五百余人，全部被歼，敌营长王国桢和靖卫团长李树滋当场被击毙，我缴枪数百。

毛泽覃率部攻入新城后，首先攻占伪县政府，打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时，一个又胖又大的家伙，化装从西门外的水沟里逃跑，被当地当过多年长工的暴动队长文根宗捉住，发现他就是伪县长张开阳。群众个个愤怒万分，纷纷冲上前去，要向这个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讨还血债。毛泽覃立即分开众人，对愤怒的战士和群众说：“留下活的，好拿到大会上审判。”随即命令把他捆绑起来，押往茅坪。部队打扫完战场回到茅坪后，毛泽覃召集群众武装开会，进行战斗总结，指出：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今后你们还是回到家里，做好一切准备，一声召唤，就能立刻集合起来打仗。

二月二十一日，在宁冈的耒市召开万人大会，公审伪县长张开阳。当大会宣判后，毛泽覃立即跳上台一手将张开阳抓起，押下台来，亲自进行处决。广大军民看到这个血债累累的家伙遭到应有的惩罚，无不拍手称快。大会还宣布成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推举文根宗担任主席，毛泽覃兼任宣传部长。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建立起县一级的红色政权，革命红旗更加高高地飘扬在湘赣边界的井冈山上。

新城战斗以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与扩大。此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留下的部队和农军在湘南发动了著名的年关暴动，又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但是，执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湘南特委，一方面极力反对和阻挠起义部队向井冈山发展；一方面又派代表到宁冈，取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强行把井冈山的部队调往湘南。在井冈山部队开往湘南的途中，毛泽东一方面率领部队在汝城一带阻击尾追湘南起义部队的敌军，掩护起义部队转移；一方面派毛泽覃带领一个特务连去耒阳找朱德、陈毅联系，迎接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队伍和湘南农军上井冈山。

毛泽覃原奉朱德的命令到井冈山与毛委员联络，现在又奉命迎接南昌起义留下的部队上井冈山来，共同建设湘赣边界农村革命根据地，他感到十分高兴。接到毛委员的命令后，立即率领部队日夜兼程，赶往耒阳，在耒阳城郊找到了朱德、陈毅，向他们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根据目前形势，湘南起义部队要在湘南站住脚是不可能的。部队必须向井冈山靠拢，在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

四月，朱德、陈毅率领部队走上井冈山；月底在宁冈的耒市和毛泽东的队伍胜利会师。五月四日，两军在耒市召开会师

大会，宣告了红四军的成立。

两军会师以后，敌人非常害怕，纠集湘赣两省的兵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红四军在毛委员和朱军长的领导下，英勇迎击敌人，于五月上旬和中旬，接连取得了五斗江和草市坵战斗的胜利。毛泽覃参加了这些战斗。当时，他任三十一团的一个营党代表，在自己部队中，开展生动活泼、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反复教育战士，在战斗中要勇敢顽强，不怕牺牲，遵守纪律，听从指挥。这对于保证战斗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草市坵战斗后，毛泽覃和伍中豪率领三十一团一部由永新转战到吉安敖城一带，进行游击活动。他们在敖城街上和附近农村张贴许多革命标语，深入群众，发动农民起来暴动，成立了一百多人的赤卫大队。毛泽覃代表红四军送了四条枪给他们，并在赤卫大队的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农民世代受豪绅的压迫，痛苦不堪，现在大家要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我代表红军把这四条枪送给你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去干，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和扩大革命武装。临别前夕，他还用红布做了一面锦旗，题了“工农先锋”四个大字，送给当地党的组织，鼓励他们积极革命。不久，这个赤卫大队很快扩大成为拥有五百多人枪的地方游击队。

完成任务以后，毛泽覃和伍中豪率领部队回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接着，红四军又胜利地进行了龙源口战斗，粉碎了两省敌人的“围剿”。

在这次战斗中，毛泽覃率领三十一团一部，配合兄弟部队作战。在战斗中，他打得勇猛而又机智。当他指挥的部队去夺取一个已被敌人占领的山头，遭到敌人密集火力的扫射时，他

立即召集几个连队的干部和战士商量，认为强攻对我不利，要设法派出一部分队伍抄小路打上去，出其不意地夺取敌人的阵地。于是他们找来两个烧炭的老乡做向导，带领部分战士，从敌人的背后冲上山头。山头上一打响，毛泽覃立即率领部队勇猛地冲杀上山，夺取了敌人的机枪阵地。战士们抓住敌人丢下的四挺机枪。掉转枪口，不停地朝着纷纷向山下逃命的敌人猛烈扫射。随后，毛泽覃一声喊：“冲啊！”部队就如离弦的箭，飞快地向山下冲去，杀得敌人尸横遍野，鬼哭狼嚎。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的斗争进入全盛时期。

从斗争实践中，毛泽覃体会到，大哥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是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他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与干扰井冈山斗争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悲观思想，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一次，他在宁冈赣市向红军战士传达毛委员的指示，指出怀疑红旗能否打得下去的思想是错误的，斩钉截铁的说：“红旗是能够永远打下去的，一定要打到底！”他曾在大井等处召开的群众会上，多次向战士和群众宣传红军是工农的军队，是穷人的亲人；红军保护人民，人民帮助红军，红军和人民是一家人。红军武器少，又能打胜仗，就是靠人民群众的支援。群众是共产党和红军的“城墙”。国民党反动派的城墙在南昌、吉安，是土作的，一打就倒。我们共产党和红军的“城墙”是打不倒的。毛泽覃的这种坚定信念和斗争精神，在红军和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踏 遍 青 山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恐慌。一九

二八年底，湘赣两省的军阀又集中兵力对井冈山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进一步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毛委员和朱军长决定分出一部分队伍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则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红四军曾来到吉安县的东固。当时，毛泽覃因在大庾战斗中负伤，被留下来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一边养伤，一边工作。

伤愈以后，毛泽覃深入群众，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扩大地方武装。这年夏天，他打听到在离东固不远的水南，盘据着两个属于地方军阀的反动部队，其中何、马两个头目各有一个干儿子，分别名叫大水和小水。他们对何、马二人纵兵残害百姓，到处烧杀淫掠，表示不满，有投奔红军的念头。毛泽覃决定深入虎穴，探究虚实，主动去与大小二水取得联系，动员他们“倒戈投红”。

古历四月中旬的一天，毛泽覃戴一副眼镜，穿一件长衫，化装成一个算命先生，前往水南。他在路上遇到一个老乡，便与他打招呼。这个老乡名叫罗国倬，家里很穷，扛着一捆扁担到外地去卖。他看一眼这个三十上下的“算命先生”，身材高大，眉目清秀，既没有瞎，也没有瘸，不象一个穷困潦倒的走江湖混饭吃的人，恐怕是个“不良之辈”，就没理他。毛泽覃微笑着问他：“老乡，我来给你算个‘八字’好不？”罗国倬没好气地回答：“你算你的八字，我卖我的扁担，你我河水不犯井水，休要罗嗦！”毛泽覃并不生气，反而主动地与他攀谈起来，告诉他说，穷人命苦并不是天生的，是因为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罗国倬一听，这个“算命先生”的话讲得有理，打动人心，想必是有点来头的，于是就问：“你是从

哪里来的？”毛泽覃环顾四周无人，坦然地回答说：“是从井冈山下来的。”接着，毛泽覃拿出几块银元，买下他的扁担，让他把扁担寄放在附近的村子里，带路到水南去，帮助干点事情，因为他是本地人，人地两熟，干起事情来要方便些。罗国倬见他果然是个“红的”，就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当向导的任务。随后，便把毛泽覃带到水南，找到大小二水，在水南镇上的一个酒店里，与他们进行了极秘密的会谈。后来，大小二水终于率领四百多人，枪向红军投诚，使我地方武装得到发展。

一九二九年秋，我党策动由地下党员罗炳辉领导的吉安靖卫大队起义。一九三〇年初，罗部和一些地方武装合编为红六军，不久又改为红三军，黄公略任军长；政委本是陈毅，因调红二十二军任军长，暂缺；毛泽覃任政治部主任，代行政委职权。他和军长黄公略一道，率领该军在赣水两岸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〇年十月初，红一方面军所辖一、三军团一举攻下吉安。毛泽覃被任命为中共吉安县委书记、赣西南后方办事处主任。不久，毛泽覃又以特派员的身份，协同红二十二军军长陈毅和政委丘达山，率领该军的一部，打回遂川，进行革命活动。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覃带队伍来到西庄，他一进村，就看见共产党员王佐农坐在村口，连忙叫道：“王佐农！王佐农！我们就是要找你的。”王佐农立即站起来，迎上前去，紧紧地抓住毛泽覃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此时，西庄的群众纷纷来到村口，毛泽覃向大家介绍了军长陈毅和政委丘达山，又说：今天，党派我们到你们这里来协助工作，恢复农民协会，重新建立政权，又要象以前那样轰轰烈烈地暴动起来。王佐农一听，

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他不仅没有把自己的喜悦心情表露出来，反而低着头，含着泪，声音低沉地说：“毛泽覃同志，你们再不来，我们大伙就没有活命了。前年，你们走了以后，白匪报复我们。”王佐农这一说，立即在乡亲们的心中点燃了仇恨的火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控诉白匪的罪行。毛泽覃说：“乡亲们，现在我们来报仇！”王佐农一听说报仇，刷地一下把衣襟擦开，露出一支驳壳。毛泽覃一看他还有枪，猛地抓住王佐农的手臂，兴奋地说：“噢，你还有这个硬家伙？”王佐农说：“没有这家伙，哪里还有命？”接着，毛泽覃又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重新夺取政权。当天，红军进占县城。罗、肖二匪的地主武装望风而逃。毛泽覃和陈、丘等随即率领部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正式成立遂川县苏维埃政府，开展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并帮助建立了一支新的革命武装——遂川县特务连。十月二十六日，特务连在城内张家祠成立，毛泽覃到会表示祝贺，并赠送了两支枪给他们，加上原西庄保存下来的两支半枪（三支枪，其中一支坏了撞针，打不响），一共四支半枪。后来这仅有四支半枪的特务连，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道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到拥有近七百支枪的红军独立团，在坚持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二次反“围剿”期间，毛泽覃主持赣西南后方办事处，负责筹集钱粮物资，领导军工生产。办事处下面有兵站、兵工厂、被服厂、特务连，共计两三百人。反“围剿”中缴获的武器，凡损坏的都送到这里来修理。毛泽覃领导兵工厂的同志，在设备非常简陋、全凭手工干活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尽快修好，源源送往前方，有力地支援了反“围剿”的战争。还

有打土豪得来的或用别的方法筹集的大批金银、粮油等物资，均由毛泽覃设法运往部队，许多重要物资，都是由他亲率特务连的战士护送，跋山涉水，披星戴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第二次反“围剿”以后，一九三一年六月，成立永（丰）、吉（安）、太（和）特委（后又改为中心县委），毛泽覃任书记，兼独五师政委。第三次反“围剿”期间，他和师长肖克一道，根据毛泽东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的作战命令，率领该师在富田一带牵制陈诚、罗卓英的增援部队，到处袭击敌人，阻止敌人前进，以配合主力红军在各处完成歼敌任务。在老营盘的战斗中，肖克和毛泽覃率领独五师与力图增援蒋鼎文的陈、罗某部展开激战，毙伤大量敌人，缴枪一百余支，使之不能前进一步，从而有力地保证了红三军在老营盘取得歼敌一个旅的重大胜利。老营盘、方石岭战斗以后，红三军在转移中路经吉安东固的六渡沟山峡，突遇敌机轰炸扫射，黄公略同志不幸中弹牺牲。临终时，他叮嘱在身边的毛泽覃，要他在前委和总部未任命新的军长以前，代为指挥全军的工作，并且号召全军同志，继续努力革命。黄公略牺牲后，中华苏维埃为纪念黄公略，决定将吉安县改为公略县，由毛泽覃任公略县委书记。肖克调去湘鄂赣根据地工作以后，又由毛泽覃兼任独五师师长。

在这期间，毛泽覃与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结婚。贺怡亦在公略县委工作，任县委妇女部长。

毛泽覃在担任永、吉、太苏区和红军独五师的领导职务期间，由于任务繁重，情况复杂，既管地方，又抓军队，难免在工作中有些失当的地方。例如在同志关系中，比较注意坚持正确路线和革命原则，而对教育和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有时则注意得不够；在土地革命中，执行正确路线是坚决的，

但在分配胜利果实时，却有不适当地照顾机关干部的地方。这些情况，机关的同志曾向毛泽东反映，当毛泽东将意见转告给他时，他感到很委屈。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他，要他注意原则，注意影响，不要以为是兄弟关系就可望得到庇护，就可以不讲党性，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

从此，毛泽覃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工作中既大刀阔斧，又细致谨慎，特别注意贯彻党的政策，改进工作作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不断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敌军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烧光、抢光、杀光）政策，使永、吉、太一带的许多地方遭到严重破坏。毛泽覃根据党的指示，千方百计地救济群众，恢复生产，曾先后数次亲自带着大批粮食、耕牛、衣服、救济款和医疗队到遭受白匪残害的东固等地慰问，把党和红军的温暖带给广大的苏区人民。当他了解一个姓张的贫苦农民家里极为贫困，没有被盖，便把红军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经组织上分配给自己的一床鹅绒被子赠送给他，使得这个农民非常感激。一次，上级拨给东固区一笔救济款，区苏维埃政府没有发放给群众，而用来修了一栋楼房，毛泽覃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区苏负责同志，指出：这笔钱是用来救济群众和恢复生产的，拿来给区苏机关盖楼房是错误的。

在开辟和巩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毛泽覃在永、吉、太一带先后工作和战斗过好几年。他的足迹，踏遍了赣水两岸的千山万岭；他的深情，留给了红色区域的千家万户。

斩 断 魔 手

毛泽覃在永、吉、太苏区工作和战斗的几年中，活动的中

心在东固一带。

东固，是一个山高林密、崖陡谷深的山区，纵横数十余里，是起伏绵延的罗霄山脉的一段。故有“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之称。这里是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西部自然屏障，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在军事上经常进攻这里，而且派遣反革命分子潜入苏区，进行破坏活动。东固区委书记的重要职务，就曾一度被反革命分子罗焕南所篡夺。

那是一九三〇年冬，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内部发生“富田事变”。在处理这一事变中，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国民党反动派以为有机可乘，密令兴国崇贤的靖卫团长罗焕南，用假投诚的办法，钻进革命队伍来进行破坏活动。据说，蒋介石许诺罗焕南，如果他能杀掉共产党员、工农干部三千人，就给他两斤黄金的奖赏，还要委派他一个相当大的官职。罗焕南于一九三一年初率部“投降”红军，并于同年四月窃取了东固区委书记职务。到职不久，就以肃反为名，大肆捕人杀人。他毫无根据地诬蔑许多共产党员、少共团员、工农干部、贫苦农民是“AB团分子”、“反革命分子”，采取吊打、灌辣椒水、烙铁烙、煤油烧等各种残酷手段，严刑逼供，然后一批一批地进行杀害。最先杀的是一个姓史的共产党员，因为他在党员会上发表意见说：“捉AB团，为什么尽捉党团员、贫雇农？”于是就拿他先开刀。接着就大杀起来，有一天杀了九十九个，只差一个就是一百。一个卖草药的老头子数榜上的名字，见是九十九个，说了一句“还杀一个，就是一百”，结果就说他是“AB团的交通员”，把他也抓起来杀掉，凑成一百。

罗焕南的罪恶行径，引起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愤怒，他们

派人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情况。毛泽东同志听到反映后，立即派原来在东固一带工作过的一个姓胡的同志到东固了解情况。这个同志到东固后，责问罗焕南为什么乱杀人？罗焕南说：“AB团到处有，不仅下面，中央也有。你对杀AB团不满，可能就是AB团分子。”这个同志立即返回，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有关情况，并说：“罗焕南这家伙厉害得很，我的脑袋差一点搬了家。”此时，以毛泽覃为书记的永、吉、太特委刚刚成立。于是，毛泽东又派毛泽覃到东固来调查处理。

毛泽覃来到东固后，首先深入到群众中，查明罗焕南杀的是一些什么人，他们的家庭出身、个人历史和革命斗争中的表现怎样，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在东固苏维埃政府里召开大会，发动党员和群众，揭发、批判罗焕南的罪行。毛泽覃拿出一张已被关进“班房”、准备即日杀害的人员名单，质问罗焕南：为什么要杀的这些人都是贫雇农？难道这些过去受压迫，现在得翻身的人都去搞AB团？罗焕南千方百计地进行狡辩。毛泽覃很气愤，拳头在桌面上一捶，说道：混帐！哪有这些过去做长工、打短工的贫农、雇农、区乡干部、党团骨干都去搞AB团、当反革命的！当即责令罗焕南检查自己的错误和罪行。会后，毛泽覃立即去到牢房里，亲自释放了那些被关押的党员和群众。被释放的同志，一个个望着毛泽覃，热泪盈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事后，毛泽覃及时向上级党的组织作了汇报。上级党委考虑到罗焕南属于“起义投诚人员”，如何处理，有个政策问题，究竟是敌人打进来有意破坏，还是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一时弄不清楚，故为慎重起见，只决定对罗焕南实行调离审查，暂未处理，仍让他去担任永丰潭头区委书记。但为防止类

似事件发生，明确规定，今后要处死人，必须经过特委批准。可是，这个反革命顽固派，一到新的工作地点，又瞒着特委领导，大肆捕人杀人。许多区委、区苏、村党支部、乡苏维埃和区乡游击队的干部遭到他的毒手。潭头少共区委书记熊桂山（党员），眼看罗焕南大批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感到问题严重，反复思考：姓罗的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越想怀疑越大，于九月间，便冒着生命危险，以研究工作为名，召开有二十多个党团区乡干部参加的会议，讨论罗的问题。他说：罗焕南杀 AB 团，都是杀些革命坚决的党团干部和贫苦农民，现在我们分析一下，到底谁是真心革命？接着，便将被杀的名单拿出来让大家分析。经过分析，大家认为这些被杀的都是真心革命的同志。会议决定，将罗杀人的情况报告特委。当即写好报告，到会的人都在上面签了名，盖了印，并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会后，熊桂山又带着一个同志化装成卖爆竹的商人，到兴国崇贤调查罗焕南的家庭和历史情况，然后赶到特委机关驻地。当时毛泽覃不在家，由毛泽覃的爱人贺怡接待他们，看了他们的报告，听了他们的汇报，对他们说：这份报告是你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写的，证据确凿，那你们先回去，告诉在报告上签名的这些同志，不要害怕，不要声张，等毛泽覃同志回来后，我们马上研究。

毛泽覃回来后，贺怡向毛泽覃作了汇报。毛泽覃看了报告、听了汇报，非常气愤，当即召开特委有关的领导同志开会，作出决定，立即逮捕和镇压这个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因为他当时要到瑞金去开会，不能亲自去处理这个问题，就派特委组织部长余泽鸿去执行这个任务。临行前，毛泽覃指示余，要带一部分武装，作好充分准备，防止他狗急跳墙。余泽

鸿根据毛泽覃的指示，作好布置以后，便通知罗焕南前往沙溪，参加特委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罗一到会，就立即被特委保卫局的同志解除武装，逮捕起来。余泽鸿当场宣布了特委的决定，号召大家彻底揭发罗焕南的罪行。

十一月的一天，特委在潭头的沙洲上召开公审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潭头附近的好几个区的干部和群众，四千多人。东固区也派了二十多个代表前来参加公审大会。会上，个个满腔怒火，人人都来申冤，揭发和控诉罗的严重罪行。罗焕南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不得不供认：他是接受国民党蒋介石以高官和重金的收买，用假投诚的办法，钻进苏区来进行破坏活动的。群众一听，怒不可遏，纷纷要求严惩这个杀人的刽子手。根据群众要求，特委宣布，将血债累累、死有余辜的反革命分子罗焕南处于死刑，立即执行。到会的同志拍手叫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

会后，毛泽覃亲自到潭头慰问和抚恤受害家属。

由于东固战略地位的重要，毛泽覃把工作的重点仍然放在东固，经常到东固区活动，与区委和区苏的同志们一道，放手发动群众，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健全和巩固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努力发展生产，大力支援前方，使东固的各项工作都搞得非常出色，曾被评为中央苏区的第一个模范区。

勇 战 逆 流

毛泽东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率领红军转战赣南、闽西的广大山区，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巩固与扩大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水两岸和武夷山区，出现了

“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大好形势。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游击战争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可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通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攻击党的正确路线，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广大干部和党员。

于是，一股逆流朝着中央苏区汹涌而来。

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接着就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当时是党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为他坚持党在边缘地区的政策应不同于巩固地区的政策，而被左倾领导错误地说成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①。在中央苏区，他们又无理地给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位同志扣上“‘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执行人”的帽子，开展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对邓、毛、谢、古的所谓“反党派别”的斗争。

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位同志，都是红军和地方的重要干部。在受打击期间，邓小平任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维俊先后担任江西省军区参谋长、乐安中心县委书记，古柏任总前委秘书长。四人均属江西省委的主要成员。他们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反对和抵制王明的左倾错误。针对左倾错误的“城市中心论”，他们明确地提出过“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敌人的统治力量强大，应该向着广大农村即左倾错误领导说的“高山”深沟、“穷乡

^①转引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三十三；见《毛泽东选集》一九六四年版第一〇〇一至一〇〇二页。

僻壤”发展，只有那里“是敌人力量弱的地方”^①。因此，他们反对攻打设防坚固的赣州，主张在苏区内肃清地主“土围子”，巩固农村根据地，积蓄力量，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左倾错误领导则认为上述观点是对红军的“悲观失望”，“主张放弃苏维埃根据地”，是对抗“党的主张”，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之处^②。

在粉碎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他们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把敌人引到群众条件好的苏区来消灭，反对左倾错误领导把红军拉到白区去硬拚，把敌人挡在根据地的大门外作战。左倾错误领导攻击他们的这种主张是“退却逃跑”，“根本不相信红军有力量在白区消灭敌人”。

在扩大革命武装的问题上，他们认为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应不断发展，并应注意质量，反对用削弱地方部队与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中央红军，和不顾质量地要求“武装一切工农群众”，单从数量上扩大地方武装的作法。左倾错误领导则污蔑这些意见是“实行对扩大红军怠工”，提出要“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并将群众的地方的武装成建制地抽走，编入正规红军，又不求质量地“号召所有一切工农劳苦群众武装起来”，且不合时宜地鼓吹要“准备从自愿军役制变到义务军役制”。

在苏区财政来源的政策问题上，他们不同意左倾错误领导不顾民力，大量发行公债的作法，认为苏区地瘠民贫，加上连年作战，“群众负担太重”，红军应该着重“打土豪筹款子”，

^{①②}《为党的路线而斗争》（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载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十二期。又，本节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或转引自本文。

因而被左倾错误领导诬为是对抗党的“决议”。

在土地问题上，他们坚决执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主张。对此，左倾错误领导则给他们扣上“富农路线”的帽子，攻击“在他们工作过的地方，是土地问题最没有彻底解决的地方”，说他们的作法“是与党的进攻路线绝对相反的”。

正因为他们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执行毛泽东所主张的正确路线，抵制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因而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攻击为执行了一条“反国际反中央”的路线，并结成了“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不断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反对邓、毛、谢、古的所谓“反党派别”的错误斗争，前后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第一阶段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开始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一方面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以反对所谓“罗明路线”为题大作文章，点了邓、毛、谢、古的名，说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一方面又责成江西省委一再向他们工作的地区和单位发出指示，反复发动基层干部和党员，开展对于他们的直接批判与斗争。二月，省委分别向会、寻、安和永、吉、太等地发出指示。三月，中共、少共江西省委又根据中央意图，向江西苏区全党和全团公布了有关会、寻、安和永、吉、太的指示文件，并联合作出决定，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寻、安和毛泽覃领导的永、吉、太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仓皇失措”，“退却逃跑”，“是与‘罗明路线’同一起来源”的“机会主义”^①。接着由中央局

^①中共、少共江西省委：《关于公布对永公太工作决议和给会寻安三县委指示信的决议》（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

出面，直接召开会，寻、安三县的所谓“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通过决议，对邓小平实行围攻。同时又召开了公略（吉安）、万太两个县委的扩大会议，“揭发”所谓“永、公、太的单纯防御路线”，并说，这就是永、公、太执行“罗明路线”的“主要内容”^①。就这样，在江西苏区人为地制造了一场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

毛泽覃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这种凶焰面前，不畏缩，不动摇，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针锋相对地与王明左倾错误作斗争。针对他们在政治上搞机会主义，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胡说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覃尖锐地指出，只有你们这些“洋房子先生”在大城市执行的是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执行的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针对他们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把手伸进各个革命根据地，妄图打倒一大批红军和地方负责同志的行为，又说，你们这些“洋房子先生”到苏区来到处“找岔子”，不过表明你们是“一派的领袖”，是并不代表党，而只代表派的“派别的首领”。谢维俊和古柏支持毛泽覃，也发表过与他相同的意见。为此，左倾错误领导指责他们“进行反中央局的活动”，“形成一种秘密的结合”。当左倾教条主义者点了他们的名，责令他们作出“申明”和“检查”的时候，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将一些污蔑和攻击的不实之辞顶了回去。

第二阶段是从这年五月开始的。五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由党中央和中央局派去的同志直接主持，

^① 《罗明路线在江西》（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六日），载《斗争》第十期。

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声明书的决议》，向他们发动大规模的围攻。会议认为，临时中央迁入苏区以后，江西党三个月的工作是落在革命战争需要之后的，没有完成“紧急动员”、“扩大红军”等任务，原因在于江西党内有一个“怪物”障碍了工作的进行。这个“怪物”就是所谓“单纯防御”的“罗明路线”。而邓、毛、谢、古四同志“就是这个怪物的代表”^①。指责“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勒令他们“立即解散”所谓“根据‘罗明路线’而组织的宗派和小组织，否则立即开除出党”，并且提出“要将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不让一个党员站在这个斗争的阵线以外”。

然而，邓、毛、谢、古四位同志面对着这种种的威胁和恐吓，并不害怕，继续就一些问题与左倾错误展开论战，为自己符合马列主义和党的原则的言论和行动进行申辩，不在原则上让步，因而被会议认为是：“对省委的决议和谈话，只是以外交方式来接受。他们反党的机会主义政纲和小组织的活动，并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的火力面前，解除武装”^②。这段话恰好从反面说明，邓、毛、谢、古四位同志是英勇捍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坚强战士。

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在政治上不能使他们屈服，就在组织上采取措施，给他们以处分，全部或部分地撤销了他们在红军、地方和党的机关的重要职务，并在会上宣布撤销他们职务的时

① 《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的总结》，载《斗争》第十二期。

② 《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声明书的决议》，（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载《斗争》第十二期。

候，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到基层去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作出新的检查，“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①

第三阶段是在五月的省委会议以后，各地方、各单位层层寻找所谓“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六月，公略县委召开会议，重点打击了所谓“以陂头区为首的‘罗明路线’”；同时，万太县委也召开扩大会议，重点打击了所谓“以冠朝区为首的‘罗明路线’”。下面的一些县和区的干部思想不通，公开赞扬“毛泽覃同志政治上很强”，比新任的某领导人“高明”，明显地表示出对反对邓、毛、谢、古不满，王明左倾错误领导指斥他们“留恋‘罗明路线’的几个英雄”^②。九月，江西省委又召开全省代表大会，对江西的所谓“罗明路线”，再次发动进攻。一些地方亦相应地召开了本地区的代表大会，号召继续“加紧党内二条路线的斗争”，克服“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强调“对拥护和留恋‘罗明路线’的分子，必须作坚决的斗争；对顽固不愿意转变的分子，必须坚决驱逐出党”^③。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与邓、毛、谢、古关系密切，对反对“罗明路线”表示不满的同志，都遭到了打击和迫害。

邓、毛、谢、古在总结会议后一段时间，被先后派遣到宁都、兴国等县农村劳动。随后又被分别安排在红军宣传部门、中央派往基层协助工作的“工作团”、政府业务部门和中央苏区北线的偏远地区等处工作。他们在政治上受打击、在组织上受

① 《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载《斗争》第十二期。

②③ 中共江西省委，《党的组织状况》（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处分的情况下，出于压力，也作过一些“检查”，但在原则问题上，并没有让步。毛泽覃还结合自己负责的实际工作，撰写文章，坚持批评左倾机会主义的正确立场。针对王明左倾错误领导空谈马列词句，脱离革命实际，大搞过火斗争，实行惩办主义等种种不良作风，他深刻地指出，讲解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一定要联系到实际工作”，“讲的要能够马上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转变其工作”，否则，“如果空谈一顿，随你讲得起花也还是老样子”^①。又说，不管有无错误或错误大小，凡是对上面的意见和作法，有不同看法或贯彻不力的，一律给予“惩办”，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倾向”，“这种倾向是非常有害的”^②。他还尖锐地批评说，“企图取消各个组织的工作”，“一概集中”在一个部门之下，一项工作之中，“形成一种立三路线时代的‘行动委员会’的方式”“是非常错误的”^③。毛泽覃的这些话，对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来说，是切中要害的，是对他们的一个勇敢的回击。

当时，毛泽东亦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排斥和打击。为了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驳斥王明左倾错误的谬论，他经常深入基层，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毛泽覃有时也跟随毛泽东去搞农村调查。一次，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兴国县长冈乡调查研究。他到长冈乡后，住在乡干部谢采标家里，白天和群众一道参加劳动，晚上走门串户，开会座谈，进行调查研究。开完调查会回

①《永丰、公略、万太、新干、龙冈五县代表大会政治决议》（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

②毛泽覃：《下肖区支部流动训练班工作的检查》，载《斗争》第三十九期。

③毛泽覃：《为全部完成粮食突击计划而斗争》（一九三四年三月二日），载《斗争》第四十九期。

去后，往往还要办公，在一盏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人坐在桌子边翻阅文件材料，一时想着什么，一时写着什么，一直工作到深夜。可是，第二天蒙蒙亮，他又爬了起来，和群众一道下田上山，参加各种劳动。他还抽空给红军的家属播种花生。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覃不断给乡苏维埃的工作以具体的指导。他曾给乡苏维埃的干部作过政治报告，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特点，讲解红军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号召干部做好扩大红军的工作，搞好生产，支援革命战争。还在一次会上，耐心教育干部：扩大红军不能用强迫命令，要尽量宣传和解释，一定要使他们自动自觉入伍，不能使他们家里有任何困难。村不能解决的困难到乡里去解决，乡不能解决的困难到区里去解决，区不能解决的困难到县里去解决。对于红军家属的困难，一定要及时发现及时解决。毛泽覃的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与左倾错误领导的那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长冈乡一次党支部会上，有的干部提出，长冈乡已有百分之八十的青壮年参军，劳力不足，大家想个办法。女共产党员李玉英立即站起来建议，把妇女组织起来学犁田，并且表示，自己愿意带头。会后，她请樟树塘一个姓钟的老汉教她。经过一段学习，她终于熟练地掌握了犁耙技术，成为全乡著名的犁田能手。在李玉英的带动下，二十多天，全乡四个村有一百三十多位妇女学会了犁耙。从此，长冈乡妇女学犁田的先进事迹，就在中央苏区传播开来。毛泽覃到长冈乡后，对李玉英带动妇女学犁田的事迹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并到田间实地观察，当他看到李玉英犁田的动作熟练，稳健，心里非常满意，连声称赞：“好！好！呱呱叫！”

毛泽覃返回瑞金后，向毛泽东汇报了长冈乡妇女学犁耙的情况。毛泽东很赞赏，在瑞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名义，奖给了长冈乡两头耕牛（一头水牛、一头黄牛），奖给了李玉英一条蓝色围裙。这条蓝裙上端镶着红色的条边，贴胸处有一颗红五星，里面绣着镰刀和斧头的图案。毛泽覃向李玉英表示热烈的祝贺。会后，又随同她和参加会议的代表，亲自将这两头牛送到长冈乡。长冈乡群众看到毛泽覃送来两头牛，高兴得跳起来。许多老把式站在这两头逗人喜爱的耕牛身边，抚摩着，评论着，赞不绝口。特别是那头大水牛，膘肥体壮，后来牵去耕田的时候，走得快，耐得久，被大家称为“模范牛”。现在，长冈人民还记得当时编过一支山歌：

我们有条“模范牛”，搞好春耕保丰收，
多打粮食送红军，消灭豪绅乐悠悠。

红 星 不 灭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战略和战术，使得红军没有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苏区越来越缩小，战斗越来越困难，最后被迫于一九三四年十月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长征。

主力红军长征后，毛泽覃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担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覃的爱人贺怡因为身怀有孕，由一个同志转移到他住在白区的老家，隐蔽起来。

当时，红色故都瑞金和整个中央苏区落入敌手。敌人对红军和游击队实行重重包围和封锁，游击队处于极其艰难的斗争环境之中。战斗频繁，生活极苦。没有粮食，就挖笋子、摘野果充饥；没有衣被，就穿着破旧单薄的衣服在风雪林中露宿。正如陈毅曾经生动地描绘的：

风击悬冰碎万瓶，野营人对雪光横。
遥闻敌垒吹寒角，持枪倚枕到天明。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毛泽覃率领红军游击队转战在闽赣边界、武夷山区。当时，敌毛炳文等四个师驻扎在瑞金一带，李默庵、李玉堂指挥的八个师驻扎在闽西各县，敌强我弱，游击队太集中容易暴露自己，被敌吃掉。因此，毛泽覃决定分散、精干队伍，动员体弱的和女同志回到当地，在群众中间隐蔽起来，和群众一道坚持斗争。

部队分散以后，日夜艰苦转战。毛泽覃经常教育部队，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对我不利的情况下，一定要坚定立场，增强信心，运用毛主席的战略和战术，与敌人作斗争，保存自己，度过难关。一次，毛泽覃率领游击队在瑞金县步权的小坑和高砾之间，与活动在该县的一支游击队相遇。下山的那支游击队看到爬上山来的毛泽覃的游击队戴有铁帽，误认为是敌军，慌忙逃跑。毛泽覃大声喊：“大家不要跑，都是自己人。”会合以后，他要大家坐下来休息，然后亲切地说：大家打游击不要慌张，立场要坚定，斗争要灵活，遇着敌人，摸清虚实，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部队分散以后，敌人到处扑空，他们为寻找红军，总结出

三条经验：听响动，看烟火，跟足迹。红军游击队也随机应变地采取各种新的斗争方法。敌人听响动，游击队就在行军中尽量不发出声响，用敲毛竹为联络信号；敌人看烟火，游击队就设法多带干炒米，或者摘野果充饥；敌人跟足迹，游击队就从没有路的深山密林中穿行，有时把鞋子倒穿起来迷惑敌人。这样，弄得敌人有耳听不见，有眼看不见，而游击队则经常出敌不意，袭击和伏击进山“搜剿”和抢劫的敌人，捣毁敌人的据点和哨卡，杀掉那些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恶霸和叛徒。

一次，毛泽覃指挥部队在谢坊伏击敌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那是一九三四年冬天，敌人尾追红军直往谢坊扑来。毛泽覃对谢坊的干部和群众说：大家不要害怕，我们是独立师的队伍，已经做好准备，决心吃掉这股敌人。他调动部队在离谢坊不远的山上，分散埋伏下来，布下一个口袋。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红军独立师在谢坊游击队的配合下，突然发起猛攻，打得敌人尸横遍野，鬼哭狼嚎，当场击毙伪团长一人，缴枪一百多支，俘敌数十名，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然而，由于环境的困难，加上红军长征以后，被留下来担任中央分局书记的项英，继续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战略和战术，将部队集中起来，与优势敌人硬拚，结果使留下来的红军不断遭到损失，队伍越来越小，生活越来越苦，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会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于二月十三日给中央苏区分局发来电报，指出：“放在你们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用它“坚韧地

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应该承认中区（即中央苏区的简称——引者）目前环境的严重性”，“对游击战争的坚持性不足是最大的危险”。因此，必须“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环境相适应”。“短小精干是目前的原则。”“多余的弹药分配给群众，最好的干部到游击队去。”要给“地方党及游击队以独立的领导权”。“庞大的机关应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应随游击队行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电示传来，毛泽覃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兴奋万分，决心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转变斗争方式，发展游击战争，不管条件怎样困难，也要坚持斗争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最后一口气！

不久，毛泽覃根据中央分局的统一安排，率领独立师的一部前往福建长汀的四都，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军区司令龙腾云率领的队伍会合整编，成立新的闽赣边界军区领导机构，毛泽覃是军区司令部的领导成员。当时，他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曾经建议“放弃四都，将部队编成几个支队，四处袭击敌人，领导中心退到闽粤赣边的深山中去。”可是，万永诚却拒绝接受。毛泽覃一方面给万永诚做工作，一方面向红军指战员作宣传，反复强调不要死守在山上，要率领部队下山去打游击。然而，万永诚仍将军区直辖的两个主力团埋伏在山上，等待敌人进攻，企图打一个歼灭战，以改变当时的不利形势。结果两个主力团反而被敌人打散。

四月上旬，部队在腊口西分水坳被敌人包围，经过激战，遭到重大伤亡。为了摆脱敌人，决定由龙腾云、万永诚率领大部分队伍向东突围，毛泽覃率领一部分队伍担任掩护，然后向西突围。龙腾云、万永诚突围后，第二天在梅子坝又被敌人包

围，部队打散，龙、万二位同志在战斗中牺牲。毛泽覃率领一部分队伍完成掩护任务后，突出重围，到达田心，不料在此又遭敌人伏击，队伍也被打散。他迅速收集一部分被打散的战士，摆脱尾追敌人，经过艰苦转战，来到长汀和瑞金边界的一片大山之中。

最严重的考验来到了，敌人“象梳梳子一样”地搜山，十几个人在山上打圈圈，找不到吃的东西。已是几天没进过半粒米、一口汤了，不少人饿得走不动路。有个战士问毛泽覃怎么办，毛泽覃立即派三个战士去找老乡，设法买点吃的。三个战士找到一个老乡住的地方，没有见人。后来发现一个地窖里有芋头，一块地里有蔬菜，可是没有人，再等下去又怕暴露目标，于是他们就弄了一些芋头和蔬菜，留下一些钱放在菜地里。后来，到一个纸槽里烧芋头吃，木板是湿的，炉火烧不旺，烧得半生不熟，大家也都吃得很香。一天，他们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饿得实在不行，悄悄来到一个单家独户的老乡家里，要求买点吃的。这家老乡见到红军就象见到亲人一样，没有什么招待，心里过意不去，就把仅有的一头小猪送给他们，牵着猪领他们钻进一个偏僻的茅草蓬里杀死，然后在他家煮吃。毛泽覃给了他一叠银元。饭后，那位老乡又领他们到一个名叫跌死猫的高崖上面隐蔽休息。

晚上，他们就在陡峭的高崖上面露宿。毛泽覃揣摩着战士们的情绪，轻声地同他们谈起话来。他问同志们：目前形势严重，大家想想，今后该怎么办？同志们表示坚决跟着党走。他说：对！目前形势严重，只是暂时现象。国民党反动派是注定要死亡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一定要看到光明的前途，经受住困难的考验，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要奋战到底。眼

下虽然剩下的人不多，但要坚持斗争，要设法与中央分局领导的队伍会合，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战斗。

正当他们谈话的时候，山下的敌人发觉他们，顿时枪声大作，无数的子弹向跌死猫的高崖上飞来。毛泽覃一声喊：“撤退！”战士们迅速飞下高崖，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茫茫的夜海之中。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覃率领游击队穿山越岭，跃涧涉溪，来到瑞金县黄膳口附近一个名叫“红林”的大山之中。这天傍晚，他们来到高山上面的一个小村落边。这个村子名叫黄田坑，只有几户人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复“搜剿”，大多数人去房空。他们悄悄摸进村来，只有一家还有人在，父子两个，儿子大概十五六岁的样子。这位老乡家里很穷，又遭国民党匪兵的多次抢掠，虽无好的招待，但仍尽力弄了一餐晚饭给红军吃。饭后，他又叫自己的儿子送他们到山上的一个纸槽小屋里过夜。

这是一栋小小的双层土墙房子，前后有门。房子的后面和左右两边都是耸入云天的山峰。房子前面是一条狭谷，有几丘水田。一道山泉在狭谷中和水田边流淌，发出一阵阵清脆而悠远的声响。毛泽覃和战士们在这个僻静的纸槽小屋里休息，商谈着如何冲出敌人的包围，找到中央分局首长领导的部队。深夜，毛泽覃把一个姓杨的战士叫到跟前，指示他说：你到杉背坑去找陶古游击队，请他们明天到这儿来，一起攻打国民党的黎子岗炮楼，我们从那儿冲出去。清晨，他又叫醒一个姓何的战士，派他出去侦察一下，说：你到下面的村子边看看，有无敌人，发现情况，立即回来报告。那个姓何的战士胆怯，有点不大高兴，勉强背起马枪，高一步低一步地离开纸槽，走不多

远，就钻进一个茅草丛里睡觉。这时，敌毛炳文部二十四师汤团某连的部分敌兵，在排长兼便衣队长秦坤的带领下，前往某地，路过这里，偶然发现草丛里躺着一个人，立即围了拢去。那个姓何的家伙贪生怕死，没有鸣枪报警，没有任何反抗，就当敌人的俘虏，并且背叛革命，供出在纸槽小屋还有十几个人，十几条枪，其中有一个姓毛的司令。

敌人得到这个情况以后，立即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带着机枪，在那个叛徒的带领下，在陶古游击队未到之前，很快就包围了纸槽小屋。毛泽覃一听到枪声，立即机警地冲到左边门口，命令战士突围，他来担任掩护。当部分战士突围后，毛泽覃还未来得及冲出去，一个伪兵窜进屋来，准备射击，毛泽覃眼明手快，猛然一下，就把这个伪兵的手抓住格斗起来，飞起一脚，便把那个家伙踢倒在地。这时，另一个匪兵绕到后门。毛泽覃听到后门有响动，立即跳出前门，并迅速转过身来准备射击，不料那个家伙开了一枪，子弹穿进毛泽覃的前胸……

英勇无畏的毛泽覃同志，为了解放祖国和人民的神圣事业，为了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光荣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毛泽覃牺牲后，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照片，还有党证。这照片和党证沾满烈士的鲜血，素白的粗纸上，透出一片殷红……

如今，在烈士牺牲的地方——瑞金县红林山区原安治公社现改名为泽覃公社、原红林大队现改名为泽覃大队的那个纸槽小屋，常有人来这里瞻仰、学习。前几年人们在这个小屋门前的草丛里面，捡到一颗红星奖章。那是苏维埃中央为表彰红军指战员在革命斗争中的功绩而颁发的一种奖品。那染着斑斑血迹的红星，是毛泽覃烈士光辉一生的象征。毛泽覃的英名，就

象一颗红星，将永远在祖国的史册上放射光芒。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张琼：《清水坑畔的亲切教诲》，载一九七七年十月五日《文汇报》。
2. 鸣非：《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纪实》（一九二三年九月），载《湖南历史资料》一九五八年第二期。
3. 《周士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4. 何长工：《伟大的会师》，载《星火燎原》第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5. 伍云甫：《年关起义在耒阳》，同上。
6. 杨至成：《艰苦转战》，载《红旗飘飘》第十四集，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
7. 《毛委员在井冈山》，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
8.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
9. 贺麓成、裘之俤：《毛泽覃在井冈山的故事》，载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江西日报》。
10. 《赣南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资料》（一九五九年编写）。
11. 《遂川县革命斗争史》（一九六〇年编写）。
12. 《吉安县革命斗争史》（一九六〇年编写）。
13. 沉浮：《毛泽覃在长冈乡二三事》，载《红色风暴》第九集，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
14.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闽西三年游击战争》，载《星火燎原》第四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
15. 《关于毛泽覃同志壮烈牺牲情况的调查结论》（江西省瑞金县毛泽覃烈士专案调查组一九六九年六月整理）。
16. 访问下列革命老同志和原苏区群众等共数十余人的谈话记录：
李井泉、何长工、谭冠三、邓子恢、曾山、陈正人、肖克、陈伯钧、刘型、赖毅、曾敬烦、黄达、徐先兆、张琼、危秀英、钱希均、周文楠、毛照秋、文东仙、蒋德云、甘纪犹、

刘育柱、刘应龙、于澄坤、王次模、王位农、郭谋泮、胡嗣龙、罗国倬、张庆隆、陈立汗、刘后尧、曾根秀、李长秀、张永丰、谢采标、钟启松、邹月明、邹朋国、杨淑英、刘之果、刘长桂、华海发、李达海、兰文才、何富庆等。

17. 佃汉：《毛泽覃生平记》，见伪《社会新闻》第九卷第四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
18. 敌伪报纸关于毛泽覃转战和牺牲情况的报道。见《中央日报》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四日和四月三十日，江西《民国日报》一九三五年四月三十日。

封面设计：王艺光

统一书号：11094·72

定 价： 0.94 元